

权力与人

권력과 인간

思悼世子之死
与朝鲜王室

[韩] 郑炳说 정병설 著

丁晨楠 叶梦怡 译

자도세자의 죽음과 조선 왕실

父与子 君与臣 情与礼

讲述朝鲜时代王室
最大的悲剧

——揭开思悼世子之死的真相以及权力和人性的本质！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改订版序言

本书出版已近十年，这期间在学界内外获得较多反响，特别是还拍摄了讲述思悼世子人生的电影，获得了巨大关注。本改订版将在回应学界若干批判的同时，补充未尽的研究。借助此次增补新内容的机会，我也修正了书中的一些谬误。现在正在进行中文版翻译工作的丁晨楠博士经常就书中内容向我提问，并纠正了一些谬误。谨此再次向丁晨楠博士与给予改订版出版机会的文学社区出版社深表谢意。

郑炳说

2021年6月

自序

20世纪50年代，有首流行歌曲的开头如此唱道：“金玉之身，贵为太子，竟死于木柜中！可怜的思悼世子！”人们认为思悼世子是未能享受与生俱来的荣华富贵，痛苦而死的可怜人。正是因为民间认为思悼世子命运悲惨，怨恨深重，可能招来巨大灾祸，所以将其奉为辟邪消灾的神灵。百姓们因思悼世子意外沦落至可怜境地而同情他的悲惨命运，于是与寻常百姓相距甚远的世子成了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共情偶像。

我们听闻思悼世子之死时，脑海中一定会浮现一个疑问，那就是思悼世子的死因。父亲为何要处死儿子？为何偏要把儿子关在木柜里？最为详细解答思悼世子之死的资料是惠庆宫撰写的《恨中录》。

《恨中录》中记述思悼世子之死的部分是她在纯祖在位时写成的。惠庆宫贵为国王的祖母，敢于写下他人不敢言及的内容。即便如此，她仍非常委婉地记述了与世子死因直接相关的世子之罪。因此不少人误读了《恨中录》，大家以为惠庆宫说的是思悼世子狂易而亡，并将此理解为国王因思悼世子狂易而处死了他。

这样的误读又引发了新的疑问。儿子狂易，父亲就会处死他吗？疑问之下，有人提出了新的死因。他们主要参考正祖撰写的语焉不详的思悼世子之《行状》，创造出思悼世子是党争牺牲品的假说。思悼世子厌恶掌握大权的老论派，站在少论派一边，因此被支持老论派的英祖处死。惠庆宫替促成杀死丈夫的老论派娘家辩解，诬陷思悼世子是疯子。

这种新假说逐渐超越“狂易而亡说”成为通论，无人一一考证该主张及其依据。我在注释并翻译《恨中录》时得以细致考察与思悼世子死因相关的主张，结果令人十分惊讶，怎会产生以错误的基本解说、完全颠倒事实的论据为基础的学术假说？怎会有部分学者不断加深错误，让错误学说成为定论？为何学界至今都未曾严谨考证过该问题？

我无法对这种错误置之不理，所以针对某本鼓吹“党争牺牲说”的书发表了批判论文。该书的写作目的是替“不幸而死的思悼世子”申冤。在该书看来，思悼世子不是狂易而亡，天资聪颖的他不过是因为支持少数党派含冤而死。为了支持该主张，该书努力展示思悼世子不但不狂易，反而具有贤明圣君潜质的一面，并且试图证明思悼世子在政治上倾向于少论一派。但我在该本书中却找不到能够有力支持这一主张的论据，只能找到对史料的歪曲与夸张，借以佐证自身观点的内容。

所谓提出学说，并非可以随意主张任何说法，至少要以事实为基础，揭示论据，再经过合理的推论步骤。但该书仅出于替思悼世子申冤的目的就随意歪曲了史实，歪曲解读了《英祖实录》等史料。如果历史可以分为“信念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那么该书基本可以被划为“信念的历史”。该书一分为二地对比好人的痛苦和坏人的得势，刻画出“可怜的思悼世子”与“邪恶的老论”，为迎合这样的构图而彻底无视了史实。

历史不能以善恶二分法轻易划分，思悼世子之死亦如此。我们需要警惕仅以思悼世子的视角来看待他的死亡。思悼世子之死与无数百姓之死相关，英祖废掉思悼世子的世子之位时写下的教文中提到仅被思悼世子杀死的无辜之人就多达百余名。思悼世子的滥杀也见于《英祖实录》。从这些无辜之人及其亲人的立场上来看，思悼世子的确该死。

固然要从世子的视角看待他的死亡，但也有必要超越该视角，即不止聚焦思悼世子的“可怜而亡”，而是以更公正的视角进行观察。思悼世子穿了与自身不匹配的衣服，世子之位也并不适合他。雪上加霜的是，他还有一位十分挑剔的父亲。思悼世子之死虽然可怜，但也难说他的死亡纯属冤枉。他非狂易而亡，而是因为试图弑杀父亲英祖才被处死，即企图谋逆。只要仔细阅读《恨中录》就能发现世子谋逆的痕迹。当然，其他的史料也能佐证这一事实。相关史料原本就以委婉方式记述，只是研究者至今未能明确读懂罢了。既然儿子决定弑父，那么英祖不得不处死儿子。

本书旨在阐明思悼世子之死的真相，同时深入当时的宫廷，探讨宫中之人，并分一一析国王、王妃、大妃、后宫、世子、内官、内人等宫中之人面临的现实，以及他们的梦想与欲望。宫廷史相关史料相对丰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特定事件进行立体考察。立体考察能够更准确、更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有时还能揭示隐藏在权力背面的人性，亦可以解读出英祖、思悼世子、正祖等最高当权者的人性苦恼与内心矛盾。

本书初稿是去年一年上传至互联网的内容。该文稿在Naver文学社区出版社的博客上以每周一篇的形式进行连载，总共48期，是首次在网络进行连载的人文学科文章。互联网可以提供只要上传文章，就能得到匿名评价的环境。我对这个未知的世界多少有些期待，但仍抱有不安。思悼世子之死本身就是一个大众话题性较高的主题，又加重了我的担忧。文章于连载初期在纸媒上引发些许争议，但所幸在连载中并没有遇到问题。

连载时也遇到不少开心的事。在网络上传连载文章后，有人指出错误之处，也有人提供相关信息。连载中期，我以同一主题在韩国教育放送公社(EBS)的节目《TV一生大学——历史故事》中进行演讲，也通过这档节目遇见了新读者。去年秋季枫叶正红之时，我在昌德宫与此前长期只在网络上交换意见的诸位朋友碰了面。那日与读者们的古宫探访就像与老友郊游一般令人满足。对我而言，一年的连载既是一场愉快的旅行，又是一段特别的经历。这一年中能与读者们一道踏上令人心动的未知之旅，离不开文学社区出版社工作人员的帮助，再次向各位表达诚挚的谢意。

郑炳说

2012年1月31日

写于思悼世子辞世250周年之际

导言

思悼世子之死是理解英正祖时代的最重要政治事件。因其极端性，该事件不仅被历史书籍，也被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反复提及。思悼之死如此广为人知，所以学界有不少人认为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分析与整理。但只要细看先行研究，就会发现其中存在无数漏洞。以概括的形式介绍并附上一两句意见的文章不在少数，专门的研究却十分罕见。

韩国文学界首先展开了针对该事件的正式研究。金用淑先生在1958年发表了《思悼世子的悲剧及其精神分析学的考察》。她依据《恨中录》，沿袭了惠庆宫所谓思悼世子是因“狂症”而死的观点。该见解在十年后受到了韩国史学界的批判。韩国史学界的依据是李银顺教授的论文——《〈恨中录〉呈现的思悼世子死因》。李银顺教授沿袭成乐熏先生所著的《韩国党争史》中的观点，从正祖撰写的思悼世子的行状入手，指出世子是党争的牺牲品。

1969年，李揆东博士发表了题为《关于衣襟症的精神分析学的考察：〈恨中录〉展示的思悼世子病历研究》的论文，这也是他在首尔大学医学院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但史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推进研究。之后虽然出现了如崔凤永的《壬午祸变与英祖末期正祖初期的政治势力》等大量政治学角度的研究成果，但并未出现细致分析思悼世子之死的学术著作，只停留在李德一的《思悼世子的告白》(1998)等大众历史书的阶段。如上所述，将思悼世子之死像讲老故事一般轻率写下的文章虽多，但学术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本书乍一看像是对早前研究成果的整理，但实际上取得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新成果。从结论上来看，本书虽沿袭《恨中录》中所谓思悼世子在精神不稳定的状态下试图攻击英祖，犯下谋逆罪的说明，但并不像早期《恨中录》相关研究那样，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观点，而是通过《承政院日记》等各种史料批判分析《恨中录》所揭示的情

况，再推导出结论。因此与先行研究相比，本书可以更加缜密明确地解释思悼世子的死亡过程。

为理解思悼世子逐步走向死亡的过程，本书首先对思悼世子生活的宫廷进行说明。在思悼世子出生时，他有四位长辈，分别是国王、大妃、王妃，以及他的生母。本书首先探讨这些人物的性格、地位及其与思悼世子的关系。从他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出，宫廷生活绝非风平浪静：从执政前就被不安和恐怖裹挟，动辄向周围发火的国王；被这样的丈夫薄待，郁郁寡欢的王妃；作为国王英祖的保护人却常与英祖爆发激烈冲突的大妃；除生下世子外一无所有的可怜生母。世子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成人。

思悼世子在无数人的关注与期待中出生。幼年的他没有辜负父王的期待，备受赞誉，但在十岁左右开始让英祖失望，因为他厌学。思悼世子是个贪吃厌学的傻孩子。这是《恨中录》语焉不详，却在《承政院日记》中呈现的世子模样。当然，世子并不愚蠢无知，只不过与英祖期待的德学兼备、严于律己、忠厚诚笃的治国贤才相去甚远。他比起学者更像是个艺术家。与父亲性格不合的世子在父亲面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英祖常在群臣或其他下人面前公然嘲讽羞辱世子，世子想躲避父亲严格又挑剔的目光，却又无处可逃。

世子在极度压力中挣扎，任何人在这样的压力下都可能变得疯狂。这种情况不仅见于《恨中录》，也见于《英祖实录》《承政院日记》。但世间并不鲜见否认世子患上狂症的意见，最近涌现出一大批明确提到思悼世子罹患狂症的史料，如英祖撰写的《废世子颁教》、思悼世子的墓志铭、思悼世子致岳父的书信、正祖对亲家公金祖淳的言说等。

世子的狂症与他的死亡直接相关。狂症虽非直接死因，但他由此采取的行动将其引入死路。英祖并非因为世子狂易才处死他，而是因为他试图谋杀自己。世子在被关入木柜前的一两日夜，曾试图持刀进入宫阙弑父，英祖听闻此事后才处死了他，即思悼世子死于谋逆罪。相关史料非常谨慎小心地记述了此事，因此研究者至今未能明确指出这一点并进行分析。若将处罚当日英祖颁布于世的《废世子颁

教》与《恨中录》对比，情况就昭然若揭。尽管英祖并非对儿子罹患狂症一无所知，但其罪至极，这让英祖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英祖对远不及此的琐屑小事都急躁易怒，这样的谋逆之事显然远超他能忍耐的极限。英祖四处寻找处死儿子的各种方法，最终将他关进木柜。

世子死后，针对其死亡的疑问不断产生。这是因为不管以何种理由解释，父亲将儿子关入木柜致其死亡的行为都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但制造疑问的始作俑者就是英祖。英祖禁止任何人提及此事，但他本人却时不时提到后悔处死儿子。当然，他并不曾公布这点。国王的后悔随即引发了疑问。国王并无处死儿子之意，而是群臣的煽动所致，说法开始发生变化。但如果考察木柜在世子之死中的使用过程，就能发现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世子不是偶发的临时事件，即便有若干名大臣誓死反对，英祖仍强行下令。他把世子关进木柜到致其死亡，仍等待了七八日。此外，当时不少史料也记录了英祖处死世子时的冲天之怒。

随着正祖的即位，该事件也迎来了全新的局面。疯世子之子——正祖成了一国之君，他不可能袖手旁观。正祖在英祖死前一个月上疏英祖，请求删去《承政院日记》中关于父亲胡作非为的内容。正祖早在即位前就迈出了通过销毁记录而歪曲历史的第一步。即位后，他提升了父亲的地位，并大规模地改建祠堂。与此同时，他也一并肃清了思悼世子在世时的朝廷核心势力——英祖时期的权臣。若是已死之人，就以谋逆嫌疑使其后代不得发挥政治影响力；若是存世之人，就要么削职，要么处死。此时思悼世子的死亡责任已被部分转嫁到他们身上。通过销毁记录、转嫁责任，正祖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思悼世子的形象。

在将父亲的陵墓迁至水原的过程中，正祖进一步加快了神化思悼世子的速度，即在后期执政时通过追崇思悼世子来强化自身权力的正统性。此时他甚至亲自撰写父亲的行状，突然论及“金滕之词”，即试图完全颠覆世人对父亲形象的认知。正祖在思悼世子的行状中绝口不提任何不利于父亲的话，而是写下父亲的二十八年人生中极少从英祖那里听到的称赞、大臣们的赞辞，以及往返温阳温泉时听到的世人

称颂等。不论是谁，作为儿子都不会试图将父亲的狂症和恶行写进传记。通过这种只挖掘伟大一面的传记，思悼世子以全新的形象获得了新生，成为贤明温良的世子。正祖进一步捏造了世子因逆贼诬陷而死的故事，当然，他并没有指出这些逆贼的具体谋逆行迹。如果不一一调查事件前后的真相，就只能按照正祖意图的方式进行分析，创造出睿智贤明的思悼世子形象。

正祖为了父亲、为了王室，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着手推进思悼世子的追崇事业。谁都不敢轻易反驳国王小心推进的生父复权事业，因此也出现了冤枉的受害者，即为了掩盖思悼世子的恶行，需要把责任转嫁到牺牲品身上，代表人物就是金尚鲁和洪启禧。他们作为世子的老师，不能说没有责任，但翻阅事件发生前后的史料，可知他们的责任非常有限。但在正祖的操作下，他们成了大逆不道的罪人。他们从未违抗过英祖、思悼世子或正祖，却背上了“逆徒”的罪名。

此事也波及惠庆宫的娘家。当然，国王的外戚虽不会像金尚鲁和洪启禧那般样被指为“逆贼”，但朝中仍不断指责他们对思悼世子之死负有责任。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是惠庆宫的父亲洪凤汉是否提议将世子关入木柜。只要是与王室相关的问题，哪怕只有轻微嫌疑都会被处以大逆罪，惠庆宫必须解释清楚娘家的责任。她的核心观点是，虽然不能说娘家完全没有道义上的责任，但从旁促成世子之死的逆贼罪名却是毫无根据的。这样看来，惠庆宫的观点带有反驳正祖一系列歪曲历史做法的性质。无人能反对正祖歪曲历史的做法，但一旦波及娘家，惠庆宫站了出来。

本书将讨论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包括思悼世子出生、成长、死亡的过程，此后英祖的反应与正祖歪曲历史的做法，以及惠庆宫在纯祖时期撰写《恨中录》的行为。若想准确把握事件的本质，需要了解事件的背景与经过以及相关谈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了解谈论的变化，就无法批判地解读史料，由是陷入莫名其妙的分析中。我认为此部分是本书取得的重要成果。

宫廷史如同其他历史事件一样，特别需要审慎解读。宫阙是一般人难以进入的场所，即使在宫中有所见闻，也不能传播。惠庆宫初次

入宫时，英祖便给予她忠告，即在宫中就算有所见闻，也要装出不知道的样子。不能谈论至尊之人的言行举止，不得已提起的话，也必须以极度委婉的方式叙述。像思悼世子事件，此后常以“某年事”来称呼；木柜以“一物”来指代；君王传位等重大命令以“不忍闻之教”等来代替。凡此种种，都以这种方式记述，若不慎重阅读史料，很容易产生误读，先行研究中，由此引发的失误也比比皆是，本书也不能断言绝无此类失误。我只能说，本书是在力图减少这类失误，而对各种史料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的成果罢了。

第一部 思悼世子的长辈们

第一讲 英祖：不安与愤怒的帝王

十岁的惠庆宫初次入宫时，宫中有“三殿”。所谓“三殿”，就是在称呼后添加“殿”的三位人士，即大殿、中殿、大妃殿。大殿即国王，也就是英祖；中殿即王妃，也就是贞圣王后；大妃殿即国王的母亲，也就是肃宗的第三任王妃仁元王后。英祖的生母是原为宫女之婢的淑嫔崔氏，思悼世子的生母是宣禧宫暎嫔李氏，而淑嫔崔氏在惠庆宫入宫前就早已去世，因此惠庆宫见过的宫中长辈除三殿外就只有宣禧宫。我在第一章中将简单介绍这四位长辈的生平。

英祖的偏执症

英祖生于1694年，1724年登极，1776年去世。他享年八十三岁，在位五十三年，不论是寿命还是享国时间，都是历任朝鲜国王中最长的。惠庆宫观察了英祖三十多年，认为他的性格是“详察敏速”，即“观察仔细、行动敏捷”（惠庆宫洪氏著，郑炳说译：《恨中录》，文学社区，2010年，第34页，以下引用仅标注书名与页数）。同时，英祖事事上心的习惯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惠庆宫对英祖性格的描述如下：

英庙用言之时，尽讳“死”字、“归”字。次对、外出所着之衣襟，改着后入内。或酬酢或闻不吉之言，入临之时，漱口洗其耳。又先召人酬酢一言后，再入于内殿。为其好事与不好事，出入之门皆异。所爱之人所居之室，使不爱之人不居焉；所爱之人所行之路，使不爱之人不行焉。吾至极惶恐，不敢仰度其历历爱憎。（《恨中录》，第40页）

英祖极度恐惧死亡，因此几乎不使用任何与死亡相关的词语。如果在外听到杀人或与之相关的不祥之语，必须刷牙或清洗耳朵祛除不

祥后再进入寝殿。英祖非常严格地区分生死与内外的界限。

不仅如此，他病态地区分好事与坏事，宠爱的人与憎恶的人。好事或坏事发生时，英祖的出入之门都不同。后来惠庆宫仅凭英祖处死世子前从景华门而入的消息，就判断会发生不祥之事。因为英祖平时进入昌德宫璿源殿时，若是经过万安门，则无事发生；若是经过景华门，则必有变故。璿源殿是供奉英祖父亲肃宗的御真即肖像之处。在行善事前向父亲肖像禀告时，便经过意为“万事平安”的万安门；禀告祸事时，则经过景华门。参考英祖忌讳“死”字的性格，可知他这么做是因为景华门的“华”字，“华”与意为“灾殃”的“祸”是同音。

英祖根据不同的事情出入不同的门，对待不同的人更是如此。英祖不允许自己宠爱的人与憎恶的人共处一室，不允许自己憎恶的人走宠爱的人所经过的道路。某次思悼世子前去英祖宠爱的女儿和缓翁主的住处附近，英祖知道后大发雷霆，命令他即刻返回。父王发怒后，世子惊慌失措，翻过高窗后逃走。（《恨中录》，第62页）虽然不知思悼世子踩着什么东西翻过窗户，但这是有多恐惧才会让一国的王世子、代理国事的掌权人翻窗逃走？

英祖不仅严格区分生死、内外、好恶和爱憎，而且彻底执行。这样彻底的二分法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病。某心理学论文曾指出，偏执症的人认识自我的根本方式就是二分法。而且偏执症患者为了自身的“情绪生存”会严格区分善与恶，将坏事全部归咎于外部。英祖的行为方式与论文的描述惊人地一致。

英祖似乎患上了这样的偏执症。心理学上认为这种偏执症与年少时期遭受的创伤、屈辱、尴尬、虐待等负面经历有一定关联。英祖在年少时期经历过怎样的伤痛？惠庆宫也将英祖的病态性格归结于年少时期经历的考验。惠庆宫提到的相关事件分别为“辛壬年之事（辛丑年1721年与壬寅年1722年）”与“戊申逆变”。“辛壬年之事”即英祖在即位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考验，“戊申逆变”即“李麟佐之乱”，是英祖在执政初期经历的叛乱。换言之，英祖从即位到稳定掌

权之间所经历的极端困境彻底击破了他的精神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他的幼年时期。

王子，与生俱来的不安

英祖生于1694年，父亲肃宗时年三十四，母亲淑嫔崔氏时年二十五。这一年，曾因张禧嫔而被逐出宫外的仁显王后时隔五年回到宫中。淑嫔崔氏出身寒微，地位甚至不如宫女，只是宫女之婢。崔氏在生下英祖之前还曾生下一子，在生下英祖几年后又生有一子。但除英祖外，这二子均早夭而亡，但从中可以看出崔氏备受肃宗的宠爱。

英祖出生时已有一位兄长，即日后先于英祖登上王位的景宗。景宗是张禧嫔之子，比英祖年长六岁。英祖出生时，景宗已被封为世子，即被定为下一任国王。也就是说，英祖在出生时不过是一介王子。

对无法成为王的王子而言，死亡的阴影常常笼罩在身边。朝鲜王朝末期为高宗生下王子，又失去两岁王子的后宫光华堂李氏对哀悼之人说：“在这个恐怖的世界里，即便长大成人，又怎么能平安无事呢？”这件逸事明确道出了王子英祖的处境。思悼世子有四子，除了日后即位的正祖外，其余的儿子均因谋逆罪而被处死。恩信君李禎在正祖登极前就因谋逆罪被发配济州岛，最后在不安与恐惧中死去；恩全君李𢈶在正祖执政期因谋逆而被处死；恩彦君李裨在纯祖执政期因谋逆而被赐药自尽。无法成为国王的王子，他们的命运大抵如此。因而可以想象根植在王子英祖心中的不安。

在这种处境下，作为王子的英祖实际上也未得到符合王子身份的待遇。这与今日一般人的想法有极大出入。《肃宗实录》（1700年六月十三日）记录了统制使闵涵因给时为王子的英祖赠送扇子而被大臣上疏弹劾之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物品，将其私下赠给王子也会引发问题。王子就是这样被警惕的对象。还曾发生过司谏院下吏殴打王子英祖下人的事情，肃宗认为这是士大夫蔑视王室后裔而引发的事件，下令重刑处置。（《肃宗实录》，170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祖虽是王子，但却是被权贵们无视的存在。

“辛壬祸狱”与“戊申乱”

王子英祖的与生俱来的不安，在父亲肃宗去世，同父异母的兄长景宗即位后迎来了新局面。景宗虽在父王死后顺理成章地即位，但体弱多病的他难以行使王权。景宗十四岁时，生母张嬉嫔被赐药自尽。坊间流传的无根之言称张嬉嫔为断绝朝鲜王室的后嗣，曾拉扯景宗的生殖器，因此景宗无嗣。景宗在即位翌年就宣称自己病入膏肓，封英祖为王世弟，准备托付国事。最终英祖作为继承人开始分担国事。

但问题在于权力绝对无法分享。从朝鲜王朝初期的两次“王子之乱”中也能看出，权力面前并不存在“父子”与“兄弟”，更何况景宗与英祖只是异母兄弟。景宗虽宣称因当下之疾将一部分权力移交给英祖，但眼看权力像潮水一般退去的他只要发怒，就能立刻处死英祖。因此代理部分国事的“代理听政”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英祖在令人不安的代理听政中度过了一年多的日子。

事件在1721年（辛丑年）末爆发。当时南人党已经失势，西人党分为老论与少论两派争夺权力。少论主张景宗继续执政、牵制英祖，老论倚重健康的统治者英祖，并试图保护他。老论与少论围绕王世弟代理听政与否展开争论。但在1722年（壬寅年），睦虎龙告发老论谋逆。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1788年完刊）中提及马可·奥勒留之子——暴君康茂德治下的谋逆诉讼时直言“嫌疑就是证据，审判就是有罪”，即只要有嫌疑都会遭到处罚。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在朝鲜时代的谋逆案中，仅凭嫌疑也足以让人处于险境。首先，在审问过程中死亡的人并不在少数。展开大规模调查与审问的话，便会有无数人下狱并死于狱中。睦虎龙的陈述中也有对英祖不利的内容，即英祖曾与逆贼接触。英祖立刻表示愿从王世弟之位退下，这是他面临的最大危机。

事情渐渐变得危急起来。少论一派甚至指使宦官朴尚俭阻拦英祖向景宗问安。一旦无法与国王进行沟通，风言风语会从中觅得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下，国王的亲信只要说上一两句对英祖不利的话，他在顷刻间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后睦虎龙的告变以金昌集、李颐命、李健命、赵泰采所谓“老论四大臣”被处死而告终。被处死的大臣足有四位，更难以想象受其牵连而死的人数。以老论的立场整理此事的《辛壬纪年提要》指出，仅仅在鞠厅遭受拷问而死的人就多达五十三名。如果再加上追随丈夫而自杀的夫人与流放而死之人，受害者人数只会进一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被怀疑涉嫌谋逆的英祖日复一日地在死亡的恐怖中挣扎，无法知道明日会不会到来。

最终景宗去世，即使不知道对其他人影响如何，但对英祖而言实属幸事。虽然一度危在旦夕，但他总算能将绝对权力收入囊中。所谓“血债血偿”，英祖的即位展示出权力构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英祖毒杀景宗的说法开始流传，察觉到危机的一些少论派联合部分南人发动叛乱，这就是1728年（戊申年）的叛乱，即“戊申乱”。世人又取中心人物李麟佐之名，将这场叛乱称为“李麟佐之乱”。

朴弼显等少论激进派主张英祖不是肃宗之子，甚至还与景宗之死有牵连。他们试图除掉英祖与老论，拥立昭显世子的曾孙密丰君李坦为王。当时朝鲜面临干旱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大饥荒，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叛军轻而易举地壮大起来。李麟佐在1728年三月十五日占领清州城后，以替景宗复仇为名进军汉阳。但该月二十四日，叛军在安城败于官军，气势大挫。同时，郑希亮在岭南举事，一时间占领安阴、居昌、陕川、咸阳等地，但遭到少论朴文秀等人的讨伐。

反对势力集结兵力攻入汉阳的叛乱已有仁祖时期“李适之乱”等先例，此前仁祖也是通过军事政变推翻光海君才登上王位。比任何人都熟知这些先例的英祖对叛军进攻汉阳之事自然感到毛骨悚然。换言之，即便成为国王，英祖也无法高枕无忧。因此惠庆宫将这两大事件，即跨越辛丑与壬寅两年的“辛壬祸狱”与“戊申乱”视作英祖的两大心理创伤。

出身情结

惠庆宫虽然不便直说，但英祖更广为人知的心理创伤是他的出身情结。惠庆宫提及父亲洪凤汉科举及第时说道，当时仁元王后家、贞圣王后家无中举之人，思悼世子的亲外祖家更不值一提。（《恨中录》，第193页）这不仅是对微贱宫女出身的宣禧宫，也是对自己丈夫暗含炫耀之意的内容。惠庆宫都这么看待丈夫思悼世子了，更不用说怎么看待公公英祖了，她不可能瞧得上生母只是宫女之婢的英祖的出身，其他大臣也是如此。无人不晓，但谁都不便发诸口的“英祖的出身”就是童话中的“国王长着的驴耳朵”。

英祖在六岁时获得“延礽君”的封号，即正式的王子名号。十岁时行意味着成人的冠礼，十一岁时与十三岁的新娘成婚。新娘是进士徐宗悌的女儿，后来她成为贞圣王后。关于这对夫妇的初夜有一则逸话流传于世，金用淑先生在《闲中录研究》中提到此事。

初夜时英祖握着新娘的手称其秀丽，于是新娘回答：“生于富贵而然。”英祖认为新娘的回答是讽刺自己的出身。他的反应是“生于富贵？这是讽刺我是微贱宫女之婢的儿子”。此后英祖渐渐疏远了贞圣王后，再也不愿意见她。《恨中录》亦详细记述了英祖对贞圣王后的冷淡。

英祖的这种尖锐的自我意识掌控了他的一生，这不仅见于稗官野史，也见于《英祖实录》与个人文集。这里我首先介绍《英祖实录》记录的一则事件。英祖九年（1733年）十一月初五日（此时英祖正当四十岁），宣祖的后裔——五卫都总府都总管海兴君李檀上疏。李檀曾出入大臣们的会议室——宾厅，误坐了大臣的座椅，而宗室人士被认为不应坐大臣的座椅，于是他与相当于现在国务会议的议政府发生了冲突。结果左议政徐命均抓捕了管理宗室的宗亲府的书吏，随后海兴君的弟弟海春君出面抓捕了议政府的书吏。双方都抓捕下人展开争斗。

因此海兴君上疏国王，而徐命均等人也在国王面前提到了此事。领议政沈寿贤、平定“李麟佐之乱”的功臣朴文秀皆支持徐命均，建议国王处罚海兴君等人。然而英祖的想法却不同，他认为备受警惕而疲软的宗室遭到大臣的打压乃至受罚，实在是有些过分，于是他为海兴君辩护。即便国王为自己的血亲宗室辩护，但大臣们仍坚持主张处

罚海兴君。最终英祖暴怒，下令严惩朴文秀等人，并拍案怒道：“尔辈谓予以王子入承此位而轻之，故蔑视宗亲府耶？”

英祖这是在反问大臣们，他们是不是在蔑视非以正式世子的身份继承王位，而是经历了长久的不安岁月，最终以宫女之婢的儿子的身份得登大宝的自己。徐命均、沈寿贤等人比英祖年长十多岁乃至三十岁，他们清楚英祖孤单的年幼时节，内心深处未必没有蔑视英祖之意。英祖的心里话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大声喊出“我是国王！”既然他已经登上王位，现在大臣们也不得不瑟瑟发抖。

两天后，英祖怒火渐消，再次提到该事。他首先后退一步，提起自己还是王子时经历的一件事情。肃宗去世后，英祖匆忙入宫而被大臣的车马挡路在前，该大臣知道后面跟着王子，但也绝不让路。该举动就是在无视没有继位希望的孤单王子。英祖没有明示该大臣的名字，但他仍未忘记年少时在路上经历的事情。

英祖的出身情结至死也未消解。以茶山丁若镛的举荐者而闻名的南人领袖蔡济恭在文集《樊岩集》中记有一则《读鲁仲连传》。

“英庙当宝箚八十有余，无以遣日，常使玉堂翰注读古书以听。一日，承旨先读，次至兼春秋。兼春秋所读，即《鲁仲连传》。始读，上卧枕上，以御手加额，鼾睡正甘，兼春秋读过传中‘叱嗟’下四字。”“下四字”即“而母，婢也”。六个字合起来解释的话，即“呵呵，你妈是婢女！”这是鲁仲连为说服对方而举出的例句，原本是出身微贱亦无实力的周显王指责齐威王而被齐威王反骂的句子。

读书并未到此停下，英祖“忽惊悟，蹶然而坐，以手拍地曰：‘忍读四字入吾耳，读之者谁也？’兼春秋止其声，侍臣皆战栗。时今上以世孙侍傍，对曰：‘臣始终在此，未闻其读四字，所读板未及于此矣。’上曰：‘丁宁入吾耳，诸臣岂有不闻之理乎？’诸臣以世孙先有所仰对，一辞言曰：‘臣等不闻矣。’上玉色稍解，复卧枕上，筵臣遂退出。”在蔡济恭看来：“彼兼春秋者，遐方冷官之人，渠何以知四字之不敢读而为之不读乎？当是时，若无世孙邸下临

机捷疾周旋，祸机将无所不至矣。”所以大臣们才会一致感叹世孙（后来的正祖）的超常应变能力，称其为“圣人哉，世孙也！”

蔡济恭称：“余时以药院提举亲见筵中事，今于数十年后，偶读《史记英选·鲁仲连传》，追记之。”正如上文所述，英祖至死也未能放下出身情结。

附录 淑嫔崔氏的出身争议

至今未有证据能明确说明英祖生母淑嫔崔氏的出身。最近六卷本《淑嫔崔氏资料集》（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2009—2010年）出版，但这么多的资料也未能明确揭示崔氏的出身。相关史料隐去了她父母的身份与职业，因此现代人不得不依靠口传之言来进行推测。关于淑嫔崔氏的出身，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说法大致有三种，但均未涉及她父母的身份，而是提到她被肃宗看中时的职位。其一是汲水婢说；其二是针房内人说；其三是宫女之婢说。下面将一一讨论这三种说法。

汲水婢说是流传最广的说法。但汲水婢原本指的是下级婢女，她们需要在宫中上下班，这似乎与淑嫔崔氏并不相符。换言之，这一职业与淑嫔崔氏相关的诸多宫廷传说并不相符。传说淑嫔崔氏在被废位的仁显王后生辰当天陈设盛馔、欲伸诚悃，因而入于肃宗之眼。若是需要上下班的汲水婢，没有在宫阙里这样做的时间。

针房（负责针线活的地方）内人说是高宗为否定汲水婢说而提出的说法，见于金用淑先生的《朝鲜朝宫中风俗研究》（一志社，1987年，第80页）。英祖某日与母亲淑嫔崔氏聊天，问她以前地位低下之时做什么事最累。她答说在针房劳作之时，制作绗缝衣服最累，之后英祖再也没有穿过绗缝衣服。由是可知淑嫔崔氏不是汲水婢，而是针房内人，即作为英祖与思悼世子后人的高宗主张自己的先祖并非是地位低下的汲水婢。

宫女之婢说亦见于金用淑先生所著的《闲中录研究》（正音社，1987年，第209页）。宫女之婢是在宫中长期劳作的婢女，是侍奉宫

女之人。淑嫔崔氏若是针房内人，英祖就没有理由那么自卑。他的兄长是宫女出身的张禧嫔所生，他的儿子思悼世子也是宫女出身的宣禧宫所生，但他们并没有对出身感到特别自卑。在朝鲜，宫女之子成为国王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针房内人是宫女，宫女之婢是宫女的奴婢。宫女和宫女之婢因主仆关系而在身份上天差地别。英祖若是下级宫女之子，没有理由非得自卑，但若是宫女之婢的儿子，那他就有理由感到自卑。正如前文有关英祖出身情结的蔡济恭的记录，英祖因“而母，婢也”的攻击之词而厌恶该部分文段。宫女不是婢女，而是有严格正式职品的女官，也是不亚于朝廷官员的拥有权力的权势家。宫女之婢就是这种宫女的婢女。综合高宗的说法，可以推测淑嫔崔氏最有可能是针房内人的婢女。

翻阅记录惠庆宫生活的官方日记——《惠嫔宫日记》（郑炳说译注，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2020年，第13页）可知，所谓宫女的下人，即“宫婢”的名称有水赐、乳母、阿只、保姆、水母、陪婢、房子、巴只、阁氏等，并无宫女之婢(각심)。水赐即汲水婢，乳母、阿只、保姆是给王室幼儿喂乳并照顾他们的人。水母主要负责洗手间之事，陪婢扮演的是王室儿童之婢的角色。宫女之婢(각심)应该指的是房子、巴只、阁氏等人。

附录 延礽君肖像：不安与忧愁的表象

英祖的肖像有两幅流传至今。一幅是登上王位前的年轻的延礽君，另一幅是即位二十年后的堂堂正正行使权力时的帝王。据说英祖对画作的理解达到了画家们都认可的高度。（《肃宗实录》，1713年四月十三日）因此，他的肖像虽非他本人亲自所画，但也不能等闲视之。

《延礽君肖像》是1714年，也就是英祖二十一岁时绘制的肖像画。从他瘦削的脸庞、犀利的目光与固执的鼻尖中可以读到他的不安与忧愁，以及敏锐的性格。延礽君从十一岁时成婚至十九岁出宫为止，多次因住宅问题吃尽了苦头。他曾试图购买惠庆宫伯祖父洪锡辅的宅院，但遭到断然拒绝。（《肃宗实录》，1707年九月初三日）1714年的肖像是英祖在宫外思考迷茫的未来，度过不安时期的模样。

他若与任何有权者见面，就会被怀疑是不是在与人谋逆。由于王子的身份，他也不能随便见人。无事可做，但也不能放纵年轻的血气，生动描绘这样的不安的画作就是《延祔君肖像》。

然而三十年后，也就是英祖二十年所绘的《英祖御真》中，这样的不安感消失了。眼神变得柔软，眉毛也画得更为沉稳。与年轻时相比，他变得温和了许多。这就是君王的自信感和安全感。

第二讲 仁元王后：大妃，最高女性掌权人

权力的另一顶点

王朝国家秩序的顶点是国王。谁都不能挑战他的权威，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思，这就是绝对权力。但是儒教社会的朝鲜还存在另一个绝对权力，那就是父母。儒教最为重视孝道，即便是国王也不能违背父母的吩咐与心意。这就是国王的父母可以拥有与国王不相上下的权力的理由。但王位通常在国王死后被他的儿子继承，所以正常继承权力的国王没有在世的父亲，以国王之父的身份生活并享有权力的兴宣大院君是例外。尚在人世的国王的父母大多是国王的母亲或祖母。所谓大妃即王大妃或大王大妃。

实际上，如果出现国王年少而无法亲自统治的情形，那国家就会由大妃代为统治。朝鲜一般认为十五岁才算长大成人，如果国王不满十五岁，那就由宫中的最高长辈——大妃在国王长大成人之前代他处理国政。这就是“垂帘听政”。儒教礼法不允许男女同席，所以垂帘听政时会用帘幕隔开大妃与臣子，之后再讨论国政。朝鲜时代的垂帘听政从世祖妃贞熹王后起，至翼宗妃神贞王后为止，共七次二十九年。从朝鲜王朝五百年的整体历史来看，垂帘听政的时间并不长，但从朝鲜完全由男性统治的社会性质来看，这是令人吃惊的事情。加之这只是官方的、表面上的时间，实际上大妃对国政产生的影响力更为巨大。

把微贱的宫女之婢的儿子，度过不安的王子时期的英祖封为王世弟的人是太妃，保护了毫无权力基础的孤单的王世弟，把大权传给他的人亦是太妃。这就是英祖的母亲——仁元王后。虽然不是生母，但从名分上来看，她俨然就是英祖之母。

景宗与英祖的父亲肃宗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是仁敬王后，她是金万基之女，也是《九云梦》作者金万重的侄女。第二位夫人是因张禧嫔而被逐出宫门的仁显王后，她是闵维重之女。第三位夫人就是

仁元王后，她是金柱臣之女。仁元王后作为肃宗的第三任夫人，年龄并不大，仅仅比英祖年长七岁。对英祖来说，她是姐姐年龄的母亲。

仁显王后于1701年八月去世，随后十月张禧嫔被赐药自尽。宫中不能长期无女主人，因此肃宗着急成婚，翌年十月仁元王后就进宫了。十六岁的仁元王后成了四十二岁肃宗的妻子。张禧嫔之子景宗虽被封为世子，但谁也不知道若年轻的王妃生下儿子，继承情况又将如何。不过仁元王后并没有生下子嗣。

仁元王后虽没能把王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在肃宗去世后，她作为宫中最高长辈，一手包揽了将王权移交景宗的过程。在王朝国家中，没有比王权继承更重要的事情了，此等大事由大妃负责。国王临终时，大妃在最靠近他的地方倾听遗训，并宣布遗训。国王留下的遗言通过大妃之口得以公开。

仁元王后不仅将权力移交景宗，还支持英祖作为病弱景宗的继承人。景宗在即位第二年就收到了请求立储的上疏。从某种意义上看，该上疏既放肆又危险。景宗向大臣们拖延决定，而大臣们向仁元王后请求定下储君。于是仁元王后下手札给景宗，其中有一句话是：“孝宗大王血脉，先大王骨肉，只主上与延初君而已，有何他意？”也就是说将英祖定为继承人，于是英祖得以成为王世弟。可见册立国王的重任与权力在于大妃，大权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确定并移交。

英祖在代理听政期间，也受到仁元王后的保护，后来思悼世子亦是如此。代替国王处理朝政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件有负担又危险的事情。治国得当、掌握大权的话，会被国王误会是觊觎权力；频繁犯错、造成问题的话，会被认为资质不足，引发失望。反正是世子，就静静地等到适当之时继承权力即可，没必要代理听政惹出事端。此外，在现国王周围享受权力之甜蜜的利益既得者们并不乐见权力被稍微移交给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朴尚俭事件。这是景宗的直属宦官朴尚俭等人与宫女勾结，离间英祖和景宗的事件。在老论与少论忙于党争，英祖的处境极度不安的情况下，朴尚俭等人“托以阙中有狐，设机弃闭

清晖门。清晖门，即王世弟问寝之路也”。这就阻断了英祖直接谒见景宗给自身辩护的机会。此事件过后数月，睦虎龙告发老论人士谋逆时也提到了英祖，可见当时英祖的处境非常危险。

英祖曾请求惩治那些给自己造成危险的离间之徒，但景宗犹豫了。对景宗来说，处置经常在身边辅佐自己的手下并不容易。此时断然惩处他们的人是仁元王后。在朝鲜上下，能做国王不愿做或不能做之事的人只有大妃。大妃的命令即“慈殿的命令”，被称为“慈教”，拥有仅次于国王之令的力量。英祖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依靠仁元王后的慈教活了下来。对于英祖来说，仁元王后既是权力的传授者，也是救命恩人。

国王与大妃的冲突

权力绝无可能两立，它也让父子兄弟产生冲突。如果大妃拥有仅次于国王的权力，那么两者之间的冲突同样无可避免。大妃与国王的冲突在前代已出现多次。代表性的例子有仁粹大妃与燕山君、仁穆大妃与光海君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两个绝对权力的冲突通常是以掌权的国王的胜利为结局，但战胜大妃的国王并不能永远地享受胜利，这是因为忤逆母亲违反了儒教的绝对品德——孝。舍弃自身存在的基础——儒教，他很难在朝鲜继续担任国王。忤逆大妃的国王们都被赶下了王位。以头冲撞祖母仁粹大妃的燕山君，以及把母亲仁穆大妃囚禁于西宫的光海君都因政变而被逐下王位。

即使不是这种极端的对立，绝对权力之间也随时可能发生冲突。只是由于这是至尊间的冲突，所以在公私记录中都很难留下踪迹，原因是这样的记录本身很可能成为不忠之举。《朝鲜王朝实录》与《恨中录》中也没有明确详细的记录，但仔细阅读史料可以部分窥探到这种冲突。

仁元王后是英祖的恩人。但两人相识五十多年，又作为大妃和国王这样的权力对手相处了三十多年，不可能没有争吵。但英祖与仁元王后关系的相关记录只刻画了英祖的孝顺，就连毫无顾忌地公开各种

事实的《恨中录》也没有鲜明勾勒出仁元王后与英祖的矛盾。在漫长的岁月里，两人真的没有任何矛盾吗？

仔细阅读《恨中录》就会发现一件可能发生在仁元王后与英祖之间的矛盾事件，这就是1752年十二月的英祖传位骚动。当时英祖突然表示要把王位传给思悼世子，并离开了王宫。思悼世子虽然无罪，但父亲的突然之举却让他不得不谢罪。因为国王要把王位传给自己，所以只能先推辞，而且担心自己犯下了什么错误，不得不先谢罪。这就是朝鲜王朝的逻辑。

当时思悼世子刚刚勉强战胜红疫（即麻疹），以未愈之躯在严寒中俯伏数日而待罪。恰好天降暴雪，世子“俯伏之貌若雪积，难以分拣，亦不为动摇”。一国的世子俯伏地上几乎成了雪人。宣布传位的英祖向仁元王后寻求许可，英祖一提出传位，仁元王后就答以“然”。国王突然宣布传位，大妃就欣然答应，这令人费解。即使有充分的传位事由，也不能如此。这是劝了再劝，劝了又劝，如果还是不行，才能不得不勉强接受的事情，但仁元王后却像批准几天假期一样欣然应允。

得到仁元王后许可的英祖回到大臣们那里，以“得到了大妃的许可”为由坚持传位。若得到大妃的允许，大臣们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了，所以大臣们不得不呼吁仁元王后挽留英祖。大臣们请求取消传位许可，仁元王后就立即听从大臣们的呼吁。她以自己耳聋，误听英祖之言为由撤回了许可。仁元王后轻易接受英祖传位令人费解，而因耳聋误听的辩解更加令人费解。王权移让是多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能因耳聋而误听呢？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周围侍奉大妃的人将受到严惩。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恨中录》称提到英祖传位事件的原因是老论派的一位大臣上疏弹劾少论大臣。上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竟会让国王宣布传位？据说上疏是煽动党争的内容，惹得厌恶党争的英祖大怒。但若是这样的上疏，仅处罚上疏之人就可以了。这不是需要放弃王位之事，实在让人费解。实际上上疏的洪準海受到了处罚，但这是英祖宣布传位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事情。不知道英祖为什么因一个多月前的事情突然宣布传

位。《英祖实录》或《承政院日记》并没有明确记录英祖传位骚动的原因，只能让人感觉到这是仁元王后与英祖的一种斗气。

汇集思悼世子之死相关记事的《待闈录》简略提及了该事背景。当时英祖宠爱后宫文氏，文氏依仗国王的宠爱，又有金尚鲁等宰相为后盾，气势汹汹。此时思悼世子病重的传闻已甚嚣尘上，甚至有传闻称如果文氏生下儿子，思悼世子的地位将发生动摇。而文氏“承恩”于五十九岁的英祖，已怀孕六七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某天文氏与思悼世子的生母宣禧宫发生了口角。即使同为后宫，而宣禧宫俨然是世子的生母。此外思悼世子是代理国政的高贵人物，但一介后宫竟敢凭国王的宠爱而顶撞世子的生母。听闻口角的仁元王后作为宫中的最高长辈叱责了文氏。她把文氏叫来，让她在世子面前接受杖责。

这件事传到了英祖耳中，触怒了他。即便是母亲，但自己才是国家的最高掌权人，她怎么能如此干涉自己的事情呢？与其这样，还不如放弃王位。于是英祖为向大妃示威才引发了传位骚动。

以这种背景为基础重新分析史料，英祖和仁元王后的每一句话都与背景若合符节。虽然谁都不知道《待闈录》中记录的信息是否属实，但比起《恨中录》中所说的理由，《待闈录》更符合前后情况。另外，如果考虑到这点再阅读《英祖实录》，才能理解模糊叙述的部分。同时，有必要考虑这一事件发生时，正逢英祖王妃贞圣王后的花甲生日。下一章将对此再作叙述。

《恨中录》描绘的仁元王后是一位非常严格地遵守宫廷法度的人。即“仁元王后盛德卓越，阙内法度因仁元王后之存而至严”。当惠庆宫与小姑子们，即英祖的翁主们同坐一屋时，仁元王后总是让将来会成为王妃的惠庆宫坐在上座。在宫中，地位不同的人需要遵守曲向而坐——曲坐的法度，该法度必须严格遵守。即使房间狭小，难以曲坐，也必须遵从该法度。某次和柔翁主因房间狭窄，不得不违反法度，仁元王后严厉斥责了她。（《恨中录》，第74页）仁元王后就是这样的人，不可能对无礼的文氏袖手旁观。

权威的基础

仁元王后留下的谚文记录最近被公之于世。这就是仁元王后撰写的记录父亲金柱臣与母亲赵氏夫人的行迹的《先君遗事》与《先妣遗事》。文章虽短，但从文中也能读到仁元王后的性格。两篇文章都叙述了仁元王后的父亲与母亲作为王室的姻亲对自己的言行有多么小心翼翼。

《先君遗事》与《先妣遗事》中并未出现该类文章中常见的被记录者的幼年故事，而是以“先君每出入禁中，小心翼翼，惟视木靴之尖，略不转眄他处，故不记识阙中堂号悬板与出入之路，十年亦不分辨前导内人之面”“先妣居戚缘后，小心翼翼，行止必以礼。入禁中数日，遽请出宫”而开始。

这两篇文章被推测是仁元王后写给娘家的，目的在于告诉子孙自己的父母是如何出色地担当王室姻亲之职。惠庆宫在《恨中录》中批评贞纯王后家，曾说：“自为戚里，持身若如庆恩家，则孰非之？”（《恨中录》，第326页）英祖在贞纯王后的兄长金龟柱科举合格后曾赐字劝他学习金柱臣。仁元王后家事事谨慎，是王室姻亲的典范。

从金龟柱的情况可知，即使成为王室姻亲，稍有放纵或不慎也会死于流放地。可见权力是如此的冷酷可怕。无论是谁，若不细心的话，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命运。

据说仁元王后的父母在女儿成为王妃后，无论女儿怎么请求，都决不把她当女儿对待，而是一定要待之以王妃之礼。父亲在见女儿时，不敢直视女儿的脸，而是像其他大臣一样俯伏于地。女儿请其暂时直视，他稍微抬头一会儿又低头。母亲虽可以正当出入宫阙，但她一入宫就说王宫不是私家夫人可以长期停留的地方，完成任务就立刻离宫。有时国王会要求她多停留些时日，那她就会多停留一天，但从未停留十天。

仁元王后的母亲入宫后，每次都是凌晨起床，在女儿睡觉的寝门外等待女儿醒来。仁元王后劝说母亲回到睡榻，但母亲总是极力推辞。与女儿在一起的时候，她总小心翼翼地怕碰到女儿的衣领。女儿握着她的手，她就恭敬地接受，仿佛不舒服一样。宫女们有时说：“夫人不必行礼。”她会笑着回答：“吾岂非人君之臣乎？”

惠庆宫首次入宫后，称：“吾入见阙内样貌，三殿俱在，法严礼重，无毫发私情。”十岁的思悼世子谒见父亲时，也像大臣谒见国王一样蜷缩俯伏于地。对此惠庆宫表示：“其为十岁之孩童，不敢相对为坐，若臣下样，跼缩俯伏而谒见，何若是过焉？”（《恨中录》，第35页）

仁元王后所学所教的宫中法度非常严格。王室的权威来自这种严格的法度，因为这样的法度，王室的权威才得以维护。没有法度就没有标准，没有原则就无法管理别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度，无论国王还是大妃的权威都很难长久维持。

大妃的权力仅次于王权，有时也会超越王权。纯祖的夫人纯元王后是唯一两次垂帘听政的朝鲜王妃，这是宪宗与哲宗时期的事情。两次的垂帘听政时间加起来超过十年，这是朝鲜时代最长的垂帘听政。19世纪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也得益于此。或许是因为这种自信，纯元王后在哲宗初期垂帘听政时给娘家的族兄弟金兴根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名义上的国王哲宗是“无异于村童之上监”。这是把时任统治者的国王比喻为“乡下的孩童”。大妃的威严以及大妃的权力由是可见一斑。哲宗是思悼世子的庶子恩彦君之孙，他在江华岛务农时一跃被尊为国王，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认为他是“村童”。但如果不是大妃，没有人敢在信中这样公然地说出来。把国王视为孩童的看法并非纯元王后独有。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王宫中度过波澜万丈人生的大妃，显然会把年幼的国王视为成王之前不懂事的孩童。

仁元王后非常溺爱孙子思悼世子，思悼世子也依靠跟随着祖母。如果仁元王后享寿更长，那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致死的事情或许不会发生。思悼世子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停留在仁元王后的灵堂——昌庆宫通明殿的附属建筑中。

附录 宫中料理的真髓

《恨中录》中几乎没有关于饮食的故事，但却特别记录唯有仁元王后殿的饮食是“别味真饌”。“（仁元王后）爱东宫至极，每设别饌而频数送之。阙内饮食中，仁元王后殿饮食乃别味真饌。”（《恨中录》，第74页）她极爱孙子思悼世子，常常送特别的食物给他。这些食物在不缺珍馐的宫中亦是特别的美味。

一本让人了解仁元王后殿美味秘诀的文献最近被翻译出版了，这就是《闻事说》。书名之意是“孤陋寡闻之人记录的一些所知之事”，这样的题目显示出作者的谦虚。该书的作者是肃宗的御医李时弼。他作为侍奉国王的顶级医生，曾多次往返中国和日本等地。与书名的谦虚相反，他是一位博闻广识之人。

除火炕制作法、生活用具制作法、各种其他物品制造法之外，《闻事说》还记述了饮食烹饪法。该书的水平和实用性很高，直到朝鲜末期为止，一直在御医之间传承。李时弼特意为在冷屋中看护患病父亲的王子时期的英祖，制作了热效率高的砖式火炕；为保护因病而失去食欲的国王玉体，制作了特别的食物。这是以良食补身，即所谓“食疗”的一环。

该书以首次介绍日本式鱼丸而闻名，在题为《可麻甫串》的项目下介绍了以下制作法：

秀鱼或鲈鱼或道味鱼切作片，另以牛肉、猪肉、木耳、石耳、藁古、海参诸味等及葱苦草芹诸物为末。鱼片一层，加馅料一层，又鱼片一层，又加馅料一层。如是三四层后，卷如周纸样，以藁末为衣，以沸汤煮出后，以刀切作片，则鱼片及馅料相卷回回如太极样，乃以苦草酱食之。馅料诸味，五色为之，刀切后纹理尤佳。

所谓可麻甫串，只要想想放入乌冬面中的鱼饼片就可以了。鱼饼片由蒸、焯、烤、炸等方式制作而成，引文中介绍的可麻甫串制作法似乎是指蒸可麻甫串（蒸しかまぼこ）的过程。在肃宗的大殿里，像

可麻甫串一样从外国学来的新食物纷纷被制作出来，它们作为“融合式”食物，被蘸着辣椒酱而食。

李时弼制作这种料理时，肃宗正长期停留在仁元王后生活的大造殿里。李时弼在仁元王后担任主人的大造殿中受王妃的指挥，向国王献上别味真饌。这就是李时弼的烹饪法传入仁元王后殿的途径。换言之，仁元王后殿是朝鲜后期拥有最佳料理场的宫殿，这就是惠庆宫认定的宫内最佳美食处的秘密。非但肃宗与仁元王后，景宗与英祖也尝到了这些食物的味道。这些秘方传承后，思悼世子与惠庆宫也得以一尝其味。从《承政院日记》来看，仁元王后非常讨厌油腻。她不喜欢肉类，主要吃素。食物显然要跟随主人的口味，仁元王后殿的别味真饌应该是素食中心的清淡之味。

附录 英祖与苦椒酱

《闻事说》一部分异本中有“苦椒酱制法”的条目。如果该条目本来就存于《闻事说》中，那就是关于苦椒酱的最早记录。关于韩国的代表酱料——苦椒酱的更确切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承政院日记》174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条目中。那天英祖说：“尝见昔年进水刺时，必进咸辛之物，今予亦常嗜川椒之属及苦椒酱。此乃食性渐与少时不同者，其亦胃气之渐衰耶？”

英祖可能是因为心理创伤和压力，消化能力欠佳，基本上是少食，不吃冷面等冷物与不熟的水果。他喜欢把大麦饭泡水吃，也喜欢吃黄花鱼等清淡的鱼类。他食欲欠佳，所以提高食欲很重要，恰好苦椒酱很合他的口味。年纪越大胃口越差，就更期待刺激性的味道。年过七旬的英祖有一天称自己久违地吃得很香：“松茸、生鰻、儿雉、苦椒酱，能有四味，以此善食。以此观之，口味非永老矣。”（《承政院日记》，1768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喜欢辣又甜的苦椒酱，比起内医院呈上的苦椒酱，更喜欢宫外赵宗溥家腌制的苦椒酱。

赵宗溥的本贯是淳昌。也许《闻事说》记载的淳昌苦椒酱制法就是赵宗溥家的苦椒酱制法。早期的苦椒酱与现代的苦椒酱略有不同，早期苦椒酱是把鲍鱼和大虾放入而腌着吃。与其说早期的苦椒酱是酱

料，不如说是小菜。就这样，18世纪首次制作出来的苦椒酱逐渐抓住了韩国人的口味。

第三讲 贞圣王后：王妃，耀眼的孤独

凄凉的一生

贞圣王后作为初夜就被英祖疏远的王妃而为人所知。她遇到了拥有极度不安精神世界的丈夫，经历了艰难的岁月，直到三十岁才勉强成为王妃。但即便成为王妃，她孤单的身世并没有改变，因为她没能得到丈夫的爱。她虽然作为王妃活在世人的关注中，但直到死的那天都很孤独。

贞圣王后1692年出生于汉阳嘉会洞。她的祖先是朝鲜前期著名学者徐居正，以及把大邱徐氏家族提升为朝鲜最高名门望族的药峰徐洵。徐洵的子孙非常繁盛，以至于后来正祖为了王室子孙的繁荣，将自己名字的汉字发音由“李祘(san)”改为“洵(seong)”的相同发音——“李祘(seong)”。徐洵是贞圣王后的五代祖，他的后人可以分为贞圣王后的娘家与朝鲜后期著名学者徐命膺的家族。徐命膺与贞圣王后是十寸之亲，他的学问被儿子徐浩修、孙子徐有渠继承。

贞圣王后直系子孙中有像纯祖时期领议政徐龙辅这样的显达子孙，但在贞圣王后结婚时，徐氏家族并不是特别出众的名门。18世纪40年代惠庆宫入宫时，曾简短评价贞圣王后的娘家“无显达之人”。贞圣王后的父亲徐宗悌在女儿嫁给王子英祖前虽通过了小科科举，但在大科科举时名落孙山，因此他只能担任一种名誉职——进士。徐宗悌在女儿成婚后才勉强得到一些末官职位，郡守是他担任的最高官职。贞圣王后祖父的地位也与儿子类似。如果英祖与贞圣王后的初夜故事属实，那英祖就是对并非出身显达家族的妻子畏缩不前。

贞圣王后的初夜轶事并不是可以公开谈论的内容，但《恨中录》中记载了一则可以佐证英祖薄待贞圣王后的事情。这是1757年贞圣王后去世时的故事。当时贞圣王后病危，英祖听说了妻子的病势也没有探病，直到贞圣王后濒死才到达病室。惠庆宫提到了英祖夫妇的冷淡关系：“两殿之间，虽不极尽，然病患危重，故来临之。”（《恨中

录》，第71页）好不容易来到病室的英祖没有探问妻子的念头，只是叱责儿子思悼世子散乱的衣着。当时思悼世子在母后临终之际一边痛哭，一边忙于侍病，顾不上衣着。英祖呵斥了如此仓皇失措的世子。

最终王妃升遐，随后必须进入葬礼程序。这就需要英祖的命令，但英祖却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先要从发丧开始做起，但英祖把刚刚去世的妻子放在一边，与内人们讲起第一次见到妻子直到现在的的事情。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贞圣王后下午去世，至天黑仍未发丧，思悼世子捶胸顿足地痛哭起来。此时恰巧传来了英祖最宠爱的女儿和缓翁主的丈夫郑致达的噩耗。英祖这才对妻子的死亡表露出形式上的悲伤，随后不顾大臣们的极力挽留，起驾赴驸马家。

虽然葬礼可以进行，但大臣们却要阻止不顾妻子亡故，执意要赴去世的女婿家的国王。国王的妻子不是普通百姓家的夫人，而是国母。哪怕夫妻关系再差，国王也不能无视国母的死亡。英祖的行为无论谁看都会觉得过分。《英祖实录》中记载，承旨、大司谏等官员因劝阻英祖，遭到革职。英祖晚间赴和缓翁主家，过了午夜才回来。贞圣王后至死未能得到丈夫的爱和关心。

英祖对王妃的漠不关心，在贞圣王后花甲宴之事上也有所体现。1752年十二月初七是贞圣王后的花甲生日，当时英祖因后宫文氏遭受的处罚与仁元王后对立，引发了传位骚动。那时不是谈论花甲宴的合适之时。但在传位骚动发生前的十一月，药房都提调金若鲁与右议政金尚鲁反复请求筹办王妃的花甲宴，英祖也没有允许。贞圣王后即使迎来人生最大的庆祝日——花甲，也没有庆祝活动，整个国家只是经历了喧闹的风波而已。英祖的传位骚动正好在他不喜欢的妻子的庆祝日前后发生，实乃巧合。

只要检索一下《承政院日记》就能知道贞圣王后活在英祖的漠视与薄待之中。英祖从未前往贞圣王后生活的大造殿。实际上或许并非如此，但若在《承政院日记》中检索“上御大造殿”，不会出现任何结果。英祖主要住在昌德宫的宣政殿与熙政堂及庆熙宫的集庆堂等日常办公处的偏殿内，他于六十六岁迎娶年仅十五的王妃——贞纯王后之后亦是如此。不过《恨中录》中也有记载，1766年初英祖因病受苦

时，在贞纯王后居住的庆熙宫内殿——会祥殿里连续停留了数月。国王久治不愈弥留之时在王妃的内殿里长期停留，也是英祖的父亲——肃宗时的习惯。虽然贞圣王后当了三十三年的王妃，但其间从未留有英祖去王妃住处的记录。

国王夫妇的关系

英祖与贞圣王后的关系在朝鲜后期的国王夫妇中不算非常特殊。思悼世子与惠庆宫生育了二男二女，夫妻关系似乎并不疏远，但正祖与祖父并无不同。《恨中录》多次提到正祖与孝懿王后关系不佳。正祖与孝懿王后不仅未生育任何子女，他在位二十四年也从未有赴王妃住处的记录。《承政院日记》曾记录正祖自称：“予则常处外殿。”正祖除了使用其他国王也住过的偏殿之外，还经常在观物轩或迎春轩停留。

惠庆宫称正祖与孝懿王后关系变成这样是因为正祖的性格本来就很淡然。她还称正祖的姑母和缓翁主妨碍了他们夫妇的关系。实际上，正祖的性格似乎比较理性、淡然。但是从他与后宫生育二男二女来看，相对来说他似乎对孝懿王后不太感兴趣。因此不仅是惠庆宫，连大臣们也很担心正祖和王妃的关系。

早年的正祖并不处于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王妃的境况。他作为世孙迎娶妻子的当年，父亲被关入木柜而亡。他作为儿子亦作为继承人目睹了这一难以承受的惨剧。1766年，他十五岁，可以作为成人与世孙嫔同房之时，开始误入与妓生游乐的歧途。他与妹夫兴恩副尉郑在和一起带着别监与妓生们游玩。此事以1769年惠庆宫的亲生父亲洪凤汉处罚别监而告一段落。惠庆宫认为该事件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展现正祖从一开始就对王妃漠不关心。

正祖一边担任储君，一边忍受英祖随时可能爆发的愤怒。虽然很难明确判断是否属实，但他必须战胜妨碍登极势力的威胁。妨碍势力中有外祖家也有妻子家。从正祖东宫时期的日记——《尊贤阁日记》（1776年二月二十八日）来看，1770年和1771年惠庆宫的父亲洪凤

汉失势后，他的异母弟洪麟汉宣布与其决裂，开始与正祖的岳父金时默互相勾结，逢迎彼此。洪麟汉被认为是妨碍正祖登上王位的势力中最核心之人，而正祖的岳父与他同属一个阵营。正祖这样看待岳父的话，显然不可能喜欢他的女儿。

而且从小就照顾正祖的和缓翁主也阻止正祖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关于和缓翁主，后面还会详细叙述，她的猜忌和嫉妒之心人尽皆知。她像收养儿子一样收养正祖，阻止正祖对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事情产生兴趣。她不仅会仔细观察正祖是否爱上妻子，也会观察他是否爱上宫女，正祖被记录中国宋朝历史的《宋史》迷住后，她甚至嫉妒起那本书。在这种情况下，少年正祖的脚步很难迈向妻子。

英祖或正祖与王妃的关系不好并不意味着其他国王都如此。从前代的孝宗、肃宗以及后世的纯祖就可以知道这一点，特别是纯祖经常驾临大造殿。也许正因如此，纯元王后生育了二男三女。纯元王后的娘家安东金氏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施行所谓的“势道政治”，也许也是源于国王和王妃之间圆满的夫妻关系。王妃受国王的宠爱，其娘家也能受到国王的信任。可以认为，这样的信任与权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生育压力

王妃最大的任务是生育继承宗庙和社稷的后代。实际上，王室并没有把这件事只交给王妃，但王妃却表现得好像除了自己，谁也做不到似的。王妃与后宫相比仅有优先权。生育对王妃既是责任、义务，也是权限。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力。虽然暂时可以回避责任而行使权力，但当事人总有一天会明白权力是以责任为基础的。

即使王妃想对生育负责，那也不能随心所欲。这不仅需要天助，也需要对方的配合。如果不能尽到责任，权力必然会弱化。这时可以采取的方法是夸大自己的责任，即广而告之自己对责任的忠实履行程度。

贞圣王后时常居于大造殿的大房，若有滞症或感冒，则居于大房对面的房间。病重之时她曾说：“大造殿乃至重之地，吾不可委身于此殿。”于是急下于西翼之观理阁，于此升遐。（《恨中录》，第73页）

该故事不仅充分展示了王妃对生育王子王孙是多么重视，同时也让人感受到王妃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是多么凄惨挣扎。不过是得了小病，为了不死在大造殿，下于对面的房间；即使在病危中，也得艰难地移动身体，去对面的房间等死。《恨中录》提到当时贞圣王后吐出的黑血可以装满一个溺缸，而她拖着如此无法正常活动的身体搬离了大房。

贞圣王后很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由于没有尽到责任，她作为王妃的样子只能显得寒酸不堪。但对她来说还有其他的办法。虽然她自己没有生育子嗣，但可以让后宫之子成为自己的儿子。思悼世子出生当天，奉朝贺闵镇远请求道：“昔景庙始生，仁显王后取以为子，今亦宜然。”即遵照张禧嫔的儿子——景宗出生后，就把他当作自己儿子的仁显王后的先例。于是思悼世子也像景宗一样，不是生母宣禧宫的儿子，而是贞圣王后的儿子。

贞圣王后非常爱思悼世子，惠庆宫也多次记录王妃的慈爱。贞圣王后喜欢思悼世子，确实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思悼世子也孝顺照顾自己的贞圣王后，也许是她与性格严厉的生母宣禧宫在很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思悼世子拿着贞圣王后临死前呕吐用的血碗给医官看并哭泣，贞圣王后失去意识后，他哭喊着：“小臣来矣！小臣来矣！”

从英祖前后的五位国王，即肃宗、景宗、英祖、正祖、纯祖来看，与王妃生下儿子的国王只有纯祖。景宗、英祖、正祖的情况前文已有说明，而肃宗也以很早就沉迷于王妃以外的其他女人而出名。肃宗从二十岁开始，比起王妃更痴迷于张禧嫔（《肃宗实录》，1680年十一月初一日），所以王妃不可能生育后嗣。肃宗直到老年才经常去大造殿，但为时已晚。这五位国王的九位王妃中，生下儿子的王妃只有一人，其余王妃都没完成自己的责任。这当然不是王妃的错，但也

很难说是国王的错。王妃没有生育子嗣的三位国王——景宗、英祖、正祖都从幼年起怀有严重的心灵创伤。景宗在十四岁的敏感时期，母亲张禧嫔被赐下死药；英祖的不安，前文已有详述；正祖在十一岁的幼年遭遇父亲的死亡。国王们也很难维持正常的夫妻生活，如果非要责怪的话，只能指责冷酷的权力。

王妃之病

即便没有生育压力，生活环境本身也很难保证王妃的健康。其他两班家庭也是如此，朝鲜的内外法严格控制了女性的外出。即使在私家中，根据女性居内、男性居外的礼法，女性也被禁止外出，更不用说九重宫阙中的王妃了。宫阙是配置了最佳设施和服务的监狱。虽然可以享用美食，但完全不能运动，再加上遭受各种严格的礼法约束和生育压力，身体和心灵都无法健康。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访问朝鲜的西方人记录说，朝鲜女性在精神上非常不稳定，上层女性中大部分患有精神病。朝鲜时代的小说中经常能看到患有统称为“心病”的精神疾病的人，其中女性的比率非常高。男性只是出现相思病，而女性却因各种郁火病而受苦。没有活力的孤立生活与无依无靠的未来等郁闷的环境让她们的身心变得脆弱。王妃就生活在这种生活的顶点上。惠庆宫记录贞圣王后在临死前吐出的黑血可以装满一个溺缸，仿佛是把自幼积累下来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惠庆宫看到了贞圣王后心中的郁结。

关于贞圣王后之病，《承政院日记》1743年正月二十九日条有一篇有意思的记录。这是贞圣王后五十二岁时的事情。当天英祖因贞圣王后的事情对大臣们发火，这是由于药房的三提调，也就是王室医疗机构内医院的三位首席大臣求见国王。都提调兼领议政金在鲁首先向国王问安，接着又问候了大王大妃的安康，接下来是王妃，但英祖未等问安就截住了提问。

上曰：不待陈达而已知之。坤殿素有痰症，以此不平，元无新般症患。而中间误传，致有三提调请对，此亦纪纲所关，极为骇然。坤殿因此用心过度，至废水刺。传言之侍人，虽互相推诿发明，而不可

置之，首医尤为非矣。当初先为禀告于予，则初无是事。而以一时侍人误传之言，转通于提调，极为非矣。误传之侍人，令攸司科罪，首医拿处，可也。

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不明晰，但看起来是诊察贞圣王后的医员将王妃的病转达给侍从宦官，宦官将此转达给了内医院提调。得知王妃病势严重，提调欲图上奏国王治疗王妃，但国王勃然大怒。外面先得知家里的事情而首先发话，这让英祖感到不快。从大臣的立场来看，这似乎是平时英祖对王妃无动于衷才如此，英祖似乎是因自己的冷漠被察觉而发火的，即“因为我对妻子漠不关心，你们就这样侮辱我吗？”

虽然英祖说王妃之病好像并不严重，但贞圣王后却病得不轻。他把王妃的病称为“痰症”，从《东医宝鉴》等医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指的是身上凝结着液状的疙瘩。英祖说自己也患过痰症（《承政院日记》，1738年二月十四日），年老时因此受了不少罪。贞圣王后的痰症似乎很严重，但英祖平时对贞圣王后的病症却不以为意。《承政院日记》1746年六月二十日条中记载了大臣们非常担心贞圣王后摔伤之事，但英祖却表现得像并非大事。料想到尽管王妃病情严重，但直接告诉国王也没什么用，所以医员才如此行事。贞圣王后当时恐怕也心急如焚。

王妃的痼疾并非仅贞圣王后才有的问题。正祖妃孝懿王后之病从正祖登极之初就已成为政治焦点。她成为王妃是在二十来岁，正是最好的年岁，但王妃生育的可能性已然成为政治焦点。朴在源等大臣们呈上了“请延良医，博试坤殿议药之节”的上疏。但正祖却不由分说地驳回该上疏，并把王妃之病定性为“非医药所治之症”（《正祖实录》，1778年六月初五日）。之后正祖遵照王大妃贞纯王后之命，准备迎纳后宫。在此过程中，李泽徵、李有白等人因批评该计划而受到了严惩。无法判断孝懿王后是否真的患有不治之症，但正祖并没有展现想要治疗王妃的意思。

据说因“仁祖反正”而被逐下王妃之位的光海君的夫人柳氏在王妃时期于宫中供奉佛像，并经常献上供品，祈祷下辈子不要嫁入王

室。这是孝宗的驸马郑载仑记录在《公私闻见录》中的故事。不知道她是预感到以后会成为废妃，还是厌倦了宫中发生的各种阴谋和斗争，抑或是因为丈夫常宠爱后宫，原因不明。她在光海君被逐下王位的前一年，就外交问题向国王上疏，是一位很有自我想法的王妃。她批评了光海君既不想获罪于明朝，也不想惹怒清朝的等距离外交，主张要明确站在有大义名分的明朝一边。从流传的其他故事中也能看到柳氏耿直的性格。加上她还是生下儿子的地位稳固的王妃，连这样的王妃都厌恶宫廷生活，凡人很难估量其生活的重量。

第四讲 宣禧宫：后宫，王的女人

诛杀儿子的母亲

1764年七月二十六日，宣禧宫暎嫔李氏离开了多恨的人世。她去世的时间点非常巧合，正是其子思悼世子三年丧结束的月份。三年丧指办丧事以年数计算达三年，实际上是在超过两年期间一边思念亡者，一边每天进行祭祀。思悼世子在两年前的1762年闰五月二十一日去世，算上两个月的葬礼与满两年的丧礼，当时刚好是三年丧结束的时间点。三年丧结束后的七月初七日，思悼世子的牌位被供奉在祠堂里，还未过二十天，母亲就去世了。《恨中录》提及宣禧宫看到儿子神位进入祠堂，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并写道“其哀痛为其心病，以毕其命”（《恨中录》，第215页）。

关于宣禧宫的死因，英祖撰写的《表义录》与正祖撰写的《暎嫔行状》也有同样的说法。惠庆宫称“（宣禧宫）忽然背肿出”而辞世（《恨中录》，第149页），但即便如此，发病的根源还是“心病”。由于去世的时间点过于巧合，有人推测是自杀，但从正祖死后惠庆宫写下的正祖行录（《正祖实录》收录）来看，宣禧宫去世的那一年，正祖曾代其父看护宣禧宫，所以宣禧宫似乎并非没有痼疾。不过考虑各种情况，可以说即使自杀不是直接死因，也是宣禧宫自己把自己逼向了死亡。

据《恨中录》记载，当年二月英祖下令将正祖过继给孝章世子为子，宣禧宫便食饮全废，惟欲一死。宣禧宫在儿子死后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本期待保全孙子正祖，使其为王，但连此事也失去了意义，孙子不再是自己儿子的儿子了。

宣禧宫作为诛杀儿子的母亲而广为人知。思悼世子步入死亡的那天早晨，宣禧宫谒见英祖，哭着请求他处罚思悼世子。同天早晨宣禧宫致信惠庆宫，信中说道：“昨夜所闻，尤为可畏，如是之后，我死而不知。生则扶宗社为可，救世孙为可，我不知生而得复见嫔宫

乎？”接着她谒见英祖，称“小朝之病渐深，更无可望。小人于情不忍为此言，而护圣躬、拯世孙、扶宗社平安之事为可，请下大处分”。思悼世子病重，不仅不了解状况，而且也不认周围人，稍有不慎，可能生出预想之外的事情，最终她劝英祖“大处分”儿子。（《恨中录》，第125页）

听完宣禧宫的话，英祖毫不犹豫地前往思悼世子所在之处。英祖要杀世子，大臣们立刻劝阻。不论知不知道情由，作为大臣，他们必须阻止处死世子。思悼世子是一国之世子，也是代理听政的掌权人，特别是在其子可能成为国王的情况下，没有哪位大臣能对处死世子坐视不理。虽然宣禧宫的选择是无可奈何之举，但大臣们不得不阻止。英祖欲处死思悼世子的意愿因大臣们的抵抗而难以实现，无奈之下，他只得把当天早晨从宣禧宫那里听到的话转述出来。都承旨李彝章反对道：“殿下以深宫一女子之言动摇国本乎？”（《英祖实录》，1762年闰五月十三日）

宣禧宫向英祖说不忍言之语是有理由的。但不论有什么不得已的情由，都无法改变她煽动诛杀儿子的事实。宣禧宫在儿子死后总是说：“吾为不忍为之事，吾之迹当无草生。”又说：“吾之本心乃为宗国、为圣躬，思之则恶且凶，嫔宫知吾之心，世孙兄妹岂可知吾乎？”她“每于夜中，不成寝睡，出坐于东便退轩，望东天而伤心，或曰不为其举措，国家或可保全，吾不善为之矣。又以为不然，此乃妇女之柔弱所见，吾岂不善为之哉？”（《恨中录》，第151页）

宣禧宫之命已经随着思悼世子而殒绝。为了保全孙子正祖，她只能勉强活着。然而这期间英祖的过继决定严重损害了正祖的名分，可以说是再处死了一遍已经死去的儿子，最后等于宣禧宫杀了两遍儿子。从那天开始，宣禧宫开始呼吸困难，她只惦记着没剩多少时日的儿子的脱丧。因此，无论直接死因是什么，都可以把她的死亡看作是一种自杀。

从下贱到至尊

惠庆宫被选为世子嫔时，惠庆宫的母亲收到了从宫中送来的信札，这是贞圣王后和宣禧宫送来的。但贞圣王后寄来的信是行四次礼后开读，宣禧宫寄来的信是行两次礼后开读。王妃与后宫在这些小事上也有悬殊的差异。

后宫是国王之妾。虽然也有像纯祖的生母嘉顺宫那样，为了延续后嗣而如挑选王妃一般，特意挑选名门望族之女的情况，但大部分是宫女“承恩”于国王，然后成为后宫。据说光海君在位时，曾与五十多名宫女同床共寝，一月之中大约有半个月会临幸宫女。这是曾在光海君宫廷工作过的宫女告诉孝宗的驸马郑载仑的故事，宫女还表示：“世误以好色称之，其冤甚矣。”

宣禧宫也是宫女出身。就算同为名门出身，后宫的地位与王妃也有天壤之别，更不用说宫女出身的后宫了。宫女大多出身于下贱民家，宫女出身的后宫可以说是国王的贱妾。这样后宫的地位既不稳定，态度也不能高调。宣禧宫也是这样的出身，所以相关记录不多，留下的记录也不详细。下文将汇集《恨中录》以及英祖、正祖所写的短篇文章来复原宣禧宫的人生。

宣禧宫姓李，祖籍全义，1696年七月十八日出生于位于汉阳景福宫东侧与三清洞南侧的观光坊。1701年六岁时成为小内人入宫，隶属于肃宗的大殿。肃宗看到年幼的宣禧宫处事周全，符合法度，感叹道：“簪缨家女子如许年齿，尚难免幼少之习，委巷女子夙成，乃能如是耶？”这清楚地表明宣禧宫的出身是委巷。根据宣禧宫的相关记录，她的曾祖父是李正立，祖父是李英任，父亲是李榆蕃，外祖父是金佑宗，记录中也列出了祖先的各种官职，但这些官职都是在宣禧宫飞黄腾达后获得的或死后追赠的。宣禧宫的后辈有《恨中录》中出现的侄子李仁康，其子李性默、其孙李宗祥、庶孙李定祥等都是中下级武将。这些都告诉我们宣禧宫是下层民家出身。

宣禧宫在1724年英祖即位后被仁元王后看中，在其安排下“承恩”于英祖。英祖当时说：“王家事，莫大于广嗣续，而与其选士夫女之未详者，宁取诸宫中厚德之人。”宣禧宫在三十一岁的1726年十一月被封为淑仪，成为英祖的正式后宫。按后宫的品阶，淑仪之上还

有昭仪、贵人、嫔，淑仪之下有昭容、淑容、昭媛、淑媛，宣禧宫没有经历下层品阶直接封为淑仪，属于非常破格的举措。这是遵循了肃宗的后宫，即英祖幼时曾称其为母的宁嫔金氏的例子。对此，副提学李炳泰表示：“昔者孝庙朝，安嫔李氏生翁主七年，始封淑媛。……愿殿下深加警省焉。”（《英祖实录》，1727年二月初六日）

宣禧宫在封为后宫的翌年四月生下了和平翁主，即英祖看着孕肚渐高的宣禧宫，给予了她后宫的地位。此后宣禧宫在1728年十月被封为贵人，地位进一步提高，1730年十一月登上了后宫最高之位——嫔。这时她才获得“暎嫔”之称，宣禧宫这个宫号是在正祖时期推动思悼世子追崇事业时获得的，所以宣禧宫在生前得到的最高名号是暎嫔。她得到暎嫔之名时，正逢景宗妃宣懿王后去世，刚刚结束出殡。宣懿王后的出殡就在前月，整个国家都因国母去世而穿着丧服，英祖不知为何如此急迫，急忙给予珍爱的后宫最高的品阶。《英祖实录》有言：“时因山甫毕，举国缟素，而有此命，中外骇叹。”可见宣禧宫受到的英祖之宠到了什么程度。

正祖之后的朝鲜国王都是宣禧宫的血脉，但直到现在，全义李氏门中仍有一部分人不承认宣禧宫是家族的一员。这是因为宣禧宫低贱的出身。宣禧宫老年时，亲戚只有侄子李仁康，可见她入宫时几乎和孤儿没什么区别。一个没有依靠之处、前途渺茫的汉阳民家之女幸运地入宫还得到国王的宠爱，简直如同灰姑娘。但是，从最低处跃升到最高位的宣禧宫的命运绝非一帆风顺。

同僚的嫉妒

1735年宣禧宫终于生下世子。当时宣禧宫是四十岁，英祖是四十二岁。这是英祖的长子孝章世子去世七年后的事情。英祖的喜悦毋庸置疑，非常重视这个新生儿。翌年三月，他将刚过周岁的婴儿册封为东宫。思悼世子就这样被定为下一任国王，而宣禧宫也成为下任国王的生母。她作为一介下贱之人，坐在了她能够登上的最高位置。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她地位的迅速上升。昔日的前辈与同僚们公然无视宣禧宫。《恨中录》有如下记载：

次为韩尚宫，能干有为，然心思诡谲，乃猜忌繁多之人。虽为东宫内人，而本是旧时大殿内人，岂有向英庙极尽精诚之理耶？若是之际，卑贱内人，不通大义，不知宣禧宫诞降东宫，乃至极尊贵之人，反思其寒微之时，怠慢侮辱，言辞犹不恭顺，或有所毁之者。宣禧宫未安于心中，英庙亦岂无不知之理耶？

其时岁初，读经之日，锦城尉亦入来。值日晚迟，读经之排设亦差缓。其内人等本非恭顺之人，竟发厌火，诽谤宣禧宫而相坐窃言云。宣禧宫亦怒，英庙亦知其事端，颇有不快之色。（《恨中录》，第30页）

1724年景宗去世，1730年景宗的后妃宣懿王后去世，当时隶属国王的大殿与王妃居住的中宫殿的内人全部出宫。但英祖在思悼世子出生后立即重建东宫，把他们召回宫中。虽然勉强可以说将这些人重新召回宫廷的理由是他们经验丰富，但英祖希望通过再次召回对自己不满的隶属景宗的内人，在宫中“导迎和气也”。正祖撰写的思悼世子的墓志中也是这样记载的。

再次回到宫中的景宗的内人马上感受到了这期间的变化。总是不安害怕的英祖成了堂堂正正的帝王，昔日在自己手下跑腿的宣禧宫在英祖身边扮演着女主人的角色。对于重新入宫后以为自己的世界再临而得意洋洋的内人来说，宣禧宫是眼中钉、肉中刺。宣禧宫不仅成为正式后宫，而且作为思悼世子的生母变得更加尊贵，但他们却毫不在意，窃窃私语地诋毁她。

景宗的内人不喜欢宣禧宫到东宫见思悼世子。因此他们主张，“暎嫔虽诞世子，即私亲也，有君臣之义，勿使之频见，见必用嫔御谒正殿之礼，以拘制于礼数仪节之间”，这让宣禧宫感到行动不便，步伐也变得更加沉重。此外，他们不仅针对宣禧宫，也用各种话语眩惑英祖，以免他们经常寻见世子。若英祖和宣禧宫来到东宫，正如前文所述，他们会让宣禧宫感到不快，英祖也能意识到。因此思悼世子幼时几乎没有得到父母的爱和关心。许久之后世子才把这样的情况告诉英祖，再加上和平翁主的帮助，最终他从东宫搬到了景春殿。这是1746年正月思悼世子十二岁时发生的事情。

英祖虽对景宗的内人感到不快，但也不能将他们一一处罚或驱逐。因为处罚先王的亲信是一件有负担的事情。斩断景宗的手足会被认为是攻击已经去世的国王。1741年英祖驱逐了内人的头目韩尚宫，留下了其他人。但是他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最终英祖让世子搬离了住处。惠庆宫认为思悼世子受父亲“大处分”而死的根本原因是幼时没有得到父亲的爱。而在未能得到父爱的源头上，同僚们对宣禧宫的嫉妒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王室的蔑视

后宫受到了同僚们的蔑视，她们在王室内部也没有得到像样的待遇，同样受到蔑视与无视。宣禧宫生下思悼世子，举国欢庆，但她的神情却并不轻松。周围的内人问起原因，她这样回答：

储嗣已定，宗祧攸托，吾之庆幸，自倍于人，而若无戊申之祸，则元子不过一王子也。今位在主鬯，小心之极，不得不然。凡保养诸方，务加慎重。曰：元子，坤殿取以为子也；吾，元子之私亲也。吾岂敢认以为己子也？（正祖：《暎嫔行状》）

宣禧宫生下孩子后拒绝当他的母亲，谦称这只不过是血肉相连的私人关系。也就是说，她根本就没有想过成为正式母亲。据说听到这句话的贞圣王后对宣禧宫赞不绝口。

宣禧宫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更加小心自己的举止。《恨中录》这样记载了宣禧宫的性格：

宣禧宫天性仁爱之中，且肃严。于所生已出，爱之之中，教训严而畏惧之者，不似慈母。其身所诞之子登储位，敬其子而不敢自处以慈母，言语间至极尊待，所以教之，不以爱而解之，其子极惧而小心。此非妇女所能之事也。爱吾之中，所待接者，无异于东宫。吾以子妇之身，每承其过待，不安之心甚矣。（《恨中录》，第195页）

宣禧宫首先从严要求自己。从郑载仑的《公私闻见录》来看，后宫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能称之“汝”。亲生女儿都不能以子女轻松

相待，这就是后宫的处境，更不用说是成为世子的儿子了。宣禧宫对待儿子严格地遵循了作为臣子的顺从，但并没有因此放弃作为母亲的教诲。她地位低下而表情温柔，却不曾失去平时从严要求自己的庄重感。儿媳惠庆宫也得到过宣禧宫这样的慈爱和教诲。宣禧宫引用古语让她警惕嫉妒，还告诉她宫廷发生的事情。后来正祖同样得到了祖母的慈爱和教诲。

像这样降低自身身份的宣禧宫对子女们来说，是一位相对让人舒适的温和长辈。惠庆宫入宫后，每五日一次向仁元王后与贞圣王后问安，对宣禧宫则是每三日谒见一次，或日日相见。因为宣禧宫温和，所以与她亲近，因为亲近而经常见面。惠庆宫在十岁的幼年入宫，受制于严格的宫廷礼法，又与同龄的翁主们不太合拍。宣禧宫对此感到惋惜，“以为吾心中必欲游戏而不为之，既入阙而修道理者也。可与翁主同为游戏，毋须如是”（《恨中录》，第196页）。在令人窒息的宫廷中，宣禧宫是给人喘息机会的人。

在思悼世子去世前的一个月，宣禧宫来到昌德宫，世子为母亲准备了大桌宴席。他摆上像花甲宴一样的大桌，给母亲呈上献寿诗，装饰了车驾，陪同母亲赴后苑。赴后苑之时，他将宣禧宫的小轿装饰成大辇，强行让母亲乘辇，并命吹打陪行。他让宣禧宫坐上了不允许后宫乘坐的，只有国王或王妃才能乘坐的大辇，甚至动用军乐，看起来像大王大妃出行。对于一辈子从严要求自己的宣禧宫来说，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事情，但她无法拒绝已经失去理智的儿子的意愿。虽然不得已坐上轿子，但宣禧宫却非常不安。看来是无可奈何了。事实上，宣禧宫因英祖不允许，连像样的花甲宴也没能得到。花甲对朝鲜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庆典，但英祖连这个庆典都没有为宣禧宫举行。不知道思悼世子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死前亲自向母亲奉上花甲宴，而惠庆宫认为思悼世子是向宣禧宫永远告别。

最后的希望——正祖

宣禧宫在获得大桌宴席的次月，劝说英祖诛杀自身存在的唯一意义与目的——比自身更珍贵的儿子。虽然有人认为宣禧宫是被党争所左右，诛杀儿子的冷酷母亲，但这种见解既不了解前后情况，也不了解

后宫的地位。虽然有人解释说她是为挽救孙子正祖而如此，但在儿子死亡的情况下，怎么能保证救活孙子呢？惠庆宫也担心丈夫死时儿子正祖会牵连致死。诛杀儿子并不一定就能救活孙子。

随着思悼世子的死亡，宣禧宫其实也死了，但她却无法在留下血孙正祖的情况下结束生命。她把正祖带到身边，照顾他的食宿。祖母照顾年幼的孙子，在民间是寻常之事，但在王室却并非如此。因为即便不是祖母，也有很多人会照顾他。另外正祖是已经成婚的东宫。勤奋的正祖若是凌晨起床，在日出前出去读书，那么宣禧宫也会一起起床，照顾孙子的洗漱与饮食。正祖本来清早不怎么进食，但在宣禧宫的诚恳劝说下，勉强会吃一点。宣禧宫在不知世孙会迎来怎样命运的情况下，为保护世孙而拼命。1770年，十九岁的世孙正祖跟随英祖赴宣禧宫的墓地。在那里，正祖感动地描述了祖母的眷爱：

我祖母顾复之恩，既无异于慈母；遇物之诲，亦无异于严父。昊天德，固罔极矣。而逮夫壬午失怙以来，小子之所以依仰我祖母者，又有倍于前日；祖母之所以怜悯我小子者，尤有甚于前日。得无寒乎？得无饥乎？煦濡拊畜，一念朝夕。俾此顽喘，得有今日者，何莫非我祖母所赐也哉？（正祖：《暎嫔李氏祭文》）

宣禧宫残余的希望只有正祖。但在思悼世子三年丧即将结束时，她遭遇了晴天霹雳。英祖下令将正祖之父由思悼世子变更为孝章世子。宣禧宫此前已是既死之身，现在到了整理人生的时候了。在人间处理完可以为儿子做的所有事情后，宣禧宫毫不留恋地踏上了慰藉已在阴间之子的旅途。

第二部 成长与教育

第五讲 成王之学

世子的常规课程

1735年正月二十一日，思悼世子生于昌庆宫集福轩，他从一开始就带着成为国王的命运来到世上。同父异母的兄长孝章世子已去世七年，英祖年过四十二岁，正处于束手无策的情况中。他是大家翘首期盼的王子，所以很快被册封为世子。思悼世子在出生次年的三月被册封为世子，得到成为下一任君王的资格。虽然他未能登极就逝世了，但他在两岁时就被确定将继承王位。

思悼世子出生后才七个月，宫中就设置了负责抚养世子的辅养厅，一周岁时为世子的学习建立了侍讲院，侍讲院通常被称为春坊。刚过周岁的思悼世子与侍讲院的老师们初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上，奉朝贺李光佐称国王首先要实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问，让世子得以观摩并学习。世子两周岁后立刻开设了正式课程——书筵，让世子阅读《孝经》与《小学》。此时世子写下了寓意全天下蒙受君王恩泽之春的“天地王春”四个字。（《显隆园行状》与《英祖实录》，1737年二月十四日）

接下来举行了世子拜见师傅的相见礼，这是世子从台阶上走下来向老师行再拜的仪式。这也是下任国王在师傅面前主动降低身份的仪式。世子的“师”与“傅”由最高官员兼任。思悼世子的相见礼上的“师”是领议政李光佐，“傅”是左议政金在鲁。

之后世子学习《千字文》等书，从七岁起开始正式读书。世子读的第一本书是《童蒙先习》。随后在他八岁时，也就是1742年三月二十六日举行了入学礼。这是宣告世子正式走向学习之路的仪式。入学

礼不在宫内举行，而是一定要去成均馆举行。在学问面前世子也不过是一名学生，于是在成均馆举行了只有世子一人的入学仪式。

虽然入学仪式是在成均馆举行的，但此后的所有课程都在宫中进行。《恨中录》提及了世子的东宫，称思悼世子居住的储承殿旁有开设讲筵的乐善堂、用于召对的德诚阁、用来接受祝贺及会讲的时敏堂。这是对房屋的说明，同时也是对世子的主要活动，特别是教育活动的介绍。

讲筵是一种正规课程。国王有经筵，世子有书筵。讲筵有朝讲、昼讲、夕讲，在早晨、白昼、傍晚这三个时间段内随时都可以进行。虽说是授课，但也兼作在读某本书的同时，思考、解读其意义的讲读及讨论。国王的话，常常在经筵上讨论国政悬案，世子的话，主要是讨论经史书籍。

参加讲筵这门正规课程的大臣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职位颇高。与此相比，召对则是简化课程，参加人数较少，且职位也较低。世子在书筵上主要读经书，在召对时读历史书。夜间进行的召对也被称为夜对。另外，会讲每月举行两次，包括世子的“师”与“傅”在内的负责世子教育的官员会聚集在一起，确认世子在此期间的学习情况。这一惯例从世子十一岁时开始执行。（《六典条例》）

实际上如果所有课程都进行的话，世子将难以承受。思悼世子通常在上午九点左右开始书筵，下午三点左右进行召对。（《英祖实录》，1747年三月十八日）在此基础上还进行每月两次的会讲。显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课程的强度非常大。所有的课程都是为世子一人而进行，作为学生的他不允许走神。所以或隔天进行，或书筵与召对只进行其一，有时还会停课一段时间。思悼世子不仅学习四书三经，也学习《小学》《通鉴》《史略》等。帝王之路并不平坦。

父王的考试

1747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三岁的思悼世子在英祖的经筵上侍坐，侍坐指世子侍奉国王坐下来听政。这是从前代传下来的惯例，他从三岁开始就经常侍坐。该日英祖召见世子侍讲院的官员，确认这段时间的学习内容。下文是英祖与思悼世子的对话：

上曰：“何必临文而论其义？《小学》是元良所曾读也，予欲考其所学如何耳。立教何先、明伦何次？”东宫对曰：“先教而后可以明伦，此立教之所以为先也。”上曰：“稽古之意，何也？”对曰：“欲博考古事，善者师之、恶者戒之。”上曰：“嘉言、善行之次于稽古，何也？”对曰：“言之嘉者、行之善者必稽古而后可知也。”上曰：“《大学》八条，首格致，何也？”对曰：“物必格知，必至然后可以至于平治之域矣。”上笑曰：“今闻所对，可见汝平日不虚读也。第以汉朝言之，何帝为优？”对曰：“文帝也。”上曰：“汝何不称汉高？”对曰：“文、景之治最善故矣。”上曰：“汝之气质，必好武帝，而反好文帝，何也？”

英祖按照书筵与召对中学习的科目顺序，对经书和历史一一提问。这些都是不用功学习的话就很难回答的问题。所幸思悼世子学习认真，得以对答如流。《恨中录》中也提到1747年是思悼世子认真学习，不需要操心的时期。

但思悼世子对历史问题的回答让英祖起了疑心。英祖认为按世子的资质本应喜欢武而非文，为何反而喜欢实现文治的君王呢？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英祖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进一步深入盘问，在次年五月又提起了这个问题：

上问：“文帝与武帝谁优？”对曰：“文帝优矣。”上曰：“是欺予也。尔心必以武帝为快而何优文帝也？”对曰：“文、景之治优于武帝。”上曰：“尔于将来以文、景之半事予足矣。予每以汉武戒尔，而尔诗中‘虎啸深山大风吹’之句，可见其气大胜矣。”侍读官李彝章曰：“虽似气胜而甚安重矣。”上曰：“古有惜寸阴之语，春坊诸臣每于书筵、召对致诚勤勉，使元良惓惓于学，知所以为君之道，则宗社幸矣。”李永福等起拜曰：“谨奉教。”（《英祖实录》，1748年五月十九日）

查阅《承政院日记》可知，此前几天英祖已经看到了世子写的诗，并感到忧虑，即思悼世子因为一首诗被怀疑是否拥有君王的资质。思悼世子的文集中有一首名为《赠人》的汉诗，这首诗与前面引用的汉诗不同，形式上是五言诗，但意思相通。

凤鸣文王世，麟出夫子时。

龙兴云雨下，虎啸冽风吹。

读者通过这首诗可以感受到思悼世子的豁达气概，前文中英祖从世子侍讲院官员那里得到的七言诗也是这样的类型。对于希望世子成为稳重君王的英祖来说，世子看起来不是很适合的继承人。思悼世子的气势太强，难以成为一位沉稳的君王。无论思悼世子回答得如何，都无法打消英祖的疑虑。

思悼世子像这样随时接受英祖的考试，侍讲院的官员们是否好好教导世子，也可由此见分晓。如果世子的学习成果让英祖感到不满意的话，侍讲院官员们就要接受惩罚。（《英祖实录》，1748年十一月初七日）侍讲院的官员们必须尽力教导世子。世子的成王之学并不简单。

附录 思悼世子的亲笔诗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有数张思悼世子的亲笔诗稿。其中有与上文提到的类似的表现出思悼世子豁达气概的诗。诗为：“灵剑久埋光射斗，大鹏一起翼翩翩。丈夫得志皆如此，何必林泉滞迁延。”此诗收录于思悼世子文集（《凌虚关漫稿》）的《赠人》题目下，是四首中的其一。但文集集中的版本与诗稿的版本存在用词出入。（灵剑久淹光铄铄，大鹏初起翼翩翩。丈夫得志皆如此，何必林泉岁月延。）《赠人》中的全部诗稿都留存下来了，唯有亲笔诗稿的最后一首写明是1758年二月十五日赠与黄锡耆。《承政院日记》1796年三月二十二日条提到正祖下令汇集思悼世子温阳温泉之行的记录，从同知黄锡耆那里得到了思悼世子的亲笔字迹。黄锡耆似乎是侍奉思悼世子的武官，有可能由于是赐给低贱之人的诗，在编撰文集时没有标明

他们的姓名。藏书阁中收藏的思悼世子亲笔字迹大部分是赐给侍从们的，有1758年赐给别监崔善起的，有1761年平壤之行时赐给长湍梧木里金圣集与平壤李大心的。

第六讲 国政实习

军事篇

英祖不仅教给思悼世子作为君王的基本素养，也教他如何处理国政悬案。从世子三岁起，英祖就让他在自己身边观察国政讨论，在他十五岁时让他代理听政，直接决定重大国事。1749年二月十六日是代理听政大概半个月后世子首次处理政务之日。这一天的事情在《英祖实录》与《承政院日记》中有详细记录。

这一天的会议在早上七点举行。英祖在会议开始前这样说道：“今日即元良侍坐之初政。有稟定事，稟于元良，予欲坐而观也。”大臣们首先向英祖稟报了一些事情，最后向世子询问战船的问题。世子回答：“依为之。”听到世子这一回答的英祖斥责道：“汝之声音甚微，如尹勤之老史官，必难听知矣。”世子听到了责备，想要摆脱尴尬，这时左议政赵显命为世子辩解道：“天威之下，自尔然矣。”英祖对世子说：“凡于诸臣奏事，若以‘依为之’三字弥缝以答，则必有错误之患。如有可疑者，必问于大臣，参以己见，然后决之。”这是英祖在提醒世子。但“依为之”这样的回答不仅仅是英祖使用，也是其他国王经常使用的。在这件事情上，思悼世子颇为委屈。

讨论了很多问题之后，终于谈到了那天政务的中心问题——军事。领议政金在鲁根据咸镜道观察使的报告，提出了将咸镜道防御营设置在城津还是吉州这一搁置已久的军事问题。

领议政金在鲁以咸镜监司状达奏曰：“城津防营还属吉州为便。”左议政赵显命曰：“六镇通路，盖有九岐，吉州当其冲，城津只可御三路矣。”上曰：“向见元良，披见咸镜地图矣。”显命达于王世子曰：“见之乎？”王世子曰：“未能详见矣。”东宫曰：“防营虽还属吉州，城津亦有军卒乎？”在鲁曰：“镇卒有之。”东宫曰：“然则防营移吉州是矣。”上曰：“汝言虽是，然当初防营之移属城津，既出于予，则还移吉州，不其轻率乎？宜先问大臣，又稟于

予，然后可为之也。”于是东宫询问诸臣，或言可或言不可，仍稟于大朝，上曰：“吉州、城津防御形便，当遣备堂看定，谁可往者？”

咸镜道是朝鲜半岛北方的防御要地，历史上外敌入侵频繁，军事上的重要性高于朝鲜其他任何地区，因此咸镜道设有特别的军事组织。组织上的最高职位是三名兵马节度使，又另外设置了防御使。兵马节度使与防御使都是从二品，即设置了四名从二品武官职位。朝鲜在其他地区仅设置了一两名兵马节度使，由此可见咸镜道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咸镜道分为北道与南道，每道各设一名兵马节度使，剩余一名兵马节度使由咸镜道观察使兼任。北道的兵马节度营设于镜城，南道的兵马节度营设于北青，观察使的监营设于咸兴。但是关于防御使管辖的防御营所在地问题，在肃宗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存在争议。

吉州的村庄规模宏大，但也存在一旦失利就会兵败如山倒的缺点。城津的村庄虽然规模较小，但坐落于连接咸镜道北部与南部的要道上，且位于险峻的磨天岭之下，有易于防御的长处。而且城津紧靠大海，也能成为阻挡海上侵略的根据地。英祖在上文争论的几年前曾下令把防御营移至城津，但此时出现了再次移至吉州的言论。十五岁的世子很难理解如此长久的历史。大臣们主张移至吉州，注意到这一情况的世子立刻就支持此观点。于是英祖叱责了思悼世子：怎么能轻易改变我不久前定下的事情呢？

英祖在讨论的最后，令兵曹判书金尚鲁去咸镜道仔细调查，这一年的十月，从咸镜道回来的金尚鲁认为城津过于偏僻，吉州又过于开阔，于是请求将防御营移至吉州以南，也就是位于吉州与城津间的仓德。英祖让防御营先搬到吉州，但由于在仓德挖井无法出水，移至仓德一事就此作罢，因此防御营继续设在吉州。

财政篇

未能按照英祖的期待回答军事问题的思悼世子还需要解答财政的问题。讨论完上文的军事问题后，管理国家财政的户曹负责人——户曹

判书朴文秀提出了关于守御厅延迟纳税的问题。守御厅负责朝鲜最重要的要塞——南汉山城的防御工作。从党派来看，朴文秀属少论派，守御厅的负责人——守御使赵观彬属老论派。赵观彬是在1722年壬寅狱事时受少论派攻击而亡的老论派大臣赵泰采的儿子。对立的两派首领级大臣为了各自官厅的利益在国王面前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户曹判书朴文秀曰：“敕行时，本曹贷守御厅银子，未及还报。向日守御米三百石移送户曹事，有所稟定，而倭以换银，终不出给，可闷矣。”观彬曰：“户判之事偏僻矣。户曹经费虽重，本厅不虞备之银，贷去而尚不还报，税贡米又欲取用，不知其稳当矣。年前贷银之时至有誓言，而尚不还送，非矣。”文秀曰：“小臣虽甚无似，贷银之时岂有誓言乎？误有所言之事，非上闻于筵席者，守御使之言大段非矣。”上曰：“户判、守御使之以誓之一字相诘，不可，并从重推考。”（《承政院日记》中标有此处部分原文删除的标记）观彬曰：“米则已为作银，故不得送矣。”文秀曰：“守御使所谓作银之说，诚无据矣。若自守御厅发卖千余石米，则小臣亦有耳目，岂不闻之乎？况御供所需之米，何可换银乎？”上曰：“其则然矣。惟正之贡，作银之说，非矣。”王世子曰：“依前下教，移送户曹，可也。”上曰：“予欲言之而未果，其所处决是矣。”显命曰：“处分诚得宜矣。”诸臣皆曰：“处分好矣。”观彬曰：“下教诚好。虽千石，当移送矣。”

这个问题看起来比前文的军事问题简单一些，而且也是国王此前十七日已经决定的事情。国王令守御厅向户曹送米，但守御厅一直拖延不从，于是朴文秀旧事重提。现在我们无法得知事态为何发展到如此地步，而朴文秀与赵观彬都是年过花甲的老臣了。由于他们分别是少论派与老论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认为他们的争论不只是官厅间的较量，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一些党争的因素。之后英祖提起了党争的话题也是因此而起。

不同于一般国政讨论，朴文秀与赵观彬在国王面前粗暴激烈地争吵起来。实际上世子袒护任何一方都不太合适，但英祖在事前已有判断，所以不难做出裁决。而且赵观彬口误称将应献给朝廷的米换成了

银子，无疑是自掘坟墓。像这样答案明确的情况，思悼世子也非常谨慎，没有像前文的军事问题一样爽快地给出答案，他仿佛因父王的斥责变得有些胆怯。最后国王支持了朴文秀，他才给出自己的答案，复述父王的话语而下令。思悼世子在形式上得到了一部分权力，而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

英祖的嘱托

令世子侍坐，长时间讨论了国政后，英祖长篇大论地训诫了世子。由于是第一天，不可能没有训诫。首先针对军事问题，他嘱咐世子凡事都要慎重：

（上）顾谓王世子曰：“予今谢务，汝则代理。汝生于深宫，长于平安，为君之难，何以知之？凡于处事之际，若不审慎为之，则予虽为太上皇，当指挥为之，予非谚所谓观光食饼之人也。近日见汝酬应之事，似易长进，若然则予可高枕而无忧矣。然俄以吉州事见之，不无容易为之之意，是诚可虑。如此事必问于大臣、诸臣以后稟于予，可也。……予在之时，犹尚如此，他日之事，何可知也？每事若如此，则后必有见欺之患矣。”

接着英祖提到他认为最重要的政策，也就是朋党间的荡平。

予则一政一令，不敢放心，苦心调剂，须发尽白。二十五年之间，未有相杀之举，汝宜守之如金石。人君使臣之道，合而用之可乎？分而用之可乎？彼诸臣推其祖先，皆结婚相好，而党论一出，便成楚、越，各怀相害之心，予之固执调剂者，断然是矣。今之进言者，或曰“调剂反成一党”，或曰“调剂反狭”，或曰“贤愚是非无别”，其所为言，千岐万涂。虽不敢相杀，而相杀之心未尝亡也。日后汝若信听快从，如今吉州之事，则其于宗社臣民何哉？一进一退，外面似快而当启杀戮之患。汝不遵此命，他日何颜见予乎？四百年祖宗基业、一国亿万生灵付托于汝，汝须服膺予言，毋负期望焉。

这样的忠告像是因朴文秀与赵观彬的较量而起。英祖对于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荡平策进行了冗长的说明，同时也提到对外人对荡平策的批

判意见。上文虽未言及，但其他记录中提到此前一年英祖谈及李世师的批判荡平策的上疏。即便存在这样的批判，英祖依然没有改变对荡平策的态度。

英祖让思悼世子看看聚集在此的官员们。老论派与少论派混合在一起，而他们原来都是从西人党里分裂出来的，分裂之前他们互相通婚，关系亲密。其实朴文秀与赵观彬的家族往上追溯的话，也有姻亲关系。在五十余年前都是作为西人这个党派而团结、联合在一起的家族，现在就像宿敌一样急于自相残杀。英祖嘱咐世子不要被他们的党论所左右，他们都说对方党派是小人，而自己党派是君子，但国王不能这样划分君子与小人。

涉世未深的世子，听到此人之言会觉得此人正确，听到彼人之言会觉得彼人正确。如果是这样，该如何做出决策呢？英祖让他先询问大臣们，再询问自己。但如果事事询问的话，代理听政又有什么意义呢？年幼世子的脑中纷乱如麻。

第七讲 希望玩乐的世子

饮食，一时之滋味；学问，一生之滋味

没有关于思悼世子的胎梦。其他国王出生前，有人会梦到龙，但有关思悼世子的记录中没有常见的龙梦。英祖的胎梦是一条白龙进入英祖出生的宝庆堂，这是一名宫女的梦。正祖的胎梦也比较类似，说是龙含着如意珠进入了寝殿。这是他父亲思悼世子梦到的，思悼世子还将梦见的龙画在绸缎上，随后挂在寝殿的墙上。据说正祖出生的前日“天大雷雨、流云布濩，彩龙数十蜿蜒腾空，都人士咸睹而异之”。纯祖也与英祖类似，是某位宫女梦到了龙。思悼世子前后的国王们都有龙梦，甚至连惠庆宫出生的前日，她父亲洪凤汉的梦中也出现了黑龙。

《正祖实录》记录的正祖撰写的思悼世子行状里没有提及龙梦，仅仅写道“自诞前数日，有星云之瑞”。儿子正祖已经登极，这些祥瑞并非不能写之语。但思悼世子没有即位，龙梦并不适合他，即便真的梦到了龙也不能记录下来。总之，仅从胎梦来看思悼世子也没有变成龙的命运，而且从一开始思悼世子就不太适合王位，与他父亲英祖所设想的理想国王形象相距甚远。

英祖比朝鲜其他任何一位国王都严格对待自己的角色与责任。他相信自己必须比任何人都博学多闻、勤勉，对自己严格要求。但思悼世子并不如此。惠庆宫说思悼世子“言语沉默，行动之间，不锐不敏。德器虽宏，凡事异之于父王之性”。《恨中录》里描绘的思悼世子不够诚实负责，这应该就是他严厉的父亲导致的，但可以看到他小心翼翼的性格。一些学者认为思悼世子这样的性格是惠庆宫歪曲事实的产物，因为正祖撰写的思悼世子行状中，世子是聪明且仁慈的形象。但实际上，仔细阅读《英祖实录》与《承政院日记》的话，可知比起正祖描绘的思悼世子，惠庆宫描绘的思悼世子形象更符合史料。正祖不可能在行状里原原本本地描写他父亲的真实形象。

与思悼世子不同，英祖为人一丝不苟、机智敏捷，是一位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周围的人。英祖常对思悼世子说一些类似于“吾幼时好学不倦，汝亦以此自勉”的话语。想成为国王，必须熟练掌握帝王之学。英祖很晚才被册封为世弟，所以学习帝王之学也比较晚。但正如他经常自我夸耀的那样，他成为世弟后好学不倦。思悼世子处于比他更好的条件下，但并没有努力学习。

某次英祖曾这样训诫思悼世子。“饮食，一时之滋味；学问，一生之滋味。饱而无滞者，惟学为然也。”（《英祖实录》，1749年二月十七日）学问是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会出现差错的事情，他在劝告世子尽全力学习。思悼世子不爱学习但贪吃，英祖是暗指此事而故意这般描述，即不要傻傻地光贪吃，而是应该把精力放在“饱而无滞”的学习上。但是思悼世子的天性与英祖完全不同。

艰辛毕卷

阅读思悼世子的东宫日志——《庄献世子东宫日记》（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品），可以见到记事前面标有“两筵停”的日子非常多。世子通常上午与下午，一天两次召开书筵与召对，学习典籍与历史，“两筵停”即两堂课均停课之意。世子的课程常因婚礼、葬礼、患病而暂停。思悼世子正是该学习的年纪，却足足四个月都未上课，这成了问题。（《英祖实录》，1744年正月十八日）当然，此时世子完成了成婚这一人生大事，但这也不能成为长期休学的理由。

当时世子称自己患有眼眩症。听闻此事的大臣们劝英祖下令给世子治疗，但英祖并没有把世子的话当真，他认为世子在装病。英祖称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常见之事，可以再观察一下。他说世子应该是厌恶读书才如此，大臣们认为世子学习太刻苦才患病，但英祖仍固执己见。思悼世子持续抱怨眼眩时，大臣们再次劝英祖下令给世子治疗。如此一来，英祖更加明确地称世子厌恶读书时就会说眼眩。因为他问了世子，世子就是这么回答的。（《承政院日记》，1743年十一月初十日与同年同月十四日）对年仅九岁的世子来说，每日都有师傅们在身边让他读无趣的书，不停地劝他学习，这让人难以承受。

思悼世子从小就厌恶读书。这是他八岁行入学礼，正式开始世子课程时的事情。某天世子在英祖面前朗读了《童蒙先习》，读完之后向英祖说：“艰辛毕卷。”（《承政院日记》，1742年九月十九日）按照现在来看的话，小学二年级的小孩子尚未那么害怕父亲英祖，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英祖从此开始担忧。

思悼世子并不聪明机智，英祖担心他贪吃厌学。惠庆宫称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时，身体“硕大”。英祖也说思悼世子是“体甚肥丰”“肥大”等，大概是小儿肥胖。思悼世子有多肥胖？某次英祖甚至称他：“若或跌蹶，则身重易伤，是甚为虑。”英祖对身体肥胖、行动迟缓而厌学的世子说：“汝若有厌读之心，则当奈何云矣。”可见他的担心。（《承政院日记》，1744年十一月初三日）

英祖经常提及世子的肥胖。他在大臣面前说：“卿不见其腹乎？予则其年不如此矣。”又说：“其肥大如此，故顷者东宫以谓所乘之轿狭甚不堪乘云。此轿即予在东宫时所乘，而东宫还嫌其窄小。”这是说对于十二岁的思悼世子来说，乘坐英祖十八岁时坐过的轿子有些狭窄。（《承政院日记》，1746年六月二十四日与同年同月二十六日）英祖认为仁元王后让世子吃了太多食物是个问题。（《承政院日记》，175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据说仁元王后殿的饮食是宫中美味，世子发胖是有原因的。

英祖也清楚经常嘲讽孩子并不好。（《承政院日记》，1745年六月十三日）但他一见到思悼世子就忍不住，他屡次在大臣们面前无视并嘲笑思悼世子。世子让他感到如此失望，他问世子：“十二月内，汝出好读之心，凡几次乎？”世子回答：“一二次矣。”旁边的大臣甚为惊讶，一边说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一边袒护世子，但世子一反常态地明确回答道：“吾已知之矣。”（《承政院日记》，1747年十月初三日）不过《恨中录》记载这段时期是思悼世子学习最用心的时节，也就是思悼世子十三岁时的事情。

厌学的世子沉迷玩乐。英祖对世子喜游戏、厌学习的情况感到忧心忡忡。（《承政院日记》，1746年五月二十一日与1748年五月十八日）世子原本就厌学，某位大臣提议：“史与小说，译而听之，易生

滋味。若使官僚一一解释事实，毕陈首尾，则东宫必有开悟之端矣。”但遭到英祖的断然拒绝。英祖认为：“此有弊，必好闻小说而尤为厌读矣。”（《承政院日记》，1747年十月初三日）

英祖反对让世子读小说，但世子却自己找来小说与“杂书”阅读。数年后英祖也察觉世子时不时阅读杂书。（《承政院日记》，1750年五月二十五日）翻阅思悼世子在被关入木柜前数日撰写的《中国小说绘模本》的序文，可以了解到他读了许多小说与杂书。这本画册的序文中提及《金瓶梅》《肉蒲团》等淫秽小说，还提到《圣经直解》《七克》等天主教书籍，总共提到九十三种书名，可以断定这些都是思悼世子读过的书。《中国小说绘模本》展示了思悼世子是多么沉迷于小说与杂书。

思悼世子从三岁起侍坐父王、学习国政。虽说幼时一无所知，但正式开始学习时，他无法扎实地跟上帝王学的课业。英祖知道世子厌学，每次见到他都要斥责一番。每次见面都要挨训，世子开始害怕并躲避父亲。如此一来，从世子去世前十年开始，英祖几乎放弃了世子。在此期间，世子侍坐父王的事例大幅减少。正祖出生后，英祖撇开了世子，频繁地令孙子侍坐于自己身边。

思悼世子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无心过问国政与书筵，多次暂停书筵，即便召开书筵也是敷衍了事。不仅是简单的召对，连书筵这样正式的课程也不在正堂举行，而是在世子寝殿里进行。（《英祖实录》，1754年二月十四日）换言之，一位原本应该以端正态度去教室上课的学生把老师叫到家里来，敷衍地学习。

第八讲 艺术家与帝王

艺术家型的人

思悼世子天生厌恶束缚。谁喜欢被束缚呢？即便是与儿子正祖相比，也是思悼世子更无法沉浸于学习这样被动且静态的事情。比起阅读，他更喜欢书写。他喜欢写字，又喜欢作诗。他自己这样说过，实际上他也经常作诗写字赏赐给大臣们。比起安静坐着接受事情，他更喜欢主动去制作东西。思悼世子非常喜欢绘画，英祖在绘画方面也造诣颇高，但没有像思悼世子那样“以作图消日”（《恨中录》，第37页）。思悼世子不是学者型的人，而是艺术家型的人。

思悼世子更喜欢去宫阙的后苑挥剑、射箭、骑马，而不是郁闷地呆坐。他对刀剑与武艺的痴迷传遍了宫阙内外，对武艺的兴趣达到了编纂武艺书籍的程度。这些被他的儿子正祖所继承，正祖主导出版了一本著名的武术书籍——《武艺图谱通志》。

思悼世子也沉迷于小说、咒术书等杂书与方术的世界。他喜欢凉爽的室外，厌恶闷热的室内；他喜欢可以尝试多种变身化形的幻象世界，厌恶一潭死水的现实。他曾阅读过据说可以召唤鬼神的道教经书——《玉枢经》，正因如此，他害怕雷声霹雳的病症变得愈发严重。

对于这样性格的世子来说，帝王学的教诲并没有打动他的心。思悼世子并不是一开始就厌恶读书。周围人回忆思悼世子的幼年，最先想到的是如下逸事：

学《千字文》，至“侈”“富”字，执“侈”字而指所着衣襖曰：“此乃侈也！”英庙幼时所御宕巾有笼七宝者，劝着之，谓以“此亦侈也”而不着之。使之衣周岁所着衣襖，亦以奢侈为人所耻，不欲衣也。此乃三岁幼年奇异之事。侍者试置明绌与绵布，问以“何者为侈？何者不侈？”景慕宫指明绌而谓“此乃奢侈”，指绵布而谓“不侈”。又欲见其所欲之样，问以何者为衣襖则为好。景慕宫指绵布而曰：“衣此为好！”以此观之，可知其卓越。

英祖极其厌恶奢侈，辅佐思悼世子之人自然会从戒奢开始教导。英祖甚至下令撤走尚衣院的织造机，禁止宫中制造奢侈的绸缎衣服。英祖还下令将禁奢令翻译为谚文并颁布。（《英祖实录》，1734年二月初五日）这意味着他率先垂范，百姓听令景从。英祖听闻世子说要穿绵布衣服，非常满意，甚至还向大臣们炫耀此事。（《英祖实录》，1737年九月初十日）

问题在于世子最初学到的俭素美德，实际上与世子的地位并不相符。现实中，世子在朝鲜可以享受最奢华的生活。他处于最接近奢侈的位置，而周围人反而致力于教导他俭素。世子从小学习这些脱离现实的美德，想让他真心地接受这一教导，并不容易。

燕岩朴趾源致俞汉隽的信中曾经提到某个厌恶读书的孩童的例子。“里中孺子为授《千字文》，呵其厌读，曰：‘视天苍苍，天字不碧，是以厌耳。’此儿聪明，馁煞苍颉。”真是坦率的回答！世子的心思也与这名孩童并无二致。无人会被对自己来说不切实际的东西触动心灵，然而宫廷中进行的正是脱离现实的观念教育。思悼世子不可能喜欢这种教育，而且他经常被诱惑围绕：美味的食物、秀丽的宫女。从幼儿期就教导世子俭素，这只是想尽快将儿子培养为国王的英祖的心思。

从心所欲

英祖很清楚思悼世子的处境。他在思悼世子十四岁时说：“食色之大，尤不可不戒。玉食珍羞列于前，纷华侈靡眩于眼，而当此之时，汝若对臣僚以为‘吾不留心于此’云尔，则是欺心也。况色欲则浮于食欲？”英祖明白教导孩子压抑自己的本能与欲望是多么勉强，但他不得不这样教导。朝鲜国王是以儒教理念统治儒教国家的君王，因此必须是这种理念的代表。他不得不进行哪怕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矛盾教育。

英祖在1749年正月思悼世子开始代理听政时训诫如下：

放僻奢侈皆由于快心，人君之事善则百姓称之，不善则皆笑之，所谓钟街人之骂其君者，是也。一快字于汝为病，戒之戒之。（《英祖实录》，1749年二月十七日）

英祖认为思悼世子“放僻奢侈”。“放僻奢侈”典出《论语·阳货篇》的注释。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该段注文中有“若心不定，便生放僻奢侈之心”。另外《承政院日记》与《英祖实录》中的汉字标记存在出入，《承政院日记》中作“放僻邪侈”。该段话又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与《孟子·梁惠王上》，作“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无论是《英祖实录》还是《承政院日记》，“放辟邪侈”都是指心无定数，把心思放在不适合的错误地方或随性生活。英祖认为这一切都是惦念享乐而生。他是在批评思悼世子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

英祖无法理解对艺术家型人格的思悼世子来说，这种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教育是多么不适合。这是只强调国王的责任，强制实施的灌输教育。英祖称：“所谓钟街人之骂其君者，是也。”不能说英祖强调当权者责任的态度有错，但即使是最好的药品，若强行喂食的话也会产生问题。思悼世子最终还是受不了这样的压迫。

思悼世子从小不断被告知禁止奢侈，被训诫要随时端正心态，但他的行为反而遵循着本能与欲望。他胃口大开，身体变得肥胖，随着年龄的增长陷入男女之情。按《恨中录》的记载，思悼世子与许多宫女发生了关系，这超出了英祖的容忍范围。后来他陷入与妓生的玩乐，甚至将女僧带入宫中。

三岁时因选择绵衣而受到表扬的思悼世子，却因为绵衣而加速走向死亡。正祖在父亲思悼世子的行状中提到一则关于绵衣的逸事，即思悼世子因绵衣而受到逆贼们的攻击。据说思悼世子在母亲贞圣王后、祖母仁元王后去世三年丧结束后依然经常穿着作为丧服的粗绵衣。思悼世子的反对势力借此向英祖进谗言，称世子盼望英祖死去所以提前穿上粗绵衣作为丧服。

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的那天，英祖为处罚世子而令他脱下袞衣，发现袞衣下面是粗绵衣。见到粗绵衣的英祖想起那些谗言而怒火中烧，没有染色的粗绵衣加剧了他的愤怒。粗绵衣是在父母丧礼时所穿的衣服，光是看见粗绵衣就会让英祖质问世子是否希望自己死去。思悼世子年幼时选择绵衣的宣言，仿佛预示了他会穿着绵衣而死。

第九讲 最乐读书

仍下教于王世子曰：“予与汝为约矣。若熟读，则自当善讲。今日诸臣所见，必须善诵，可也。”在鲁曰：“当背讲乎？”上曰：“然矣。”王世子承命读《中庸》序，在鲁曰：“序文不少，而邸下外诵，一字不误，甚奇矣。”锡五曰：“《中庸》序文之善诵，难矣。而邸下初读外诵，无一字碍误处，臣不胜欣忭之至。”上曰：“元良能外诵篇题及第一章大文耶？”王世子曰：“并读音释乎？”上曰：“以汝意为之。”王世子读篇题及第一章讫。上曰：“章下注亦须读之。”王世子承命读之。上曰：“今日则善诵矣。”在鲁曰：“通也。”上曰：“以儒生讲规言之，则当为四通三略矣。”仍下问曰：“上智，而何有人心？下愚，而何有道心？”王世子曰：“上智亦有形气之私，故不能无人心。虽下愚，性命则一，故能有道心也。”上曰：“人心何以听命于道心也？”王世子曰：“能制耳目口鼻之欲，有若听命者然，故云耳。”上曰：“以汝喻之，游放之心，即人心也；安坐读书之心，即道心也。汝于安坐读书之时，能使游放之心听命耶？”王世子良久乃对曰：“似未易矣。”上笑曰：“汝曾命之而有违耶？”王世子曰：“自然有违矣。”在鲁曰：“殿下以实问义，故邸下亦以实仰对。而游放之心，若不听命，则邸下诵读何能若是精熟乎？”上又下教于王世子曰：“读书最乐之诗，汝欺李毅敬矣。游戏最乐则可矣，而读书岂汝所乐也哉？”

这是《承政院日记》1748年九月二十一日条的内容。英祖在一开始就威吓世子：“必须善诵。”这让本来就怕见父亲的世子吓住了。世子背完《中庸》序文后，英祖又让他朗读篇目与正文。该日世子对英祖的提问对答如流，英祖也罕见地称赞了世子。如果这样结束就万事大吉，但英祖在夸奖后又加上了一句“以儒生讲规言之，则当为四通三略矣”，即不能因为今日只妥善完成一项提问就获得“合格”，要妥善回答四项提问，大体流畅回答三项提问才能算合格。英祖的意思是世子不要因为有一项做得很好就过于高兴。他是在不留余地地贬低世子取得的成就。

随后英祖改变了测试方式，开始追问文句的含义。他针对《中庸》序文中的“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的部分进行提问，让世子解释“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这句话。英祖起初只是单纯追问字面之意，但思悼世子仍然对答如流，于是他又追问如何压制欲望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思悼世子举出了通过学习而了解到的知识，给出了非常妥帖的答案。

随后英祖转向文义的应用与实践方面，即让思悼世子将文义应用于生活中。英祖问他：“汝于安坐读书之时，能使游放之心听命耶？”这不是提问，而是责备。世子半晌无言，最后投降道：“似未易矣。”此时英祖开始嘲笑世子，无论领议政多想帮助世子也无济于事。

英祖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追问世子：“读书最乐之诗，汝欺李毅敬矣。游戏最乐则可矣，而读书岂汝所乐也哉？”最后思悼世子在众多大臣面前成了笑料。

事发前不久，思悼世子赐给曾在世子翊卫司工作而后还乡的李毅敬一首诗。诗中有“最乐之中读书乐，千金不贵万民贵”之句。李毅敬回到家乡全罗道康津后，向周围人炫耀思悼世子赐诗。听闻此事的人将这首诗告诉了英祖，于是英祖也知道了“最乐读书”这首诗。

此后英祖多次提到这首诗，当众取笑世子道：“读书岂汝所乐也哉？”在上述事件发生前五日，他甚至对思悼世子说：“顷日李毅敬下乡之时，汝以读书最乐书给，汝非但欺李毅敬也，亦尽欺湖南之人矣。”英祖的意思是，李毅敬回到家乡后，向遇到的每个人都炫耀世子的赐诗，于是消息流传，可以说是世子欺骗了湖南地区的所有人。英祖态度严厉，但不知该不该说他是懂诗才如此。他真是一位用语凶狠、为人凶狠的父亲。

第十讲 世子教育的问题

惠庆宫曾在思悼世子幼年期的教育中，寻找他发狂而最终离世的根本原因。思悼世子出生后刚满百日就与父母分离，英祖与思悼世子的生母宣禧宫若莅临东宫，曾侍奉景宗、现在侍奉世子的宫女们总会让宣禧宫感到不愉快，因而英祖开始减少前往东宫的次数。惠庆宫认为，这样世子就不能经常见到父母，也未能形成正常的亲子关系，这是世子教育失败的首要原因。而且世子的抚养与教育仅由东宫的宫女与侍讲院的官员来负责，结果世子陷于宫女之手。

英祖没有像对待民间孩子那样随和对待自己的亲儿子思悼世子，而是仅把他当作可以托付国家重任的继承人。可以理解英祖的严厉，他是为了强调延续社稷的继承人的重大责任。不过父亲对待儿子的态度与方式存在过分的一面，惠庆宫对英祖的态度也很不满。她在初入宫时见到英祖与思悼世子会面的情形，曾说“其为十岁之阿只，不敢相对为坐，若臣下样，跼缩俯伏而谒见，何若是过焉？”

英祖不会经常召见思悼世子。然而一旦会面，他只会训诫世子，而不是表达关爱，甚至在大臣们面前向尚是孩童的世子追问他无法详细回答的文义。如果世子的回答不能让他满意，他就会当众责备世子或者揭世子的短。这样反复几次，世子由于害怕，连明明掌握的内容也不能好好回答。日积月累，他变得害怕英祖，以至于后来将谒见父亲视为举办大事。（《恨中录》，35—38页）

英祖对待世子的态度与方式，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他本人的性格。但朝鲜的王世子教育，通常与现实重叠的部分也不多。如果我们通过思悼世子接受的教育，解读朝鲜时代世子教育的常见问题的话，可以认为这是与世子地位不符，从俭素开始教导的观念教育、非自主性教育与反社会性的教育。

前文已经解释了观念教育，现在谈谈自主性与社会性教育。正如惠庆宫所言，思悼世子的穿衣系带等事务都由内人帮忙处理，生而为

世子的他无事可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情况下，还有什么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呢？所有事情都以世子为中心而运转着。自己只要负责下命令，但没有事情需要他亲自动手。只要听父王的话，按师傅的指导来学习就可以了。别的事情没必要做，也不能做，于是导致世子缺乏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自主性。

在以世子为中心运转的世界里，世子与他人爆发冲突的话，不必感到难过，也不需要妥协。与他人无法沟通，故而无法培养世子的社会性。孩子们通过游戏建立社会关系，但宫中没有可以与世子一起玩耍的孩子。世子独自学习，游戏的时候则召唤下人一起。在与宫女们或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时，世子也总是处于中心位置。

《恨中录》提到韩尚宫发明的游戏就是一例。东宫的韩尚宫对崔尚宫说：“人皆闻谏而逆，阿只之心必郁积而不能舒。崔尚宫严保而以义引导之，吾则使之有游戏之时，使其消畅。”（韩尚宫）有手巧之术，以木与纸，为月刀、为剑、为弓矢。其与崔尚宫为交替尚宫，趁崔尚宫下去之时，令年幼内人立于门后，使其持所为武器，故作武艺之声，以诱景慕宫同游。”（《恨中录》，第30页）惠庆宫认为就是因为韩尚宫，思悼世子陷入游戏，对刀剑与武艺产生了兴趣，乃至后来被怀疑谋逆。然而这种游戏不是只有思悼世子玩过。

据说高宗之子英亲王幼时在昌德宫乐善斋后院与七八岁的年幼内人玩过军队游戏。英亲王率领年幼的内人们，他们举着竹刀与木枪。问题是世子玩这样的游戏不会培养他的社会性，反而会培养出他的反社会性。这样的游戏对世子来说，只会强化权力的与生俱来的正当性，只会强化他自己是天生统治者这样的想法。对于在任何地方都位处中心的世子来说，需要的是可以使他认识到世界并非如此的特别项目。

在朝鲜时代，并不是没有考虑过给世子安排一些同龄玩伴以培养他的社会性。朝鲜前期的中宗时代，元子出生未久，韩效元等人就上疏讨论元子的教育问题，其中建议挑选十岁至十二岁的大臣子弟，让他们每天出入宫廷与元子一起读书、相处。（《中宗实录》，1517年正月十九日）不知该建议最终是否实施，即使实施也不过是暂时的，

况且也不能期待大臣子弟成为三岁元子的朋友，从而提高元子的社会性。

通常在与世子教育相关的文章中，会以“陪童”来解释这些扮演世子之友角色的孩子们。他们是与世子一起玩耍、学习，为培养世子的社会性而从宫外带入宫中的孩子。但实际上，陪童并不是世子的朋友，也不存在以这样的意思来使用“陪童”一词的例子。陪童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侍奉某人的孩子”，即世子的陪童是侍奉世子的，不是与他一起学习、玩耍的孩子。《承政院日记》1784年七月初二日条中提到，有提议说从民间孩童中选拔陪童辅弼世子，待年纪渐长后给予他宫廷内外的末等官职。陪童大概是给世子跑腿的孩子。按《恨中录》所言，宫中法度禁止十岁以上的男孩子在宫中过夜，所以在宫中男孩子罕见。思悼世子在小舅子过来时，想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甚至不回自己的住所。世子仅有侍从而无一起玩耍的朋友，他从小就是个孤独的孩子。

朝鲜的世子教育基本上就是观念教育、非自主教育与反社会的教育。最近有不少人高度评价朝鲜的世子教育具有高层次的教育理念与合理的体系，我认为固有必要找寻世子教育中的可借鉴之处，但也需要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朝鲜时代的人也提出过这其中存在非自主的、反社会教育的问题。

第三部 狂症的展开

第十一讲 狂症的证据

《英祖实录》

从十岁左右开始令英祖失望，直到死前，思悼世子一直是让英祖头疼的儿子。对思悼世子来说，英祖是令人恐惧而想避开的父亲。

《恨中录》称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二十年，世子的精神不健全，这种说法颇有说服力。但从前有几位学者怀疑并否定《恨中录》中关于思悼世子狂易的记录。这种看法源于他们没能正确理解《承政院日记》与《英祖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他们只翻阅了正祖把思悼世子之墓迁往水原时撰写的思悼世子行状与墓志就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儿子写的父亲传记里没有狂症的说法，世子是贤明的世子，所以不能相信《恨中录》的相关记录。他们怀疑妻子写下记录的意图，但照单全收儿子写下的记录。

针对《恨中录》中思悼世子狂易的说法，首个正式提出质疑的李银顺教授并没有考虑正祖在撰写父亲传记时采取怎样的态度，即没有考虑如果思悼世子真有狂症，儿子正祖会怎样撰写。她急于对《恨中录》提出质疑，都没有仔细查阅最基本的其他史料。基本史料当然是《朝鲜王朝实录》，即《英祖实录》。《朝鲜王朝实录》记录规模庞大，所以很难进行整体研究。但至少有必要细致分析重要日期的记录，而李银顺教授连这样的分析都没有进行。

《朝鲜王朝实录》中存在所谓的“卒记”，这是史官在名人去世时简单整理并评论其生平的文章。可以推测，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或去世之日也会有类似的记录。下文是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的1762年闰五月十三日《英祖实录》的记录：

世子诞生，天资卓越，上甚爱之。十余岁以后，渐怠于学问，自代理之后，疾发丧性。初不大段，故臣民冀其克瘳矣。自丁丑、戊寅以后，病症益甚，当其疾作之时，杀宫婢宦侍，杀后辄追悔。上每严教切责，世子疑惧添疾。上御庆熙宫，两宫之间，转成疑阻，且与阉寺妓女游嬉无度，专废三朝之礼。上意不合，而既无他嗣，上每为宗国之忧矣。

上文称思悼世子在十五岁开始代理听政后开始发病，并丧失了本性。到底是什么病让他丧失了本性呢？这个病若发作会让他杀死内人与宦官，发作停止后他又会后悔。到底是什么病呢？这个病能被看作是肉体上的疾病吗？无论怎么思考，这个病看起来都不像是肉体上的疾病。引文仿佛把《恨中录》记载的思悼世子传记概括为一段，从而简单阐述了思悼世子狂症的发展过程。总之，《英祖实录》明确提到了思悼世子的狂症。

英祖、思悼世子、正祖之言

此外，还存在多种证据能证明思悼世子患有狂症，这从当事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中可以一一确认。首先是英祖的陈述。英祖将思悼世子关入木柜后，把世子从东宫贬为庶人。当时他撰写了所谓的《废世子颁教》颁布于世，该教旨中放入了“虽曰狂何不处分”之语。思悼世子的生母宣禧宫将他的恶行上告英祖后，仍然强调他患有狂症才会有这些举动，请英祖宽大处理，“虽曰狂何不处分”正是英祖对她的回答。在此英祖虽未断定思悼世子患有狂症，但也没有否定该观点。然而，在思悼世子去世两个月后的葬礼上，英祖明确表示思悼世子已“狂”。当时英祖亲自口述并撰写的思悼世子墓志铭中有如下一段话：

噫！自古无道之君何限？而于世子时若此者，予所未闻。其本生于丰豫，不能摄心流于狂也。

当然，引文中的“狂”并不一定就是指精神病，也可以将此理解为不具备健全的精神的样子。但参考《废世子颁教》，再考虑到此言所指的对象是至尊的世子，似乎不妨将此视为精神病。

另外，需要注意事件的当事人——思悼世子本人也提到自己的精神疾病。他在1753年与1754年左右写给岳父洪凤汉的信中曾提到自己的郁火症：

余本人难知郁火之症，今日暑症之中，入侍罢，火盛郁极则烦若狂。此等之症，不可语与医官也。卿其知悉涤郁之剂，制剂而潜送如何？事烦未安，从容报之。

当时思悼世子的病症并不严重。按《恨中录》的记载，“癸酉年，至有惊悸之症。甲戌年，此症时时间发，渐为沉痾”（《恨中录》，第55页）。总之，思悼世子本人此时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病症。

思悼世子的状态日渐恶化，发展到后来周围无人不知，所以子女不可能不知道，但正祖在思悼世子的正式传记中只字未提父亲的狂症。他真的不知道父亲的狂症吗？正祖虽然没有公开留下任何话语，但在非正式密谈中却提到了父亲的病症。

1800年六月，正祖召准亲家金祖淳到当时自己居住的昌庆宫迎春轩会面。正祖在去世当月，儿子纯祖的配偶再拣择也已完成的情况下，召见了将来的亲家进行密谈。他像念遗嘱一样回顾了自己的政治历程，对很多事情发表了看法。金祖淳在密谈结束后记下了当天听到的话语，命名为《迎春玉音记》（该题目的意思是“在迎春轩听到的国王的话语”），并把它藏在家里传给后人。

正祖在密谈中称君王本孤危，拜托世子妻家积极帮助世子。他还提到思悼世子之死：“景慕宫患候而人孰不知？而竟未蒙先朝昭晰洞谕之举。予之至恻，安得不郁结而冥顽？故至今忍过矣。”也就是说，英祖明知思悼世子的狂症，却把他当作逆贼一样安上罪名，而正祖对此惋惜不已。如果相信《迎春玉音记》的记载，那么可以说英祖、正祖都知道思悼世子患有狂症。

《恨中录》记录狂症的理由

虽然很多记录都证明思悼世子患有狂症，但具体分析并详细记录病症发展过程的只有《恨中录》。《恨中录》为何如此彻底地展露思悼世子的精神状态？这与惠庆宫的执笔动机有关。

正如《恨中录》序言所说，从惠庆宫生活的年代起，对思悼世子之死就存在各种看法。首先，有意见认为思悼世子犯有死罪，即因谋逆罪而死；与之相反，也有人认为思悼世子无罪，是英祖听信亲信的诬陷而处死了他。惠庆宫称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不符，即思悼世子既有罪又无罪。这是什么诡辩？事情是这样的。思悼世子确实试图杀死英祖，难逃想杀死父王的谋逆罪。但该罪是他在精神不健全时所犯，所以不能被视为问题。这是狂人世子犯下的罪，不能说有罪。

惠庆宫认为不应该讨论思悼世子有罪无罪，选择哪一方的观点都会出现问题。如果说思悼世子真的有罪，他的后人会怎样呢？思悼世子之子正祖或孙子纯祖会陷入怎样的处境呢？他们必然成为罪人之子与罪人之孙。罪人的子孙怎么能成为朝鲜这个严格的儒教国家的国王呢？这是对国王最恶劣的亵渎，无异于谋逆。说思悼世子无罪也是如此。如果说英祖听信亲信的谗言处死了儿子，英祖会陷入怎样的处境呢？他会成为一个无法正确决定子女的生死，乃至国家存亡大事的愚蠢国王。这是对已经去世国王的亵渎，也是对整个王室的攻击。

按惠庆宫的说法，思悼世子有罪的逻辑是她娘家最强的政治对手——英祖继妃贞纯王后娘家所主张的。思悼世子去世后，为阻止正祖继承王位，贞纯王后娘家散布了“罪人之子，不可承统。太祖子孙，何人不可？”的凶言。这句话共十六个字，被称为“十六字凶言”，也有取前八字而称其为“八字凶言”。当然现在也无法断定这是不是贞纯王后娘家公然散布的话语，但惠庆宫借正祖之口主张贞纯王后娘家散布凶言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另一方面，主张思悼世子无罪逻辑的主要是在野人士。这是被挤出权力场的南人或少数论势力为攻击并追究执政势力——老论派的责任而使用的逻辑。惠庆宫娘家在这样的攻击中也难以脱身。按这一逻辑，惠庆宫娘家是要承担最大责任的一方。

惠庆宫不得不在攻击贞纯王后娘家的同时解答针对自己娘家的质疑。惠庆宫逻辑的核心是，自己的娘家从未说要处死思悼世子，他也不是被谁强行诛杀的，仅是应该死而死亡了。惠庆宫认为无论说思悼世子有罪还是无罪，都是不了解实情的郁闷之语。

为了证明自己提出的思悼世子是应该死而死的观点，惠庆宫不得不仔细描绘思悼世子的狂症。无论是认为思悼世子有罪的立场，还是无罪的立场，都否认他患有狂症，因此若想批判这些观点，就必须更详细地描绘世子的狂症。站在有罪的立场来看，如果世子患有狂症，那罪过不至于那么大。相反，站在无罪的立场来看，若说世子患有狂症，就等于是玷污无辜的世子。惠庆宫通过具体、详细的描绘，让否定狂症的人无话可说。

我们从其他记录也可以读到思悼世子曾患有狂症。但如果没有《恨中录》，我们几乎无法知道狂症的程度，因此《恨中录》具有更高的价值。有人认为惠庆宫编造了思悼世子的狂症，但考虑到她描绘的病症内容之细，很难让人同意该观点。像这样缜密分析并描绘某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记录，在《恨中录》出现之前或之后，都绝无仅有。惠庆宫再怎么是个天才也无法切实描绘史无前例的事情。

第十二讲 狂症的症状

病症之始

《承政院日记》显示思悼世子从九岁起就患有“眼眩之症”。英祖认为这是思悼世子在装病，但也许这就是神经症初期的症状。惠庆宫在成婚次年的1745年就已经注意到了思悼世子的异常症状。“阿只之行动甚腾骞，而游戏亦不若往时，若有病患之渐。”“自十余岁起，有病患之渐，进御饮食及行动之时，皆难如常。”（《恨中录》，第36页与第55页）这样与寻常吵闹的孩子们不相类似的思悼世子的模样，与最近常说的注意力缺陷及多动障碍(ADHD)相似。

自十一岁起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对思悼世子之病的记录，而这段时间内他的眩症还在继续。十五岁之时他患上眼疾，眼睛充血近两个月，由于与近视症状重叠，英祖甚至考虑让世子戴上眼镜。（《承政院日记》，1749年三月十四日）晕眩、看不清字迹的眼疾在几十年前还是儿童身上几乎看不到的疾病。

《英祖实录》称十五岁代理听政后，世子开始生病。《恨中录》虽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时候，但也说代理听政后世子开始出现“病患之萌”。惠庆宫这样解释原因：世子开始代理听政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复杂的事情，对于强调党论问题等敏感或重要的事情，世子几乎都会禀告父王。“大朝则以为若此小事，不能决断，频频于我，有何代理之本意？由是叱责小朝。小朝若不禀，则以为若此之事，何为不禀于我而自断，又叱责之。”（《恨中录》，第45页）思悼世子的处境变得非常困难。

思悼世子在英祖面前本来就畏缩不前。代理听政初期，无论大小事他都过于琐碎地禀告国王，甚至到了大臣们劝他慎重虽好，“可以自断者则自断，当禀者则当禀之”的程度。（《承政院日记》，1749年二月二十日）虽说是代理听政，却与傀儡没什么两样。按惠庆宫的记载，“至于冻馁或旱灾天变灾异，则以为小朝无德而致此。如此之

故，小朝于日气小阴或冬雷，则未知自大朝有何等叱责，忧愁念虑，事事惶怯恐惧，因生邪思妄念，渐致病患之萌”（《恨中录》，第45页）。

世子之病在慢慢发展，转眼到了1752年冬天。这年冬天发生了许多事情。秋季正祖出生，随后宫中出现了红疫。和协翁主死于该病，而思悼世子好不容易战胜了病魔。但他刚刚痊愈，英祖就引发了传位骚动，这是距离贞圣王后花甲还有两天时发生的事情。在这样的混乱中，思悼世子读起了道教《玉枢经》，这是因为他听说阅读此经可以驱使鬼神。《玉枢经》的最前面有一幅雷声普化天尊的神像，这是掌管雷电的神灵。雷电与雨水联系在一起，人们在祈雨时或读该经。自然现象中最令人惊奇害怕的是雷电，可知人们是把那位神灵放在最高位置侍奉起来。思悼世子想驱使这位雷神而阅读《玉枢经》，但他没能如愿，反而被雷神所驱使。他“夜则读而学之，果于深夜精神昏迷之时见雷声普化天尊，呼以恐惧恐惧”，“天雷时塞耳俯伏，止后始起”。在因红疫而精神恍惚的状态下，世子最终陷入了鬼神迷思之中。

第二年，他的恐惧症发展成动辄心跳加速的“惊悸症”，由此患上了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世子就像“纸张溺水一样”，病症渐渐加剧，逐步恶化。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只是呻吟而已。

衣襟症

1757年是世子的狂症进入新阶段的一年。他出现了什么衣服都不能穿的所谓“衣襟症”的强迫症症状，不能抑制冲动而打死人的施虐症也正式出现。神经精神科专家李揆东博士将该施虐症称为“施虐癖”(sadism)；旅美神经精神科专家郑有硕博士称其为“反社会性格障碍”；心理学家金泰亨博士称其为“冲动调节障碍”。

1757年初，英祖的王妃贞圣王后与肃宗的继妃仁元王后先后间隔一个月去世。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对思悼世子来说是母亲与祖母几乎同时去世。两位王后是思悼世子最坚强的后盾。当时思悼世子侍奉

母亲之病，在侍病中若遇到英祖，每次都会被叱责。两位王后去世后，在居庐厅（供丧主居住的守丧之屋）举行丧礼时也是如此。英祖不是因特别重要的事情，而是因侍病中他的衣冠或行缠（绑腿布）等样貌不整而大加叱责。世子在母亲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哭泣失神，英祖抓到了他的小失误。

英祖素来对衣着十分敏感。惠庆宫成婚后第一次入宫时，英祖曾给这位年幼的儿媳三项训诫，其中两项与衣着有关：毋只着内衣与丈夫相见，毋让手帕沾上胭脂。即便是夫妻，如果将内心全部展露，也会失去感情。胭脂虽然很美，但沾在手帕上就很脏乱，所以要小心。十岁的惠庆宫震惊于五十多岁老国王的忠告之琐碎，她直到花甲都还记得这些忠告。

1761年思悼世子因儿子正祖成婚，曾前往英祖所在的庆熙宫看望儿媳。但他恰好没找到世子佩戴的瑄玉贯子，只好使用文官们佩戴的“通政玉贯子”。英祖见到世子佩戴的贯子后勃然大怒，命令他不用见儿媳，直接离去。公公因为戴错一介贯子，连儿媳的脸都没见到就被赶走了。贯子与冠带一起，是展现官职地位的代表性装饰物。这与军人帽子上的军衔类似，因此世子不应该使用文官的贯子。当时世子犯下的许多失误比这更严重，他偷偷地去了趟平壤。其实一介贯子并不是什么大事。但英祖如此，世子不得不对衣着敏感，最终患上衣櫛症这一空前绝后的奇怪强迫症。

衣櫛症在《恨中录》中也被称为“衣櫛病患”及“衣櫛之頃”。衣櫛是宫廷中称呼衣服的用语，因此衣櫛症算是一种“衣病”。世子着衣时觉得不合身就脱掉，反复穿上又反复脱掉，或以为有鬼附上而将其烧焦。穿一件衣服，有时候需要十件甚至二三十件，因此好不容易穿上的衣服总穿到脏为止。世子之衣并不能随便使用任何布料，而且需要这么多件，所以很难估计制衣费到底花了多少钱。惠庆宫称所有费用都由自己的父亲洪凤汉承担。

施虐症

衣襟症并不单纯只是引发衣裳造价问题，它与施虐症联系在一起。思悼世子为穿衣服而费心，若不如意，常会杀死侍者。思悼世子攻击他人并不一定与衣襟症有关，但衣襟症提高了他的攻击性。若屡次费心，却仍然穿不上衣服，世子就会经常杀人。

思悼世子杀人的传闻传遍了宫外。《玄皋记》中记载了世子杀人无数的传闻，以及制作刀剑的工匠给世子献剑而被砍断脖子的故事。目前尚不清楚思悼世子是从何时开始杀人。《恨中录》中记载的首位牺牲者是长番内官金汉采。思悼世子砍下金汉采的头，拿进屋里展示给惠庆宫与内人看。在此之前，思悼世子被英祖斥责后就已经开始殴打内官和内人，从1757年六月开始杀人。在杀死金汉采之时，还杀害了好几名内人。《英祖实录》表明当时共有六名死者。

像这样，思悼世子从第一次杀人时就残忍地将受害者斩首并展示首级，而且足足杀了六人。这种残忍与死伤规模让人怀疑该事件是否为第一起杀人案。《玄皋记》称思悼世子在长大成人之前就已经开始杀人了。也许在此之前，惠庆宫也不知道的杀人事件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们也无法准确查明思悼世子到底杀了多少人。宣禧宫在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的那天清晨，将儿子的恶行上告英祖：“世子戕杀中宫内人家属将至百余，而烙刑等惨忍之状不可胜言。”惠庆宫也称无法记住1760年以后思悼世子到底杀害了多少人，只是记得世子在去世前几个月，一日之内都能杀害数人。思悼世子周围之人每天都如履薄冰。

思悼世子杀害的人大部分是内官与内人，即不起眼的手下之人。在金汉采以外，惠庆宫还以徐景达举例，称他因延迟送来内需寺的物品而遭到杀害。在《承政院日记》中，徐景达的名字曾在一段时间内经常出现，直到1759年才不见踪影，大概他死于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认为内人也有不亚于内官的死伤，但完全查不到内人的名字。1761年正月，世子甚至杀死了自己最珍爱的侍妾冰爱。事已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内人了。思悼世子不仅杀害自己的内人，还杀害生母宣禧宫的内人。1760年七月左右，他还向惠庆宫投掷棋盘，使其左眼受伤，即

妻子不太听话，所以投掷棋盘。思悼世子周围之人就这样暴露在他的慢性暴力中。

不管世子杀了多少人，任何人都不会轻易诉之于口。惠庆宫把世子杀人之事告知宣禧宫，但完全不敢把此事上告英祖，因为她没有信心承担后果。但英祖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世子杀人，内官金汉采遇害事件在翌年年初即被英祖知悉。

1758年二月二十六日，英祖时隔三四个月见到了世子。当时英祖为召唤世子，让大臣们告知世子自己便血。世子长期以来以各种借口逃避父王，但父亲认为自己去探望儿子并不合适，所以没能见面。最后英祖让大臣告知世子自己患有重病，才成功召见了世子。时隔许久见到世子的英祖让他“直奏所为之事”，于是世子毫不隐瞒地说出杀人之事。

其日对答曰：“心火出，不可抑。杀人或杀鸡禽之类，心乃少定。”问以何为如是，答以心伤而然。问以何为而伤也，答以因大朝不慈而伤痛，因叱责而惧怯成火而然。及杀人之数，无一隐匿，细细尽告。英祖其时一时动于天伦之情，圣心怜悯，以为吾今则不当如是。（《恨中录》，第85页）

以上的对话只见于《恨中录》，但从当日的《承政院日记》中也能感受到英祖对思悼世子的和蔼。英祖在对话后对世子说：“汝今如此，吾国其庶几矣。”并对大臣们称赞世子：“今见东宫，予心豁然矣。”这是英祖难得一见的温柔和蔼的样子。

英祖在翌日找惠庆宫询问思悼世子的病情，他担心自己的儿子。惠庆宫与英祖交谈后见到了思悼世子，把从英祖那里听到的话转告给世子，并补充道：“如是承闻，此后父子间幸或有少愈之道。”但世子大发火症称：“子乃爱妇，此等教旨，岂可尽为听信乎？此教不可信也，毕竟我死后乃已。”（《恨中录》，第86—87页）英祖与思悼世子之间的不信任已经是痼疾了。

英祖与思悼世子这样温和交谈的景象在《恨中录》中也是绝无仅有，在《承政院日记》中更是几乎找不到痕迹。也许正因如此，惠庆宫破例明确记下了英祖找她的日期是1758年二月二十七日，这是惠庆宫终生难忘的一天。

性暴力

思悼世子的施虐症几乎都指向在自己眼中与“禽兽”无异的内官或内人。随着病情加重，施虐的对象范围扩大，他的施虐方式也更多了。他不仅攻击侍妾或妻子，在1756年被英祖怀疑喝酒时还试图追打世子侍讲院的官员，即自己的老师们。他在死前似乎还想杀掉生母宣禧宫，乃至父王英祖。

一生研究《恨中录》的金用淑先生曾怀疑思悼世子与妹妹和缓翁主存在近亲通奸的关系，这是基于施虐症容易演变成近亲通奸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而提出的假设。思悼世子的攻击性自然也会体现在性关系上，即使没有心理学研究，也完全可以想到。1757年，思悼世子纳侍妾冰爱，其间或与内人发生关系，如果她们不服从，就殴打她们，到血肉淋漓后才与其发生关系。世子有要求，不过一介“微物”的内人却拒绝，按照朝鲜宫廷的习惯，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思悼世子的精神不健全已经到了内人们不愿听他吩咐的程度。思悼世子还威胁和缓翁主，禁止她向父亲说对自己不利的话，并称：“此后我或有某事，当以此剑斩汝首。”（《恨中录》，第95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失去正常精神状态的世子会对和缓翁主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第十三讲 试图自杀

自杀的意志

思悼世子死于正值青壮年的二十八岁。但冷静地回顾他的一生，他仿佛活了很久。在受到父亲各种羞辱的同时，他如何熬过来的呢？思悼世子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希望能自我了断。但世子的自杀企图不可能广为人知，这是因为暴露王室问题的事件很难原封不动地公之于众。尽管如此，《恨中录》仍然记载了思悼世子的三次自杀企图。

最早的自杀企图是在1755年思悼世子二十一岁时。1755年二月发生了“罗州挂书事件”，即尹志等少论派人士在全罗道罗州贴上怨恨朝廷的凶书的事件。因为这是严重的谋逆事件，英祖决定亲鞫（国王亲自审问罪犯），直到半夜还在审问并处死罪犯。这是血染宫廷的时节。英祖在这么不吉的场合一定会召世子前往。如果世子不在场，处理完事务回宫时，英祖再晚也一定会召他来问话。此时英祖只向他扔出一句“吃饭乎？”这是英祖要洗刷当天不吉之气的举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世子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他偶尔向妻子或内人、内官们发泄怒气，但仅凭此仍无法解开心中的郁结。

1755年十一月，思悼世子前往集福轩看望生母宣禧宫时，遭到英祖的严厉叱责。英祖厌恶思悼世子待在和缓翁主身边，因而找茬儿训斥他。和缓翁主本已成婚离宫，不知是不是因为英祖的宠爱，她得以常常回宫住在母亲身边。英祖不能忍受自己讨厌的人与喜欢的人聚在一起，得知思悼世子在和缓翁主近处后大怒。思悼世子并没有犯错，听到“速去”的叱责后，情急之余慌忙越过高窗回到自己的住处。世子这样的至尊之人为了不被父亲发现，像小偷一样快速越过窗户。他痛忿难抑，发狂而宣称要“自尽”“饮药”。这是《恨中录》中记载的思悼世子第一次的自杀企图。

进入1756年后，思悼世子变得更畏缩不前。随着病情的加重，他躲在就善堂外小厨房（制作宴席饮食的地方）的一间幽深安静的房屋中。世子变成了“隐遁型孤独者”。五月英祖突然来见世子，世子既不洗漱，衣着也不端正。英祖怀疑他喝了酒，他的样子与醉酒之人没有区别。英祖认为在禁酒令森严的情况下，世子居然违反法令喝酒，于是怒骂如火。

英祖在位期间一直实行严格的禁酒令，尤其此时实行了宗庙祭祀中都不允许用酒的强硬禁酒政策。英祖本人也严格遵守了这一规定。思悼世子去世的同一年，他曾以违反禁酒令为由处死了兵马节度使尹九渊。以饮酒问题处决高层将领，看来禁酒令得到了严格执行。从《待闻录》来看，英祖曾叱责世子：“酒若复出，朝鲜必亡。”这与“有酒则国亡”的《承政院日记》（1763年六月二十六日）的记录一脉相通。在禁酒令如此森严的时期，世子被怀疑喝了酒。

世子素来不喝酒。思悼世子的文集《凌虚关漫稿》第一卷中写道：“余素不饮酒，时适苑中绿荫可赏，与之酒，使左右醉吟，此以记其景。”思悼世子不喝酒之事，他本人、惠庆宫、正祖都曾说过。但在受到如此令人委屈的怀疑后，思悼世子开始喝酒。惠庆宫说：“英庙以臆见，言其子所不为之事，而其前景慕宫果行此事，似若天诱然。”（《恨中录》，第64页）思悼世子似乎试图在父亲无法看到的地方无条件地反抗父亲。

当日英祖的追问仍在继续，最终世子承认喝了实际上没有喝过的酒，于是英祖更严厉地训斥了他。英祖走后，世子难忍郁火。惠庆宫说：“其日冤抑伤痛，冲天之壮气尽出。”直到这一天，官员们才看到世子发狂是怎样的模样。虽然他们都已经听说过世子如何如何的传闻，但当天是首次见到真实情况。

世子的发狂导致了失火。英祖要求世子侍讲院的官员们好好教导“喝酒的世子”，但教导世子的官员们反而遭到世子的指责。世子被冤枉得那么厉害，而官员们怎么能在享受俸禄时连一句话都不为世子辩解呢？崔尚宫虽然只是尚宫，但为世子说了话。世子的意思是，你

们空有官员的名号，在国王面前一句话都不敢说，现在居然来教导我？

看起来像是遭到思悼世子训斥后，官员们又反驳了，于是事情闹大了。生气的世子要攻击官员，乐善堂中上演了世子与官员互相追逐的场面。“逐出之际，座上烛台倒而抵于乐善堂温突之南窗，火遂起。”世子遭到叱责后东宫失火，英祖认为这是纵火。实际上这是把失火误认为纵火。英祖之“震怒十倍有加”，怒斥世子：“汝是不汗党耶？为何放火乎？”世子害怕而不敢辩解。他觉得又委屈又郁闷，认为“不可支生”，并试图跳入储承殿前庭的井中。

《英祖实录》1756年五月初一日条只简单记载了把违反禁酒令的内人海贞流配巨济岛的命令与火灾事件，《承政院日记》中只有依1776年国王之令抹去四行记录的注释。这是思悼世子第二次试图自杀。

自杀未遂

世子欲死但难死，前两次的自杀企图均无果而终。有可能是他真到了自杀之时因害怕而未能采取果断行动，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周围人的劝阻。世子旁边总有很多侍奉之人，如果世子自杀，他们将难辞其咎、难保其命。因此如果世子寻死，周围人会拼命阻止。世子是想死而无法死之身。

思悼世子正式采取果断自杀行动是在1757年，该年他的病情急速恶化。思悼世子从数年前就注意到了祖母仁元王后殿里的针房内人冰爱。该年三月仁元王后去世，在居丧期刚结束的九月，他就把冰爱带回自己的住所。世子特别宠爱冰爱，虽然他的女人不止一两位。十一月的时候，英祖发现了这一情况。英祖因世子竟敢染指上殿的内人而大发雷霆。所谓上殿的内人，相当于上殿的女人，下位之人觊觎上殿的内人会成为问题。

十一月十一日冬至的子夜时分，英祖跪伏于孝昭殿，即仁元王后魂殿的门外，思悼世子紧随其后。大臣们问：“殿下何为以作如此过

举乎？”英祖说自己读到世子写的悔过书，刚开始很高兴，但仔细一看，发现并没有写到底做错了什么。也就是说，世子没有表现出反省之意。大臣们认为这是国王平时太严格了，世子害怕才如此，并异口同声地劝说国王应对世子多施慈爱。这是《承政院日记》记载的内容。

《承政院日记》中并没有写世子究竟应该反省什么，具体原因见于《恨中录》，即儿子染指了上殿的内人，父亲带着儿子到祖母的魂前谢罪。英祖在母亲面前为自己没有教导好儿子而道歉。他催促世子坦白事实，世子趴在地上流下了眼泪。接着英祖下令把冰爰抓起来，但思悼世子威胁来抓冰爰的下级官吏，不让他们带走冰爰，后来又利用英祖不知冰爰长相的情况，谎称同龄的其他内人是冰爰而将其充数送走。冰爰被藏在和缓翁主的住处。

当日思悼世子再次被英祖召见并遭到叱责。他一回到住处就跳入养正阁的井中。世子似乎是突然采取行动，这样就可以掉进井里了。身材高大且肥胖的世子，如果掉入井中，无论受到冲击还是溺水，都很有可能立即殒命。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冬至之际，井水结冰，而且也没有多少水。世子既没有溺水，也没有被坚冰撞死。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被侍从们救起后活了下来。

世子的自杀企图不能被如实地记录下来。该日思悼世子的自杀骚动在翌日朝报（朝廷的官方消息志）上被记为“落伤”（《玄皋记》）。《英祖实录》1757年十一月十三日条中也仅记载了世子的“落伤”。有伤口而无法隐藏，所以只能说是落伤。

类似的落伤在宫中并不少见。1771年二月，惠庆宫父亲洪凤汉遭反对派的攻击而被流放，惠庆宫为了喊冤，故意从高处摔下而落伤。

《承政院日记》只记录了惠庆宫因父亲之事而惨淡悲戚，但《颐斋乱稿》的作者听到传至宫外的传闻后，记录下了惠庆宫的自杀企图。

这样看来，我们也应该慎重审视《承政院日记》1746年六月二十日条记录的贞圣王后落伤事件。按此记录，听闻英祖身体违愈的消息后，王妃因惊吓而落伤。但五十岁出头的王妃为何因丈夫生病而惊吓

摔伤，实在令人费解。官方记录展示的内容如此有限，这是可以切身感受到历史研究之难的一个事例。

思悼世子很早就想死了，不，是想摆脱可怕的父亲。他曾躲在幽深的房间里，也曾远赴平壤、温阳，但最确定的方法是死亡。自杀并不容易，因为周围总是有拼命劝阻之人。世子真的很想离开。

第十四讲 欲奔于外

世子的首次远足

思悼世子素来喜欢外出。卑躬屈膝的内官与内人、一直板着脸想教导他的世子侍讲院的先生们、嘲弄指责他的父亲，世子想越过由他们组成的藩篱，与真正的人见面。迎风飘扬的华丽仪仗、首尾相继的护卫兵行列、三五成群地围坐在行列路边的身穿白衣的百姓、忙于传达命令的巡令手们的嘹亮声音，以及震撼大地的军乐队的演奏，这一切都充满了活力。

但英祖很少允许世子外出。幼时为举行入学仪式，世子曾去过王宫东侧的成均馆；为参加各种仪式，也曾去过王宫南侧的宗庙。但说这些都是外出，实在太过勉强，不仅距离较近，规模也较小。国王离开汉阳，巡幸远地之事包括定期参拜先王之陵与偶尔为疗养远赴温泉。如果可以跟随国王出行，对于世子来说就是远足。

思悼世子在二十二岁之前，未曾陵幸（为参拜而赴陵墓）随驾（国王出行时随侍国王）。已经长大成人的世子一次都未曾陵幸随驾，这并不正常。如果与后来世孙正祖屡屡跟随英祖陵幸相比，结果显而易见，何况思悼世子还是代理听政的国政实际负责人。事理如此，若英祖巡幸汉阳城内或近郊，礼曹就会呈上请求“东宫随驾之奏禀”，但英祖不同意。而思悼世子“初则怅然，继则憾恨，渐成郁火，或有泣下之时”。他悲痛于不获父王认可而被抛弃在旁的自身处境。

1756年八月初一日，思悼世子首次陵幸随驾。该年是英祖的母后仁元王后七旬之年。英祖以庆祝母亲长寿之意，在该年七月举办了面向老年儒生的科举考试——耆老科，考试后还在昌德宫后苑举行了宴会。那天不知为何他还让思悼世子参加了喜庆的聚会。英祖遇到审问或处死死囚的不祥事，常常召世子坐在身边，遇到喜庆的吉祥事则不

召世子。但当天或许是仁元王后的恳求，他在喜庆的场合召唤了世子。

此次庆典结束后就是英祖的陵幸。在肃宗诞日（八月十五日）之前，英祖赴肃宗之陵——明陵，举行陵幸。这是每年都会举行的陵幸，唯有该年允许世子随驾。惠庆宫认为这是宣禧宫向和缓翁主表达了思悼世子“至今不为陵幸之事，民心亦当怪异之”之意，让和缓翁主说服了父王。当然，仁元王后的七旬诞辰也是考虑因素。

思悼世子对第一次远足感到非常高兴。他沐浴斋戒，尽心竭诚地参拜祖父的陵墓。明陵陵幸一般是当天凌晨出发，深夜返回的日程，相当于一日远足。思悼世子在这短短一日内不仅致信祖母仁元王后、嫡母贞圣王后、生母宣禧宫，也致信所有子女。他似乎想效仿君王离宫后仍持续问候王室成员的惯例。自己也是堂堂正正的“小国王”，所以想展示自己可以尽到国王的责任的一面。当时世子病势日益严重，但外出时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心胸舒畅，火症随之舒缓了。世子也觉得自己能无事回还是一件值得庆祝之事。

大雨乃率来小朝之崇

初次陵幸两年后的同一天，思悼世子再次陵幸随驾。这次除了为迎接肃宗的诞日而扫墓外，还有察看前一年去世的仁元王后与贞圣王后的陵墓之意。英祖可能并不情愿，但无法阻止子女扫墓。

英祖于凌晨时分从昌德宫出发。赴明陵的陵幸路线是：昌德宫—钟路—广通桥—崇礼门（南大门）—京营库—迎恩门（独立门）—弘济院—碌磻洞—礪石岬—黔岩昼停所—昌陵—明陵，总长37里。英祖没有选择西大门，而是通过南大门前往，这是因为有规模庞大的数千名随行人员，西大门并不合适，而被用作使臣们通行道路的修缮良好的南大门一带才是正路。

陵幸队列终于抵达黔岩的昼停所。昼停所是陵幸路上为暂时停留、睡觉、进餐而设置的临时休息站。正祖还是世孙时，经常跟随祖父英祖赴明陵，在黔岩昼停所睡觉之时往往挣扎着踢开被子而眠，英

祖会帮他盖上被子。天明正祖起来时英祖笑着说：“予纳冲子于怀，不得接目。”（《弘斋全书》）昼停所就是这样的地方。

那天距离中秋节只剩半个月，抵达昼停所时，秋天的阵雨倾盆而下。距离目的地仅剩7里路，而前路桥梁已断、江水大涨等妨碍陵幸的不祥消息接连传来。这时英祖突然下令让世子回宫，他本人继续陵幸。为什么让世子回去呢？

《恨中录》的说明如下：英祖不得已才允许思悼世子随行，但内心并不乐意。此时途中下起了阵雨，他大发雷霆。平时英祖极度相信迷信的征兆或禁忌，其中世子总是“晦气的存在”。他不得已让不祥的世子参与陵幸，果然发生了灾变。“大朝以为日势如许，乃率来小朝之崇，未及陵下，命小朝回还而大驾独往。”世子盼望已久的外出化为泡影，他本人也因以荒谬理由叱责自己的父王而再次受挫憋闷。世子呼吸困难，甚至无法正常移动。他没有立即回宫，而是进入西大门外名为京营库的官厅，缓解一度被堵住的呼吸。

上次陵幸随驾之前，连日下雨，但登程时天色放晴，思悼世子并不是“晦气的存在”。尽管如此，英祖还是很快忘记了美好的记忆，只保留了不好的记忆。英祖对思悼世子的偏见无法改变。

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明

从《英祖实录》和《承政院日记》中可以看出，陵幸中英祖令思悼世子回宫的理由与《恨中录》完全不同。先看《英祖实录》：

上诣明陵，以戎服至剑岩。时大雨如霖，王世子随驾，睿候不宁。上教曰：冷雨沾湿，气不能定。虽欲强行，难以行礼，即以驾轿，命归调理。

英祖在听说思悼世子被雨淋湿生病后才令他回宫。由此看来，英祖真是个慈祥的父亲。《承政院日记》记载的也是类似内容，只是大臣们担心思悼世子之病的话语更加具体。

《恨中录》《英祖实录》《承政院日记》，哪个才是真实的说明呢？世子回宫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英祖是可怕的父亲，还是慈祥的父亲？虽然现在很难对该问题做出明确的判断，但考虑各种情况，《恨中录》应该是接近实际情况的说明。

首先，即使天降阵雨，也难让人理解六十五岁的国王把二十四岁的儿子送回王宫的行为。反过来才是普遍的、正常的情况。另外，如果情况不便，那么两人都应该回宫。在快抵达目的地的情况下将世子送回，也令人费解。此外，十日后的八月十二日，英祖向大臣们降下“不忍闻之教”。英祖的震怒不止一两次，但此时的怒火似乎与让世子中途回还有关。考虑这几种情况，可以说比起《英祖实录》，反而是《恨中录》更合理地解释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当然，我并不认为《英祖实录》与《承政院日记》捏造了事实。如果重构当时的情况，英祖在送世子时应该讲了不少话，其中会有以世子生病为借口的话，也会有像《恨中录》中记载的过分之一言。史官不会把英祖的过分之一言都记录下来。把叱责代理听政世子的内容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并非易事，史官似乎只挑选了应该记录的内容。史官只是委婉地记录了情况，但却让后世不了解来龙去脉的我们陷入误读和误解。这一部分为如何解读王室相关记录提供了指南。我认为，再怎么强调史料的批判性理解都不为过。

第十五讲 简陋而华丽的温泉行

出发时的情况

思悼世子陵幸随驾，被父亲以荒唐的理由赶回来后，欲出于外的念头并没有消失。恰好他腿上出现了湿疹，皮肤开始溃烂，于是希望以治病为由赴温泉。他首先向世子侍讲院的官员们展示了腿上的伤口，让英祖知道自己生病，接着向备受英祖宠爱的妹妹和缓翁主强行要求：“但在此阙，亦伤痛而闷迫，汝能使我往温阳乎？余因湿气，脚腿毁伤，汝亦知之，期于得往。”（《恨中录》，第95页）

英祖同意了思悼世子赴温阳温泉的请求。这是1760年七月十八日出发，八月初四日返回的共十六日的行程。思悼世子从昌庆宫宣仁门出发，穿过南大门，经过西冰库，渡过汉江前往铜雀渡口，沿冠岳山绕行，到达果川官衙，在此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第二天，经仁德院，过沙斤川院昼停所，宿于水原府。次日经过振威县大昼停所，到达素砂小昼停所，再经过成欢驿，宿于稷山县。二十二日，经天安到达温阳。（《温宫事实》，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回宫是八月初一日从温阳出发，八月初四日到达王宫殿。从汉阳到温阳通常花费三天，因为队伍庞大，往返似乎各多了一两天。包括到达之日与回程出发之日，世子在温阳共停留了九天。温阳是思悼世子一生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此次行程也是最久的一次正式外出。

惠庆宫认为思悼世子的温阳之行“萧条不成说”。虽然是二十六岁成年世子的第一次单独出行，但规模却非常小。英祖将随行的军人定为520名，考虑到通常有数千名士兵跟随国王的远程出行，可以说温阳之行是简陋的出行。思悼世子内心希望这是一场华丽的出行，但不得已同意出行的英祖并没有让他大肆铺陈。甚至《英祖实录》在出发当日有如是记录：“时师傅、宾客无一人从之者，识者忧叹。”

当时思悼世子的火症已极，因惠庆宫不太听他的话，世子投掷棋盘严重砸伤了她的左眼。惠庆宫感受到了可能会被丈夫杀害的危险，

产生了普通妻子不敢想的念头。

所天虽重，而罔极危凜，不知吾命毕于何日，一心但愿不见景慕宫，而温行实多幸然。（《恨中录》，第97页）

“一心但愿不见景慕宫”之言，即希望自己或思悼世子，两人中有一人尽快死去。把这句话理解为希望世子死去也无妨。感觉生命受到威胁，惠庆宫甚至产生了希望丈夫死去的极端想法。此时世孙正祖请季舅洪乐伦与表兄弟洪守荣入宫，所以惠庆宫也让自己的妹妹与嫂子、弟媳一起入宫。她的意思是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就会结束，因此要在世子不在之时提前道别。

温阳之行的神话

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在前往温泉之前几乎步入死亡的思悼世子离开宫殿后，不知何时又恢复了正常。他下严令禁止出行队伍给民家造成麻烦，在途中向百姓展示了威严并施与了恩惠。“时京城民庶多指言东宫失德而怨之，及是湖民见所以爱恤者甚勤，乃以京民为诬云。”（《待闾录》）百姓称颂在路上见到的世子是出色的君主。

思悼世子第一次听到百姓这样的称颂。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单独来到宫外，所以也是理所当然。世子的温阳之行是他行迹中唯一显露在宫外的政绩，所以不仅《恨中录》，正祖写的思悼世子行状中也比较具体地提到了这一点。正祖称思悼世子询问路边的百姓生活是否困难，下令减免租税和徭役。他还介绍了世子护卫军的马进入豆田里毁掉豆苗后向主人进行补偿的故事。正祖将此作为思悼世子的政绩而宣传，但如果成年世子的政绩是这种程度，不能不说是寒酸。

行状说思悼世子到温泉后，日日召开讲筵。这是模仿历代国王温阳幸行时召集弘文馆官员一边学习，一边讨论政务的旧例。实际上世子在温阳期间可能召开过讲筵，但效果似乎微不足道。不仅师傅与宾客等高位老师都未随行赴温泉，而且从当时承政院每日记录世子温阳行踪的《温泉日记》来看，思悼世子每日几乎连常参（即政务会议）都不举行。不举行常参，当时日记里也没有记录世子的讲筵。即便举

行讲筵，也令人怀疑到底是怎样的讲筵。《英祖实录》也记录了思悼世子往返旅程中的一些政绩，但对于温泉的事情，只简单记录“王世子在温宫”。总之，正祖在撰写思悼世子行状时，夸张地叙述了父亲仿佛在温阳做了许多事情。正祖试图通过行状来创造父亲的神话。

若把思悼世子简陋的温阳之行与十年前英祖的温阳幸行相比，就能看出其中的天差地别了。1750年，英祖时隔三十多年再次到访温阳。他曾作为王子跟随父王肃宗而来，现在作为堂堂正正的国王到温泉治疗。当时英祖皮肤发痒，一开始只是汲来温泉薰洗，但未能痊愈，所以亲赴温阳。他的温阳之行被承政院记录下来，并编为《温幸日记》（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品）。只要翻阅思悼世子的《温泉日记》与英祖的《温幸日记》，就能立即看出两人的行程有多大差异。思悼世子无话可说，每日日记里空空如也；英祖不知为何事务繁多，每日与多人交谈并下达命令。

综合这些记录可知，思悼世子的温阳之行里不存在正祖夸大其词的显著政绩。以当时世子的状态来看，没有引发大问题就已经足够幸运了，更不用说期待政绩了。惠庆宫称思悼世子无事往返温阳。宣禧宫通过担任公州营将的侄子李仁康了解世子的情况，所以惠庆宫似乎也听到了他传来的消息。一介营将很难报告世子引发的琐碎问题。这样看来，现在虽然已经无法了解琐碎的细节，但整个温阳之行中似乎没有发生重大事故。惠庆宫称思悼世子似乎只要一出门火症就会消退，或许正是如此。

正祖的温阳之行纪念事业

温阳有一座供国王出行时临时使用的小型宫殿——行宫。温阳温泉的行宫简称温宫，温宫内有十六间房屋组成的内正殿与十二间房屋组成的外正殿，还有上、中、下三处汤池。思悼世子停留在这里时，洗温泉浴、射箭，以此休息。

思悼世子之后，朝鲜国王们再也不赴温阳。没有国王的出行，该地区居民会觉得更舒服，但行宫却荒废了。茶山丁若镛叹息于孩童们随意攀爬思悼世子栽种的槐树，让槐树无法正常生长，而且连槐坛都

消失的景象，曾作诗以记。思悼世子在温阳射箭时，对射台没有树荫感到遗憾，便让郡守以品字形栽种三棵槐树。这些树种上不久后就滋长繁荣，因而当地人称其为“灵槐”。思悼世子死后树木很快变得茂盛起来，当地人似乎相信这是因为树中凝聚了思悼世子的灵魂。

正祖已然知晓思悼世子的温阳之行备受外界称赞。岭南儒生们呈上万人疏，提到了这样的情况。正祖在开展把父亲之墓迁至华城等追崇思悼世子事业的过程中，开始修缮他在温阳留下的行迹。首先改建槐树所在之台，并在其旁竖立了记有槐树之意的石碑。正祖亲自题写了石碑所刻的“灵槐台”三字。该年是思悼世子温阳之行三十五年后，也是世子的花甲之年——1795年。

正祖还在1796年春指示整理思悼世子的温阳行踪，要求寻找当时随行世子之人，列出名单，记录他们的回忆。从《承政院日记》中可以略微看到这件事的进行过程，其具体成果是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有的《温宫事实》一书。

现在灵槐台位于温阳的一家宾馆内。思悼世子所种的三棵槐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次第枯萎，2007年最终完全死去，现在只剩下碑阁和碑石。思悼世子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独自来到温阳，首次独立地扮演了君主的角色。世子的出行行列虽然简陋，但他的短暂人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华丽的时刻。这可以说是简陋但华丽的外出。

从温阳回宫的世子拜托周围人让他去往黄海道的平山温泉。他去了一次温泉后，又产生了再去的想法。但世子没有被允许再次外出，于是他开始偷偷出入宫外。

第十六讲 世子的恶行

荷叶生

备受广泛性焦虑症、强迫症、冲动调节障碍等疾病折磨的世子从1760年开始出现幻觉。路上无人，但他却说看到人了并感到害怕。也就是说，他开始患上思维障碍即精神分裂症。惠庆宫不让其他人出现在世子途经的道路上，后来又在世子乘坐的轿檐上“设四面帐而行”，让他看不到外面。

过完1760年正月的生日后，思悼世子开始辱骂父亲，越过了不该越过的底线。他对前来祝寿的子女说：“不知父母者，岂知子息乎？”并赶走了他们。他自己明知对父亲的憎恶既是不孝，也是不忠，但却无法控制。不仅子女，连宣禧宫也见到了他那天发狂的样子。宣禧宫此前听说过儿子的狂症，但并不完全相信，直到那天才目睹了真相。

同年七月英祖移御庆熙宫，国王与世子不再同居一宫，世子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也许是当月往返温阳温泉的缘故，他的状态有所好转。脱离了可怕之人的视线，稍微舒服自由一些，病情就会好转，但要扭转走向破灭的局面，为时已晚。

1761年正月，世子杀害了自己非常喜爱的宠妾冰爱。他在换衣服时衣襟症发作，杀死了她。世子还用刀砍伤了冰爱之子恩全君。当然，恩全君也是他自己的孩子。当时恩全君刚满周岁，思悼世子将中刀的恩全君扔到了门外的莲花池里，恰好英祖继妃贞纯王后得知此事，派人救了他，孩子正在荷叶上呱呱啼哭。贞纯王后救了孩子，将“荷叶生”定为他儿名。英祖听到这个消息后，将他原来的名字从“禔”改为“禔”，取字“怜哉”，即“可怜”之意。恩全君的这个故事出现在《颐斋乱稿》中，虽然有趣，但令人难以相信。贞纯王后与英祖当时住在庆熙宫，思悼世子住在昌德宫，彼此几乎没有往来，而且英祖是在冰爱事件一年后，也就是处死世子时才得知冰爱之死。

三政丞之死

1761年春天，发生了三政丞——领议政李天辅、右议政闵百祥、左议政李 瑄 先后间隔一个月全部去世的史无前例的事件。《英祖实录》记载这三人全部是病死，但如果不是传染病，很难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另外，各种人名词典中记载，为承担思悼世子潜行平壤的责任，三政丞自杀，但思悼世子的平壤之行是在他们去世后。

领议政李天辅去世前写下了上呈给国王的上疏，即遗疏。该上疏的核心内容是劝告英祖不要经常生气。李天辅在上疏中担心英祖的气血会因发火而受损，但这也暗示英祖激怒于某事可能是李天辅之死的重要原因。右议政闵百祥也在去世前十多天上疏，内容是担心思悼世子之病。综合这两人的上疏来看，思悼世子因事惹出麻烦，英祖似乎对负有世子教育责任的丞相们大加叱责。

李天辅与闵百祥在去世前还上呈了吐露自身病情恶化的上疏，因此，将他们的死亡视为病死也并非不可。但左议政李 瑄 在去世前，没有提及任何病情，甚至在去世前一周，他还围绕成均馆掌议的任命问题谏诤国王，然后他突然去世了。如上所述，三政丞之死在诸多方面都存在不少疑惑。

目前我未能找到阐明三政丞死因的有说服力的资料。《待闈录》等资料仅用比喻的方式讲述了三政丞因世子而死的故事。昌德宫后苑有孝宗种下的三棵松树。这些树木连抱在一起，被称为“相松”，也就是“三政丞之松”。因世子砍伐这些树木，三政丞同时死亡。该故事的注释上写有“伐之者，文女之甥”。文女是当时英祖宠爱的后宫，正祖即位后她被指为导致思悼世子之死的逆贼而被赐死。该注释的意义并不明确，但三政丞之死似乎与文女有什么关系。总之，三政丞之死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第十七讲 往返平壤

平壤之行的动机争议

世子的宫外出入，最终发展为争议不断的平壤之行。那是一场从1761年三月末开始的持续了二十日左右的旅行。世子究竟为何去平壤？《恨中录》与《英祖实录》并没有赋予世子的平壤之行太大意义，只是视为一场游玩而已。提供其他解释余地的是正祖撰写的思悼世子行状——《显隆园行状》。

辛巳，问时措之策于大臣，大臣不能对，遂有西邑之行。盖欲请命于上，以沮贼谋也。贼臣洪启禧欲从中搆乱，小朝闻之，促御径还。时有一承宣白于上，请览廷臣章疏之上小朝者。事机急迫，小朝躬诣上前，悉告以处变之本意，上始释然。后小朝临宾筵，教曰：储君亦君也。名以臣事，包藏奸谋可乎？仍以逆禧之无严，荐下严教，比之江充。自是谋益急。

上列引文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乍一看，可以理解成思悼世子是为对抗想要攻击自己的洪启禧一党而往返平壤，但仔细分析下来，则不能这样解释。另外，这一解释在逻辑上也令人难以接受。因为手握重权的世子没有理由为阻止部分逆臣的攻击而直赴遥远的平壤。实际上思悼世子曾当面斥责洪启禧是“江充”，江充是因谋害太子而被处决的中国古代人物。世子握有可以在权臣前直斥他是“江充”的权力，没有为阻止权臣的专横，冒着引起父王误解的危险而直接奔赴遥远之地的理由。

在解释思悼世子行状时尤为需要注意，虽然每个句子大部分符合事实，但将其连起来解释的话，会得出与事实完全不同的说明，看来存在不少被巧妙编辑的部分。对于思悼世子的精神状态，行状中删除了与狂症相关的事迹，只列举了展现世子优秀、明智的逸话，让人误解了真相。因此行状中描绘的世子变成了与其他记录中的世子完全不同的人。正祖在不说谎的同时，为了提高问题缠身的父亲的地位，尽

最大努力编辑了行状。关于平壤之行，从《英祖实录》等资料中可以确认：世子的确去了平壤；世子在平壤期间，洪启禧的确做了与世子有关的某件事情；世子从平壤回来后见到了英祖；世子把洪启禧斥为江充等。但将这些事实连接起来而推导出的平壤之行的原因以及针对该原因的解释却很让人接受。如果平壤之行时洪启禧露出一点点谋逆行迹，正祖即位后论处洪启禧家族之罪时一定会提及。甚至在反对派的攻击洪启禧的上疏中，也没有任何话语提到该点。正祖若想主张洪启禧的逆谋，就需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根据，但同样什么都没有。

正祖虽然想赋予思悼世子的平壤之行特别的意义，但从目前为止公开的世子的处境和情况来看，平壤之行的动机似乎只是单纯的游览，即去以妓生著称的平壤游玩。当时平安道观察使是和缓翁主的婆家叔父郑翬良。世子认为郑翬良受到和缓翁主的庇护，即使自己非公开造访平壤，他也不会贸然上告英祖。惠庆宫认为思悼世子出于这样的考虑而选择了平壤。而且郑翬良非常了解思悼世子，微行的世子也没必要生硬地告诉他自己是谁。据说郑翬良接待世子一行付出了巨大心血，世子离开平壤时，他甚至呕血。

朝廷的动向

世子曾想瞒着国王与朝廷偷偷访问平壤，但这绝对无法瞒住。尽管说是秘密之行，但世子的出行不可能是只有一两名随从的简陋之行。世子率领五六十名随从启程。五六十名壮丁踏着尘土奔赴平壤，世上不可能没有传闻。

世子赴平壤期间，安允行、洪启禧等人请求英祖召见世子。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世子的平壤之行。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当时英祖想见儿子，肯定会惹出大事。因此，该上疏被认为是洪启禧等部分老论人士为使思悼世子陷入困境而故意策划的。然而呈上上疏的时间虽巧，但大臣们请求英祖召见世子的情况并非只此一次。相反，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很可能不知道世子的平壤之行。世子从平壤回来后，老论方面立刻呈上批判平壤之行的上疏。如果世子在平壤时他们就知道此事的话，早就呈上上疏了。英祖称：“不请元良，反奏于予，轻重倒置。”又称：“人君动静，臣子何敢指挥乎？”国王对他

们的请求置之不理，并且处罚了安允行与洪启禧。一边在外游玩、一边关注朝廷动向的世子不可能没听到这个消息，于是他急忙返回汉阳。

平壤之行的消息传开后，金龟柱、尹在谦、徐命膺等人试图告知英祖这个情况。他们呈上了要求对偷偷往返平壤的世子进行训诫，并处罚默认或助其前往平壤的人的上疏。惠庆宫认为当时暴露世子的平壤之行并视为问题的人是别有用心。其意图是废掉思悼世子，或攻击惠庆宫娘家。其中金龟柱的上疏虽没有作为正式上疏流传下来，但可以从《恨中录》与正祖的文章中找到痕迹。尹在谦与徐命膺的上疏被收录于《英祖实录》等资料中。

金龟柱是英祖继妃贞纯王后的兄长，时年二十二。当时他成为王室外戚不过两年，还未在朝廷站稳脚跟。在这种情况下，他上疏攻击可能成为自己政敌的其他外戚。惠庆宫将此事视为贞纯王后娘家攻击自家的出发点。

在上疏的转达过程中，当时受英祖宠爱的承恩尚宫——李尚宫得知情况后，对新妇贞纯王后这样说道：“宅下焉敢为如此之事乎？”并即持器水，急劝洗草。很难探知是怎样的权力力学在发生作用，但尚宫斥责王妃的场面的确令人惊讶。英祖也斥责了王妃，据说当时备受国王宠爱的十七岁年幼王妃惊慌之余，竟到了“罔极之境”的地步。

惠庆宫称尹在谦与金龟柱家族不仅是姻戚，他也与金龟柱的堂叔兼家族的掌门人金汉祿同门受学，即尹在谦上疏的背后是贞纯王后娘家。但徐命膺只是为博取好名声，“举‘冒死而陈之’之语，乃欲示好英庙之计也”。徐命膺在上疏末尾称“坐明伦堂而书此疏”，这既是因为他当时是成均馆之首——大司成，也是因为他想表达自己在“伦纪无存”的世界里独自“明其伦纪”之意。连思悼世子都愤其傲慢。

尹在谦与徐命膺的上疏并未立即上呈英祖。虽然不是很确定，但似乎是遭到了政丞洪凤汉的阻止。不知因为何事，九月的时候英祖阅览之前的《承政院日记》，看到了徐命膺的上疏。英祖立即掀起了一场风波，问责并处罚了在世子偷偷前往平壤之时以世子患病为由而假

冒世子的内官柳仁植，以及代替世子处理事情的内官朴文兴等相关人员。但由于郑翬良等人的努力，世子本人没有受到责罚。

平壤回还后

思悼世子在平壤之行后的几个月中一直被疟疾折磨。惠庆宫认为该病是外出而得，并回忆道：“吾之此言，于人事或怪异。而经万古所无之事，不如若以此病大归。”（《恨中录》，第106页）世子外出之后，精神状态有所稳定，还举行了书筵。但1761年末和1762年初，他在儿子正祖的婚礼过程中多次因英祖而受心伤，从三月开始病情再次加重。他开始指使内官、内人，乃至来到昌德宫的和缓翁主，强行让其辱骂英祖。

此时的思悼世子就像享受人生最后的盛宴一样，与从宫外带来的女僧、妓生们一起举行宴会。他们玩到深夜，不收拾桌上的食物，上下不分地都睡在一个地方。森严的宫廷中出现这种混乱的景象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从四月开始，他把自己的住处装扮得像坟墓一样，竖起类似大红色铭旌（在红布上写上死者的头衔与姓名，立在灵前的旗帜）的东西，还造棺材藏在其中。他还嫌不够，五月干脆在东宫附近挖地修建了地下室。地下室共有三间，间与间之间设置了门障，每间都像棺材一样。地下室之门向上开，盖上仅容一人进出的小型盖板，再盖上茅草消除痕迹。室内挂上玉灯，世子在地下室开灯而坐，感叹道：“妙哉！”他在地下室里藏了许多刑具和兵器，后来因此受到怀疑。对于寻找避难处的世子来说，地下室是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于是思悼世子踏上了死亡的门槛。

附录 思悼世子的肖像画

思悼世子停留平壤时，平安道观察使的幕下有一位实力出众的画家，即能把猫画得十分精细，不仅获得“卞古羊”的别名，还因肖像画的手艺被评为国手的卞尚璧。思悼世子令他画下自己的肖像，以后送至汉阳，但世子在生前没有收到这幅肖像画。在思悼世子去世十余年后的1773年，惠庆宫与正祖接到这幅肖像画，他们非常感激，仿佛

重新见到了丈夫与父亲。据推测此后该肖像画被供奉在思悼世子的祠堂，但遗憾的是现在已消失不见。

第十八讲 狂症的心理学问题

由于近年发现的诸种证据，人们很难再对思悼世子的狂症提出质疑。尽管如此，最近还是有一位心理学家加入了质疑的行列，这就是著有《心理学者分析正祖之心》一书的金泰亨。这本书在史料解读上存在重大失误，让人很难全盘接受其主张，但并不是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金泰亨提出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三条：

- ① 为何思悼世子到十五岁才突然发病？
- ② 为何思悼世子只在私人领域发病？
- ③ 为何思悼世子没有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狂症发作？

①的疑问看起来是基于《英祖实录》1762年闰五月十三日条中的“十余岁以后，渐怠于学问，自代理之后，疾发丧性”这句话，即十五岁时进行代理听政后出现了丧失本性之病。《英祖实录》只是简短地压缩叙述，没有记述发病经过，并不是说世子“突然发病”。《恨中录》中称思悼世子从十一岁开始就出现了患病的迹象。无论是《英祖实录》还是《恨中录》，都未说世子突然发病。

②的疑问也与史料解读问题相关。另外，我认为金泰亨对世子地位的理解不足是另一个原因。世子没有私人领域。世子管辖的空间——东宫看起来像私人领域，但东宫是拥有职域与职品的官员们执行公务的公共领域。如果一定要举出世子的私人领域，那就是卧室。但思悼世子的发病空间不仅包括卧室，也超出了东宫，他甚至杀害了生母宣禧宫的内人。

金泰亨还提出了思悼世子若患有狂症，如何进行近十四年代理听政的质疑。从实际情况来看，思悼世子并未正常履行代理听政之责。英祖虽然嘴上说让世子代理听政，但并未给予相应的权力。英祖让思悼世子处理自己难以处理的杂务，把他当作提线木偶，只让世子处理此前自己带着内官处理的日常琐碎之事。更何况，世子让内官们代为

处理这些事务的情况似乎也不在少数。思悼世子赴平壤时，内官曾代替世子处理事务。他用这种方式应付代理听政。

谁也不敢轻易提及思悼世子的狂症，但世子之病从发病初期开始，就传到了宫外。消息灵通之人已经听到了宫中的传闻。1756年，世子在朝廷大臣面前也发狂过，因此朝廷大臣们清楚得知了世子之病。1760年正月思悼世子生日后，宣禧宫也见到了真实情况。此前听到传闻而半信半疑的宣禧宫目睹了儿子的狂症，从此不再怀疑了。而且英祖在一定程度上也了解世子之病，他1758年就清楚思悼世子若发火则杀人。思悼世子的狂症超出了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继续发作。

针对③的回答，不是我能轻易置喙的部分。目前无法弄清楚多年来一直受辱的思悼世子为何不在英祖面前发狂，甚至世子在英祖试图杀死自己的危机中也未发狂。在心理学家眼中，这是可疑的。但精神医学家郑有硕称思悼世子“害怕父王，在他面前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但内心却怒火中烧”，并判断这是美国精神科学会承认的仅限于韩国人的文化精神疾病——“火病”。（《思悼世子的精神病》，收入 Artholic ,Random House Korea,2008年）郑有硕认为，思悼世子没有在英祖面前发狂是可以理解的现象。我期待心理学及精神医学领域的专家对思悼世子的狂症进行深入探讨。

第四部 死亡与死后

第十九讲 罗景彦之告变

告变经过

事情终于爆发了，罗景彦告发了思悼世子，《英祖实录》将此事称作“景彦告变”。事情发生在1762年五月二十二日，世子被锁进木柜前的一个月。何为告变？告变指的是告发谋逆，即造反的行为。世子按部就班就能接掌大权，声称这样的世子造反是什么意思呢？另外又是谁敢告发下任君王谋逆呢？

罗景彦是尹汲的僉从。僉从或僉人，其身份并非奴隶，而是类似协管名门之家家事的执事，虽然这些人与奴隶这样的贱民不同，但也不属于两班，充其量算作平民。罗景彦作为这般下等的人物，竟敢做出连两班都无法做的事情。没有某人的唆使或权势之人的协助，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罗景彦是宫中别监罗尚彦之兄，他也处理过一段时间别监的事务。别监负责宫廷内护卫、运送等各种差事，罗景彦通过弟弟或者以前的同事来了解宫中发生的大小事。但是，并非所知道之事都能说出来，也并非所能说出来之事都能传出去。世子不是罗景彦这种地位的人能够随意讨论的对象。

罗景彦为告发世子的谋逆用尽了心思。他首先把含有宫中内官密谋造反的内容的告变书呈至刑曹，刑曹参议李海重看到告变书后大吃一惊，急忙告诉领议政洪凤汉，李海重是洪凤汉的小舅子。洪凤汉马上向英祖报告了此事，英祖提出要直接审问罗景彦。国王本来无须亲自审问罗景彦这种身份之人的告变，这样做是因为事态十分严重。然而当罗景彦见到英祖时，他从衣缝中掏出了另一封告变书，里面指控世子罪行的内容足足有十几条。他禀告英祖，自己是因为无法上呈这

封告变书，才会先向刑曹上呈伪造的告变书，如果一开始上呈的是写有世子罪状的告变书，可能等不到它抵达国王之手，自己就已经死于非命了，所以先抛出诱饵，面圣后再上呈真正想要上呈的告变书。其手段之缜密与狡猾一览无遗。

从程序与过程来看，罗景彦的告变疑点重重。李海重在上报罗景彦的告变时有过于仓促的嫌疑。他在没有查明情况、提审罗景彦再上报的情况下就直接禀告国王，导致世子最后遭难。另外，他在君王亲自审问之前没有对嫌疑人进行搜身，这也备受质疑。罗景彦在直接面见君王时竟然能够从衣服里掏出告变书，李海重对搜身之事疏忽至此实在异常。所有这些疑点都令人怀疑罗景彦背后有人。

英祖看完告变书，斥其悖乱罔测，当天就付之一炬。次日，他处死了罗景彦。然而英祖与诸臣都传阅了告变书，于是其内容也公之于世，英祖还让整个朝廷都知道了世子的不轨行为。根据《英祖实录》的记载，英祖看完这篇告变书后，下决心废黜世子。究竟告变书上有什么内容，竟让英祖做出如此决定？

告变书的内容

现在已无法见到罗景彦当日上呈的告变书，甚至无从得知它的大致内容，但我们可以从《英祖实录》中记录的英祖因此事斥责思悼世子之语而推断出其中几条。英祖斥责世子：“汝搏杀王孙之母，引僧尼入宫，西路行役，北城出游，此岂世子可行之事？”

英祖提到了四件事，虽然可能还提到了其他事情，但记在《英祖实录》中的只有这四项。王孙之母指的是侍妾冰爱，一年前的1761年正月，思悼世子指责冰爱更衣失误，将她杀死。女僧指的是安岩洞尼姑假仙。告变后的次月，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之时，内官、尼姑、妓生等随他一起全部被处以死刑。此处列举了内官朴弼秀、安岩洞尼姑假仙以及五名平壤妓生。此外，英祖还提到了他早就知晓的世子的平壤之行与世子前往北汉山城游玩的事情。除了这四项罪状外，《英祖实录》还通过英祖在告变发生两天后所下的命令揭露了另外一项，即

英祖从告变书得知世子曾抢夺汉阳市井之人的财产，还欠下许多债务，便命令户曹偿还。《英祖实录》揭露的世子之过错为以上五项。

那么告变书的其余内容是什么？为何超过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没有流传下来？英祖决心废掉世子的线索藏在这里，那其中的决定性原因是什么？线索同样藏在《英祖实录》中。《英祖实录》将罗景彦事件称为“告变”，还提到罗景彦一开始上呈刑曹的告变书中有“变在呼吸之间”等语，英祖把思悼世子关入木柜时也说了这句话，这是暗示思悼世子嫌疑中存在谋逆罪的语句。从这些事实来看，罗景彦在面呈英祖的告变书中极有可能部分地提到了思悼世子的谋逆嫌疑，不过《英祖实录》似乎不敢讨论此事，因而没有记录。

然而罗景彦告变书指控的思悼世子谋逆嫌疑，其具体证据既不明确，也算不上严重。如果真的“变在呼吸之间”，那么英祖不可能不立即处置世子就把他遣送回府，让他反省。也就是说，罗景彦所提出的世子谋逆嫌疑，英祖无视也无妨。英祖本来就不把思悼世子当回事，还似乎因为知道世子有病，所以并不着急处理。英祖拿罗景彦的告变来训斥世子，世子辩白道：“此果臣之本病火症也。”英祖对此大发雷霆：“宁为发狂，则岂不反胜乎？”（《英祖实录》，1762年五月二十二日）英祖轻视世子，认为他无法真的去做一些事情，因此将世子遣回昌庆宫等候处置。然而不到一个月，更大的事情发生了。

罗景彦的后台

罗景彦是一名无异于他人家仆的僉从，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地谋害世子。就算自己的亲人死在世子刀下而决心报复，世子的地位也过于崇高。因此即便怀有这样的心思，如果没有权势之人的帮助，也不可能实施。任谁都不可能不怀疑罗景彦有后台。

但看了罗景彦的告变后，却没有人提及他的后台。义禁府判事韩翼謩请求查明罗景彦的后台，但英祖一怒之下免了他的职位。只有思悼世子在积极调查，他在捕盗厅提审罗景彦的妻儿审问其后台。罗景彦的妻儿声称幕后之人为安城的京主人。京主人指的是地方官衙的驻首都办事处首领。思悼世子逮捕安城的京主人进行审问，得到的答案

为“熟人尹光裕”，尹光裕是右议政尹东度的儿子。京主人无法忍受拷打交代了幕后之人，由于没有胡编乱造的空间而供出了政丞的儿子，这要是放在其他地方，此人必死无疑。但思悼世子视此为诬告，听完审问内容后反而安慰了忧心忡忡的尹东度。以上为《英祖实录》所有有关告变后台的记载。

另一方面，惠庆宫认为，罗景彦是尹汲的僭从，而尹汲与英祖的继妃贞纯王后的父亲金汉耆同属一派，因此这是贞纯王后娘家的唆使。如果思悼世子被废黜，贞纯王后一派将是最大的政治受益者。他们即便自身无法掌握实权，至少可以削弱以王室姻亲身份而发挥巨大政治影响的政敌——惠庆宫一族的力量，因此值得怀疑。

《玄扈记》还记载了如下说法。英祖传唤思悼世子进行斥责，但没有任何官员要求查明谁是罗景彦的后台。训斥结束后，英祖让世子回去，世子出去后大声痛骂站立在院子里的官员们：“敬大臣，大臣则吾不言也。诸臣无请究指嗾，是皆逆贼也。”面对世子的滔天怒火，臣子们吓得全身发抖，据说郑远达尤其惊恐，以至于辞去职务，后来成了疯子。郑远达平日就有心疾，此事导致他病情加重。另外，据说罗景彦死前曾供出金汉耆、尹汲、洪启禧为幕后之人，此话一出，罗景彦马上就被处斩了。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再去查明幕后之人，毕竟当时也未能找到，不对，当时也未曾认真追查过。按理来说，贞纯王后一族最值得怀疑，但反过来又可以推断出，正因为从一开始就会被怀疑，他们的行动难道不会最为谨慎吗？但最重要的事实并非查明谁是幕后之人，而是没有人试图揭露幕后之人，这在《英祖实录》等资料中都得到了确认。唯有思悼世子一人想要查明罗景彦的后台，但英祖以及所有朝臣，无人试图彻底揭露幕后之人。

查明世子谋逆告变的幕后之人并非易事。提审罗景彦供出的人的过程中会死掉很多人，而在再次提审这些人的过程中又会死掉更多的人。这些人必然是处于当时权力中心的人，调查一旦开始，权力中心便会血流成河。正因为如此，英祖等所有人似乎都害怕或忌讳这样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朝廷里没有人站在世子这一边，比起上述原

因，大家都不甚重视世子所处的险境。思悼世子此时已变成朝廷上下的“烫手山芋”。

第二十讲 关入木柜之日

与世长辞

罗景彦告变之后，思悼世子在被称为东宫正堂的时敏堂中庭，即月台等待国王的处置。在此期间英祖也曾赴东宫附近，但他说：“元良必生怯，故今归矣。”（《英祖实录》，1762年闰五月初二日）双方都感受到了危机，事态一触即发。从《英祖实录》来看，在这期间思悼世子整日等待国王的命令，表面上在反省，但实际上他做了许多其他事情。他不仅为自己下令制作的绘本写序，还出过宫。最近广为人知的《中国小说绘模本》收录了《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小说的插画，而思悼世子为此书写了序文。也许他是为了缓解紧张情绪，但确实是意料之外的行为。

宣禧宫的奏请割断了这条紧绷的弦。就在水子被关入木柜的当天清晨，宣禧宫向英祖奏请“大处分”，“大处分”即“处死儿子”。英祖即刻动身，从自己居住的庆熙宫前往世子所在的昌庆宫。此前大臣们也曾请求英祖去见世子一面，但每次都遭到英祖的拒绝，他认为只有儿子向父亲请安，没有父亲去找儿子的道理。这样的他居然亲自去见思悼世子。

国王动身的消息马上传到了惠庆宫处，惠庆宫密切关注着英祖的行踪，打听他从哪个门进，又前往哪里。听到英祖经过景华门前去璿源殿的消息后，惠庆宫绝望了。璿源殿是供奉英祖父王肃宗肖像的地方，在行大事之前，英祖每次都谒见他已故的父亲，并告诉他自己的计划与心情。他在那天赴璿源殿也就意味着将有大事发生，但问题在于经过景华门这点。英祖深信宿命之学，所以将行善事时会从万安门通过，而将行祸事时则会从景华门通过。英祖经过景华门，无疑预示着对世子的处置。

思悼世子也时刻留意着父亲的动静。英祖抵达后，派人通知世子前来迎驾，但世子并没有去见英祖。与此同时，世子叫来妻子与她告

别，让她把世孙正祖的挥项拿来，打算见父亲时戴上它，说自己患了疟疾。疟疾，即malaria，是一种浑身发寒的疾病。虽然是夏天，但世子决定通过戴上冬日防寒的帽子——挥项来清楚地表明自己生病了。另外，他之所以戴儿子的挥项，不仅想借此表明自己精神错乱，还想通过表示自己是下任国王候选人世孙的父亲来博取同情。听到丈夫的最后请求，惠庆宫认为：“此挥项小，欲着渠身之挥项，命内人持来小朝之挥项。”她没领会到世子的深意。面对惠庆宫的回答，世子说：“君乃凶畏之人，率世孙而久活，忌余今日出而死，不欲余着世孙之挥项，心术可知矣。”思悼世子认为惠庆宫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担心如果他戴世孙的挥项，祸将延及正祖。对于丈夫的意外之言，惠庆宫大吃一惊，连忙拿出正祖的挥项，但世子没有戴上。

有人认为这番对话揭示了惠庆宫想要置丈夫于死地的真实意图，但这是一种超出常识的理解。如果这桩轶事在其他地方也有记录的话还好说，但它只见于《恨中录》。倘若惠庆宫真的为了老论而想置丈夫于死地，她不会将这桩可能被抓把柄的轶事收入自己的书中。同时，如果思悼世子真把妻子视作连丈夫都可以杀死的“凶畏之人”，他就不会在最后一刻与她诀别。惠庆宫描绘了丈夫挣扎着想要活下去直到最后一刻的身影。

英祖继续传唤世子出来迎驾，世子只好走出院门，在成为处决场的徽宁殿附近的集英门外迎接了国王的驾轿，然后父子俩一起进入徽宁殿。徽宁殿即现在的昌庆宫文政殿，当时是英祖前王后——贞圣王后的魂殿。国王或王后的神主被移入宗庙供奉前，会临时供奉在魂殿。换言之，徽宁殿是贞圣王后灵魂的居所。英祖决定在妻子的灵魂栖息之地与妻子一起惩处儿子。

徽宁殿风景

1762年闰五月十三日，即阳历7月4日，汉阳城干旱了很长时间，两天前迎来一场大雨，天空因此更加晴朗。时值初夏，天色澄明，烈日炎炎，国王与世子在贞圣王后神主前相对而立。国王首先向神灵致礼，然后世子向神灵与父王问安，徽宁殿笼罩在沉重的寂静之中。听闻国王动身的消息，负责教育与护卫世子的世子侍讲院与世子翊卫司

的大部分官员就逃走了。他们害怕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有责任引导世子走上正轨。英祖令军队分四五层围住宫殿，并让身边的武士们拔刀护卫，营造出一种无人能违逆的森严气氛。

英祖突然高呼：“诸臣亦闻神语乎？贞圣王后丁宁谓予曰：‘变在呼吸之间。’”英祖开始恐吓诸臣，问他们是否听到贞圣王后提及世子的谋逆。在国王面前，世子已然是一名罪人。英祖坐定后，一边用刀敲击地面，一边发布命令。世子摘冠脱袍，赤脚趴伏于地。作为罪人，他通过以头抢地的方式来谢罪，以致额头鲜血直流，这绝非一位将继承国家的世子该有的模样。世子脱去龙袍，露出里面的绵布衣。英祖再次大吃一惊，他曾听闻世子经常穿绵布衣以求父王逝世，眼前这一幕证实了这一传闻，而且世子穿的还是在父母葬礼上所穿的未染色的生绵布衣。他痛斥道：“尔作孝服苴杖置土窟者何意也？”英祖要求世子自裁，干干净净地自我了断。当时的情况如下：

“汝若自处则不失朝鲜世子之名，汝速为自处。”

“吾死则三百年宗社亡矣，汝死则宗社尚保，汝死可矣。”

惠庆宫派人到宫墙底下偷听，听到世子求饶。

“父王！父王！吾之谬误甚矣，自今以后，惟命是从，读书且听所教，幸勿如是！”

他还说：“某年臣几不免于剑头魂也，今又命之，死臣当死矣。”

世子垂死之际，开始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官员阻止世子自裁。后来领议政申晚先到，随后左议政洪凤汉、判府事郑翬良、都承旨李彝章、承旨韩光肇依次到来，但他们慑于森严的气氛，无法对英祖说出一句话。英祖当场将他们罢免，而后他们全部退下。随后世孙正祖进入现场，如其父亲一般摘冠脱袍。既然父亲成为罪人跪倒在地，那么作为儿子的世孙也应紧随其后。正祖恳求祖父：“请活我父！”英祖的答复简短而果断：“出去！”正祖被岳祖父汉城判尹金

圣应强行抱了出去。之后官员们再次进来试图守护世子，但都遭到了英祖的驱赶，最终世子被关入木柜。子时过后，英祖才颁布了废黜世子的教旨。至此，世子已经踏上死亡之途。

第二十一讲 世子的罪名

直接死因——谋逆罪

关于思悼世子的死因，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世子狂易致死，另一种则认为他是党争的牺牲品。主张“党争牺牲说”的人否定“狂症说”，认为世界上没有父亲会因为儿子狂易就杀了他。然而这种说法没有正确理解“狂症说”，惠庆宫所谓的“狂症说”并不意味着世子因狂易而被杀。这一说法认为，英祖杀死思悼世子另有原因，但这一切都源于世子狂易，考虑到这一情况，他应该得到理解与原谅。那么不管“狂症说”还是“党争牺牲说”，英祖处死世子的首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

英祖处死世子并非偶然。他把世子关入木柜中慢慢治死，因此他惩处世子时，应该提到是什么原因。不过根据现存的记录，这一理由并不明确。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当天，英祖在贞圣王后魂殿中突然拊掌高呼：“诸臣亦闻神语乎？贞圣王后丁宁谓予曰：‘变在呼吸之间。’”这就是《英祖实录》记载的所有直接原因。

国王大白天念叨神灵的行为十分荒谬，就算他听到了神灵的话语，但以此来征求大臣同意也显得可笑。英祖平日处理国政时总是遵循严正的逻辑，这种行为实在出人意料，更别提他还引用了自己厌恶、无视了一辈子的王妃的话。再申明一次，这部分属于正史《英祖实录》的内容，而非野史。

英祖的言语与行动虽然令人费解，但其含义与意图却十分明确。“变在呼吸之间”的意思是“变乱迫近”，而这句话是对思悼世子说的，也就意味着他把世子视为变乱，即谋逆的主导者。英祖以五年前逝世的王妃的声音证实了世子的谋逆事实。然而倘若世子谋逆，国王需要征求谁的同意来惩处他呢？英祖已经算到了这一点，若说是从某某人那里听来的话，官员们就会追问“谁说的？”“这是真的吗”之类的问题。这样一来，英祖将很难实施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干脆说成

是亡魂的声音，而大臣们也没有办法对这些话提出异议。官员们若是提出“如何能听到亡魂之语”的质疑，就会变成视君王为精神病患者的逆臣。这种说话方式实在是巧妙。于是英祖判处思悼世子死刑，那么世子的谋逆罪究竟具体是什么内容？

谋逆罪内容——《废世子颁教》

现在很难找到有关思悼世子谋逆嫌疑的具体记录，《承政院日记》是最核心的资料，但其中相关部分已被全部删除了。英祖在逝世前采纳了尚是东宫的正祖的上疏，下令把与思悼世子恶行、嫌疑等相关的记录如数洗草。思悼世子若是谋逆罪人，那么正祖就会成为罪人之子，届时将很难君临朝鲜。从法统上来说，正祖是孝章世子之子，而非思悼世子之子，但既然生父为谋逆罪人，那他的儿子便很难要求臣民的效忠。

《恨中录》是一部比较清楚展示思悼世子谋逆踪迹的记录，但对这一部分的描述也不甚具体。可作为补充材料的有收入《待闈录》《玄皋记》《某年记事》（权正忱后人收藏）等史料中的《废世子颁教》。处死思悼世子前，英祖首先废掉了他的世子之位。这是因为世子被称为“小朝”，即“小国王”，不能以谋逆罪来惩罚君王。此时国王所下的命令就是《废世子颁教》，向全国宣布“废黜世子”。既然告知全国要废黜世子，那就不得不说明缘由。他只在少数官员面前将亡魂之语作为理由，但不能对百姓们说这种荒谬的话。

《废世子颁教》在当时家喻户晓，但现在却不见于《承政院日记》或《英祖实录》。思悼世子死后，与他的死亡相关的一切都成了禁忌，颁教及其痕迹也都被抹除了。所幸一些私撰史书还存有相关内容，鉴于这是国王亲撰的命令，以及其内容的严重性与在当时广为人知的事实，可以说几乎没有伪造的可能性。然而先行研究并不重视这一记录，一些论文在引用时也错误理解了其内容。

《废世子颁教》的中心内容是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的那天清晨，宣禧宫对英祖所说的话。英祖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宣禧宫的话语，并将此作为废黜世子的理由。以下是宣禧宫的原话：

世子戕杀中官内人家属，将至百余，而烙刑等惨忍之状，不可胜言。而其刑具皆在，于内司等处无限取用。长番中官逐之，只小中官别监昼夜同处，取用财货，遍赐此辈，妓生僧俗，淫褻昼夜。余之侍人招来拘囚，近日饰非忒甚，而以母子之恩，不忍以奏。近日御苑中造冢欲埋不敢言之地，令侍人被发，傍置利剑，欲行不测之事。顷日往彼阙，几乎被杀，仅以身免。一身虽不可顾，仰念圣躬，何敢不奏？若此之故，顷日祈雨，御门露处之时，心自祝曰：圣躬若便，则三日内雨下，悖子若得志，不雨矣。果雨，自此心稍定矣。今则圣躬之危，迫在呼吸，何敢牵私不奏？

当日清晨，宣禧宫先是致信惠庆宫，称“昨夜所闻，尤为可畏，如是之后，我死而不知”。接着她谒见英祖，禀报了儿子迄今为止所做的恶行与前日的传言，请求英祖下“大处分”。英祖也在上个月从罗景彦告变中多少了解到思悼世子的恶行，但尚不知世子杀害了百余名下属，并欲杀宣禧宫，甚至连自己都想杀掉，即“不敢言之地”的事实。听完宣禧宫的话，英祖说：“虽曰狂何不处分。”看来宣禧宫是以儿子狂易为由为其部分辩解，但不管多么狂易，意图杀死国王的世子都是不可饶恕的。

英祖以宣禧宫之言为由，正打算下令处死世子时，相当于国王首席秘书的都承旨李彝章马上反对说：“殿下以深宫一女子之言动摇国本乎？”这个批评十分严厉，可以视为对国王的挑战，但英祖已无暇理会这种批评了，他的心思只放在了处死世子这一件事上。

意图弑父

《废世子颁教》委婉地表达了思悼世子剑指英祖的事实，《恨中录》有更详细的叙述。

小朝欲由水口而往上阙，往而不能则还来，其日乃闰五月十一二间也。如是之际，添出惶惶之飞语，狼藉甚矣。前后之事，皆非以本心为之者，不知人事而精神恍惚之时，浮于火而所发之言，或欲以兵火为之，或欲挟刃而往做某事而还，若有一分常情，岂至如是？

在被关进木柜的前一日夜间，即十一日夜晚与十二日清晨之间，思悼世子曾想通过水口前往英祖所在的庆熙宫，此时世子已神志不清，嘴里不停说些“或欲以兵火为之，或欲挟刃而往做某事而还”之类的话，也就是说打算用刀剑杀死住在上阙——庆熙宫生活的某人，即英祖。根据以上引文，思悼世子当晚抱着刺杀英祖的想法，携带刀剑经水口赴庆熙宫。宣禧宫将这一“惶惶之飞语”告诉了惠庆宫与英祖。

从初十日夜开始，天降大雨，降水持续了一天多，宫殿内外的水渠都满溢了。世子连夜疏通水路赴庆熙宫。要是他的微行与往常无异，估计会有百余名下属跟随。世子与他们冒着倾盆大雨，深夜持刀剑穿过汉阳的街道，即便天色再晚，一队壮汉穿梭于街头的情形，不可能不引起流言蜚语。世子在去庆熙宫的路上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猛然清醒后回到了自己的住所——昌庆宫通明殿。清晨回过神来的世子担忧不已，又恰好听到房梁仿佛折断的声音，便说：“吾将死矣，此何事也？”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

就这样，思悼世子死于谋逆罪。说是世子试图弑父，但作为父亲的英祖并非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精神不正常。难道世子就不能得到保护与治疗，而非要接受惩罚吗？如果担心他谋逆，那么更严密地监视他不就行了吗？当然，世子不像普通人那样可以轻易放任不管。即便死了百余人，也没有人敢诉之于口，这充分展现了世子之位的性质。其权力如此强大，若放任不管，不知会导致什么事情。即便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父母真的爱自己的儿子，难道不会去寻找其他出路吗？父亲处死了自己精神不正常的儿子，不论有怎样的理由，其心思都令人费解。英祖比谁都生气，执意要处死儿子。无论是因为权力属性，还是因为个人性格，这在一名深爱儿子的普通父亲眼中，只留下了遗憾。

第二十二讲 为何偏是木柜？

使用木柜的原因

在思悼世子事件中，光是父亲处死儿子这点已足够令人震惊，而更荒唐的是，世子竟然被关入木柜中活活饿死。到底为什么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呢？木柜是解读思悼世子事件的关键，以下是木柜登场的过程。

英祖来到徽宁殿，宣布完世子的罪状后令其自裁。由于世子的身份为“小朝”，不能像普通囚犯一样被处决，所以被要求自行了断。世子辩解了好一会儿，也对死亡表示了反抗，但都无法改变国王心意。最后世子接过剑，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官员们穿过护卫军的包围，夺过世子的剑，阻止他自杀。之后世子解开腰带打算上吊自尽，但被大臣们解开绳结而以失败告终。他又试图用头撞砖石，却被官员们用手挡住了。世子一次次寻死，又一次次失败，而英祖依然不放弃处死他的想法，但一时也无计可施，没人敢上前触碰世子的身体。

无论如何，思悼世子在名义上仍是代理朝鲜国政的最高掌权人，尽管他现在因谋逆罪被处罚，但谁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而且他的儿子已经注定是下下任国王了。处死现任国王的儿子兼下下任国王的父亲，此事任谁也无法想象，就算有十条命，也不敢贸然行动。哪位官员敢行此事？别说处死世子，他们甚至无法承受世子死在自己眼前的情况。当日东宫大部分官员之所以一听到英祖动身的消息就慌不择路地逃跑，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单凭今日未能拼死阻止世子死亡这一点，他们以后就可能会沦为促其死亡的逆贼。即便以后不会因此事被单独问罪，他们仍可能会被治以“以下犯上可恶罪”。精于算计的人当然选择赌上自己的性命来阻止世子死亡，就算当场会受到英祖的惩罚，但按儒教理念，他们最后十有八九会被原谅，而且大概率会因忠诚被推崇为忠臣。这是自己舍命一博，自身乃至家人都会位列功臣的机会。因此无论对世子的忠诚度如何，官员们都只能冒着生命危险阻

止他自杀。衣服都不会自己穿的国王也只得亲自撰写《废世子颁教》。谁敢砍世子的头呢？木柜的主意由此产生。

谁的提议？

下午三时许，大殿小厨房的木柜登场。“速为自处！”“幸勿如是！”“速为出去！”各种关于处死世子的争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在此期间，在某人的指示下，木柜进入现场。大殿小厨房是负责准备宫殿各种宴会膳食之处，该处的木柜没有那么宽大。身体肥胖的世子根本无法进入木柜，于是英祖命人再去找更大的木柜。这次抬来的是宣仁门外，位于昌庆宫南边御营厅东营中供军队使用的大型木柜，此时已到傍晚。

御营厅的木柜刚到，英祖马上令世子进入其中。世子一开始竭力拒绝，但在英祖的不断催促下而放弃。看着世子只身进入木柜，没有一位官员上前阻拦。一开始时，不论是世子还是官员都觉得难不成英祖真会把世子困死于柜中吗？随着夜幕降临，木柜里的世子再也无法忍受闷热。世子身体肥胖，本来就很怕热，此时应该极为难受。本来以为“虽终日终夜，待回天之后可以出来”，但英祖最终不发一言。世子后来踢开木板跑了出去，在宫中四处游荡。他违背国王命令逃出来，感到惊惶不宁。英祖得知世子逃出的消息后，命人抓住世子再次关入柜子。《恨中录》也有记载：“初欲跃出而未成。”接着英祖“亲自下来益加封锁矣”。为了让世子再也无法破坏木板逃出来，英祖“命取长板、巨钉、大索牢锁封之”。后来木柜被移至承文院，最终成为世子的棺材。

如此一来，木柜成了将思悼世子引向死亡的道具，究竟是谁提出这个想法就变成了政治争论点。仿佛提出木柜主意的人便是杀死世子的罪魁祸首一般，大家都想找出这个人。韩、沈仪之、郑履焕等攻击惠庆宫娘家一族的攻洪派主张惠庆宫的父亲洪凤汉是主犯。对此，惠庆宫在《恨中录》中反驳说自己的父亲从未提出过木柜的主意，依据是世子被关入木柜时，父亲还未入宫。洪凤汉于闰五月初二日被罢免了领议政一职，退居东大门外的别墅。同月初七日，英祖重新起用洪凤汉为左议政，但他却没有马上回京，而且在十二日上疏称自己病情

加重，恳请英祖让他休息。十三日，洪凤汉得知世子受罚的消息后才赶赴宫中。按惠庆宫的说法，洪凤汉于晚上七时才抵达大殿，到达不久就陷入晕厥，耽搁至九时才进入大殿。不用说第一次抬入的木柜，连第二次木柜登场之时，洪凤汉都不在宫中。惠庆宫称正祖也能证实此事，正祖一听到外祖父昏厥的消息后便派人送去了清心丸。正祖即位后，在批复郑履焕上疏时援引了英祖之语，称木柜先于洪凤汉到达。（《正祖实录》，1776年三月二十七日）

按正祖和惠庆宫的说法，洪凤汉与木柜无关。但按《英祖实录》有关世子被关入木柜那天的记录，在木柜到达之前，洪凤汉好像早已在宫中。另外加出假注书李光铉的《壬午日记》也称洪凤汉似乎在处置世子的现场。只不过问题在于《英祖实录》对时间先后的记录很模糊，而《壬午日记》则被质疑其真实性。李光铉当时是进入承政院不足两日的临时注书，这样身份的官员在《壬午日记》中记录的其斥责大臣等内容很难让人信服。李光铉很少出现在该时代的史料里，但从正祖撰写思悼世子的行状开始，他被刻画成一名为救治思悼世子而把医官带至徽宁殿的功臣。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查明究竟是谁提出了木柜的主意。但可以确定的是，试图处死世子的人是英祖，而非提出木柜主意的人。木柜固然把世子引向死亡，但也只在某人想要处死世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附录 木柜骚动

1982年11月，一则新闻报道称发现了囚禁思悼世子的木柜。这个木柜长宽高分别为110厘米、70厘米、105厘米，内部为标示世子躺着死掉时的位置，写有“上下左右”的字样。收藏者听家中老人说，自己的第七代祖先曾任兵曹参判，受英祖的指示献上了家中的木柜，思悼世子死后，他重新将木柜搬回家时发现里面有很多污物。据说在两百多年间，他们家每年正月初都会在木柜上放装有水的铜盆来进行祭祀。

思悼世子的木柜一经公开，学界内外就其真伪展开了争论。后来虽因各种疑点的出现，这个木柜没有被认定为文化遗产，但也没有人根据《恨中录》或其他记录提出过具体批判。按《恨中录》的记载，木柜来自御营厅东营。收藏者称是献上了自家之物，但正是由于大殿小厨房的木柜太小才搬来了兵营的木柜，所以哪怕是簪缨世家，私宅的木柜也难以进来。而且宫廷内大殿小厨房的木柜肯定比私宅木柜大得多。

另外，虽然记录的真实性多少存在问题，但按李光铉《壬午日记》的描述，木柜“高广以布帛尺计，高下三尺半，广亦如之”。布帛尺每尺大约46厘米，那么记录中的木柜长度与高度大概为161厘米，明显大于引发争议的木柜。而且思悼世子身材高大，他死时所处的木柜似乎也需要那么大尺寸才合适。

思悼世子死于木柜后成为“木柜大王”。木柜是完全展现处死世子之难与问题严重性的象征物，因此成为朝鲜历史上最沉重的政治物件。

第二十三讲 向死之路

讨伐逆贼！

关于思悼世子之死，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被再三提起，即英祖并无意处死自己的儿子。据说英祖把世子关进木柜只是为了轻罚他，而世子却死在了里面，英祖得知世子死去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前因后果就能知道这种观点有多荒谬，但普通人愿意相信它，因为他们不能接受父亲处死儿子的事实。在留意这一点的同时，让我们看看思悼世子是怎么死的。

首先，思悼世子在供奉嫡母贞圣王后神主的徽宁殿里进入木柜。按英祖给思悼世子撰写的墓志铭来看，木柜置于讲书院。有些记录称思悼世子进入木柜后，英祖让人把它抬到了承文院，可见承文院与讲书院指的是同一个地方。按《英祖实录》1759年二月二十四日的记录，讲书院卫从司被转移到了承文院。这两个机构都集中在与徽宁殿（即文政殿）毗邻的昌庆宫崇文堂。看起来英祖不忍在贞圣王后灵魂栖息的地方处死儿子，因而将木柜移到了其他地方。

英祖让人把封死的木柜抬到讲书院，并派一百多名士兵看守。即便如此，英祖还是不放心，总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也不返回自己所住的庆熙宫，而是每日监视木柜的情况。直到十九日，思悼世子奄奄一息，英祖这才回宫。惠庆宫认为思悼世子死于二十日，但为了确定他的死亡，直到二十一日木柜才被打开。也许世子在十九日就已经死了，就算有人在十九日将世子从木柜放出来，他活下来的机会也已经微乎其微。英祖目睹世子濒临死亡的情形后，才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在这种情况下，称英祖无意处死世子无疑是天方夜谭。另外根据《颐斋乱稿》等记录，英祖在回宫的途中还高奏凯歌，即他把处死儿子之事等同于平定敌国一般而演奏胜利之歌。尽管官员们极力劝阻，可英祖置若罔闻。首都百姓都看着得意洋洋的英祖高奏凯歌沿街行进，处死儿子如同平定逆贼一样。不幸的是，这就是现实。

二十日下午三点左右，暴雨倾盆而下，电闪雷鸣。惠庆宫认为世子死于此。自从十年前“《玉枢经》事件”发生后，世子一听到雷声就会害怕得躲起来，而他偏偏在如此可怕的雷电交加之日死去。当天夜里，惠庆宫收到了“无可奈何”的报告，她将这个时间点视为命运的瞬间。最终，世子在木柜待了整整七日（官方记载为八日）后与世长辞。

死亡时的传言

无数传言提到了木柜中的世子，如《壬午日记》《待闾录》《玄皋记》等各种个人记录中的所传之言。记录与记录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人很难完全相信某种记录。而且一些传言还会成为政治攻击的借口，所以需要更加小心。以下介绍其中的几种传言。

关住思悼世子的木柜是军队使用的大型木柜，但身材高大肥胖的世子难以忍受其狭小闷热。加之时值阳历7月初，全国干旱许久后，在数日前刚下了一场大雨，天气异常闷热。在这种烦闷、酷热、口渴、饥饿的状况下，世子遭受的痛苦更为深重。世子本来就因为火症而难以忍受炎热，更不用说这样的痛苦了。本来生活得最为奢侈舒适的世子，如今被困在了一个无人能承受的狭小空间里。

正好木柜底部有一个小洞，大臣们通过这个洞给世子递水、饭、药、扇子等物品。有一次他们给世子递去了醍醐汤与清心丸，世子喝了醍醐汤后大呼爽快。醍醐汤是一种用梅子与蜂蜜等制成的朝鲜传统清凉饮品。然而英祖很快察觉到柜洞的存在，随即命人将它堵上，世子因此再也无法得到任何援助。

世子踢开柜板挣脱出来，又马上被抓了回去。接着，英祖便给木柜加固了一层木板，把所有的洞口与缝隙都堵住，密封得严严实实，还在木柜上盖了一层草，让它变得更热。据说堵住缝隙与铺草是惠庆宫的叔父洪麟汉的进言，目的是让世子早点热死。世子在木柜里听到进言，自言自语道：“汝忍为此？汝必殃及子孙矣。”正祖即位后，果然立即以逆贼之名赐死了洪麟汉。

此外，也有几则传言提到世子在木柜中时还蒙受了屈辱。当时捕盗大将具善复奉英祖之命负责监视木柜，窥视世子的动静。他为了了解世子的情况，敲打木柜。“世子问：‘谁也？’对曰：‘具善复也。’世子叱曰：‘尔安敢不具衔也？’乃具衔以对，且恣饮食于其傍。”具善复后来被正祖处死。正祖在处理洪麟汉时曾含糊提到：“麟汉之罪，正与复贼一般。”又在亲撰的思悼世子行状中提到，洪麟汉与具善复还一度妨碍试图阻拦思悼世子走向死亡的大臣们的行动。换言之，这些轶事算是与国王判决对应的野史证据。

与思悼世子死亡相关的这类怀疑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不过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之日，洪麟汉与金阳泽等人在麻浦乘船游玩到深夜的事情成为公开讨论的问题。这一疑点虽是广为人知的事情，但并不是从当时就有的传言，而是在思悼世子去世三十年后，李祉永在上疏中首次披露出来的，他是事件发生时担任世子侍讲院弼善的李万恢的儿子。（《正祖实录》，1792年闰四月十九日及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除非是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的傻瓜，否则不会有人在得知世子生命消亡的当下还去划船游玩，这一行动无异于将军得知战争爆发还继续饮酒作乐。而且这则传言与另一段告发洪麟汉的传言相冲突。在前者中，世子被关进木柜时，洪麟汉提出了在木柜上盖草的建议；而在后者中，洪麟汉却在同一时刻去了麻浦划船游玩。考虑到这些，洪麟汉的麻浦船游之事在各方面都缺乏可信度。

此外，很多有关木柜中世子的传言都令人难以置信。据说有些守卫木柜的士兵用“欲食饼，进饼乎？欲饮酒，进酒乎？”等话语戏弄世子。而英祖为了确认世子死亡，曾凿柜洞往里窥视，还直接用手去探世子是否有呼吸。难以想象底层军卒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英祖亲自确认死亡不仅没必要，而且很过分。

英祖为了确认世子是否已死，让人在木柜一侧垫上石头，时不时晃动柜体，世子每次都会出声问是谁在摇。直到第七天，柜子里不再传出一丝声响，再次摇晃之下，木柜里才传出呻吟般的细声：“勿摇也，眩不能耐。”后来人们把世子的尸身搬出后，发现柜子里有半截

折叠起来的扇子。虽然不知道是谁放进去的，但可以看出世子因无法忍受饥渴曾用扇子来接尿喝。这则传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信的。

所谓“思悼”之谥号

2015年9月电影《思悼》上映后，“思悼”这个谥号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电影中称这是“思念之思”与“哀悼之悼”，是承载了英祖思念与悲伤的谥号。英祖在正式确认思悼世子死亡的当天（1762年闰五月二十一日）赐下了“思悼”这一谥号。若仅考虑“思悼”的第一层次的意义，通常会将其译为“思念之思”与“哀悼之悼”，即“思念哀悼”，并将其理解为蕴含了英祖对儿子的感伤之意。但谥号要遵循谥法，谥号的每一个字都要反映该人物的性格与生平。“思”与“悼”在谥法中都有规定的含义，按《朝鲜王朝实录》记载的朝鲜王室谥法用例，“追悔前过曰思”，“年中早夭曰悼”，“思”“悼”都是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的恶谥，所以使用时需要极其谨慎。从这一点来看，很难想象英祖会因其他理由赐下这样的谥号。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祭文誊抄》收录的题为《英祖祭思悼世子文》的祭文来看，英祖赐下所谓“思悼”谥号的原因更为明确。在谈到思悼世子的错误时，英祖说：“若无尔子，岂免庶人之名？……赐尔谥曰思悼，比诸戾太子，于尔可谓美谥。”英祖称让思悼世子复位是因为有孙子正祖他才有所宽容，虽然“思悼”这个谥号是恶谥，但比汉武帝时举兵失败自杀的戾太子的谥号还是要好。根据谥法，“戾”是“不悔前过”之意，即“没有反省过去的错误”。英祖认为思悼世子比谋逆的戾太子更为恶劣，但他宽容地给予了更好的谥号。由此可见，英祖内心的愤怒要远大于悲伤。

第二十四讲 杀子之父的心情

卿等之罪

无论是抵抗还是叛乱，或是其他理由，处死儿子的父亲都不会感到安心，即便是目睹再多杀戮之事的国王也会如此。也许正因为这样，不少记录都展示了英祖这种不安的心情。在《颐斋乱稿》中，作者黄胤锡记录了他从司成南彦彧那里听到的一则故事（1768年七月初九日）。数月前，英祖在经筵上与大臣们交谈时提及思悼世子的死亡，他问：“其前诸臣果能一番馈药乎？”即英祖事后才得知思悼世子的病情，并后悔不已。

难道英祖果真不知世子的病情？若按迄今为止的分析，英祖或许不知道世子病症的严重性，但一定知道病情本身。英祖早已知晓思悼世子杀死金汉采等六名内官及内人的事件，在处死世子的当天也从宣禧宫处得知了世子之病，他自己还多次向洪凤汉等身边人提过世子的狂症。如此看来，英祖的后悔只不过是想要把自己的失误转嫁给大臣们。

从李祉永的上疏中，我们也能看出英祖的后悔，他是思悼世子死亡时担任世子侍讲院弼善的李万恢的儿子。1764年某天，都承旨洪重孝去李万恢家中拜访，描述了英祖那日的言行。英祖拍案流涕说道：“吾之元良，岂或有如何，而实由于卿等之罪也。”在筵诸臣，莫不悚然。（《正祖实录》，1792年闰四月十九日）英祖否认了给世子冠上的罪名，把问题归结为大臣们的疏忽及诬陷而加以斥责。

《颐斋乱稿》记录的是思悼世子死后刚过六年时出现的传言，而且来源明确，因此可信度很高。李祉永上疏提到的是将近三十年后才出现的传言，但发声者身份明确，内容又是直接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话语，因此也不可忽视。从这些资料来看，英祖在处死思悼世子后感到后悔的传言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英祖真的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吗？

后悔还是愤怒

英祖的后悔只见于私人记录，而未见于英祖或相关者等公开发表的记录中。不过还是有人能够从英祖为思悼世子亲笔撰写的墓志铭中读出他的后悔。相关内容如下：

讲书院多日相守者何？为宗社也，为斯民也。思之及此，良欲无闻。逮至九日，闻不讳之报。尔何心使七十其父遭此境乎？

在首篇介绍该墓志铭的论文中，这段话被翻译为“在讲书院守卫木柜多日，是为宗庙与社稷？还是为百姓？想到这里，真心希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九天过去后，听到了你死去的悲报。你到底抱有何种心态，竟让七十老父遭遇这等事情？”由此可读出英祖的后悔。按媒体的报道，如果将上文理解为英祖虽把世子关入柜中，却不忍听到儿子死去的消息，最终得知儿子死亡的消息后，心中悲痛，那么从中可以读出英祖最初无意处死儿子。

怎么可能有人把儿子关入狭小的木柜里整整九日，却希望无事发生？关一两天都该担心是否出事，在酷暑中把人关了足足九日，岂会不担心他的安危呢？用“悲报”来形容儿子的死亡，怎么就能将其解释为后悔呢？难道处死儿子的国王会在公开的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愉悦吗？而且这还是用作墓志铭的文字。虽然介绍该墓志铭的论文中的译文存在误读的可能性，但由此读出这是突发事件而致死或读出英祖的后悔之意实乃脱离常识。

英祖处死世子绝非突发事件，世子并非死于英祖的一时之怒，而是等待了一周以上才最终死去的。而且许多臣子拼死想要阻止世子的死亡，如果英祖对自己的判断稍有迟疑，思悼世子完全可以死里逃生。另外，无论是上述的墓志铭还是《废世子颁教》等其他官方记录，更多展现的是英祖对儿子的愤怒而非对处死儿子的悔恨。毕竟他在处死儿子后，于返回住所的途中奏起了平定敌国一般的凯旋歌。

死后仍受冷待的世子

英祖对思悼世子的愤怒还可以在世子死后的丧礼过程中得以确认。世子死后，英祖的怒火仍未平息。在为世子发丧的二十一日晚，

英祖将废世子李愔复位，并让世子侍讲院准备灵堂，即让他享受世子之礼。然而在实际的丧礼过程中，英祖却没有给予李愔应有的世子待遇。他不仅让臣子们身穿玉色浅淡服来当丧服，还大大减短了服丧的月数。玉色浅淡服是三年丧后穿的衣服，实在不能被称为丧服。世子代理听政了十几年，在他的丧礼上，英祖竟只让大臣们穿了一小会儿这似是而非的丧服。另外，世子出殡当日，年幼的正祖本来想在大殿门外与父亲诀别，却遭到阻止。此举是为了正式断绝罪人父亲与正祖的关系。

与思悼世子类似，纯祖之子孝明世子也曾代理听政且死于二十来岁，对比两人的丧礼待遇，就可以明显看出英祖对思悼世子的冷待。与思悼世子的简式丧礼相比，孝明世子的丧礼像国王丧礼一般庄重。对于英祖的残忍处置，连史官都在《英祖实录》中指出了其不当之处。史官认为既然位号已复，丧礼就应该符合其地位。此外史官还批评了对英祖这种处置不予谏言的大臣们。（《英祖实录》，1762年闰五月二十一日及同年七月十三日）

世子生前也好，死后也罢，英祖对他依然严格。他不仅不允许大臣参拜思悼世子的墓地与祠堂，也不允许思悼之子正祖参拜。这是与孝章世子或懿昭世孙完全不同的待遇。1770年，崔益男以此为由上疏，但直到1774年英祖濒死，他才准许正祖扫墓。（《待闈录》《玄皋记》等）英祖在官方场合对自己处死儿子的决定从未表示过后悔。既然在官方场合如此决然，那么传言为什么再三提及他的后悔呢？如果这些传言不是被人编造出来的话，英祖为什么在言行上如此矛盾呢？对此，著名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有关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著作中提供了值得思考的内容。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最后把既是个人竞争对手又是政敌的玛丽·斯图亚特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当玛丽·斯图亚特的死讯传来后，伊丽莎白一世像疯了一般高声叫喊，捶胸顿足，辱骂内阁官员未经自己允许就擅自执行死刑。实际上明明是她自己杀人，却表现得好像是下属不听从她的命令就执行死刑一样。

伊丽莎白声称自己毫不知情，可是没有人相信这一厚颜无耻的谎言，也只有一个人会认为这个编造的故事是事实，那就是伊丽莎白本人。

癔病(hysterie)患者，或者说具有癔病倾向的人的特性之一是，不仅非常擅长说谎，而且自己还会被这一谎言所欺骗。他们会完全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他们的证词是所有谎言中最率直的谎言，也是最危险的谎言。

(中略)

伊丽莎白努力将自己推入一个自我暗示，即处决玛丽·斯图亚特一事违背了自己的命令。因此她的话里流露出确信的态度。

伊丽莎白一世制造了自我辩解与逃避责任的理论，是一名欺骗他人乃至自己的癔病患者。英祖也许与伊丽莎白一世怀有同样的心情、患有同样的神经症。英祖就算不后悔处死世子，也希望摆脱处死他的责任，而且至少需要作为国王在诸臣面前摆出父亲的样子，假装自己痛苦不安、遗憾惋惜。我们应该要考虑到这些情况，然后再去解读英祖的后悔。

第二十五讲 金滕之书的秘密

金滕之书

每当论及英祖处死思悼世子后心有悔意之时，最常被提及的便是金滕之书或金滕之词。金滕之书甚至被用作某部著名小说的核心素材，该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金滕意为金属质的丝带，是捆束装有中国古代皇室秘密文书匣子的绳子。因此金滕也象征着王室的秘密。据说英祖在处死思悼世子不久后便感到后悔，并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心情，然后交给都承旨蔡济恭，命其藏于贞圣王后魂殿放置神位处的下方。虽然这具体是何时之事并不明确，但从蔡济恭官居都承旨可推测事情应当发生于1767年至1769年间。然而这一事件在世子去世三十余年后才为世人所知。1793年八月初八日，正祖将此事全面公之于世。正祖为何要在即位二十年之时突然公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呢？

金滕之书的实物并未被公开展示，全文内容也无从得知。正祖仅将文中的二十字汉诗示于大臣们，即“血衫血衫，桐兮桐兮，谁是金藏千秋，予怀归来望思”。

文中所述的“血衫”与“桐”是指思悼世子为嫡母贞圣王后服三年丧时之事。据说思悼世子在嫡母死后极为伤心，流下血泪，血泪浸湿了衣角。桐木指代丧杖，思悼世子在三年丧结束后，因为思母心切，仍旧保有丧杖。他怀着极大的孝心保留丧杖，却被反对势力诬陷为在期盼父亲早日去世。世子被关入木柜之日，英祖为找到世子谋逆的证据，命人将世子“常时所用细干，尽为出之”，一番搜查之后发现世子在宫殿后苑挖有一处地下室，其中藏有环刀、宝剑等各类武器及数根丧杖。此时已是完成贞圣王后三年丧的两年后，世子不仅持有丧杖，还有多根。即便是世子，也没有必要持有多根丧杖。而且这些丧杖中还有部分是暗藏机关的宝剑。当剑插入剑鞘时看起来如普通丧杖一般，去掉剑鞘则是宝剑，这是刺客暗杀时常用的武器。虽然大臣们辩解称这是世子为玩乐而制作的物件，但是这一解释却没能打消英

祖的疑虑。桐杖既是世子的孝心的象征，同时也是英祖对世子误会的象征。

后两句诗说是展现出英祖处死儿子后的后悔与遗憾。“谁是金藏千秋”经常被误读为“谁会永远把它当成金滕收藏？”从上下文来看，该句诗应当理解为“谁是像安金藏与车千秋这样的忠臣？为何没有这样的忠臣呢？”《高宗实录》等同时代其他资料的解释也是如此。

安金藏是中国唐朝人。唐睿宗还是太子时，曾被人诬告谋逆。案件开始审理时，其他大臣都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做伪证称太子确有谋逆之心。只有安金藏用刀剖开自己的肚子，坚持称太子无辜。于是武则天终止了审讯，睿宗得以幸免于难。

车千秋是中国汉武帝时期的人物。当时太子与权臣江充关系恶劣，江充诬陷太子诅咒皇帝。太子听闻后气愤难耐，遂领兵杀死了江充，随后逃亡，最终自杀。汉武帝因此觉得太子确实有谋逆之心，后来听了车千秋的话才了解到太子是无辜的，遂灭了江充三族。汉武帝对自己导致儿子死亡一事感到十分后悔，修筑了“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表对亡儿的思念。最后一句“予怀归来望思”虽然常被译为“望你回到我的怀抱来”，但是更准确的解释应当是英祖如汉武帝一般对自己导致儿子死亡的事情感到十分后悔，表达了思念亡儿之意。

将金滕之诗如此解读之后，我们可知其内容着实令人震惊。如果这首诗属实的话，那么英祖不仅后悔处死思悼世子，而且怨恨当时的权臣。若论党派，那便是怨恨老论一派。在车千秋与“归来望思之台”这段典故中曾出现名为“江充”的人，思悼世子平壤一行之后，也曾以“江充”指责洪启禧。据说洪启禧因此加快了除掉世子的步伐。总之，英祖是在批判没有像安金藏与车千秋那样的忠臣，他们宁愿剖腹也要阻止逆贼的诬陷。在私人领域以传言流传的英祖之悔，直到孙子正祖在位时才被公之于世。

改造历史

金滕之书为何在二十余年后才被公开呢？无论是英祖还是正祖都曾禁止公开谈论世子之死。英祖在位期间无人敢谈论思悼世子之死。1771年，韩、沈仪之等人大胆言及木柜，犯大逆不道罪而被处死。被处死的沈仪之甚至都没有说出“木柜”一词，仅以“一物”，也就是“一个物品”进行指代。对此英祖批判了他们欲提及木柜的用意，并诘问道：“一物何物乎？”当然英祖并非不知道答案，他更多的是在诘责。对此沈仪之回答道：“所谓木器，殿下岂不知之云？”最终沈仪之因攻击国王而成为大逆不道的罪人。

正祖在位期间，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正祖无法突然推翻英祖立下的规矩。对于正祖来说，思悼世子之死是已经结痂的伤疤。但在正祖即位不足一月之时，李德师等人便想要揭开这块伤疤，称思悼世子含冤而死。正祖即位后曾立刻发布命令，禁止以思悼世子之事挑起争端。可以说国王的话语刚落下，李德师等人就公然提出相关议论。正祖随即处死了违背王命的李德师等人。但未过数月，安东儒生李应元等人就再次呈上相同内容的上疏。按李应元等人的说法，根据曾任世子侍讲院说书一职的权正忱所著日记，世子是仁德贤明之人，却由于掌权派的错误最后含冤而死，必须给世子申冤。李应元本人是权正忱的同乡，所以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他的上疏内容或许令正祖感到高兴，但是违背了国家政策。屡次上疏后，正祖不但处死了李应元，还将安东由府降级为县。

曾经对思悼世子问题如此强势处理的正祖慢慢改变了态度。在思悼世子去世三十年后的1792年，气氛逐渐发生变化。这是1789年思悼世子之墓被迁至水原华城，已然开始的追崇思悼世子的氛围的延续。事情的开端始于一封毫无关联的上疏。1792年四月，时任正言的柳星汉上疏劝诫正祖不要被女色迷惑，要全心钻研学术。可能当时正祖正颇为宠爱某位宫女。此上疏遭到多人的批判，传来传去之后，变成了柳星汉仿佛在批判思悼世子的恶行。这与柳星汉上疏的原意不同，问题往出乎意料的方向扩大。对此，岭南上万名儒生联名呈上万人疏，批判柳星汉，请求为思悼世子申冤。（《正祖实录》，1792年闰四月二十七日）这些儒生虽与正祖即位初年的那几人一样触犯了国家禁忌，但正祖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呈上万人疏的人不仅得到了宽大

处理，为首的儒生甚至受到了正祖隆重热情的款待。上疏之路由此开启，次月又有人进呈万人疏，之后便是次年蔡济恭的上疏。（《正祖实录》，1793年五月二十八日）

领议政蔡济恭非常清楚不能谈论思悼世子，然而他却参与了为世子申冤之事。蔡济恭称：“当时诸贼之为谗为诬，若架凿以货利声色，构捏以驰骋弋猎，则其罪固上通于天，而殿下之以事属先朝，隐忍不发。”他对此无法袖手旁观故而上疏进言。蔡济恭的上疏实际是将思悼世子之死归结于“老论逆贼”之错。因此老论左议政金钟秀等人随即反驳，而正祖最终拿出了金滕之书。

正祖谨慎地提起了这份展示英祖处死思悼世子后感到后悔的文书，同时确立了一种任谁都不敢发声质疑文书真伪的氛围。他说：“今日诸臣每因一番事端，辄有一番妄度，以典礼间事致疑于不当疑之地，此岂敢萌于心者乎？”即便这份文书疑点重重，也没有人胆敢提出确认文书实物的请求。正祖公开了金滕之书后，蔡济恭立刻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庆尚道儒生，称国王也认可了思悼世子含冤而死的言论，要求诸生顺正祖之意，加快为思悼世子申冤的步伐。因此，为思悼世子申冤的氛围受到鼓舞。

1794年十二月，距思悼世子花甲还有一个月之时，正祖在世子灵前为其上八字尊号。这次正祖尽可能保留了金滕之书的意思，即展示出仁德聪慧的世子因逆贼诬陷含冤而死的情况。起初准备的八字尊号为“隆范熙功开运彰休”，随后正祖下令修改以凸显金滕之书的意思，改为“章伦隆范基命彰休”。丁若镛在《自撰墓志铭》中称“章伦隆范”蕴含了金滕之书的意思。从意为伦理的“伦”字即可看出思悼世子并不是违逆英祖意思的逆贼，而是顺从父母之意的孝子。

于是英祖时期绝对禁止谈论思悼世子的情势，在世子花甲来临之际发生了逆转，发展成追崇世子的氛围。这一连串的过程看起来似乎早有谋划，但正祖在这一过程中却未披露任何具体的东西。他绝口不提父亲的病情，也未具体反驳父亲之罪，而仅用模糊的表述去掩盖病情与罪行。1789年，正祖将父亲之墓迁至水原时撰写了思悼世子行状，文中将世子写成仿佛无病之人，又称世子未曾犯罪，是在与逆贼

对峙的过程中成了牺牲羊。但正祖并未再具体披露相关内容。与其说正祖一直否定或批判思悼世子的病情与罪行，倒不如说他是在销毁或搁置对其不利的记录以推动事情发展，从而重构思悼世子的形象。换言之，正祖通过销毁或搁置来改造历史，企图歪曲历史。

乔治·奥威尔在著名小说《1984》中写道，在“老大哥” (Big Brother)的专制统治下，“过去不仅被改变了，而且是持续被改变” (The past not only changed, but changed continuously)。正祖为了父亲，也为了自身与朝鲜王室的正统性及正当性，递进式地改变了思悼世子的形象。我们可以推测，金滕之书是在这一过程中被编造出来的产物。

第二十六讲 世子死亡的责任

金尚鲁与洪启禧

一国的世子成为罪人并被处死，最直接的原因当然在于世子自己，但世子获罪而死必须有人出来负责。引导世子胡作非为的人应当负责，同时辅佐世子的人也需要负责。但宰相们作为师与傅，只是兼任世子的老师，位于其下的世子侍讲院的官员也是名官，因此难以问责这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们，这时候便需要一两只替罪羊。

众所周知，金尚鲁与洪启禧是导致世子死亡的代表性人物。金尚鲁在世子死后就立刻受到了英祖的处罚，理由是1757年思悼世子杀死内官金汉采等人时，他未马上将此事禀告英祖。（《英祖实录》，1762年六月初五日）其实英祖在事发次年年初就已知晓，在四年多后才把这一事件当成处罚理由并不能成立。《颐斋乱稿》曾记录如下传言，即世子被关入木柜后，英祖曾派人搜查东宫，搜出了一幅金尚鲁的肖像画，画上有世子手书词句“知余心者，惟卿一人”，金尚鲁因此获罪。具体罪名并未公开，但有可能是金尚鲁十分清楚世子的情况，却不——向国王禀告。这种程度的嫌疑是否真的构成犯罪，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金尚鲁的子孙击铙鸣冤，要求给祖先申冤时曾将这句话作为金尚鲁对世子忠心耿耿的证据。

起初，金尚鲁因没有将世子的情况如实禀告给英祖而获罪，正祖即位后，金尚鲁又因将思悼世子的恶行——上报而成了离间世子与英祖关系的逆贼。正祖追夺金尚鲁官爵，且对其猛烈批判。

壬午复设东宫后，教予曰：“尚鲁，汝之仇也。予之勒令致仕，白予心于天下后世也。壬午虽不敢更提于他日，前壬午五年之时，酿壬午五年后兆，即一尚鲁而已。”拜稽闻命，铭诸心腑。（《正祖实录》，1776年三月三十日）

英祖对孙子正祖说：“尚鲁，汝之仇也。”同日正祖还批判金尚鲁，称其“以大朝事告小朝，以小朝事告大朝，互相欺蔽，谗构罔

极”。惠庆宫在《恨中录》中也曾记录金尚鲁用手指在房间地板上写字，向病中的英祖报告思悼世子的恶行。因思悼世子的生母宣禧宫在旁，而她不懂汉文，金尚鲁便故意用此向英祖告密，英祖看完后扣肩叹息。如上所述，金尚鲁的罪名在正祖即位后完全反转，由原先的未如实禀告之罪变成了事事告密之罪。

洪启禧成为罪人的过程与金尚鲁并无二致。洪启禧是金尚鲁的侄女婿，还与金尚鲁之子存在姻戚关系。洪启禧的岳父是金尚鲁之兄金取鲁，金取鲁又把金尚鲁之子金致永立为养子。虽然与金尚鲁关系如此之近，但洪启禧却与金尚鲁不同，他在英祖在位期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官至最高名誉职——奉朝贺，并于1771年平静地结束了一生。然而，在英祖执政期间可谓享尽荣华富贵的洪启禧在正祖即位后不久就变成了逆贼。洪启禧的儿子与孙子因刺杀正祖未遂之嫌被迫夺官爵，洪启禧作为逆贼之父也受到牵连，被扣上了罪名。后来正祖亲撰思悼世子行状时，洪启禧成了导致世子之死的主谋。若论洪启禧与思悼世子的关系，其实英祖应当比正祖知道得更清楚。但是洪启禧在英祖时期却全身而退，反倒是在正祖即位后因子孙犯罪变成了逆贼，他本人也变成了谋害思悼世子与正祖的罪人。

人们一般取金尚鲁与洪启禧姓名中的“鲁”和“禧”两字将两人合称为“鲁禧”。他们都在正祖时期变成了代表性的逆臣。鲁禧两人不仅是正祖眼中的逆贼，也是全天下人眼中的逆贼，甚至同属老论一派的人也这样认为。那么他们是如何在正祖即位后突然变成了乱臣贼子呢？

逆贼之路

《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年出版）叙述了金尚鲁与洪启禧的罪状及嫌疑：

金尚鲁：积极参与1762年对世子的处罚，获得了英祖的认可，但随着国王开始后悔，金尚鲁被流放清州。后来得到英祖特令的赦免，官至奉朝贺。（金驹起编辑）

洪启禧：1762年时任京畿道观察使的洪启禧让人告发世子的恶行，这成为世子死亡的契机。……洪启禧勾结英祖继妃之父金汉耆等人弄权逐利，被士林视作小人甚至奸臣。（郑万祚编辑）

按《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的表述，金尚鲁“积极参与处罚世子”，洪启禧“让人告发世子的恶行”。然而这样的表述既不准确，也缺乏确凿的证据。若说金尚鲁没有冒死阻止英祖处罚世子，或许还有可信度，但当时包含金尚鲁在内的大臣们任谁都不会胆大包天，站出来主张处死世子。另外，英祖因后悔处死思悼世子而流放金尚鲁的说法也与当时的史料记载有出入。金尚鲁在思悼世子死后半个月就受到了处罚。此外，撰写洪启禧词条的郑万祚曾在其他论文中写道：“我们至今仍然无法确切知晓他（洪启禧）到底与壬午祸变有多大关系。”郑万祚在百科事典里因为篇幅限制而采纳了通论，但在论文中具体阐述了通论的局限之处。

如上所述，金尚鲁与洪启禧的具体罪行并没有被披露出来。无论是试图刺杀思悼世子，还是试图用其他方法置世子于死地，或是策划某些阴谋，我们都无法找到具体内容。即便没有具体罪行，他们却仍在正祖时期变成了最恶劣的逆臣。金尚鲁时而因漠视世子的恶行而成为逆臣，时而因向英祖禀告世子恶行而成为逆臣。实际上《承政院日记》还曾记录领议政金尚鲁包容世子的失误与不足，为其辩解的情形。就算金尚鲁并非真心要包容世子的不足，但起码在公开场合他也不得不如此行动。然而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保密，金尚鲁作为世子的老师，有时不得不把世子的行踪与问题上告英祖。这样的处境导致金尚鲁不得不成为罪人，处于如此两难的境地，早日退出权力场对他来说才是上策，但他却没有这么做。金尚鲁之罪不在于谋逆，而在于无法果断抛弃权力。

对于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当事者本人，还是周边的亲友、后世子孙都感到愤懑难平，心情难以言说。后世子孙可谓是有口难言，毕竟作为罪人之后又能说什么呢？子孙们认为即便当下不能开口，日后终会有机会辩明真相，所以着手整理相关资料。洪启禧因为遭遇满门抄斩，没有留下子孙，但金尚鲁的子孙却在等待时机的来临。金尚鲁文

集《霞溪集》附录《事实记》中有相关的记载。1797年金尚鲁之孙金钟杰进行了第一轮整理，1917年金尚鲁第七代孙金镇汉进行了补充整理。

《事实记》按年份整理了金尚鲁辅佐英祖的政绩，同时添加了对罪行的辩解。按金尚鲁后人的逻辑，他可能会因没有辅佐好世子，在世子死后被罢职。哪怕退一万步来说，金尚鲁都不可能是谋反的逆臣。其证据是1766年金尚鲁去世时英祖对他的若干肯定评价以及后来赐下的谥号。

最让金尚鲁后人感到惋惜的部分是英祖对正祖说的“尚鲁，汝之仇也”这句话，这是后世子孙无法辩解的致命一击。因为这是正祖亲口转述的原话，无法否定。因此《事实记》试图从其他角度去解读这句话，即英祖之所以对正祖说“尚鲁，汝之仇也”是为了问责金尚鲁没有好好教导世子，导致世子走向死亡，后来因奸臣洪国荣等人的挑拨，其本意被曲解。在思悼世子离世百年后的高宗初年，金尚鲁的玄孙金东翰察觉到可为“逆贼”先祖申冤的政治征兆，便立即击铙鸣冤。这次行动多少洗刷了家族百年来的逆贼污名。

被创造出来的罪人

加图立大学神父尹义炳所著的描写19世纪当局迫害天主教教徒的小说《隐花》里对“逆贼”，即“国家的罪人”有如下解释：

所谓“国家的罪人”，这句话在这片土地上是一句空话，它被狡猾的群体用做圈套，失去意义已经有几百年之久了。在党派斗争的时候，随着占据上风的势力的变化，有的人可能今天是忠臣，明天就会变成国家的罪人，昨天是国家的罪人，今天又有可能变成忠臣受到表彰。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这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般自然正常。正义、忠义、善恶的观念与“国家的罪人”一词变得毫无关系已经很久了。（《隐花》下卷，韩国教会史研究所，2007年，第195—196页）

上述引文是对朝鲜朝廷将天主教教徒定义为“国家的罪人”一事的解释，却也说明了在朝鲜时代的政治环境中创造罪人的过程。金尚鲁与洪启禧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罪人，却未显现谋逆的蛛丝马迹。忠臣、功臣、叛臣、罪人并非依据正义或者善恶界定，而是根据政治情况与需求来定义，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天主教教徒身上。

一旦被贴上逆贼标签，这个人不仅要经历物理意义上的死亡，也要经历历史性、社会性的死亡。逆贼的所有相关记录，尤其是正面记录会被全部销毁。金尚鲁的子孙起码为金尚鲁进行了辩解，而洪启禧则是连辩明的机会都没有。他就像百科事典里的评价一样，是小人、奸臣以及权力的走狗。其实除去后世这种单方面的评价以外，洪启禧还拥有另一种形象。洪启禧并不把自己视为官僚，而更认可自己的儒学家身份。他有《三韵声汇》《均役事实》《国朝丧礼补编》等多部编书、著书流传后世。洪启禧年轻时阅读了柳馨远的实学著述——《礪溪随录》，深受启发，后来担任官员时制定并推进了均役法、结布制等多项改革政策。不论是学术上，还是政治上，洪启禧都是不容小觑的人物。

金尚鲁与洪启禧在思悼世子生前掌握滔天权势，对于世子之死，不能说他们没有责任，然而这种程度的责任并不足以让他们成为逆贼。他们虽然被指为罪人，但具体罪状又未被披露，这是因为没有罪。那他们为何会变成逆贼呢？我认为原因有二：第一是他们的为人；第二是政治需求。考虑到他们曾拥有巨大的权力，不难想象他们可能做过一些让国王之外的其他王室成员感到不快的事情。例如，金尚鲁用手指在地板上写字、洪启禧被世子叱责为“江充之流”等等，我们不难推测他们曾经对世子、世孙等人所做的事情。《待闈录》曾记录一则逸话。1759年，思悼世子下严令叱责洪启禧，而洪启禧未发一语就离开了座位，世子感到十分不快。这些行为变成了一种“以下犯上可恶罪”，加之正祖想为自己的父亲申冤，两者不谋而合，于是金尚鲁、洪启禧便成了替罪羊。说到底，他们也只不过是无情的绝对权力的受害者。

第二十七讲 岳父家的责任

要知进退

世子之死，岳父家的责任比任何人都大。即便说本家与外祖家也有责任，但其中并无承担责任的合适人选。而世子的岳父洪凤汉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即使与女婿的死亡没有直接关系，也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然而世子岳父家却未承担任何责任，洪凤汉在世子死后不过十日就上疏英祖发表如下言论：

左议政洪凤汉白上曰：“以今番事言之，非殿下何以处之耶？外间则惟恐殿下不能辨得，而毕竟所辨，无异血气盛壮之时，臣固钦仰矣。”（《英祖实录》，1762年闰五月二十八日）

岳父称赞亲家英祖处死了自己的女婿。对此史官批判道：“凤汉身为师傅，且居姻娅，既未能殚诚辅导以尽臣节，则处分之后，固宜谢过引罪，惟愿速死之不暇。而筵对之际，乃敢曰‘外人惟恐不能辨得’，此岂前席之所可言者耶？无严甚矣。”所言极是。若论以事理，史官的评论可谓完全正确。

洪凤汉当然不是连这种道理都不懂的愚笨之人。从他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呈的论述思悼世子处分的著名劄子可以一探他的想法。洪凤汉很清楚自己应当怎样处事，但因收拾残局之事无法托付给他人，他又无法拒绝英祖的挽留，只得留下。在需要让英祖息怒，顺应英祖心意从而不再扩大事态，同时从中周旋为世子举办符合规制的葬礼的情况下，洪凤汉的选择可能也是无奈之举。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引文可能是洪凤汉为了让愤怒的英祖息怒而说的话，却被史官视为迎合英祖的奉承之语，从而遭到严厉批判。

惠庆宫写道：“先亲当此之境，少若不善为之，虽若一毫违于圣心，其时圣怒若火，吾家之湛灭犹为第二事，而世孙不得保全也。先亲期于不失圣心，不辜负丧逝之人，不欲遗恨于世孙，竭忠尽诚，左右周旋也。”（《恨中录》，第142页）即便没有世子一事，英祖一

触即怒、暴跳如雷的性格也是历史书中公认的事实。从当时的情况考虑，也不是不能理解洪凤汉的发言。问题在于洪凤汉在事态平息之后依旧没有放弃权力，这一点不论惠庆宫如何辩解都无法令人信服。她曾有如下发言：

大抵先亲不幸，当艰险之时，久掌朝局。以若恩遇之郑重，处地之自别，欲退之心，虽夙宵耿耿，而眷恋宗国，又以世孙幼冲，身不得自由，苟且弥缝，不得尽古人之直截。尚朝野如有刚直之人，不谅本心，责以无古大臣凜然之风，则先亲必当笑而受之，吾亦何以介怀？吾家世以仕宦之家，当门运亨通之时，子弟连科，门阑盛满，权势过重，人怒鬼猜，无足怪矣。到今思之，不能绝迹于荣途，沾身于科宦，悔恨莫及。千万意外，遭此诬陷，至于此境，实是至冤。盛衰祸福，譬如循环。已盛至衰，暴此至冤，自有转祸为福之时。泣血祝天。（《恨中录》，第323—324页）

惠庆宫很清楚本家的失误。从情理上来看，理当隐退，但她的家族反而官运亨通。1761年兄长洪乐仁科举及第，此后两位弟弟洪乐信、洪乐任又分别在1766年与1769年科举及第。兄长洪乐仁在家族兴盛之时曾多次对惠庆宫强调：“每以保家乃荫官之主簿、奉事为长享之道，抹楼下勿喜于本家之盛。”（《恨中录》，第260页）话虽如此，他们却没有及时从权力场抽身。权势滔天时会受到牵制，醉心权力时会受制于权力。惠庆宫在家族衰败之后才明白这一真理。

惠庆宫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

主张思悼世子是党争牺牲者的一派认为，世子受到岳父家及妻子的攻击而死。惠庆宫及其娘家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思悼世子的岳父家分明对世子之死负有责任，却并未负责。但是，把他们视为杀害思悼世子的加害者又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英祖与正祖从未提过以洪凤汉为代表的惠庆宫娘家对思悼世子之死负有什么责任。攻击洪家的人，即被称为“攻洪派”的人主张洪凤汉有错，但英祖与正祖反而维护洪凤汉。攻洪派提出是洪凤汉想出木柜的主意并上告英祖，但正祖却公开澄清，称这一说法并非事实。洪

凤汉若有稍许过失，便会被攻洪派抓住把柄，然而正祖去世后贞纯王后一派掌权时，攻洪派却不再提起洪凤汉与世子之死的相关嫌疑，可见主张惠庆宫及其娘家是杀害思悼世子的加害者的观点毫无根据。世间传言惠庆宫的叔父洪麟汉进言将关押世子的木柜封得严严实实，但又有人传言当时洪麟汉不在现场而是在麻浦游玩。这种前后矛盾的传言无法佐证惠庆宫娘家是加害者的观点。

正祖即位后惠庆宫娘家受到正祖的攻击，常有人因此认为惠庆宫娘家对思悼世子之死负有责任。这种观点缺乏对事实的具体考证。正祖问责外祖父洪凤汉并不是因为他与思悼世子之死相关，而是因为尚在东宫时曾受到洪凤汉的威胁。正祖尚在东宫时，洪凤汉曾私下威胁正祖，称正祖即位后必须追崇思悼世子，如若不然，少论、南人等反对势力可能会拥戴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正祖即位后郑履焕曾上疏论洪凤汉之罪，正祖批示道：“大抵原其心虽出于虑患，论其言实归于妄发，闻之者声罪宜也，言之者自明亦宜也。”（《正祖实录》，1776年三月二十七日）换言之，正祖明白外祖父本意可能并非如此，但自己确实感到了威胁。

正祖这一句话完全阻断了惠庆宫娘家的出仕之路。洪凤汉发言的那天，惠庆宫也在现场，她却表示自己未听到父亲说过追崇思悼世子，反而主张应当遵从英祖的意见，不讨论追崇世子之事。我认为正祖用不存在的事情去批示上疏意在牵制外祖家，是为了让权势滔天的外祖家不再参与国政，提前抓住其弱点，使其动弹不得。正祖一方面希望牵制外祖家，另一方面又强调洪凤汉本意不坏，为外祖家留下了辩解的空间与退路。对此，惠庆宫认为：“如是如是一节，若吾家之发明，若渠辈执而攻之，乃下两是双非之含混批答。”（《恨中录》，第446页）

思悼世子的岳父家既是老论一派的名门望族，也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家族。他们在手握大权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多批判。岳父洪凤汉在女婿以谋逆罪被处死后，依旧官居领议政、左议政等高位。这在失去父亲的世孙眼里很不合情理，他无法喜欢这样一个借王室权威而狐假虎威、无所不为的外祖家。我认为这是正祖即位后惠庆宫娘家遭到排

斥的重要原因。正祖没有将洪凤汉论以谋逆罪而处死，但在执政初期就给洪凤汉扣上了各种嫌疑，让他无法干涉国政。权力的流失终究导致了家破人亡。正祖即位后第二年，惠庆宫的兄长离世，次年父亲离世。惠庆宫认为父亲忧虑于一连串的政治攻势，最终折寿而亡。

没有任何明确证据可以证明思悼世子的岳父家杀害了世子。从常识思考，世子的岳父家也没有动机杀害作为自己权力根基的女婿。人一旦深陷权力便很难抽离。权力只会展示飞黄腾达之路，却不会展示偃蹇困穷之途。不考虑退路的权力最终会在某个瞬间坠落。惠庆宫一族忽视了这一真理，最终走向没落。

第五部 正祖之路

第二十八讲 正祖的年幼时节

思悼世子离开了，但他的死亡却成了炽热的政治争论点。尤其是随着儿子正祖成为国王，思悼世子事件成了必须解决的政治悬案。正祖是加害者英祖的孙子，同时也是被害者思悼世子的儿子。不能说加害者做错了，也不能说是被害者的问题。在解决这个矛盾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此子肥天下

正祖从出生开始就非同常人。与思悼世子出生时没有任何胎梦不同，正祖的父亲梦见了龙。思悼世子梦见龙叼着如意珠进入睡榻。梦境如此生动，以至于世子可以把梦到的场景画出来贴在墙壁上。

正祖生于1752年九月二十二日。实际上他并不是长子。在他出生前两年，思悼世子与惠庆宫已经育有懿昭世孙，但懿昭世孙未过两岁就夭折了。所幸懿昭世孙夭折时，惠庆宫腹中已怀有正祖。惠庆宫这样描述幼儿期的正祖：

周岁时能识字，夙进异于凡儿。三岁定辅养官，四岁学《孝经》，少无幼冲之事，好学无教之之劳。如长者然早梳洗，持书而游戏，非常之事异于凡儿。（《恨中录》，第200页）

正祖很聪明，这不仅仅是“爱子女而蒙蔽双眼的母亲”的判断。不断嘲弄、叱责思悼世子的英祖也对正祖赞不绝口。1759年英祖称赞年仅八岁的正祖：“年妙夙成，俯伏节措，莫不中度，可谓神异矣。”（《英祖实录》，1759年闰六月二十二日）另外，在思悼世子被关入木柜的1762年三月二十九日（《英祖实录》与《承政院日记》），英祖问了十一岁的正祖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许是正祖回答得过于出色，英祖说：“无忘壬午三月二十九日为可矣。”甚至下令把

当日的问答内容编成书，传于后世。在次月的会讲中，英祖与年幼的孙子就国家管理问题进行了如下问答：

上谓世孙曰：……朝鲜异于齐楚，统三韩而为一，脱有疆域有事，则守其本之外无他道矣。太王之去邠，昭烈之率民，虽有轻重，其仁心则一也。予必欲守城，舍我赤子而更往何处？曾见《南汉日记》，下城时百姓呼号曰：吾君何以弃我？每读此句，不觉流涕。今虽有金城汤池，不可往矣。上曰：尧之授舜，舜之授禹，即精一心法也，无他道矣。行仁义，则精一在此矣。予得于古书者如此，故乃有今日之教矣。夏禹以干戚，能格有苗，此乃圣诚感天而然矣。自古帝王之统一。与我国无异，如有不虞，守乎？否乎？世孙曰：守国可矣。上笑曰：守社者何意耶？世孙曰：不可弃而然矣。上曰：社稷之设，为君乎？为民乎？世孙曰：有君，而亦有朝鲜矣。上曰：其对好矣，而犹有未畅焉。其本为民而设也。

.....

上曰：天之所以立君，何也？世孙曰：非欲食民之力，欲存吾民也。上曰：何以则存民乎？世孙曰：行仁义，则可存矣。上曰：何以则行仁乎？行之难乎？易乎？他日汝能久而能思今日之言乎？其于饮食之节亦有欲焉。汝能刚克乎？世孙曰：非仁义之饮食，不可矣。上曰：何者不可食乎？世孙曰：不多不少，乃仁义之道也。（《承政院日记》，1762年四月二十五日）

正祖回答得十分出色，不像是十一岁的孩童。英祖要求为百姓而守国，正祖称须“不多不少”，即持中庸之道，以仁慈公正的道路引导百姓。英祖称赞了这样的正祖，还高度评价了教导正祖的讲书院官员们的工作。他特别称赞谕善朴圣源，并向正祖发问道：“汝之学问乃朴圣源之力也。……汝他日能爱朴圣源乎？”在《恨中录》中，惠庆宫对朴圣源的称呼也与其他大臣不同，唯独尊称朴圣源为“故谕善朴圣源”。

英祖为聪明的孙子感到自豪，经常把外面的孩子们召到宫里，让他们与孙子较量。他又召在汉阳的学校里教导孩子们的童蒙教官及其

学生，以及成均馆儒生至世孙面前，让他们与世孙就经典展开问答。

（《英祖实录》与《承政院日记》，1762年九月二十三日）某天英祖对正祖的聪明感到非常满意，他说：“以予此气，如此酬应，此唐玄宗吾瘦天下肥之意也。”英祖相信正祖会成为“肥天下”的贤君。

（《承政院日记》，1765年五月二十五日）

帝王家父子间

若要家道兴，子须胜父。因此祖父或父亲总是希望儿子胜过自身，孙子胜过儿子。这是普通人的心思。但王室却不同，因为父亲和儿子会围绕权力展开竞争。正祖出生时，思悼世子已经失去了英祖的青睐。幸好孙子令祖父心满意足。

英祖很满意正祖，也非常疼爱他。正祖不仅学习认真，而且懂得聪明地回答提问，所做之事情都很出色。英祖经常把正祖带在身边，然后在臣子面前动辄担心世子。担心之余，他往往说一些为了宗庙和社稷，将重托国家于世孙之类的话。世子还健康地活着，而且代理听政，负责部分国政，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祖居然说要把国家托付给孙子。思悼世子不得不对这样的发言做出敏感反应。

思悼世子对父王的动态和意图感到好奇，想了解英祖在经筵上说的话。他让人抄录了史官撰写的《承政院日记》的草本。这又变成一个问题。如果世子了解英祖的意图，可能会惹出大事。正如惠庆宫所说：“帝王家父子间，自古为难，况于病中乎？”（《恨中录》，第98页）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因此惠庆宫特别拜托内官在抄写史官记录时，删去英祖称赞正祖的部分。她有时亲自指出需要删掉的部分，有时拜托担任政丞的父亲洪凤汉，让他在外面提前删掉相关部分，即伪造文书。即使处理得如此周到缜密，思悼世子也不可能不察觉其端倪。他在去世前一年与惠庆宫有如下的交谈：

其日谓吾曰：意必无无事之理，何为？吾郁郁对之曰：闷矣，岂有如许之事？小朝曰：岂或然哉？贵爱世孙，既有世孙，吾之不在，有何关系于世孙乎？吾答曰：世孙乃抹楼下之子，父子间福祸同之，

有何虑乎？小朝曰：汝思之不及也。疾之已甚，生路渐难，若废吾而以世孙为孝章世子之养子，当以为如何？（《恨中录》，第107页）

思悼世子虽未明确表露出来，但他深知因为儿子正祖，自己的立足之地更为缩小。他在临死前对前来贺寿的子女们说：“不知父母者，岂知子息乎？”并大声斥退他们。正祖从小就不得不在严格的祖父与走向疯狂的父亲间如履薄冰。

第二十九讲 少年正祖

离开母亲的怀抱

正祖年仅十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见到了成为罪人，向国王乞求原谅的父亲的最后样子。如何忘记那天的冲击和恐惧呢？正祖突然成了大逆不道罪人的儿子，不知道愤怒的祖父会将事态导向何方。英祖没有其他的选择，不大可能处罚思悼世子的妻儿，但愤怒的火花有可能溅到任何地方。

幸好正祖没有出现问题。宣禧宫与惠庆宫曾担心英祖会伤害孙子，但英祖并没有这样做。父亲的葬礼一结束，正祖就成了东宫，即被定为下一任国王。正祖成为东宫后，与之相关的机构名称也全部变更。讲书院即春坊，被改为侍讲院；卫从司即桂坊，被改为翊卫司。

（《英祖实录》，1762年八月初一日）就是在这个月，英祖在思悼世子去世后第一次与惠庆宫见面。

母子保全，皆圣恩也，泣涕而奏之。英庙执手而泣曰：不及思汝能若此，吾之见汝之心，难矣。令吾心舒之，嘉哉！听此下教，吾之心益塞，命顽甚矣。吾因而奏之曰：望率世孙于庆熙宫而教诲之。英庙曰：汝能耐相离以过乎？吾垂泪而奏之曰：别而惆怅乃小事，侍上而学乃大事也。（《恨中录》，第144—145页）

有些人无法理解思悼世子死后惠庆宫的处事方式，为何丈夫都死了也不抵抗。这不是当时人而是现代人说的话。这是在问后来娘家遭到攻击时绝食的惠庆宫为何在丈夫去世时没有抵抗呢？当时惠庆宫并非处于可以抵抗的境地。她是大逆罪人的夫人，需要一起受罚。自己须跟儿子一起等待惩罚，为丈夫而抵抗不符合情理。朝鲜王朝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将大逆罪人与其家人的命运分开考虑的社会，那是连坐制这种法律形式存在的时代。假设她反抗了，又能说些什么呢？即便不是关入木柜而死，英祖也必须处罚思悼世子，这是连他的生母宣禧宫都已经同意的事情。

因此惠庆宫见到英祖后首先表示感谢。她的意思是感谢他赦免本应诛杀的罪人的妻儿。如果只剩下惠庆宫一人，那么她表达感谢是不恰当的。世子丈夫死了，不能说自己将独活。如果是她自身一人，就应该说“请赐一死”。但惠庆宫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任国王的儿子。考虑到宗庙与社稷，她不能请求赐死。

英祖因儿媳的话语而哽咽，因为他自己的心情也很沉重。他无奈之下处死了儿子，把儿媳变成了寡妇，把孙子变成了无父之子，心理上不可能没有负担。此时惠庆宫一提到圣恩，英祖就非常感动。他称赞了让自己心情舒畅的儿媳，并赐名惠庆宫居住之屋为“嘉孝堂”，意思是美好的孝性。

惠庆宫认为思悼世子被英祖厌恶的根本原因是父亲与儿子相距甚远，即父子分开居住，两人因不能经常见面而关系疏远。所以为了让儿子正祖不与国王产生距离，她请求英祖带走正祖。当时英祖住在西大门附近的庆熙宫，惠庆宫住在东大门附近的昌庆宫。她请求祖父把孙子带走，好好实施国王教育。她认为在失去丈夫、独自一人的情况下，如果连儿子也送走，会更加孤独与凄凉，但应克服这种私情。

送正祖“留学”的惠庆宫的方法，从结果来看取得了一半的成功。留在英祖身边的正祖缩短了与国王的距离，顺利登上了王位，但反过来与母亲的距离变远了。如果说思悼世子与父王相距甚远，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那么可以说正祖与母亲相距甚远，最后他攻击了外祖家。从正祖即位后打击外祖家来看，他对外祖家并没有深厚的感情。我们可以说送正祖去“留学”的惠庆宫的计谋对正祖而言是成功的，但对她自己而言则是失败的。

如母之和缓翁主

来到庆熙宫的正祖在祖母宣禧宫与姑姑和缓翁主的保护下专心学习。宣禧宫在余生的最后两年只为保护孙子而活。正祖也非常顺从母亲与祖母的期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努力学习。

1764年二月，他们再次遭遇晴天霹雳。英祖下令把正祖的父亲由思悼世子变更为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孝章世子。如果想把正祖送上王座，就不能让因谋逆罪而死的思悼世子继续担任他的父亲，不能让罪人之子成为一国之君。因此英祖变更了正祖的父亲，改变了王统。这一命令让正祖再次失去了父亲。上次失去的是父亲的身体，这次失去的是父子关系。当时正祖正为父亲思悼世子守三年丧，失去了父子关系后就不能守丧了。惠庆宫回忆当时正祖的反应：“脱丧服之时，哭泣之声，彻天极地，有加于初丧时天地晦塞之悲。”（《恨中录》，第148页）

该年七月宣禧宫去世了，儿子的三年丧一结束她就撒手人寰。正祖居住的庆熙宫中，现在能信任并依靠的人只剩下姑姑和缓翁主了。惠庆宫嘱咐和缓翁主：“毋违圣心。”又嘱咐正祖：“厚待姑母，事之如我。”于是和缓翁主成了正祖的保护人。

和缓翁主是英祖与宣禧宫的女儿。她是后宫之女，所以不能被称为公主，只能被称为翁主。和缓翁主深受英祖宠爱。她的丈夫郑致达与英祖的夫人贞圣王后在同一天去世，英祖觉得自己寂寞，女儿也可怜，于是更加偏爱和缓翁主。《英祖实录》（1754年正月初七日）曾记载：“主于诸王姬中，最为上钟爱，性且妖慧。朝士之无耻躁竞者，莫不暗通声气于羽良及其弟翠良。”《颐斋乱稿》亦称：“三相六乡方伯，多出其门。”

正祖登极后，和缓翁主因妨碍正祖登极获罪，被贬称为郑妻，即郑某的夫人。惠庆宫说：“到今时移事变，其所为人，判作前后二人。其人虽凶恶而遭谴，予岂不为直言乎？”她又说，和缓翁主刚开始还不错，丈夫与母亲宣禧宫先后去世后，婆家与娘家都不再有可以教导并牵制她的人，于是她变得放肆与奇怪。惠庆宫比任何人都讨厌和缓翁主，她在需要把和缓翁主与其他翁主并列叙述时，也不称“和缓翁主”，而是称“戊午生翁主即今所谓郑妻者”。也就是说，惠庆宫仅厌恶和缓翁主一人，不愿称她为“和缓翁主”，而以她出生在戊午年（1738年）称其为“戊午生翁主”。

和缓翁主被惠庆宫憎恶，后来还惹上妨碍正祖登极的嫌疑，原因在于和缓翁主成为正祖的保护者后，慢慢流露出与生俱来的嫉妒心。惠庆宫对和缓翁主的看法是“大抵其为性也，妇女中好胜多猜，偏嗜用权，自是有别之人”。她认为和缓翁主为了独揽英祖与世孙正祖的宠爱与眷爱，不仅排挤英祖信任的内人，而且表现得像是正祖的母亲一样，乃至排挤惠庆宫这个真正的正祖之母。另外，和缓翁主担心正祖与世孙嫔过于亲密，以离间计与诽谤将两人的夫妻关系挑拨得势如水火，而且让正祖都不敢亲近宫女。甚至正祖为重新编辑《宋史》而制作新书时，若在外面停留稍久，她就会嫉妒这本书。（《恨中录》，第355页）和缓翁主出身高贵，但最终只能是翁主，于是她嫉妒惠庆宫虽然出生于私邸，却因生下好儿子，可以登上国王之母的最高位。不仅如此，她还说养子郑厚谦的资质不亚于正祖。但自己的儿子不能成为国王，而嫂子的儿子可以掌握最高权力，她十分嫉妒。

和缓翁主既然接受了拜托，就应该爱护并照顾正祖，并劝自己比正祖大三岁的儿子好好辅佐正祖。但由于嫉妒与猜忌之心，她经常与正祖对抗。对于和缓翁主来说，正祖一直是个好欺负的孩子，因为她看着正祖长大，但她没想到正祖一下子长成了“小国王”。翁主总是与绝对掌权人顶嘴，反驳并训导他，这就是挑战，最终或与谋逆连接在一起。郑厚谦也跟随母亲轻视正祖，不知不觉走上了谋逆之路。他们怠慢作为侄子或弟弟的正祖，做梦也没想到这会被视为对绝对权力的挑战。对于绝对掌权人来说，再微小的反驳也会被看作巨大的谋逆。

第三十讲 少年国王的逸脱

国王的妓生游戏

不知不觉间，正祖成长为一名血气旺盛的健壮青年。对于正祖这样的模范生，彷徨与逸脱也如期而至。英祖说：“世孙绝无一毫走作意。禁苑花发，非从予，未尝一往游赏，日静坐读书。此岂勉强可为？即其天性然也。”（《正祖实录》附录续编《正祖迁陵志文》）但这样的正祖也是无可奈何的。

1766年正祖的妹妹清璿郡主与郑在和成婚。妹夫郑在和比正祖小两岁，容貌与举止都很不错。郑在和担任了经常由驸马出任的，负责护卫宫城的五卫都总府的总管，因此经常出入宫廷，与正祖关系密切。与此同时，他引导在沉闷宫廷里只会学习的正祖走上了游乐之路。下一任国王与妹夫一道，以叱咤汉阳花柳界的别监们为前导，陷入了“妓生游戏”。这是正祖十八岁时发生的事情。

国王青年时的逸脱行为几乎没有留下记录。《恨中录》比较详细地提到这件事，而《承政院日记》或《明义录》等官方记录只留有痕迹。惠庆宫为何记录已经成为国王的儿子的逸脱行为呢？因为她认为这是自己的娘家被正祖攻击的起因。惠庆宫称，从该事件开始，正祖就背弃了外祖家，并称这是“吾家祸之根柢”。这究竟是什么事，导致正祖因此冷落了外祖家呢？

首先来听《恨中录》的说法。正祖的逸脱是和缓翁主先察觉的，当时和缓翁主在照顾正祖。和缓翁主请求惠庆宫处罚将正祖带离正轨的别监，又恐吓道，思悼世子也是与别监们一道陷入妓生游戏，如果放任此事不管，壬午祸变会再次发生。这是无法上告英祖之事，只能告知惠庆宫的父亲洪凤汉，让他处理。惠庆宫请父亲解决该事，洪凤汉犹豫了。因为如果轻率阻止东宫的行动，说不定将来会遭殃。惠庆宫采取了非常手段。她绝食了三四天，表示若不听从，她会先正祖一步而死。对此，洪凤汉一边说“任他死生祸福”，一边与正祖的岳父

——判书金时默商议，让刑曹参判赵荣顺出面流放领头的别监。赵荣顺起初拒绝，后来改口道：“帝王家与凡有异，将来此事有必大之虑。而大监以为国苦心，不计他日祸福而决之，令人钦感云。”于是抓捕了别监，没经审讯就送去流放。之后洪凤汉在见到正祖时称“误了兴恩之别监，不得不治罪云”，暗示他应该停止与妓生游玩。正祖对外祖的行为感到十分不快。他怒不可遏，认为其竟然胆敢剪掉东宫的手足。

正祖震怒于外祖行为的传闻很快传到了外面，说是东宫憎恶外祖家。此后不久，反对派们开始了针对惠庆宫娘家的攻击。洪氏家族向反对派显露了垄断权力的缝隙。对洪家的攻击始于清州乡曲士人韩。1770年三月，韩以洪凤汉不忠为由，上疏请斩洪凤汉。针对不了解汉阳政界氛围的乡曲士人上疏一事，惠庆宫怀疑幕后有人操纵，并认为背后的操纵方是英祖继妃贞纯王后的娘家。此后对洪家的攻击之言发展为洪家受到正祖的憎恶后，决定放弃正祖，让思悼世子的庶子——正祖的同父异母弟恩彦君与恩信君成为国王。惠庆宫说这是无稽之谈，但1772年二月英祖怀疑洪凤汉的意图，下达了宫城护卫令。

持续的攻击导致洪家失去了英祖的宠爱，最终下台。到了这个地步，惠庆宫开始担心娘家的安危。在娘家陷入危机后，惠庆宫不仅绝食，还故意从高处跳下，向英祖强烈地表达娘家之冤。惠庆宫的抵抗消减了英祖的决心。另外，惠庆宫为了让娘家度过危机，联合了可以让英祖回心转意的势力，其主轴就是和缓翁主。她试图把垄断英祖宠爱的和缓翁主变成自己人，从而保障娘家的安全。在联合和缓翁主的第一线，惠庆宫的弟弟洪乐任站了出来。他与和缓翁主的养子郑厚谦在同一年科举考试及第，因此有一种同年意识。洪家与郑厚谦联手，多少可以让家族安全一些。但这才是更大的祸根。随着郑厚谦让东宫正祖感到不快，洪家也与郑厚谦一起成了妨碍正祖登极的势力。这一切的起因都在于正祖的妓生游戏。

谁阻吾路？

新政权经常进行大换血，正祖也在登极初期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肃清。因为这是发生在1776年丙申年的事情，所以被称为“丙申处

分”。他剥夺了早已不在人世的权臣金尚鲁与洪启禧的名誉与职位，追究了深受英祖宠爱的后宫文女等人牵涉思悼世子之死的责任。另外，他称贞纯王后的兄长金龟柱傲慢放肆，将其流放黑山岛，又以妨碍登极为由赐死叔外祖洪麟汉与和缓翁主的养子郑厚谦。1777年，洪启禧后人等主导的谋逆事件被揭发出来，从此英祖时期的权势家陷入了无法东山再起的状态。像这样，正祖在即位一年后推翻了此前所有的既得利益层，构建了以洪国荣等东宫宫僚为中心的亲政体制。

那么明知道正祖会成为下任国王，为何权势人物还要对抗东宫呢？《明义录》是详细记录正祖即位后的肃清过程并将此公之于众的书。下面将以此书为中心，来审视权势人物妨碍登极的嫌疑。《明义录》最重要的部分是《尊贤阁日记》。尊贤阁是东宫正祖在庆熙宫的住所，也是正祖在即位翌年移御昌德宫之前的所住之地。《尊贤阁日记》是正祖在即位前一年（1775年）至即位翌年（1777年）间写下的日记。正祖将每日写下的简短记录编辑成该书，主要内容是和缓翁主、郑厚谦、洪麟汉一党对他的无礼行为。历史书上一般说他们似乎是为阻止正祖登极而用尽一切方法攻击正祖，但在《尊贤阁日记》中，只留有他们为得到正祖的眷爱而“纠缠”的样子。他们要求正祖不要只眷爱宫僚洪国荣、郑民始等人，要珍惜既是王室姻戚，又能真正成为肱股之臣的自己。正祖一直冷漠地对待他们，他们的诉求被正祖视为不忠乃至谋逆。

当然，正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肃清行动是政治性的。他很清楚这并不是真正的逆贼肃清，而是担心他们会妨碍自己行使绝对权力才采取的措施。如果他们是像李适与李麟佐一样发动叛乱的逆贼，那么以后也难再复权了。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正祖统治末期被正祖复权。首先是赵荣顺。

1769年负责处罚别监的赵荣顺在正祖即位后，受儿子赵贞喆的谋逆事件牵连而遭处罚，被追夺官爵。当时正祖说：“荣顺曾于秋曹开座时对刑推罪人，有某年复出之说。渠若有一分严畏储君之心，何敢乃尔？”（《承政院日记》，1777年八月十六日与十七日）《恨中录》称“某年复出之说”是和缓翁主所说。赵荣顺似乎将这句话告知

他人。在处理别监事件时，赵荣顺的若这些人引导正祖走上歧途，他落得思悼世子一样的结局该怎么办的发言等被认为是对正祖的攻击。

正祖在去世当年的1800年二月，以了解当时所有情况为由赦免了赵荣顺之罪，即作为逆贼而名登《明义录》的赵荣顺不再是逆贼。赦免赵荣顺是替正祖初年被斥为逆贼之人申冤的信号弹。察觉到这一点的老论派僻派的先锋沈焕之站出来反对正祖的决定。他反驳道：“荣顺之凶言，既出于清原之所传，则清原亦岂无所闻而言之乎？且其刑配掖隶之时，已有摇动储位之意。其情迹可谓尽露无余矣。”但正祖依然否定了自己立下的《明义录》之义理，赦免了赵荣顺之罪。

（《承政院日记》，1800年二月初八日）制造逆贼的是正祖，赦免逆贼的也是正祖。正祖统治初年的肃清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性的。

第三十一讲 “三不必知”与阻碍登极

东宫不必知

以阻碍正祖登极而被处决的代表性逆贼是洪麟汉与郑厚谦。洪麟汉是惠庆宫的叔父，郑厚谦是和缓翁主的养子。正祖即位四个月后，他们在同日被赐死。他们并未向正祖显露杀意，就被当作逆贼处死。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来看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即所谓的“三不必知”。

这是英祖去世前几个月，也就是1775年冬天发生的事情。八十二岁高龄的英祖病势沉笃。他痰症严重，经常昏迷并说胡话，“或有猝出大庭试令，或有无事而出陈贺之令，或有以肃庙朝宰臣金镇龟除授药院提举之命”。英祖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执掌国政，所以想把国政交给东宫。但洪麟汉等人极力阻止英祖传下东宫代理听政之令。这是“三不必知”事件的核心。

据记录洪麟汉、郑厚谦等人成为逆贼经过的《明义录》所言，当时英祖的病愈发严重，但洪麟汉等人以为只要熬过冬天，病势会有好转，所以阻止将国政交给东宫。最终在1775年十一月二十日，英祖表示要将国政交给东宫，并有如下发言：

上曰：神气益，虽一张公事，诚难酬应。如此而为万几乎？言念国事，夜不能寝者久矣。冲子知老论乎？知少论乎？知南人乎？知少北乎？知国事乎？知朝事乎？知兵判谁可为，吏判谁可为乎？如此而置宗社于何地？予欲使冲子为之，予欲见之矣。昔我皇兄，有世弟可乎，左右可乎之教。今时比皇兄时，尤不啻百倍矣。欲为二字下教而恐伤冲子之心，故泯默。而至于听政等事，自有国朝故事，卿等之意何如？麟汉曰：东宫不必知老论、少论，不必知吏判、兵判，尤不必知朝事矣。诸大臣曰：圣候益胜矣。上曰：予意如此，卿等不知，诚慨然矣。欲授心法于冲子，《自省编》《警世问答》即予之事业也。

（《英祖实录》，1775年十一月二十日）

英祖的主张是，自身体衰，难以顾及国政，来日无多，但东宫并没有做好处理国政的准备，因此应该尽快让他代理听政学习处理国政。然而洪麟汉等人觉得尽管目前国王身体违和，但还没有到把国政传给世孙的程度，而且病势会有好转，于是请求他收回代理听政的命令。因此洪麟汉称东宫没有必要知道国王所说的三件事，即“三不必知”。

原本国王下令“传位”或“代理听政”，大臣们就不能立刻接受。对下属来说，绝对掌权人谈论自己权力的向背是最危险的时刻，加上此时还有继承人，就更加难以处理了。那天就是这样的场合。如果立刻接受命令，想要移交权力的人可能会感到遗憾，如果不接受，继承人可能会感到不快。在听到这样的命令时，一般正确答案是劝阻权力移交。

惠庆宫称国王与臣子会面的一般场合上，以上对话不会像《英祖实录》记录的那样进行，即英祖不是集中进行提问，而是一个一个地抛出问题。也就是说，英祖问：“东宫知老论、少论乎？”洪麟汉回答：“不必知。”稍微休息了一会儿，英祖又问：“东宫知吏判、兵判乎？”洪麟汉回答：“不必知。”然后又休息了一会儿，英祖最后问：“东宫知朝事乎？”洪麟汉又回答：“不必知。”国王与大臣的对话通常如此进行，特别是考虑到老年重病患者英祖的病势，这种可能性很高。惠庆宫称，如果在英祖问东宫是否知老少论时回答知道，那么英祖会认为自己这么强调荡平，东宫竟然违反荡平，所以更不能这样回答。与其说洪麟汉是想阻止正祖的代理听政，不如说是只能这样回答。

对此，主张洪麟汉有罪的《明义录》称：“朝诊麟汉以三不必知之说仰对矣，惠庆宫闻之，以小纸具道，必欲分劳之圣意，缕缕勸慰之下教，通于麟汉。而及至夕筵，其所奏对，又如朝诊。”这是问题所在。虽然早晨的事情可以看作是惯行的权宜之计，但到了傍晚，洪麟汉明知英祖之意，却做出了与早晨一样的回答，这分明有妨碍正祖代理听政的意图。

但寄信的真正当事人惠庆宫在《恨中录》中表示，那天并未给叔父寄过这样的信。她说虽然知道英祖想让正祖代理听政的意图，但即便正祖那天不接受代理听政，她也会说“当何处去之，岂必如是？”并不会告诉洪麟汉“阙内之事势与世孙之睿意”。现在无法断定这是惠庆宫寄信后说谎，还是她捏造了正祖未参与的事实，或是彼此之间有什么误会。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洪麟汉试图阻止代理听政的事实本身很难令人理解。国王几乎就在死亡的边缘，而二十多岁的英明健壮的继承人作为东宫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洪麟汉既然不是傻子，就不应该与继承人唱反调。

当时劝阻代理听政的并非只有洪麟汉一人。英祖主张代理听政，并担心左右之人代替自己处理事务时出现失误，领议政韩翼馨回答：“左右不足忧。”即没有必要因担心左右之人的失误而进行代理听政。韩翼馨也因此受到处罚，但不到一年就解除流放，在正祖执政之初就已复权。但洪麟汉因同样的罪名不但被处死，而且复权也用了近百年时间。洪麟汉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臣服于绝对权力

《明义录》将洪麟汉、郑厚谦一党试图铲除正祖的心腹洪国荣与郑民始等人的举动记为重要罪行。（《尊贤阁日记》，1775年七月初十日）如果他们真的想斩断东宫的手足，可以说这是重大的谋逆之举。但翻阅《恨中录》可知，洪麟汉反而按正祖之意，努力让洪国荣留在正祖身边。1775年冬，英祖想派洪国荣赴济州岛担任监督饥荒救济工作的御史，洪麟汉受东宫正祖之托，让其他人代洪国荣而去。如果洪麟汉真有剪除洪国荣之心，那应该抓住这个好机会派他去济州岛，何必要阻拦呢？《承政院日记》1775年闰十月二十六日条中的相关记录如下：

上曰：耽罗，为国甚重，今番予欲送督运御史，儒臣中谁可合者？翼馨曰：安大济好矣。其弟今为湖南伯，尤好矣。上曰：洪国荣、柳炯，予思之，似可合矣。麟汉曰：洪国荣，他日则何处不可用？而年少未经事，恐不合于今日之用矣。上曰：柳炯，何如？麟汉曰：好矣。

阅读以上问答，可知洪麟汉正像惠庆宫所说的那样，试图阻止英祖派洪国荣赴济州岛。当然，仅凭这一件事情很难做出判断，按《明义录》的记录，该时期洪麟汉一党为剪除洪国荣而煞费苦心，也出现过与引文不同的事件。但从此次事件来看，洪麟汉不一定就像《明义录》中强调的那样，试图与正祖对抗。

正祖在登极后首次把洪麟汉流放砺山之时，曾袒护洪麟汉道：“今日诸臣之曰有逆情，曰有异志者，此则是情外之言也。”然而几个月后，正祖把洪麟汉围篱安置在全罗南道古今岛随后赐死他时，明确表示洪麟汉是逆贼。虽然没有新查明的事实，但仅数月后，判决就完全改变了。正祖处死洪麟汉后过了近十五年，他在开始逐步洗脱外祖家之罪时说：“不必知三字，便同莫须有等。”（《正祖实录》，1792年闰四月二十七日）“莫须有”即不能说一定有之意。在无根据地诋毁对方时说“虽然不能说一定有，但也有可能”，这种说法是“没有就算了”式的找出对方失误的句式。“莫须有”是毫无根据的代表性诬告，“三不必知”亦是如此。也就是说洪麟汉无辜地被扣上罪名。正祖还说：“麟汉之罪，正与复（指具善复）贼一般。虽欲言之，某年某月事，予岂忍言乎？”虽然正祖说洪麟汉像具善复一样在与思悼世子之死相关的事情上有罪，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其罪行。就这样，正祖洗脱了洪麟汉之前的全部罪名，但又给他扣上了新的罪名。正祖向惠庆宫这样解释情况：

其时筵说，为“莫须有”之言。又曰：而丙申三不必知，不可为罪。实则以某年事，有此处分，至对我亦言“欲伸三不必知之罪，从今归之，以某年则以脱罪至易，甚幸”云云。余不胜惊讶曰：丙申事，已极冤痛，而某年事，尤是千万不当之事，岂有如此之言乎？先王以为：若以某年罪案，牒列以如许如许，则固难矣。既无历举罪名，则后世谁知其罪也？今番稍解丙申之罪，甲子当解某年之罪。故今姑移送于某年罪案，以待甲子之大赦。（《恨中录》，第382—383页）

正祖将洪麟汉的罪名归咎于他处的发言让惠庆宫大吃一惊。重新冠上模糊不清的罪名，以后可能会成为更大的麻烦。洪麟汉已经受到

了这样的批判，即他在思悼世子被困木柜的当天，还与其他官员在汉江张帆游玩。在这种情况下，添加新嫌疑不是摘掉赘瘤，而是增加赘瘤。

洪麟汉是正祖的逆贼。他以逆贼身份而死，但正祖却三次改变判断，此事令人惊讶。第一次是流放罪人，第二次是处死罪人，最后一次是无罪，最终还改变了罪名。现代人的看法是，如果说是逆贼，就应该有策划了什么谋逆或发动了军事政变等显露于外的明显的叛逆行迹。但在朝鲜时代，像洪麟汉那样没有明显的叛逆行迹的人也可以成为逆贼。当时的逆贼是冒犯了绝对掌权人的人，即触碰了龙的逆鳞。

从当时的记录——成大中的《青城杂记》来看，洪麟汉在担任全罗道观察使期间，让妓生们在宴会上演奏音乐，结束时一定会故意找妓生的失误再杖打她们，看到妓生流血他才感到痛快。这样的故事流传开来，不知道是因洪麟汉被打上逆贼的烙印，还是他的品性真的那么暴戾，因为据传大部分“逆贼”都是这样的品性。为洪麟汉辩护的惠庆宫也认为他性格不佳，他过于敏感且能敏锐地捕捉权力的变动。

惠庆宫为何对叔父的品性持否定评价呢？即使有想法，但非要写下来的理由又是什么？正如正祖指出的那样，洪麟汉家族与惠庆宫的娘家——洪凤汉家族的关系并不好。洪麟汉起初追随兄长洪凤汉，但洪凤汉失势后，他公开宣称自己是洪凤汉的同父异母弟，彼此的政治倾向不同。（《明义录》）坊间也将洪氏兄弟分别视为大洪与小洪。

（《颐斋乱稿》）我认为正因如此，惠庆宫才在《恨中录》中指出了叔父的性格缺陷。当然，这也是为“三不必知”辩护所需。对权力变动如此敏感的人阻止下任权力者的进入，这根本说不过去。惠庆宫虽然厌恶洪麟汉，但因为是一家人，只能这样评价叔父并为其辩护。

把洪麟汉看成傲慢暴戾之人，那就大致可以推测出他如何冒犯正祖的。正祖说：“吾自对人接物，以至衣襟之伤，皆是效则于罪相。”（《恨中录》，第384页）洪麟汉教导了孙子辈的正祖。既然教导正祖，他有时会在正祖面前展露傲慢。他在教导长大成人的东宫时，如果东宫不听话，他也会提出逆耳的建议与忠告。忠告一旦失去信任就会成为指责，对绝对掌权人的指责就是对抗，就是谋逆。可以

这样理解《明义录》中记述的洪麟汉的谋逆之举。机警的洪麟汉也没能计算到这一点。如果被权力蒙蔽双眼，再机灵的人也会误判。

第三十二讲 洗草相关记录

消除记忆

1776年二月初四日，东宫正祖向英祖上疏。这是距离八十三岁的英祖去世刚好还差一个月时发生的事情，也是正祖代替英祖处理国政还不满两个月的时间点。正祖在上疏中请求洗草与父亲思悼世子恶行相关的《承政院日记》记录，即用水洗去相关内容。正祖一接手国政，就试图删除与父亲相关的记录，他选择抹去历史作为迈向执政的第一步。英祖接受了孙子的恳求，并认为此意难能可贵，乃至亲自写下“孝孙”的字样。

正祖惋惜于父亲思悼世子之死，加上父亲是获罪于祖父而死就更加如此。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去世的父亲，而是自己。父亲是罪人已是过去之事而无可奈何，但自己成为罪人之子，就很难主张作为国王的正当性和正统性。英祖早有预料，于是在宗统上把正祖由思悼世子之子改为孝章世子之子，但他的生父并没有因此改变。再怎么否认继统，世人也都知道他是思悼世子的儿子。

英祖曾下严令禁止谈及与思悼世子相关的事情，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的正祖居然上疏，请求删除有关思悼世子的记录。该上疏可能令正祖陷入危险，这不但触及了英祖严禁提及的问题，而且也可能被认为是对其处分的处分不满。换句话说，孙子试图抹去英祖都没有删除的记录。

从《英祖实录》来看，上疏过程与后续措施似乎都进展顺利，但只要是了解壬午祸变经过的人，都会料到这个过程中的麻烦。实际上正祖在上疏之前，已经从多个角度进行事前探问。他上疏之前先向多人征求意见，特别是与可能提出反对的人协调了意见，并打探了英祖的心思，做好万全准备后才呈上上疏。

《迎春玉音记》《恨中录》《金公可庵遗事》（收入《公车指南》，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品）等记录的上疏前后事如下。《迎春玉音

记》是正祖的亲家金祖淳记下的正祖在去世之月于住所召见自己并密谈的内容。该书称正祖在上疏前派心腹洪国荣去寻求金龟柱的协助，劝说对方一起努力让英祖写下思悼世子平时有病而最终死亡的话，即思悼世子并不是因罪而死，而是因病才如此。听到这句话后，金龟柱拿出了朝鲜的法典《续大典》，其中有“癫狂失性而杀人者，减死定配”的语句。简而言之，朝鲜存在不对狂易之人执行死刑的法律条款。思悼世子“有病”（即发疯），说明英祖违反了法律条款，误杀了人。也就是说，金龟柱出于不能将英祖的处分归于错误的考虑，拿出了《续大典》。但如果再进一步，这就等于说思悼世子真的有罪。洪国荣将金龟柱的行为告知正祖，正祖非常愤怒。

《恨中录》也提到此事，事情经过基本与《迎春玉音记》相同，但称正祖派去的不是洪国荣而是郑民始。这里提到洗草《承政院日记》中思悼世子相关部分的计划时，金龟柱拿出的是《大明律》。

《金公可庵遗事》也称正祖派去的人是洪国荣，而“狂易毋诛”实际上不是《大明律》而是《续大典》中的条款，由此观之，《恨中录》在细节上似乎存在一些错误。

而在据推断是金龟柱的后人所写的，记录金龟柱一生的《金公可庵遗事》中，事情的发展略有不同。正祖首先召见了贞纯王后的叔父金汉耆，请他站出来建议删除与思悼世子相关的记录。金汉耆将从正祖那里听来的话转给侄子金龟柱，金龟柱的建议是正祖直接向英祖请求为妥。金汉耆再将这个建议转给洪国荣，洪国荣也觉得不错并表示同意。洪国荣在上疏前一天还带来了正祖的书信，其中拜托金家通过贞纯王后提前透口风给英祖。

从金龟柱方面的记录来看，他们在正祖上疏的过程中似乎帮过他，但冷静阅读的话，就会发现其中不乏让正祖伤心的部分。金家没有欣然接受正祖的建议，而是让正祖冒险亲自上疏。为了上疏正祖必须冒险，但金家却把这件事完全推给了他。正祖清楚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很难进行国政管理，所以亲自站了出来，但我们可以推知，这件事想必令他非常伤心。

上疏的步骤与内容

正祖完成了这些幕后工作后，向英祖呈上了上疏。他在如此周密准备上疏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打动与说服大臣们的步骤。《英祖实录》这样说明了整个过程。上疏当天，正祖参拜完思悼世子的祠堂垂恩庙后，在斋室见到了大臣们。他在大臣们面前哗哗流泪，哽咽到无法自己，最后说出如下的话：

其时处分，余何敢言？而《政院日记》多载不忍闻不忍见之语，传播一世，涂人耳目。今余苟活至今者，已非人理之所堪，而顽若无知者，特以大朝在上，且伊时处分，有不敢议到而然也。顾余罔极之痛，何尝食息间少弛？而今又承大朝之命，猥当听断之任，某年日记，岂忍见之乎？若置此而怡然视之，此岂人子之道乎？方今义理，至于某年事，君臣上下，勿复涂于眼目挂于齿牙可也。至若史草，则藏之名山，传之万世，体段重大，非所可论，而日记与此异焉，其有无无所关系矣。今若存此，余于听政之后，将何颜对百僚乎？余欲谕者多，而掩抑不忍言矣。（《英祖实录》，1776年二月初四日）

正祖首先明确表示，对处分思悼世子说三道四是不对的。但他又说，自己不但痛苦至极，而且现在代理国政，接下来即将成为国王，出入朝廷的大臣们却可以轻易读到记录国王生父恶行的记录，这一事实令人惋惜。他接着说，虽然知道删除记录的行为不具正当性，但反正有编纂历史的基本资料——史草的存在，所以即便删除《承政院日记》中的记录也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历史真相反正会被留在实录中，因此只删除把国王生父写成狂易逆贼的《承政院日记》中的相关部分不也可以吗？

正祖的恳切呼吁让大臣们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演绎完东宫与大臣们的感动场面后，正祖回到庆熙宫的住处，在尊贤阁的前庭里让都承旨朗读上疏，然后将疏文呈给了国王。换句话说，正祖为了让自己能够堂堂正正地处理国政，要求删除《承政院日记》中与思悼世子相关的部分。正祖表达得非常谨慎，但想要传递的内容非常明确。英祖接受了正祖的恳求，传下教旨令承旨与注书在汉阳北门彰义门外的遮日岩洗去相关部分。《英祖实录》虽然把当天正祖的眼泪记载得像突然出现一样，但从上一节披露的前后过程来看，这是准备好的眼泪。

由于历史记录被删除了，思悼世子的恶行罪状的核心内容几乎消失殆尽。《承政院日记》中明示因当时的命令而被删除的部分就超过十处。特别是与思悼世子有关的内容中，简单标明出“传教”，即因传下教旨而删除的部分就有多处。正祖通过周密的准备，抹去了痛苦的记忆与历史，以此应对执政。始于洗草的正祖的歪曲历史的做法，后来发展成巧妙的捏造。他创作了新的《龙飞御天歌》，让父亲思悼世子获得重生。

第三十三讲 执政初期的正祖

呜呼！寡人思悼世子之子也

1776年三月初十日，正祖登上了王位。他是二十五岁的年轻国王，并不是乳臭未干的孩童。他已经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这是由于他在除父亲去世之外，还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又跟随严格的祖父忠实地学习了帝王学。斥退谁、启用谁、与谁保持距离，以及重用谁，他已经全部计算好了。

国王正祖对世界的宣告是“呜呼！寡人思悼世子之子也”。有人将这句话解读为正祖对杀害思悼世子的仇敌们的复仇宣告，但这是把正祖视为政治新手的观点。刚刚登上权力宝座的人先提复仇的话，实在是愚蠢至极。只要是稍微了解政治的人就不会这样说，准备好的政治家正祖当然也是如此。

当天正祖的发言是这样的。我是思悼世子的儿子，但英祖不得已将我的宗统改为来自孝章世子，所以首先要遵从英祖的意愿。但对亲生父母的人情同样重要，所以我也想对思悼世子尽孝。然而如果有人推测我对亲生父母感到惋惜，并提议追崇思悼世子，我将坚决予以惩罚。这就是先大王英祖之意。

正祖表达了作为儿子，在内心深处保留的对父亲的心意。但该发言的主旨是，新国王基本上不会改变英祖的统治基调。正祖为了让因新国王登极而动摇的集团安心，恫吓要坚决严惩试图推翻目前局面的势力。尽管有正祖的强硬发言，但不到一个月，李德师、李一和、柳翰申等人就呈上了称思悼世子冤枉而死的上疏。无论正祖如何说要稳定政局，但世人都不照单全收这句话。于是正祖处死了他们，表明了自己的坚定意志。然而该年八月英祖的葬礼一结束，安东儒生李应元又呈上了类似内容的上疏。正祖这次不仅处死了李应元与其父李道显，还干脆将他们的故乡安东从府降级为县。

正祖在执政初期虽标榜稳定，但在这样的标榜中逐渐肃清了既得利益层。也就是说，正祖在政局不会发生太大动摇的前提下，铲除了给政权带来负担的势力。正祖登极后，任命老论大臣金阳泽为领议政、少论大臣金尚喆为左议政，这都是按照之前的权力构图进行的。然而正祖在保守稳定的基调下，超高速提拔心腹洪国荣，以及与洪国荣同为东宫羽翼的郑民始、徐命善等人。正祖在维持既往局面的同时，在大的框架上逐渐编制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版图。

1777年暗杀正祖未遂事件

正祖将政局变更为以自己为中心的最后契机是所谓的“丁酉逆变”，即1777年丁酉年发生的谋逆事件。这是洪启禧之孙洪相范等人试图推戴思悼世子的庶子恩全君李禕为王的逆谋事件。记录并公开正祖在执政过程中铲除妨碍势力经过的《明义录》的续集——《续明义录》详细记载了此事。

这是1777年七月二十八日晚十一时左右发生的事情。正祖结束政务工作后，在住处后堂看书。正好身边的小内官出去查看护卫们是否做好了警卫工作，正祖身边没有其他人。但突然宝章门东北部的屋顶上传来了脚步声，并向尊贤阁靠近。瓦片破碎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正祖急忙召唤手下之人点灯搜查，结果声音停止了，而屋顶上到处散落着碎瓦。

正祖立即召唤禁卫大将洪国荣，对宫殿进行紧急大规模搜查，但未能抓到犯人。不安的正祖将住处从庆熙宫搬到了昌德宫。在此期间，他罢免了消极抓捕犯人的右捕盗大将李柱国，把工作交给了具善复。正祖要求迅速抓捕犯人。负责人变更后，犯人就落网了。八月九日晚，为暗杀国王而越过昌德宫西侧围墙的犯人被抓获。显然，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狱事。

该事件以展现正祖即位初期政局的危险程度而闻名，在史剧中也出现过多次。但若仔细观察该事件，就会发现漏洞百出。现代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几乎不会有人相信上述的事件说明。刺客们只做了一些与目的无关的奇怪行动，公然在国王住处的屋顶上闹出骚乱已经令

人奇怪，而且失败一次后，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再次尝试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此外，侍从经常随侍在国王身侧，偏偏在左右无人的瞬间发生了事情。追究事件负责人的责任后，立即抓获了犯人，这一点也很可疑。案件的发展似乎没有一处合乎情理，不得不让人怀疑可能是造假。无论正祖亲自指挥还是洪国荣指挥，该事件都是为一网打尽以洪启禧后代为核心的，牵制正祖的势力而策划的。从结果来看，该事件彻底扫灭了正祖的牵制势力，完成了所谓《明义录》的大义。

洪国荣，掌权人之友

英祖时期的权贵们空出的位置被正祖的亲信们占据了。他们是引领并帮助东宫时期正祖的东宫官僚，代表性人物是洪国荣。洪国荣也属于惠庆宫娘家一族，惠庆宫和洪国荣之父洪乐春是十寸的近亲。换句话说，洪国荣可以算是惠庆宫的侄子。洪国荣因才华横溢、相貌出众，深受长辈们的喜爱。据说英祖也很疼爱他，甚至称他是“我孙”。洪国荣仅比正祖大四岁，因此成了正祖的好友。谁也不能轻易向正祖说一句玩笑话，所以洪国荣成了向孤独的东宫讲述世上故事的亲密友人。

正祖即位后，洪国荣一飞冲天。他还不满三十岁，无法成为政丞，但担任了宣惠厅提调与各军营大将，他还组织了护卫宫城的亲卫部队——宿卫所，并兼任大将，把金钱与武力等实权全部掌握在手中。掌握权力后，洪国荣立刻沉醉于其中。他的权欲日益增大，傲慢逐日膨胀。多种资料记载他在宫廷内放肆地与妓生玩耍、对国王肆意妄为等，做出各种目中无人的行动。

洪国荣称霸天下后，依然不知足，甚至想扮演国王外祖家的角色。与英祖一样，正祖与王妃的关系也不好。正祖与王妃之间没有子女，洪国荣认为中殿有无法生育子女的腹病，于是拉拢贞纯王后，让贞纯王后下令挑选后宫。接着洪国荣把自己十三岁的妹妹送入宫中，并为她要到不该用于后宫的名号——“元嫔”，“元嫔”之意是“第一嫔宫”。元嫔入宫不满一年即卒，洪国荣怀疑她的死因。作为大臣，他竟然怀疑王妃，并审问中殿内人等，表现出挑战王权的姿态。另外，他还让恩彦君之子常溪君李湛过继为元嫔的养子，掌管元嫔的祭

祀，并担任守护墓地的代奠官与守园官。这是想把李湛推为东宫而采取的行动。洪国荣将常溪君更名为完丰君，“完”指的是王室李氏的本贯全州，即“完山”，而“丰”指的是洪国荣的本贯丰山。从名号来看，他有把正祖侄子推戴为国王的嫌疑。

洪国荣的这种姿态被认为是对王室的挑战，这导致了他的没落。对掌权人来说，即便有像朋友一样亲近之人，也不存在真正的朋友，更何况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铭记这一点，才能长久地享受权力，但洪国荣没有意识到。1779年九月，洪国荣抛置朝廷内部的争议，辞去了官职。正祖封被赶下台的洪国荣为奉朝贺。他这是把赐给退休老大臣的名誉职位赏给了三十二岁的年轻臣子。洪国荣的待遇是如此独特，因此“黑发奉朝贺”成了洪国荣的别称。洪国荣从汉阳近郊被赶到了江原道横城，之后又被移送江陵。1781年四月初五日，三十四岁的洪国荣在东海海边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白鸥片片莫惊飞，世弃吾将从汝归。

五六春光风景好，花明柳暗拂珠鞿。

这首广为传唱的歌谣据说是洪国荣创作的时调，他在三十出头的年纪意识到了权力的无常。唯一的友人洪国荣也离开了朝廷，正祖成了不受任何干涉的绝对掌权人，只有彻底的孤独才是他的朋友。

第三十四讲 正祖的统治哲学

万川明月主人翁

洪国荣被赶走后，朝鲜终于迎来了正祖的世界，变成了正祖的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正祖实行了暴力独裁。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道德上，正祖都是可以成为臣民模范的圣君。正祖不是大臣们可以提出建议并教导的国王，而是应该听其言、顺其行的老师，即所谓的“君师”。

正祖对学问的关注与热情早已是众所周知。《恨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春秋几近五旬，万机无暇，而每冬必读一帙经传。岁己未冬，又毕《左氏传》。余以志喜之意，效幼时洗册之礼，略具汤饼以进之。”

正祖的孝顺也自不必说。俭素的品性让他“朝夕馔品，不过三四器，亦不许高排”。甚至晚年居住的迎春轩漏雨也没有修理。惠庆宫劝说正祖，虽然俭素很好，但作为国王的话，是不是有些过分。正祖反倒以“崇俭非惜财也，乃惜福之道也”来教导母亲。

这种模范行为的基础是自信。正祖从东宫时期起，就在居处挂上“弘斋”匾额，并以此为号。“弘斋”出自《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句。正祖自幼怀抱的这种远大梦想延续至其晚年的“万川明月主人翁”之号。此号指的是他自己是照亮全世界溪水的明月。正祖写过一篇文章，详细地解释了此号之意，即“月者太极也，太极者吾也，是岂非昔人所以喻之以万川之明月而寓之以太极之神用者耶？”（《万川明月主人翁自序》）在正祖面前，党派、派别、才能、学识等不过都是细枝末节。他说，世人无论怀有怎样的心情与才能，都只在自己照亮他们时才会显露出来。这真是威风凛凛的君王形象。

金钟秀与蔡济恭是屈指可数的代表正祖时期的大臣。金钟秀自诩清白正直，以清流自处。他还向正祖主张，尊崇生父思悼世子于义理

不合（即他忠告国王不要尊崇生父），所以也被称为“义理主人”。由此金钟秀自称是敢于发表正论的大臣，据《恨中录》记载，这也是正祖一手策划的，即正祖指使了金钟秀。正祖经常对惠庆宫这样说：

先王每曰：“钟秀之名论，乃予成就也。钟秀承顺予之义理，世上不知而谓钟秀先主论也，岂不可笑？”又曰：“予若不欲追崇，岂亲纂景慕宫八字尊号与玉册金印耶？予即今若示追崇之意，钟秀亦主论欲追崇之。癸丑年腊月，渠揣度予加意洪氏之意，于筵中奏渠乃洪氏之至亲，未曾行攻洪之论。大体情态，如九尾狐也！”（《恨中录》，第451—452页）

世人以为金钟秀是主张高见、引导君王的名臣，但实际上他是被正祖之言操纵的大臣，即按其本性，也就是自身利益行动的小人。翻阅最近公开的正祖的秘密信件，可知正祖利用信件操纵了大臣。在写给沈焕之的一封信中，正祖称金钟秀已死，现在你将成为“义理主人”，并详细指示沈焕之在朝廷中该如何行动。蔡济恭的情况也不例外。如果想通过《正祖实录》等资料来了解正祖，必须考虑正祖的幕后操纵。无论大臣的本性为何，正祖都是能够照出他特定面貌的月亮。那是一轮照亮整个世界的明月。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正祖把展现自己统治哲学的《万川明月主人翁自序》制作成匾额，挂在宫中各处。一般来说，“万川明月”的“明月”可以被理解为普照世界的国王之恩，但实际上正祖的月光并非恩惠之光，而是监视、操纵、控制世界的统治之光。国王照亮每个人的某个角落，塑造他们的形象，将其捆绑在一起，放入政治中调和。在这里，国王是引领世界的唯一操纵者。

操纵世界并不容易。利益不同、视角不同、行为不同。要操纵他们，必须按他们各自的要求做出回应。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正祖为了操纵

世界，不得不说谎。《正祖实录》呈现的正祖形象，与其说是“真实的儒生典型”，不如说是经常欺骗与独断的政治家，对此连国王的支持势力都感到困惑。

母亲惠庆宫也是正祖操纵与控制的对象。从《恨中录》来看，正祖与惠庆宫的说法有三四处相左。1769年，洪凤汉在会见东宫正祖时威胁说，若将来不追崇思悼世子，可能会推戴他人为王。正祖在回答郑履焕的上疏时公开表示，洪凤汉曾说过“推戴”。但同在场的惠庆宫称洪凤汉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同一场合，母亲没有听到儿子听到的话。惠庆宫认为，正祖这样答复上疏是为了抓住自己父亲的弱点，不让外祖家动弹。

另一件事发生在1776年正祖处死惠庆宫的叔父洪麟汉时。正祖在赐死洪麟汉时，称惠庆宫认为国法至严，忍着私人的痛苦允许了此事。于是正祖以母亲为借口，判处叔外祖死刑。（《正祖实录》，1776年七月初五日）对此惠庆宫表示，借自己的话处死叔父是把自己也一并处死。她称，世人不知情，把自己看成是不救叔父于危难中反而同意此事的伦纪罪人。她反问世上哪有这样的冤痛之事？

对于同一事件，母亲与儿子的说法完全不同，让人很难判断真伪。但考虑到正祖的政治哲学与行为，我无法不对正祖产生怀疑。正祖不止一两次欺骗母亲，《恨中录》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某次正祖与惠庆宫进行了母子交谈。正祖称，到1804年纯祖成年能够承担国政后，将全面赦免外祖家之罪。惠庆宫怀疑道：“其时吾年七十矣，吾难期满七，或与今日之言有舛，则将若之何？”对此正祖正色道：

“何敢欺七十老人乎？”从此事可推知，正祖不止一两次做过让母亲无法相信的事。此外，在洪麟汉说“三不必知”的当天早晨，正祖称惠庆宫致信洪麟汉，而惠庆宫说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连母亲惠庆宫也不相信正祖的言行。也许对于独自高挂天空、照耀世界的正祖来说只能如此。他的生活非常寂寞孤单。正祖在去世之月曾召见亲家金祖淳说：“人君地极孤危，非妻家则何以为依乎？”（《迎春玉音记》）当然这可能是对亲家说的祝福语，但也可能因为是临死前说的话，可以像遗嘱一样让人感受到真情。正祖在即

位初年斥退了妻家与外祖家，不久又赶走了亲信。此后二十年间，他独自主导国政，人生极度孤危。

第三十五讲 正祖之死与《恨中录》

贞纯王后的攻击

1800年六月二十八日，正祖去世。正祖的权力虽不是民主的权力，但却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善良权力。正祖不仅保护了百姓免受第二、第三权力的侵害，还努力实现儒教社会的理想，并且在这一点上也获得了很高评价。这位从朝鲜理念与体制中诞生的最优秀的国王抛弃了自己钟爱的国家，来到了生养教导他的祖先们所在的地方。

就像大部分的死亡一样，无论是对本人还是周围的人，正祖之死都是突然的。虽然未满五十岁的正祖并非年轻，但也不是面临死亡的年龄。更何况儿子纯祖与正祖失去父亲时一样年幼，只有十一岁。对于刚结束初拣择、再拣择，即将与金祖淳之女完婚的纯祖来说，父王之死是晴天霹雳。纯祖虽背上了朝鲜这个国家的负担，但同时也获得了作为国王的荣耀。

年幼的纯祖无法立刻治国。在举行成年仪式的十五岁之前，年幼国王在大臣的帮助下亲自治国并非没有先例，即便如此，十一岁的年纪还是太小了。因此直到纯祖成年，宫中长辈将代他负责国政。当时宫中最高长辈是贞纯王后。从年龄来说，惠庆宫虽年长十岁，但她在辈分上是贞纯王后的儿媳，加上她的丈夫没有成为国王，她不能成为大妃，仅仅只是国王的亲祖母而已。无论从辈分还是地位来看，贞纯王后都是宫中最高长辈。

对贞纯王后来说，正祖意外的死亡是一次好机会。贞纯王后出身于寒微的儒生家庭。对于这样出身的人成为王妃的背景，有很多说法，而她入宫前后受到惠庆宫娘家庇护之事可以在《恨中录》等资料中得到确认。但贞纯王后成为王妃后，其家族不再柔弱可欺了。当时惠庆宫娘家无法再对自家依靠的思悼世子有所期待，万一贞纯王后给年近七旬的英祖生下王子，思悼世子可能会失去世子之位。在这种情

况下，贞纯王后娘家持续攻击拥有既得利益的惠庆宫娘家，成为所谓“攻洪派”的主轴。

在贞纯王后入宫不到两年的1761年，她的兄长金龟柱以思悼世子的平壤之行为由，呈上了请求处罚负责世子教育之人的上疏。英祖知道该上疏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惠庆宫娘家，认为这会引发外戚之间的政治斗争，于是严厉批评了贞纯王后。1763年，金龟柱在中举后的次日获得英祖写下的“勉尔效古清风庆恩”八个赐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勉励你效仿之前的清风府院君与庆恩府院君”。清风指显宗妃的父亲金佑明，庆恩指肃宗妃的父亲金柱臣。这两人都是国王的外戚，为人低调安静，英祖是在嘱咐金龟柱作为外戚要为人低调。英祖亲自写下这八个字，并嘱咐他千万不要忘记。从某种角度看，英祖的这句话与其说是称赞，不如说是责骂，后被记入金龟柱后代编纂的金龟柱年谱《可庵年谱》中。1769年，金龟柱之父金汉考在去世前对儿子说：“凤汉眼无君父久矣，必将恣行脑臆，以危宗国。汝须勿忘吾言，竭力报国也。”贞纯王后娘家是惠庆宫娘家不共戴天的死对头。

贞纯王后娘家在英祖健在时依靠国王的眷爱维持势力，但随着正祖的即位，家势最终完全衰落。王大妃的亲兄长金龟柱被流放到死亡之岛黑山岛。1786年金龟柱死后，其家就如《恨中录》所描述的那样，变成了“唯存寡妇、孤儿之家”。虽然这一时期惠庆宫娘家也被打压得支离破碎，但还是作为国王的外祖家保有一定程度的待遇。贞纯王后娘家陷入了远不如惠庆宫娘家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正祖突然去世，贞纯王后掌握了权力。

贞纯王后掌权后，立即恢复自身一派的权力，开始攻击敌对之人。于是她家的长期政敌——惠庆宫娘家的处境宛如风前灯烛。贞纯王后方面翻开了三十年的旧账，不仅重新攻击惠庆宫娘家，还把微不足道的罪过也全部找出。就这样，贞纯王后一派试图损害死者的名誉，结束活人的生命，惠庆宫的弟弟洪乐任成了复仇的绝好目标。贞纯王后一派把惠庆宫娘家贬为逆贼之党并大肆攻击，而惠庆宫在正祖的葬礼结束后立即赴正祖去世时居住的迎春轩，拒绝药房的问安，表示要卧而赴死。贞纯王后认为惠庆宫的抵抗是洪乐任在幕后操纵，下令流

放洪乐任。此事因年幼纯祖的出面而中止，但恰好黄嗣永事件爆发，洪乐任被怀疑是天主教信徒。

当时天主教在朝鲜获得迅速发展，在此期间，黄嗣永为朝鲜天主教向西方请求军事援助的事情被察觉。也就是说，此时可以以大逆之罪随意杀害天主教信徒。贞纯王后一派在此加上了洪乐任的名字，即洪乐任与南人天主教信徒吴锡忠有过交往。洪乐任与吴锡忠交往之事，不仅惠庆宫不知，连与吴锡忠同属南人党的丁若镛亦称其荒唐而加以否认。没能经受住严刑拷打的吴锡忠称曾见过一次洪乐任，但丁若镛说这不是事实。流放济州岛后，洪乐任被赐死，同日思悼世子的庶子恩彦君也在济州岛被赐死。恩彦君因妻子、儿媳与天主教有牵扯而被连累，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洪乐任与天主教的关系是不清楚的，他是蒙冤而死。

《恨中录》，惠庆宫的反驳

惠庆宫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在不共戴天的贞纯王后掌权的情况下，完全看不到活路。唯一的希望是时间，留给贞纯王后的时间只剩三年多，之后纯祖将亲政，直接进行统治。惠庆宫一边祈祷纯祖三年内不死，一边为纯祖亲政做准备。这就是《恨中录》主要部分的执笔动机。该书大致由三篇文章组成，其中一篇是在正祖生前执笔的，但讲述思悼世子死亡经过与辩解娘家嫌疑的文章是在正祖死后执笔的。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读者都是纯祖。惠庆宫想明白地告诉孙子，自己的娘家不是逆贼。她希望娘家不要再被视为逆贼了。

惠庆宫的心愿实现了。三年后，纯祖顺利开始亲政，而贞纯王后可能是因为承受不住放权的压力，在结束垂帘听政的一年后就去世了。此时纯祖周围只有惠庆宫一派。金祖淳之所以能够维系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也是因为这样的政治环境。但权力时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幻，一辈子生活在宫中的老练政治人物惠庆宫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惠庆宫希望在为娘家辩解的同时，在政治上巩固娘家的稳定地位。虽然现在谁都不敢攻击自己的娘家，但为彻底洗清之前的嫌疑，惠庆宫整理了历史。整理家中内外与王室的往返信件是第一步工作，第二步工作是撰写《恨中录》。惠庆宫找出了数千封与王室的

往返信件，并经过彻底的资料整理，创造了《恨中录》里坚实的自我辩护逻辑。

惠庆宫想通过《恨中录》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即自己的娘家没有犯下任何谋逆罪行。至于思悼世子之死，惠庆宫称自己娘家没有罪，此后各种琐碎的嫌疑也不属实。积极主张惠庆宫娘家嫌疑的是以贞纯王后一派为中心的所谓“攻洪派”，他们此时已完全失势，几乎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惠庆宫为何如此卖力地为娘家辩解？乍一看，《恨中录》似乎是在批判“攻洪派”，但实际上针对的是更强的对手，即正祖。

正祖为牵制外戚，将外祖家的罪过与“攻洪派”提出的嫌疑捆绑起来。另外，他为了掩盖世间对父亲思悼世子的侮辱与否定，最终设定了不利于惠庆宫娘家的情境。正祖构筑了将思悼世子的恶行与过错转嫁给外祖等周围人的逻辑。乍一看，《恨中录》引用了正祖的话，似乎赞同正祖的逻辑，但其背后分明是对正祖创造的逻辑的反驳。

第三十六讲 惠庆宫，哲之女性

宫中女性政治人物的一生

惠庆宫是宣祖之女贞明公主的后人。贞明公主与洪柱元成婚，其孙洪重箕是惠庆宫的曾祖父。洪重箕去世后，惠庆宫的伯祖父洪锡辅将遗产全部占为己有，而惠庆宫之家虽是祖父洪铉辅出任过判书的名门望族，但也难逃窘境。《恨中录》的某本异本略微透露了惠庆宫对伯祖父没有把财产分给祖父的怨恨。她称祖父去世后，如果没有姑母的帮助，在一段时期内饔飧不济。

随着惠庆宫入宫，家中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恨中录》中介绍了惠庆宫入宫时的一则逸话。惠庆宫被选为世子嫔后，很多亲戚为在她入宫前见最后一面而涌向她家。惠庆宫感叹世态炎凉，称那些在她家家道凋零后不怎么往来的人也来了。但在那么多亲戚中，惠庆宫唯独只记得一个人，这就是洪鉴辅。他是惠庆宫的再从祖父，即祖父的堂兄弟。惠庆宫在那天第一次见到了洪鉴辅。九岁那年就见过一次的人，竟然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是为什么呢？

那天洪鉴辅在告诫族中孙女惠庆宫的同时也道了别。他说：“宫禁至严，入去后不可谒，永诀也。恭敬谨慎以过！”又补充道：“吾名鉴字辅字，入阙后复记之。”（《恨中录》，第174页）洪鉴辅作为一族的祖父，训诫成为世子嫔的年幼堂侄孙女。他称自己不是靠这个孙女就可以出入宫廷的近亲，所以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训诫。训诫的内容是让人听不进的话：用心侍奉宫中的长辈，要时刻小心。这种无趣的训诫原本不可能给惠庆宫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是九岁听完后直到花甲都能记住的内容。洪鉴辅的训诫特征是利用了自己的名字。训诫完毕，洪鉴辅要求惠庆宫入宫后，记住这些话与自己的名字。“鉴”指把自己的话或古代圣贤的话当作镜子，小心举止。“辅”指辅佐宫长辈或宫殿之事。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自己要好好帮助惠庆宫。洪鉴辅称要训诫孙女，实际上是提出了让惠庆宫终生难忘的请托。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从《承政院日记》与《英祖实录》来看，洪鉴辅在惠庆宫入宫后，出任了多个官职。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有一本名为《麾事总要》的书，该书是由他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收集的文件编辑而成。年幼的世子嫔惠庆宫在入宫前就已经是请托的对象。虽然不知道正是因为如此还是其他原因，但在这则逸话的结尾，惠庆宫说：“闻其言，悲之。”不论惠庆宫自身愿意与否，她已经坐在政治位置上了。

聪明与坚韧

记载洪凤汉初年年谱的《翼翼斋漫录》称，惠庆宫被选为世子嫔时，首次呈上的拣择单子有七十九件。在初拣择时，筛选为八件，再拣择时压缩为三件。步入最后竞争的姑娘除惠庆宫之外，还有都事崔景兴与承旨郑俊一的女儿。惠庆宫从79:1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世子嫔。虽然英祖的亲信们对拣择惠庆宫起到了作用，但也绝不能忽视惠庆宫的资质。

正祖生前曾这样向大臣们提到母亲惠庆宫：“我慈宫自少凡耳目之所经涉，终身不忘。自宫中故事，以至国朝典宪，人家氏族，靡所不记。予或有所疑，未尝不仰质，仰质未尝不历历指教。聪明博识，予不敢仰企也。”（《惠庆宫志文》，见《纯祖实录》1816年正月二十一日）正祖以聪明而闻名，惠庆宫作为他的母亲，即使没有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她的聪明。另外，从惠庆宫娘家也能看出她的才华。父亲洪凤汉，兄长洪乐仁，弟弟洪乐信、洪乐任接连通过了科举考试。此外，从《恨中录》中也可以看出惠庆宫极佳的记忆力与井然的逻辑。小说家李泰俊称“《恨中录》才是朝鲜的经典散文”，也是事出有因。

惠庆宫既聪明又坚韧。她也对自己年轻时几乎每天凌晨就起床打扮，穿上正式礼服，克服困难向各位宫中长辈问安而感到自豪。她说：“吾又以十岁年幼，为人刚坚，入而问安不敢怠。”她还说：“虽隆冬盛暑风雨大雪之中，若问安之日，不敢不往。宫中之法，比于近来，何如其严也。吾之未尝苦之之事，亦古人为人或能当之也。”（《恨中录》，195—196页）

这种坚韧似乎成了她在丈夫去世、娘家被儿子打压得几乎灭门时继续活下去的力量，而且这样的坚韧也仿佛与毫无顾忌的表达方式连接在一起。惠庆宫在文章中明确展现出了党派的偏颇与对娘家的偏爱。当然，《恨中录》原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读者所写的，而是让自己的家人与后人阅读，因此没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小心翼翼。但即便考虑到这样的情况，从朝鲜时代两班家的女性，特别是宫廷女性所具有的极度谨慎态度来看，也不能不说惠庆宫撰写的《恨中录》是一种大胆的表达。若与肃宗的继妃仁元王后留下的文字对比，结果显而易见。

惠庆宫是一生都生活在几乎没有私人领域的公共空间里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而言，可以说《恨中录》使用了相当直接、大胆的表达方式。在《恨中录》研究的起步阶段，由于上述偏颇与偏爱，有人对整体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最近的研究对作为历史记录的《恨中录》的价值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因为它不仅在内容上与包括《承政院日记》在内的各种一手史料基本一致，而且在逻辑上也井然有序。

惠庆宫眼看着丈夫去世、娘家道凋零，但也活满了八十年。儿子与妓生游玩时，她要求处罚与儿子一起出游的别监而绝食数日；父亲被攻击为逆贼时，她自投于地而寻死；在她老年时，贞纯王后攻击她的娘家，她赴正祖曾居之处，饮食全废，卧而待死。聪明、冷静、坚韧的惠庆宫作为女性政治人物，在并不短暂的人生中激烈地活着。1815年十二月十五日，惠庆宫在生育正祖的昌庆宫景春殿走完了曲折的一生。

结语

权力是美丽的宝石，任何人看一眼就想拥有。世子嫔拣择令下达后，惠庆宫家里很犹豫是否该安排女儿参与拣择。惠庆宫母亲说：“儒士之女，不欲入于拣择，岂有害耶？”惠庆宫父亲说：“为臣子者，何可欺罔？”决定参加拣择。惠庆宫表示，自己家对把孩子送入宫中没有兴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惠庆宫的家族真的对权力没有欲望，但我不认为他们会超然于世子嫔这块玲珑的宝石。初拣择一结束，惠庆宫就说：“拣择后有所闻然，族党多来访者。门下人自庚申后绝迹，而来者亦多，人心怪异矣。”（《恨中录》，第171—172页）即使在获得宝石之前，权力仍然让人蜂拥而至。对权力漠不关心就等于没有欲望，放弃权力是仅次于放弃一切的困难之事。惠庆宫的家族并不像后来她自认的那样，是一个会轻易放弃权力的家族。

权力在落入手中之前并不属于自己，但一旦拥有，就会出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化。我即权力，权力即我。我会认为权力原本就是自己的，因为这是给予自己的，所以也会出现这样的逻辑跳跃，即只有自己才有资格拥有。如果同一化进行得更顺畅，之后还会产生对此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即自身有责任维护，并认为此事是自身的义务。惠庆宫之父洪凤汉在思悼世子去世后未能退出朝廷也是出于这个缘故。这是若没有自己，谁来收拾混乱政局的责任意识。虽以责任为借口，但仔细分析的话，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欲。惠庆宫娘家的政治反对派——贞纯王后娘家也是如此。起初贞纯王后娘家向惠庆宫娘家低头，但女儿成为王妃后，就像先前的王室外戚一样行动。贞纯王后之父金汉耆给儿女们留下了对抗洪凤汉之权的遗言。两家在政治上持不同立场，但在权力欲方面却是一致的。惠庆宫直到娘家陷入困局才意识到思悼世子去世后，父亲未能从朝中退下的原因其实是权力欲。

与权力合为一体的国王也没有什么不同。英祖总说不会留恋国王之位，于是他动辄宣布“传位”，但无人相信他的传位宣言是出自真心。只要国王表现出对国家与百姓的担忧，他就决不会脱离权力。若

想摆脱权力，就要抛弃自我而去相信其他人，即要相信继承人，因为相信继承人，所以现在该下台了。把部分国政交给世子的代理听政并不是抛弃权力欲，反而是对权力的更强烈的执着，这表示要把世子也直接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因为深知这些内情，继承人大都不是乐意接受而是害怕代理听政。

就像世事一样，人到了时候就应该离开。因害怕死亡，一辈子连“死”与“归”字都不敢提的英祖也去世了。到了时候就应该放下权力，但就像不知道死亡之时一样，人无法知道该放下权力的时间。所谓权力的宝石既有大而华丽的，也有小而朴素的。大部分人连小而朴素的都无法放下，所以放弃大的真的很难。更何况如果抛弃大而华丽的宝石，连受其光环影响的人都会失去光彩。因此他们也会加入进来，劝阻不要放弃权力。

我们可以把朝鲜后期党争也理解成是为占据权力光环而进行的斗争。老论与少论展开对决，扶洪与攻洪展开争斗，最后演变成时派与僻派对立的党争的本质同样是如此。若某一方乘势独断专行，就会形成在无意中与国王争夺权力的局面，而让国王感到危机。绝对掌权人会攻击想要抢夺自己东西的人，但拥有夺权力量的人也会提前斩草除根。为了权力的存立，双方都寸步不让。

权力的无情正是来源于此。英祖平时对思悼世子冷漠而严格，都到了要杀子的地步，这就更不用说了。英祖声称为了宗庙与社稷，要求思悼世子赴死。但从本质上看，他所说的四百年宗社不是其他，正是他自己的权力。对权力的核心，也就是对他本人的挑战，一丝一毫都不会得到原谅，子女也概莫能外。对于平凡的父亲来说，这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但根据权力的一般逻辑，这并非无法理解。正祖亦是一样的无情。正祖登极后，立即打压外祖家，在此过程中还欺骗了母亲，后来又把像朋友一样亲近的洪国荣逼入死亡。对掌权人来说，没有朋友、家人、父母、子女。

无情令人孤独。没有可以分享东西的人，只能是一个人。即便周围许多人聚在一起笑闹，自己不向他们分享真情，他们也不会回以真心。这样的独自之身自然岌岌可危，因为要时刻担心权力的安危。掌

权人虽然只是独自孤危，但多疑的权力总是不断给周围之人带来痛苦。周围之人害怕掌权人的愤怒，失望于掌权人的骗术，于是时而哭泣，时而捶胸顿足，但如果不知道从权力周围退下的适当之时，最终会跌入谷底。明知道这一点却不能轻易离开，这就是权力。权力是如此美丽的宝石，所以人们不知道离开的适当之时，无法离开，而即使知道又不忍离开。

现实就是现实。虽然普通人看起来觉得有些扭曲，但这样的国王们打造了朝鲜的全盛期，即以愤怒与恐怖为长技的英祖，以欺骗为长技的正祖成就了朝鲜的“文艺复兴”。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了“作为君主，受人畏惧和受人爱戴哪个更好”的问题，回答是“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受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马基雅维利还忠告道：“在不可避免出现流血事态的情况下，一定要树立强有力的、明确的逻辑与大义名分，然后推进事情。”他还说：“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可以说，他把恐怖与欺骗说成是君主的品德。英祖与正祖正是具有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品德的国王。

可以说因英祖与正祖忠于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品德，所以创造了最好的时代吗？这两人作为统治者所具备的资质里，可以高度评价的是他们不仅对周围人，对自己也非常严格。他们欣然放弃了作为帝王可以享有的奢侈生活，比任何人都彻底、诚实地实践了俭约这一品德，此外他们在孝道等其他儒教品德的实践上也比任何人都彻底。虽然他们有时用愤怒来威胁大臣，有时用欺骗来安抚大臣，但两位国王的权威从根本上来说，是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大臣们就像学生跟随老师一样，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随国王，不敢慢待国王。这与为民统治连接在一起，让他们从百姓那里收获了“仁君”的称颂。

现在，绝对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在政治领域之外，其他领域还留有类似的权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经济权力。有些人拥有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经济财富，不受任何干涉，行使着强大的权力。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就像朝鲜不是国王的所有物一样，经济财富也不是资本家的所有物。即便自己努力积累财富，但也没有权力把它世

世代代传下去，应该将此视为暂时委任的权力。但是有人利用这样的权力，甚至影响了他人的生存。不分享的权力是孤独而危险的。

附录一 对先行著述的批判

第一讲 近来围绕思悼世子之死的争议

这本出版于2012年的《权力与人》批判了成乐熏的《韩国党争史》与李银顺的《朝鲜后期党争史研究》等书提出的思悼世子因党争而死的观点，即此前学界视为通论的“党争说”。本书主张思悼世子“狂症说”与“谋逆罪人说”，出版后在学界内外引起了一定的争议。首尔大学国史系教授吴洙彰在书评中写道：“《权力与人》是实至名归的历史著作。其在令历史学者汗颜的严谨文献考证基础上，阐明了许多新的史实，给朝鲜时代史研究带来了很大冲击。”吴洙彰教授几乎全盘接受我的观点，而汉文文献学学者张裕昇与历史学泰斗韩永愚也与我见解一致。但是也有几位学者通过书评或论文对本人的观点进行批判，其中代表性的评论可列举如下：

白敏贞（音译），《观察历史权力问题的视线》，《人文论丛》68，首尔大学人文学研究院，2012。

崔诚桓①，《从朝鲜后期政治脉络解读荡平国王正祖》，《正祖与正祖以后》，历史批评社，2017。

崔诚桓②，《〈恨中录〉的多面事实性及史料价值》，《惠庆宫及其时代》，华城市厅，2015。

丁海得，《〈恨中录〉及相关记录的比较探讨》，《惠庆宫及其时代》，华城市厅，2015。

针对这些批判，我曾撰写了简略的反驳文章，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刊物发表。此后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提议邀请持有批判观点的学者与另外四五位学者举办讨论会。这次特殊形式的研讨会举办于2020年11月16日，我进行简短报告后，由六名学者进行评论。这次研讨会由李庆求（翰林大学翰林科学院）主持，金文植（檀国大学历

史学系)、崔诚桓(首尔大学历史教育系)、丁海得(韩信大学国史学系)、朴范(公州大学历史学系)、张裕昇(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院)、白丞镐(韩南大学国文系)等参与集中讨论。本文是对前述四篇文章及这次研讨会上所提问题的答复。

思悼世子的死因

关于思悼世子之死,我主要采纳《恨中录》中的表述,书中解释道:思悼世子与父王英祖不和而患狂症,做出威胁英祖的举动,受到处罚而死亡。这是《承政院日记》《英祖实录》以及其他一手史料中也可以确认的内容。但依照正祖为父亲思悼世子撰写的墓志——《显隆园志》而做出的解释,不仅否定了思悼世子之罪,也否定他身患狂症。或是因为我的研究,还是其他理由,现在罕见否定思悼世子身患狂症的研究,但至今仍有一些论文对思悼世子获罪受罚而死的解读持批判态度。

我说过无论是“狂症说”还是“党争说”都不是直接死因。英祖并非以思悼世子狂易为由将其处死,党争也不是思悼世子的直接死因。若是要找出英祖处死思悼世子的直接原因,我认为应该是谋逆罪。我的看法是,英祖降谋逆罪于世子并将其处死,思悼世子获叛逆罪的原因是他对英祖的攻击性的言行,而思悼世子攻击父王言行的根本来源是狂症。此前有研究认为思悼世子身患狂症是因为父子间的性格差异,但未仔细考察他们是否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观点认为英祖受老论派的支持,思悼世子对少论派有好感,在思悼世子代理听政时,英祖称朝廷分为父党与子党,即分为亲英祖的一派与亲思悼世子的一派,但不清楚这能否被看作是父子间政治意见的差异。

否定思悼世子“谋逆罪说”的学者有崔诚桓与丁海得,论文崔诚桓^①对我的书评价道:“现在文学界试图超越作品分析,从而纠正对英正祖时代的历史叙述,《权力与人》即顶峰。该书否定了韩国史学界的主要说明模式,即党争史视角,是彻底地从作为人的英祖、思悼世子、正祖的观点分析壬午祸变前后英正祖时代的研究成果。”并整理了我的见解:“郑炳说在该书中不仅否定了李德一,也全面否定了历史学界的‘党争说’,以思悼世子的‘谋逆罪人说’取而代之。他

不仅将英祖的处分视为对世子谋逆意图的合适措施，而且认为英祖后悔该处分而写下的‘金滕之书’有可能是正祖的捏造，从而改变了讨论的方向。他在关于壬午祸变原因的传统解说中，唯独排除‘党争说’，反而提出‘谋逆罪人说’，这是会引发争论的主张。”

针对思悼世子的死因，崔诚桓继续提及此前的“党争说”“性格冲突说”“狂症说”，并断定：“最初该事件就不是从某一方面可以下结论的事情，也不是争论的对象。”针对“谋逆罪人说”他主张道：“没有实施谋逆的证据，英祖也调查了思悼世子谋逆的企图，由于没有证据而最终未将其公开，所以不能将谋逆认为是历史事实。”他又说：“这是因为壬午祸变时，英祖在极度激动的状态下颁布《废世子颁教》，公布了世子想谋害自己的情况，但在给世子办丧事时又恢复了他的地位，乃至降下谥号，使大臣们无法再提世子之罪。我们应该认为《废世子颁教》最终被英祖撤回。”

丁海得也提出了与崔诚桓类似的主张：“英祖确认世子死后即刻撤回了废世子的举措，恢复了世子的位号，公开了世子之死。”同时，他说朝鲜的正式文书把思悼世子之死记为“薨逝”，从“薨逝”这个用语可以看出思悼世子并非作为逆贼被赐死，因而不能将他的死亡与谋逆罪联系到一起，即英祖处死思悼世子时，是因某种理由废掉他的世子之位并赐死，但在世子死后又恢复了他的地位，所以世子并非因谋逆罪而死。

两位学者对思悼世子受英祖处罚而死并未提出异议，也不反对英祖在降下处罚时，正如《英祖实录》所展示的一样，意识到了某种叛乱的事实。他们亦未对英祖在处罚思悼世子之前，已经意识到了世子的威胁性言行这一情况提出异议。这些都是可以在《恨中录》《英祖实录》《废世子颁教》等史料中确认的事实，特别是《废世子颁教》借思悼世子生母暎嫔李氏之口较为详细地传达了世子的恶行。但他们认为，不能将这些行为视为谋逆，因此不能断定思悼世子因谋逆罪而受到处罚，而且不存在思悼世子谋逆的证据，这在世子死后英祖即刻撤回废世子之举使之复位，并令大臣们无法言及世子之罪等方面已经体现出来了。

在此需要严格区分“犯谋逆罪而死”与“有谋逆之举”。这就如某人获杀人罪被执行死刑，但不能说他一定是杀人犯。而且因时代的不同，某一罪名的适用范围也会有较大差别，即现代人认为的“谋逆”与朝鲜时代的人认为的“谋逆”在具体行为方面会有较大差异。朝鲜时代使用的刑法典——《大明律》里的谋逆罪出现在最前面的《名例律》中的“十恶”与《刑律》中的“贼盗”等处。“十恶”中第一条“谋反”、第二条“谋大逆”、第三条“谋叛”、第四条“恶逆”、第五条“不道”等都是指谋逆罪，“贼盗”律中的掠夺对象若是国家，即为谋逆罪。但观察罪名的实际适用情况，谋逆并不一定指的是率军入侵宫殿或直接攻击君王。未能立刻执行君王的命令或使君王不悦，这些都可被视为谋逆罪。例如1771年八月沈仪之在英祖面前提到了英祖忌讳提及的思悼世子死时所用的木柜，触发逆律而获死刑。英祖的教旨如下：“今者沈仪之万万阴惨，故虽施逆律，此与关系大逆者有间，应坐人特除一律，为奴甯配。”（《英祖实录》，1771年八月初三日）思悼世子若率手下的武士出去，即使没有入侵英祖的宫殿而归，仅在英祖不在的地方抽刀说了将刺杀国王这样的话，也足以被定为谋逆罪。崔诚桓与丁海得认为英祖后来恢复了世子之位，所以很难说思悼世子犯下谋逆罪。但即使死后复权，处罚时的罪名也不会消失，上述观点是颠倒顺序而产生的误解。

2020年11月的研讨会上，崔诚桓与丁海得不再坚持自己先前的主张，而提出无法断定为谋逆罪。崔诚桓认为是英祖察觉到叛乱迹象，为防止事情发生，提前将世子处死；丁海得认为比起谋逆罪，世子应该是因对父亲言行无礼之罪，即触犯纲常罪而被处死。任何记录都没有明确说明思悼世子的罪名，因而可以自由推断。但深知国法之严的国王，未能给世子定上一个明确的罪名就提前将其随意处死，这一解释似乎难以说通。朝鲜时代，尤其是英祖的统治不会如此简单又随意。若要提出这样的观点，应当查阅朝鲜时代是否存在单独将谋逆未遂定为罪名进行处罚的法条或是否存在前例。我们从前述的沈仪之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在朝鲜时代即使仅仅展露谋逆的迹象也不会被单独视为谋逆未遂，而是直接定为谋逆。

国王处死世子，不可能不依据法律而随意为之。特别是像英祖这样强调原则的国王在处罚世子时，绝不会降下超越法律、脱离法律的处罚，即绝不会无视法律而处罚一国至尊的世子。英祖为使处罚正式化，在处分之前首先废掉思悼世子的世子之位，再通过《废世子颁教》以文书的形式将此事告知全国百姓。思悼世子是“小朝”，即小国王，从法制上来看，不能处死国王，这是因为不存在处罚国王的法条。所以若要处死世子，首先需要废掉他的世子之位。英祖的做法是如此彻底。

但亦如丁海得所说，英祖也可能给思悼世子定下纲常罪并处死他。英祖与思悼世子是君臣关系，同时也是父子关系，因此思悼世子对英祖的威胁性行动既是不忠，亦是不孝，谋逆罪与纲常罪可以同时成立。我认为，英祖提到与思悼世子的官方关系，甚至在私人场合通常是把君臣关系放在首位，所以先以谋逆罪论处，但说是纲常罪也没有错。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即便是纲常罪，思悼世子之罪也绝没有减轻。《大明律》没有直接点出纲常罪，前述的“十恶”中第七条是“不孝”，在现实中常适用于纲常罪。网络检索《朝鲜王朝实录》数据库的话，可以确认纲常罪的多数适用情况，《秋官志》第二卷《详覆部》的“伦常”中列举了杀害或殴打父母等罪，并介绍了实际判例。这些到了英祖时期，在《续大典》（《刑典》“推断”）中变成了明文规定的法条，其规定为：“纲常罪人（弑父、母、夫，奴弑主，官奴弑官长者）结案正法后，妻、子、女为奴，破家谪泽，降其邑号，罢其守令。”英祖没有不能采用纲常罪的理由，但真的实施的话，会有更严厉的处罚伴随而来。他需要把惠庆宫与正祖等人降为奴婢，把思悼世子的住处刨为水池。但既然英祖没有这样做，可见他没必要勉强采用纲常罪。

历史学泰斗韩永愚也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到谋逆罪是直接死因。他写道：“世子的谋逆事件一败露，英祖终于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也就是他决定处死世子。”（韩永愚：前揭书，第216页）形成谋逆罪存在多种原因，而思悼世子的狂症是最接近的原因，且狂症的主要成因是他与父亲不和。

英祖之悔

关于思悼世子之死的另一个争论点是世子死后英祖是否真的原谅了世子，以及是否后悔处罚他。这不是与死因直接相关的问题。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将死因及之后的行动与感情联系起来有什么意义呢？处死世子后再原谅他，并且后悔，不能证明在处死他的时候不讨厌他。但英祖的原谅与后悔是正祖将其作为追崇生父的重要依据，因而实际意义并不小。思悼世子虽然受到英祖的处分而死，但英祖此后的原谅与后悔，可以与追崇世子未违背英祖之意的逻辑相连接。英祖的原谅与后悔可以看作是对思悼世子的一种赦免。

我曾说过，英祖在处死思悼世子后从未正式表示过后悔，而且我认为展现英祖后悔的代表性事件“金滕之书”也是为追崇思悼世子而捏造的。关于这一点，崔诚桓^①中写道：“应将英祖的后悔或‘金滕之书’视为事实。祸变发生时英祖提到了世子的叛乱，即弑杀自己的可能性。但时过境迁，在英祖四十年代中期后表露后悔之情也是事实。后悔的表现在《英祖实录》中处处可见。”他在论文的注解中列举了《英祖实录》中可作为证据的三个部分，其中英祖四十四年（1768年）五月十四日条、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条中未见后悔迹象。英祖四十七年（1771年）八月初七日条中的如下内容或可读到某种程度的后悔。

自韩疏后，圣心烦恼，每中朝而叹曰：“吾儿贤矣，而臣下不匡，以至于此。彼虽曰凤汉所献之物，既献之后，用此物者，岂非予乎？天下后世，将谓予何？”至是特除两司长官，荣进等不得已发凤汉之启。

此事件发生前的上一年三月，韩上疏批判惠庆宫的父亲洪凤汉，内容是洪凤汉献上了木柜，导致思悼世子死亡。他认为思悼世子之死是献上木柜的洪凤汉之错。对此英祖说思悼世子本来贤良，是下面的臣子没有好好引导以致其死亡，木柜虽是洪凤汉所献之物，但所用之人是他自己，后世岂非最终将此归咎于他？英祖的话语中存在可被理解为他为思悼世子之死深感惋惜的部分，但我们不能就此判断他认为自己处死思悼世子是错误的，因而感到后悔。即使把这部分解读为后悔，那也是杀子之父对儿子之死感到惋惜的后悔，而不是因自己误判

而处死儿子的后悔。崔诚桓参与翻译的《玄皋记》中有以“英祖之悔”为题的条目，其中的后悔也与上文类似。

此外，丁海得说思悼世子的“思悼”谥号蕴含了英祖作为父亲期望反省的恳切之心，而不是对儿子的愤怒。他认为：“世子的谥号‘思悼’，其谥法为‘追悔前过曰思，中年早夭曰悼’，这也反映了英祖希望世子能像太甲一样反省自己过错的心情。”但若正确理解思悼世子谥号的含义，就不会如此解读。英祖降下“思悼”这一谥号中的“思”与“悼”都是含否定意义的恶谥。简单来说，他称思悼世子为“虽然犯错但反省的年轻离世的人”。当然，我们可以说既然英祖称世子还知道反省，那就避开了连反省都没有的最差的否定谥号。查阅《祭文誊抄》记录的英祖亲自撰写的思悼世子祭文，他说：“闻尔不讳，追思近卅载父子之恩，曲尽处分，复其故号赐尔谥曰思悼，比诸戾太子，于尔可谓美谥。”英祖是如此愤怒，他的意思不是期待思悼世子反省，而是世子做了比谋逆举兵的戾太子更恶劣的事情，但他以宽容的态度放其一马。

英祖的原谅与后悔是后世研究者要谨慎考虑的部分。若要阐明后悔，就需要寻找相关记录与证据，但即使发现这样的内容，也需要慎重解读。宽容与后悔基本上是感情的问题，而感情是难以明确解读的。有哪位父亲能在处死儿子后，宣称自己的行动出色又觉得骄傲呢？在重视“父子有亲”的儒教社会，即使父亲有理由杀害儿子且毫无悔意，但在外也要对儿子的死亡表示惋惜或遗憾，这是外界期待的感情表达方式。英祖作为国王，哪怕毫无遗憾，也要迎合大臣与百姓的期待而表示惋惜。我们要牢记这些注意事项再谨慎解读史料。不过即便英祖有某种程度上的明显后悔表现，我们也难以相信其真实性，因为他从未正式或明确地好好表现过后悔。

能够更加明确展示英祖的原谅与后悔的是他的行为。一边说着同样爱儿子与女儿，一边又把全部财产都传给儿子，女儿是否能从这样的父母身上感受到平等的爱呢？每天对配偶说“我爱你”，同时又出轨的人是真的爱配偶吗？原谅且后悔的话，若有与之相称的行为，我们可以认为是真实的。英祖处死思悼世子后恢复了他的世子之位，我

们可以认为他展示了原谅与后悔，但我们很难判断复位到底是意味真的后悔，还是英祖作为父亲、作为国王为了顾及颜面所采取的最低层面行动。若能找到当时人们对英祖行为的反应与评价，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情况。

在为思悼世子举丧之时，英祖恢复了他的世子之位，但没有按世子之位的标准举办丧礼，因而受到史官的批评。服丧的月数及丧服的标准均低于世子丧礼的规定。一段时间过后，英祖说是后悔，但不允许大臣与正祖参拜思悼世子墓所与祠堂，以至于有人上疏批判，这些事情均无法展现英祖原谅死去的思悼世子。差不多到了他离世前的1774年，他才允许正祖去给生父扫墓。

无论从任何角度都无法读到英祖真正的原谅与后悔，但仍有一些学者不断读出这一点。若问处死儿子的父亲心中怎能没有一丝悔意，英祖之悔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解读都应有依据。在找到表现与行为依据之前，我们是不能如此解读的。无法解读的话不如保留解读更为妥当。

正祖对思悼世子传记的歪曲

声称英祖后悔处死思悼世子，正祖举出的代表性证据就是所谓的“金滕之书”。1793年八月初八日，正祖公开了二十字的汉诗。我怀疑“金滕”事件是正祖伪造的，而崔诚桓^①认为：“若是造假，对正祖试图变更‘壬午义理’持批判态度的诸多大臣都会提出质疑。”他以正祖公开“金滕之书”后近十年主持国政期间，大臣们未表示丝毫怀疑为由否定了造假说。但我认为无法放下对“金滕之书”的怀疑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一贯性问题。如前文所述，英祖在一生的言行中都没有展现后悔，反而经常表露愤怒。但这样的人某天隐瞒了深深的后悔，把“金滕之书”转交给秘书，事后过了很久，相关人员才拿出了证据，这不得不引人怀疑。当然，也可能是英祖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但在至尊的国王之位上无法表露。然而问题是，如果看到“金滕之书”，也不一定非要隐藏。是大臣们没能好好辅佐世子导致其死亡，英祖像

这样哀叹世子的死亡，因而埋怨大臣的情形在其他场合也发生过。如果说“金滕之书”有比这种后悔更迫切的内容，就应该展现出来，但并未如此。令人怀疑的是，正祖为何在即位快满二十年之时，才像公开大秘密一样公开“金滕之书”？如果这真的具有重大意义，那早就应该公开，为什么不公开呢？正祖度过即位初期后，分步完成追崇父亲思悼世子的程序，但为何迟至那时才公开如此重要的文书，实在令人费解。即位之初时，可以说他是因为很难违背实际掌握朝廷的大臣们的意愿，但即位十年后，他已经成了无所不能的国王，却也没有立即公开。不仅是英祖，连正祖的言行也无法展现一贯性。我们遇到研究对象的出人意料的言行首先会产生怀疑，这种情况就是如此。

第二，证据的充分性问题。正祖提出的证据并不充分。如果存在记录了英祖之悔的“金滕之书”，正祖就可以拿出原件，也可以展示全文，但他只向部分大臣展示了副本的部分内容。如果展示原件的话，就会被问“这是真的吗？”如果展示全文，就会被问“还有其他的吗？”但只拿出部分与副本，就表示没有继续全部展示的意思，大臣们也无法再要求了。正祖只拿出证据的末端，就让大家相信了。

“金滕之书”是在当初属于老论派的左议政金钟秀等人就思悼世子的生平展开争论后拿出来的，针对这个问题，正祖说：“今日诸臣每因一番事端，辄有一番妄度，以典礼间事致疑于不当疑之地，此岂敢萌于心者乎？”从而禁止提出异议，堵住了悠悠之口。崔诚桓认为当初大臣们争论思悼世子的生平问题时，正祖拿出来的正是“金滕之书”，如果“金滕之书”存在问题，大臣们会提出异议，但未有人如此为之。如果继续追问国王，可能触犯“犯上不道”的谋逆罪。正祖就这样展示了“金滕之书”，堵住了悠悠之口。崔诚桓似乎认为朝鲜的朝廷是无论国王如何堵住大臣们的嘴，但只要有疑点，他们就一定会提出质疑的地方。不知他如此看待正祖朝廷的依据是什么。我对朝鲜或正祖的朝廷看法与崔诚桓不同。虽然每个国王都不同，但像英祖或正祖一样具有绝对权威的国王强势提出自己的主张的话，大臣们不敢在朝廷提出异议。

第三，证据提供者的信赖度问题。许多学者称正祖为贤君、学者君主从而抬高他的时候，研究正祖并出版著作的政治学家朴贤谋认为

《正祖实录》中的正祖是“经常使用欺骗手段的专断政治家，甚至让国王的支持势力都感到困惑”。我曾把正祖称为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近来大量公之于众的正祖寄给大臣们的秘密简札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证据提供者的信赖度问题，白敏贞（音译）曾提出过反驳。针对我对正祖的怀疑，她表示：“如果把正祖的历史歪曲之举视为严重的历史欺诈行为，那么作者如何对正祖的治世赋予意义呢？”意思是我在详细论述正祖歪曲思悼世子相关事实的同时，如何给他的治世赋予一定的意义？世间对正祖的评价极为不同，有些人认为他是改革的圣君或启蒙君主，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导致朝鲜走向灭亡的暴君。旅德历史学家卞媛琳认为答案是后者。我认为正祖的政治统治在朝鲜历代国王中相对优秀，但不能视正祖时代为太平盛世，也不能视他为圣君。当然，更不能认为他是圣君，所以就不会歪曲事实，即我不认为政治与道德具有必然或密切的关联性。另外，我认为正祖歪曲事实，是为追崇父亲而歪曲父亲传记，可能并不违背当时的道德准则。崔诚桓辩护说，英祖末年，正祖还是东宫时向英祖请求删去《承政院日记》中有关思悼世子恶行的部分，这可以视为“一种统治行为”而不是歪曲事实。不知他是不是因歪曲这一说法所含有的否定意味而想要否定此事，但不论这是不是统治行为，想隐瞒事实这一点并没有变化。

正祖为制作不同于事实的思悼世子的传记，制定了多种对策。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歪曲事实，即减少、隐瞒、删除、编辑、夸张等。去掉《承政院日记》中思悼世子的恶行部分是删除，而且他不正当地介入《英祖实录》的编纂确实与他试图减少思悼世子恶行的动机相关，后文将详述。另外，在迁葬思悼世子坟墓的过程中发现的《英祖亲制志文》被他放置不管最后自动废弃，取而代之的是选取思悼世子传记内容中正面的部分，与他亲自撰写的《显隆园志》。在此过程中，正祖还搜集整理了思悼世子温阳温泉之行的相关传闻，使思悼世子的行踪看起来比实际夸张。从正祖所做的一系列事情来看，“金滕之书”的事情完全有可能造假。

第四，情况的问题。这与统治体制的性质有关。崔诚桓^①表示，如果“金滕之书”是伪造，对正祖试图追崇思悼世子持批判态度的大臣们不会坐视不理。从大臣们不发一语来看，这不是伪造。如果国王朝着与大臣们意愿不同的方向做出可疑的行为，大臣们就会纠正他的信念与朝鲜或正祖的统治体制性质相关。君臣关系是压迫的、单方面的，还是能动的相互批判与牵制，观察者对此的认识不同，该问题的答案也会有所不同。崔诚桓似乎认为朝鲜朝廷是实现活跃的公论政治的地方，而我认为，可能偶尔出现理想的双向沟通，但从根本上看，专制的、压迫的单向沟通占主导地位。

想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一两本书都说不完。虽然正祖的统治风格与相对更加压抑的英祖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臣们易于向正祖追究问题或提出反对意见。尽管存在极度小心翼翼向国王陈述自己意见的大臣们，但一旦国王严格确立政策方向后，他们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与“金滕之书”相关，类似情形也见于《正祖实录》。从近来公之于众的正祖寄给近臣们的秘密简札来看，偶尔出现的大臣们提出异见的行为，其实是正祖操纵下的产物。尽管不能认为大臣们的异见调整全都是通过国王的秘密操纵实现的，但可以看出，国王单向的统治方式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强烈。

关于朝鲜统治体制的性质，我最近与政治思想家金英敏展开过争论。他在批判我的书《朝鲜时代小说的生产与流通》时说：“很难将朝鲜王朝视为专制权力统治的王朝。”同时他还举例说，在以行使强大王权而闻名的国王——英祖的统治时期，从《推案及鞫案》来看，谋逆事件多达八十三件，即从近百起谋反事件的数量来看，英祖的统治权力出乎意料的脆弱。对此我反驳道：“《推案及鞫案》提及的逆谋案中，近一半是有令国王不悦的言行，即所谓的‘犯上不道’罪。最近我们所想的那种拿着刀剑的谋逆行为，只有1728年戊申乱这一件。”虽然不能把英祖统治推及整个朝鲜时代，但朝鲜政治大体上具有百姓或大臣们无法轻易动摇的严肃特性。同样，即使“金滕之书”之事被怀疑是国王伪造的，只要国王下定决心坚持，就无人胆敢反对，这就是朝鲜朝廷的基本性质。

正祖是否伪造了“金滕之书”，目前谁也不能断定。造假是伪造了“金滕之书”中的诗，还是诗是英祖写的，但被正祖夸大其词，说成英祖悔不当初一样，尚不清楚。无论如何，从以上四种理由来看，我认为“金滕之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历史学泰斗韩永愚对“金滕之书”也持类似见解，他说：“事实上‘金滕之书’很可能是正祖为了挽救父亲与祖父的声誉而与心腹大臣蔡济恭合谋编造的假文书。”（韩永愚：前揭书，第349页）

接近历史真实的方法

迄今为止，围绕思悼世子的死亡，争议不断的原因在于这是父亲处死儿子，国家最高统治者处死接班人的令人难以言说的事件。无论是加害者，还是死者之子，都忌讳把伤口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政治争议以此为契机而爆发，其中特定的视角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事件被掩盖、歪曲，所以越来越难以接近真相。后世学者应该充分考虑这些情况并查阅史料，但他们却懒得注意，反而沿着特定一方的视角继续扩散错误。虽然很难完全查明数百年前的事件真相，但我认为只要注意以下几点，就不会与真相背道而驰。在我看来，上述的若干批判也是没有注意这几点，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第一，应尽可能广泛地涉猎相关史料。不仅是核心资料《恨中录》《显隆园志》，也包括《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等编年史料中的相关部分。同时，需要仔细研读《废世子颁教》《英祖亲制志文》《英祖亲制致祭文》等未被广泛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将此作为研究对象。前述的对我的书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中，除了崔诚桓之外，大部分看起来都没有读过这些资料。

第二，要正确翻译、解读资料。王室相关的文书具有委婉表达的特征，尤其要更加小心感情表达等难以准确掌握意义的部分。部分学者对于《英祖实录》与《英祖亲制志文》中相关内容的解释，没有按前后脉络正确读出英祖的感情。

第三，需要严密地批判资料。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资料中揭示的情况，有必要了解资料的可信度与资料的性质。想要准确把握资料的性

质，我们有必要了解编纂动机、目的及过程。如果不了解资料的性质就去解读的话，会拘泥于文面，最终导致错误地解释整个事件。《恨中录》作为核心史料，因为是个人记录，被怀疑存在记录不准与党派狭隘性，但通过最近的几项研究，我们查明了惠庆宫在编纂过程中下了很大功夫，该书是相当准确、相对公正的资料。相反，与《恨中录》对立的正祖亲撰的思悼世子传记——《显隆园志》因为是国王所写的记录，曾被预测是准确、公正的资料，但实际上是正祖为美化父亲而撰写的。

从《显隆园志》的制作过程来看，该资料的性质非常明显。英祖在处死思悼世子后，于东大门外的拜峰山下建造坟墓埋葬了他，同时埋下亲撰的墓志。正祖即位后，挑选了更好的墓址，下决心将父亲移葬水原。在移葬过程中，他接到了原墓址中出现英祖亲撰墓志的报告，但他并没有按惯例将墓志移葬到新墓址，而是就地掩埋将其湮灭，然后在新墓址中埋下自己亲撰的新墓志。正祖埋葬的英祖亲撰墓志在1968年建筑新建施工中出土。如果把英祖撰写的墓志与正祖撰写的墓志进行比较，我们就能看到完全相反的内容，就像《恨中录》与《显隆园志》分别刻画了“疯世子”与“贤世子”一样，前者刻画了狂易悖恶的世子，后者刻画了仁慈贤明的世子。我们从英祖撰写的墓志可以推测，正祖为何会违背惯例就地掩埋先王撰写的墓志，并且重新葬下自己撰写的墓志。我们只能认为，正祖想改变祖父确立的思悼世子的传记。据《玄皋记》的记载，正祖为了不让大臣们读到自己撰写的《显隆园志》而费尽心思，甚至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拒绝将其收入《列圣志状》。也就是说，正祖不希望《显隆园志》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他虽然想改变父亲的负面形象，但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引发争议地将墓志埋葬。

另外，我们需要掌握严肃、公正且以非常客观而著称的史料——《朝鲜王朝实录》的性质，并批判地加以阅读。《朝鲜王朝实录》是在某位国王死后，由下一任国王主导编纂的史料，并不是所有王代的实录都同样公正与严肃。正祖时代编纂的《英祖实录》存在正祖介入的情况，由此可以确认其偏向性与指向性。

从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收藏的《英宗大王实录厅仪轨》来看，正祖即位后编纂《英祖实录》时，破例将部分时期的《时政记》删节任务交给特定之人。部分时期是指1758年至1762年思悼世子生命的最后时期与1773年至1776年正祖即位前的时期，负责人是李徽之。针对思悼世子人生最后五年的记录，正祖甚至下达了如下的命令。“上曰：《时政记》及《政院日记》中戊寅以后癸未以前所载者，或不无不可烦人眼目处，而此则虽三房罢后，都厅犹可抄节，姑勿输去。”（《英宗大王实录厅仪轨》，删节厅誊录，1778年三月二十三日）正祖针对思悼世子的恶行达到极点的时期，让特定之人编辑“烦人眼目处”的部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毫无疑问，“烦人眼目处”指的是思悼世子的恶行，为什么把这部分交给特定之人呢？李徽之到底是什么人？

李徽之是因“辛壬狱事”而死的老论大臣李颐命的侄子，也是李观命的儿子，他属于因少论家破人亡而恨意满满的铁杆老论派。与之相关需要关注的是《景宗实录》的改修。《景宗实录》在英祖初年编纂完成，由少论派主导编纂。该实录把因“辛壬狱事”而死的老论大臣们视为逆贼，老论派对此感到非常不满。正祖允许修改《景宗实录》，以平息老论派的不满。与此同时，他还全权委托老论大臣编纂记录自己父亲多项恶行的史料。正祖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父亲恶行相关的部分，实际上最终结果是重要的部分被删去，其中正祖与老论的交易值得怀疑。虽然不能进一步查明真相，但我们必须铭记，连所谓客观性高的实录都需要留意其性质再加以阅读。

第四，要根据合理的推论进行解释。思悼世子犯下某罪受罚，后来却被赦免了，所以崔诚桓与丁海得主张应视其无罪。我不认为他们是从逻辑上掌握了死因。赦免后无罪，不能就此认为赦免前无罪。另外，这两位学者在研讨会上称，不存在断定谋逆罪的证据，还不如视作谋逆未遂罪或纲常罪。这可以说是对当时法制理解不足而提出的意见。按朝鲜王朝的法律，哪怕试图谋逆，就可以适用谋逆罪，英祖时代的纲常罪比普通叛国罪更须加重处罚。我们要想通过推论主张某种假设，必须有情况与证据的支持。

最后，要警惕偶像化研究对象。白敏贞（音译）认为正祖是优秀的统治者，不可能说谎。崔诚桓则辩护道：“即使正祖编造了思悼世子的传记，也应将其视为统治行为的一环。”我怀疑两位学者是把正祖偶像化成优秀的君主。优秀的统治者也会说谎，即使把编造视为统治行为，编造这一事实本身也不会改变。不应该说某某不是那样的人，而应承认这样的事实。如果学者们不具备严格的客观与冷静，那普通人就会偶像化历史人物。

第二讲 对思悼世子党争牺牲说的批判

当时的“党争牺牲说”

关于思悼世子死亡原因的各种说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狂症说”与“党争牺牲说”。前文已详细分析过“狂症说”，接下来要正式探讨“党争牺牲说”。尽管都是主张“党争牺牲说”，说法也略有差异，但基本上都认为思悼世子本无病，开始代理听政，表现出反老论的倾向后，受到了老论的牵制与诬陷，再加上英祖亦赞同老论，最终使其走向死亡。如果这一说法要成立，就必须确认思悼世子是否真的表现出反老论的态度，以及在党派问题上是否与英祖的立场不同等。

“党争牺牲说”在惠庆宫撰写《恨中录》时就已出现。惠庆宫称，关于思悼世子之死，世间存在两种说法。一是思悼世子犯下死罪而死；二是思悼世子本无罪无病，却遭诬陷而死。（《恨中录》，第152页）前者不仅把思悼世子视为谋逆罪人，而且把其子正祖也视为罪人之子，该说法在正祖即位后很难发之于口。后者是正祖开展思悼世子追崇事业后开始成为主流的说法，在后世发展为“党争牺牲说”。在“党争牺牲说”的扩散中，正祖发挥了巨大作用。支持“党争牺牲说”的最重要论据是正祖撰写的思悼世子行状。

比正祖撰写的思悼世子行状呈现出更明确、更典型党争立场的资料，还有赵翰逵的《壬午本末》（收入《紫桥小藏》《角亭集》等）。该短篇文献汇集了民间对思悼世子之死的传闻，其中有不少传闻支持“党争牺牲说”。赵翰逵和惠庆宫生活在同时代，他是少论巨头赵泰亿的曾孙。换言之，该文献展现了少论对壬午祸变的理解，主要内容是思悼世子被老论一派诬陷而死。该书收录的大部分记事似乎是无法验证的传闻，我挑选了其中几条还算像话的记录罗列如下。

○思悼世子在十八岁时与英祖谈话，思悼世子称：“不忠于景庙者，岂有忠于殿下之理乎？至于荡平诸臣，忘先王、附国贼，皆反复

小人也。”上奇其见识高明，益加爱重曰：“皇兄借腹而生汝也。”

○1757年冬的某天，金尚鲁向英祖建议废掉世子。“上大惊曰：‘此何说也？谁使卿为此言乎？’尚鲁惶怯曰：‘洪启禧也。’”

○思悼世子叱责洪启禧是汉武帝时的逆臣江充，而“（洪启禧）少不畏怵，乃敢勃然曰：‘邸下宜熟看《阐义昭鉴》。’”

第一个事件是年幼的思悼世子向英祖称，对景宗不忠的人“岂有忠于殿下之理乎”。该发言可以被解读为是在批判老论。听到该发言的英祖认为思悼世子见识高明，并称思悼世子是景宗的转世。这是在批判英祖的支持势力——老论与荡平派，英祖怎么可能会称赞他？第二个与第三个事件是宰相向国王抛出的令人震惊的发言，以及权臣与世子顶嘴。考虑到朝鲜严格的君臣关系，这也令人难以接受。上文提到的《阐义昭鉴》是1755年罗州挂书事件后，朝鲜朝廷颁布的记录讨伐少论、南人过程的书。

像这样，《壬午本末》由来源不明、令人怀疑是否发生过的短篇记事罗列堆积而成。加之几乎不存在可以验证其真伪的其他信息，因此很难将其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

现代的“党争牺牲说”

像传闻一样流传的党争牺牲说被收入成乐熏的《韩国党争史》（《韩国文化史大系2》，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1966年），这也是该说法首次被学术著作所采用。成乐熏说：“正祖是贤明的君主，我相信他绝不会为制造生父思悼世子的无罪而对是非持有黑暗的见解。”他同时依据正祖撰写的与思悼世子相关的文字来树立主张，即成乐熏未能逐一考察史料与事实，而是在正祖是值得信赖的国王的前提下展开讨论。本应与研究对象保持客观距离的学术著作从立论开始就存在问题。

在《韩国党争史》中，作为“党争牺牲说”的证据而被提出的只有《壬午本末》中出现的若干传闻，即便如此，成乐熏将此作为有力证据，从基本事实关系开始就犯下错误。

世子代理听政的当年，庆尚道儒生赵进道登科。正言李允郁上疏请求削去赵进道的科名。这是因为赵进道属于南人党，他的祖父赵德麟在上一年上疏，称辛壬去世的金昌集等人是逆贼。赵德麟死于流放济州的途中，所以不能让他的孙子登科。世子不允许削去赵进道的科名，但老论向英祖告发了此事，英祖怒于世子的处理，立即下令削去赵进道的科名。（《韩国党争史》，第380页）

成乐熏认为，“赵进道的削科事件”，即取消赵进道科举合格资格的事件是展示思悼世子与英祖党派立场差异的代表性事件。成乐熏称该事件发生在“世子代理听政的当年”，即1749年，但实际上该事件是在十年后的1759年发生的。到了1759年，世子的病症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无法因政治问题与父王对立。《英祖实录》等资料也未展现在处理该事件的过程中，思悼世子与英祖存在立场差异。崔凤永亦在名为《壬午祸变与英祖末期正祖初期的政治势力》（《朝鲜后期党争的综合性检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2年，第256页）的论文中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思悼世子并未强烈提出反对意见，只是模棱两可间被强硬派拖入立场尴尬的境地。就思悼世子代理听政时的态度，朴光用也在《英祖与正祖之国》（蓝色历史，1998年，第104—105页）中表示：“虽说是思悼世子在代理听政，但重要的实务事案大都是经过备边司的讨论后处理的，重要的政治事案总要获得英祖的批准才得以决定，因此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可以说，《韩国党争史》至少对思悼世子的死因问题未能提出任何可信依据。崔凤永亦批判成乐熏的该书：“不仅内容粗略，而且错误严重。”

李银顺的《〈恨中录〉呈现的思悼世子死因》（1968年）等一系列文章将成乐熏的“党争牺牲说”变得更为具体化。李银顺的论文最终结集为《朝鲜后期党争史研究》（一志社，1988年）。李银顺也和成乐熏一样，以正祖的文章为基础，批判《恨中录》的观点，从而提

出“党争牺牲说”。她认为《恨中录》是“惠庆宫洪氏以回忆录体例编写的自我辩解”，《英祖实录》则是“编纂者多属于老论一派，所以不能排除掩盖该事件的可能性”，而通过正祖的文章，“不仅可以了解思悼世子的一生，还可以找到壬午祸变准确始末的线索”。与成乐熏类似，她给予正祖的文章毫无批判的信任。

李银顺以正祖的文章为基础，认为不能称思悼世子为病人，思悼世子不仅正常，而且优秀。他在代理听政时，不仅实施了为民的税收政策，而且因为果断做出了违背英祖意愿的独立政策判断，与英祖正面对立。父子间的政治意见分歧导致了思悼世子之死。但李银顺的观点源于误读思悼世子的行状。

首先，我们来阅读一下她所谓的思悼世子在代理听政过程中做出了独立的政治判断的例子。

甲戌年，……太学儒生以斋隶持御赐银杯而夜出为逻卒所捕，遂捲食堂。教曰：大朝重儒之德意何如？敢因微事起闹，致令圣庙无人可乎？重推本兵长，仍命劝入斋儒。（《显隆园行状》）

李银顺将画线部分分别解释为“废除食堂”与“胆敢因小事闹事，所以降下了命令，因而圣庙中无人才正确”，从而将整段部分理解为思悼世子在没有与英祖商议的情况下单独“关闭成均馆的食堂”。（《朝鲜后期党争史研究》，第116页与第203页）该事件在《英祖实录》1754年正月二十八日条中有详细说明，即孝宗曾赐给成均馆所谓“赐太学”的银杯，后来逐渐形成了成均馆的奴仆夜晚持该银杯上街，哪怕违反宵禁，巡逻军士也不敢问罪的传统。当天成均馆儒生也以奴仆持杯，结果意外被巡逻军士抓获而受罚。成均馆儒生们认为这是巡逻军士在无视成均馆，因此采取了“捲堂”措施，即某种共同罢课。听闻这一事件的思悼世子遵照英祖之意严惩了大将。这样解读的话，此时思悼世子的判断是遵照英祖之意，而不是李银顺所谓的“在没有与英祖商议的情况下单独”决定。李银顺对该事件的分析，因对“捲堂”理解不足以及对“可乎”的错读而误解了文脉。

继成均馆事件，李银顺又称思悼世子“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与英祖产生意见分歧，父子之间形成对立。对立针对的是与英祖的即位义理名分相关的辛壬士祸。此时父子均引用中国典故来表明意见”。她没有具体说明父子围绕辛壬士祸的政治分歧在何处，可以推测或是上揭引文的延续部分，但无论在这一部分，还是在行状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存在可以视为思悼世子与英祖产生政治分歧而对立的内容。李银顺在误读了思悼世子行状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正如前文所述，解读正祖撰写的思悼世子行状并不容易，在解读时须极度小心。崔凤永也严厉批判了李银顺的论文，但就李银顺对正祖的文章的信任，他宣称：“这只不过是在未分析《英祖实录》或其他记录的情况下做出的模糊推定而已。”李银顺对《恨中录》的真实性提出了各种质疑，试图主张思悼世子死于党争，但最终没能提出支撑自身主张的依据。

李德一在《思悼世子的告白》中用小说笔调润色了这种贫乏的“党争牺牲说”。我将在下文中针对该书展开详细批判，暂且分析他提出的两件作为“党争牺牲说”的有力证据。

对“思悼世子反老论说”的批判

“党争牺牲说”的核心是思悼世子具有反老论的倾向，成了老论的威胁。李德一为阐述思悼世子的反老论态度，提出了若干论据，其核心是以下两点。一是围绕1755年罗州挂书事件（乙亥狱事）的处理，思悼世子排斥老论的主张，保护少论；二是他被关入木柜而死之前，向少论赵载浩请求帮助。总之，思悼世子反对、排斥老论，反过来保护少论，并试图依靠少论。

罗州挂书事件是少论一派在全罗道罗州贴出了表达自身不满之文的事件。英祖把此事件视为执政初期将自己陷入恐慌的李麟佐之乱的延续，并严肃处理了该事件。在三四个月期间，谋逆嫌疑人连续遭到审问，许多人因此被处决。李德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思悼世子与英祖不同，袒护了少论。当时上疏堆积如山，要求立即处死逆谋嫌疑人及其妻子，而思悼世子没有完全接受这样的要求，李德一因而主张思

悼世子站在少论一边。仅从几个事例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思悼世子试图救活嫌疑人，但英祖亦是如此，英祖也没有完全接受大臣们处死嫌疑人的要求。若从整体角度来看罗州挂书事件的处理过程，我们就不能断定思悼世子与英祖立场相反。朴光用也说：“对于乙亥狱事，存在主张有问题与主张没问题这两种观点，但没有发现能够直接掌握思悼世子立场的记录。”（《英祖与正祖之国》，第104页）

思悼世子向孝章世子嫔的兄长赵载浩求助也与此别无二致。在世子被关入木柜之前，朝中无人能帮助他。因此世子只有向不了解自己情况，远在他方的元老大臣求助，这就是少论领袖赵载浩。因而仅凭该事实，我们不能认为思悼世子本来就亲少论。虽然不是像《英祖实录》一样的官方记录，但《待闈录》也记载当时连洪凤汉都为保护世子而向赵载浩求助。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保护世子，根本无法追究是老论还是少论。崔凤永也认为，思悼世子向赵载浩求助是无可奈何之举。（前文，第260页）由此可见，所谓思悼世子是反老论亲少论而引发英祖的不满，最终走向死亡的“党争牺牲说”毫无根据。

“党争牺牲说”等阴谋论总是若有其事。如果抓住弱点而提出质疑，看起来会比一般说法更合理、更正当。但从整体上看，阴谋论往往本身存在更大的疑问。“党争牺牲说”若只是传闻的程度，倒是可以谈论，但要想成为学术假设，其依据与逻辑还远远不足。迄今为止的“党争牺牲说”只不过是误读与臆测的说法而已。没有任何事实是绝对的、完美的，我们只希望能出现更准确、更精密、更合理的学说。

第三讲 迷失方向的历史大众化：对李德一《思悼世子的告白》的批判

从孔洞窥见的历史

我认为，所有人都只能通过自己凿出的孔洞(peephole)来窥视世界。观察历史也一样，学识渊博的人拥有更多的大型孔洞，而学识浅薄的人拥有的孔洞非少即小，有眼光的人会占据视野更好的孔洞，差异无非这些。归根到底，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在观察世界与历史时，都只能从自己凿出的几个孔中窥视世界。

而历史只不过是使用适当的理论或方法论，有逻辑地对这些透过孔洞看到的情形进行编织的东西。因此，所有历史在本质上都具有局限性。我们之所以承认某段历史属实，不是因为历史本身属实，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可以接受构建该段历史时所使用的证据与逻辑。所以任何历史如果存在论据或逻辑上的问题，都不能被称作历史。

本章将探讨一册“历史著作”，即韩伽蓝(Hangaram)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德一撰写的《思悼世子的告白》。该书因“李德一”三个字广为人知，被评价为引领历史大众化的著作。另外，该书以小说体来叙述历史事件，也被称为融合事实(fact)与虚构(fiction)的纪实小说(faction)。不过该书虽被称为纪实小说，却并不是说它不是“历史著作”，因为作者与读者都将它视为“历史”。

但遗憾的是，《思悼世子的告白》并不能被称为以事实为基础的历史著作，其虚构的程度几近小说，而其小说性质上的逻辑又远不足支撑它成为小说，我将在下文详述为何要如此苛评该书。当然，在我指摘的内容中也可能存在看错的地方。就像李德一会失误一样，我也会犯错。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批判该书，因为其中的谬误不止一两处。整本书不仅逻辑崩坏，所使用的论据也错误百出。

对核心逻辑的批判

《思悼世子的告白》一书批判了惠庆宫在《恨中录》中提出的思悼世子之死的原因与背景。惠庆宫把思悼世子的死因归于狂症，认为英祖之所以把思悼世子关入木柜致其死亡是因为世子狂易。一位父亲因为子女狂易便将其杀害，这让人难以接受，疑点自然也会随之而来。但《恨中录》非常详细地叙述了这一过程：思悼世子自幼因性格挑剔的父亲英祖而饱受煎熬，精神疾病加剧，死前还做出意图弑父等荒谬举动，被英祖发现后，因涉嫌谋逆而被处死。

而李德一认为惠庆宫是为隐藏及歪曲事实而编造了这样的逻辑。他主张：思悼世子非但不狂易，反而很聪明。世子从小对少论派持同情态度，这种倾向外露后受到掌权派——老论派的牵制，最终与亲老论的英祖背道而驰。他因担心受老论操纵的英祖会攻击自己，便试图发起政变，结果落得死亡的下场。简而言之，李德一认为思悼世子是党争的牺牲品，而且惠庆宫因娘家是纯粹的老论派，出于自家与党派的利益、安全将世子置于死地。思悼世子之子正祖即位后把外祖家视为杀父凶手加以攻击，惠庆宫为辩解自家罪行而写下《恨中录》。李德一把《恨中录》视为具有党派偏论的虚假记录，称惠庆宫是为了娘家与党派而“把丈夫逼向死亡的恶妻”（《思悼世子的告白》，第25页）。

李德一的逻辑可整理为以下简短论点。

- ① 思悼世子并未狂易。
- ② 思悼世子亲近少论派。
- ③ 思悼世子受老论派的牵制而死。
- ④ 惠庆宫的娘家因思悼世子之事而没落，她为辩解而创作《恨中录》。

上述核心逻辑无一符合事实。

首先，思悼世子患有精神疾病之事并非只见于《恨中录》，像《玄皋记》这样的野史也记录了一些传闻，但不知有无必要列为证

据。英祖为思悼世子亲手撰写的墓志铭、思悼世子寄给岳父洪凤汉的简札、正祖对亲家金祖淳说的话等都是不可轻易忽略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直接相关者所说的思悼世子的“狂症”“郁火症”“病”都可以被理解为精神疾病。甚至《英祖实录》也有若干内容部分透露思悼世子患有狂症，例证如下：

上御兴化门，召各廛市民，下询曰：“昨日予有所见，（谓景彦书也。）知内司四宫，多债于市人。且汝有抱冤之事，悉陈无隐。”盖世子本病日甚，昼夜与掖属豪悍之徒，游戏失度，赏赐无限，内司尽空，乃敛市人之物以进之，掖属藉威势夺市人，怨言载路。上至是始知之，命市人等各言所负，命户曹惠厅及骑曹以偿。（《英祖实录》，1762年五月二十四日）

上述引文内容发生在英祖处死思悼世子前约二十天，其中提到的“本病”到底是什么病？思悼世子因病与掖属的豪悍之徒，即别监们一起游戏，那么这个“本病”就很难被视为某种肉体上的病症。虽然《英祖实录》没有明确说出世子患有精神疾病，但其叙述足以让人推测出这点。《英祖实录》中还有与之类似的其他记录，可以说像这样直接或间接提及思悼世子精神疾病的文字不止一两处。就算像李德一那样批判《恨中录》，也不能否认思悼世子患有精神疾病。

世子将继承一国大权，还会成为后世国王们的祖先，谁都不敢说他狂易，因而官方史料并没有详细记载思悼世子的严重病症。正祖对亲家金祖淳说：“景慕宫患候，人孰不知？”因此没有必要在官方史料中披露这种无须再言的问题。无论存在多少思悼世子狂易与否的相关资料，数百年后的人们也不敢妄加断定。但从各种证据来看，我们可以确认《恨中录》中所说的思悼世子的狂症是很难否认的事实。

即便思悼世子未曾狂易，从党争、老论派与少论派的对立中寻找其死亡背景的做法也是超出常识的推论。一国世子有何不满，竟豁命支持一方党派？这根本找不出合适的理由与合理的根据。如果他厌恶老论，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登上王位前隐藏自己的想法。如果思悼世子连这种常识性判断都没有，要为了少论而与老论对抗，也应该有一定的依据。但《思悼世子的告白》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合理的证据。

《恨中录》也提到思悼世子对少论派持同情态度，但问题在于“这是否达到了让整个老论派都感到危险的程度”。而且重要的事实是，思悼世子在世时，老论派与少论派在现实中并未形成严重的政治对立格局。少论派在权力斗争中已败下阵来，从现实来看，比起老、少论的对立，老论内部的矛盾反而更加严重。从《恨中录》也能清楚看到，这一时期的权力斗争主要集中在攻洪派与扶洪派之间，即惠庆宫洪氏一族的反对者与支持者之间。当时称这些人为南党与北党，或南汉党与北汉党，他们后来分别演变成僻派与时派。

惠庆宫认为是反对自己娘家的一派导致了思悼世子之死。她先指责“逆贼鲁、禧”，即金尚鲁与洪启禧，待贞纯王后入宫后，又把矛头指向金汉耆与金龟柱等贞纯王后的娘家人。少论派甚至未出现在她的批判中，她反而还多次提到少论派郑翬良曾帮助洪凤汉。

即便情况如此，李德一还是一直谈论老论与少论的对立，这让人怀疑他对18世纪朝鲜政治史的理解水平。另外，思悼世子临死前曾向少论派赵载浩求救，李德一认为这是亲少论派的思悼世子为抵挡老论派攻击而试图借助少论派力量，并将此视为思悼世子是老少论党争牺牲品的有力证据。

但是，如是解释这一事件让人难以理解。在此之前，思悼世子也从老论派人士那里获得过许多帮助，难道这就能说他是亲老论派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思悼世子已经无法再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了，连生母都放弃他了，还建议处罚他。也就是说，思悼世子再也不能向包括老论在内的周围人求助了，所以只能依靠少论派赵载浩。这一解释才符合当时的状况。若要解读某一事件，就需要相符的论据与逻辑。在学术上，我们应该警惕像李德一这样对某件事过度解读、强行科普的行为。

论点①主张思悼世子并未狂易，但反对证据更多；主张思悼世子受老论派的牵制而死的论点②与③与当时的政治现实不符；因此，认为惠庆宫为娘家辩护而撰写《恨中录》的论点④也不可能正确。李德一将惠庆宫撰写《恨中录》的动机归结如下：

思悼世子死后，惠庆宫的娘家丰山洪氏一族乘胜长驱，兄弟官至政丞，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望族，但偏偏就在思悼世子与惠庆宫的儿子正祖即位不久便走向了没落。其过程十分曲折，因为惠庆宫的娘家丰山洪氏一族被视为导致思悼世子死亡的主犯（又称“丙申处分”）。世人也怀疑惠庆宫是“将丈夫逼向死亡的恶妻”。如果无此没落，大抵惠庆宫也不会撰写《恨中录》。（《思悼世子的告白》，第24—25页）

李德一认为惠庆宫撰写《恨中录》的动机与正祖即位后惠庆宫娘家的没落直接相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恨中录》大致由三篇组成，其中只有一篇写于正祖时期，其余两篇都写于纯祖时期，正祖时期的部分也不是写于惠庆宫娘家没落的情况下，而是写成于没落的娘家再次见到曙光之时。李德一似乎连自己用力批判的《恨中录》的编纂过程都不甚清楚。

如此一来，《思悼世子的告白》的核心逻辑没有一个清楚把握住事情的脉络。2011年1月，李德一在网络上传了文字，针对的是我撰写的《对〈思悼世子的告白〉批判》一文，他忠告说：“要关注提出的逻辑框架，而不是纠缠细枝末节。”他似乎没读到我对其所述的核心逻辑，即“框架”的批评。另外，他仿佛认为历史的论据只是“细枝末节”，这句话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出自历史学家之口。如果没有论据与史料这种“细枝末节”，历史如何成为历史？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李德一引以为豪的这一“框架”实际上并非由他首创。

李德一所用的逻辑框架，即思悼世子的“党争牺牲说”在朝鲜后期党论书中非常常见：思悼世子未曾狂易，是在党争中遭到老论及老论一派的攻击而死。惠庆宫在《恨中录》中也提到了这种说法，并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进入现代后，成乐熏使“党争牺牲说”重焕生机，而将成乐熏的见解具体化的人是李银顺。

早在《思悼世子的告白》出版三十年前，李银顺就在《〈恨中录〉呈现的思悼世子死因》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假说，并进一步完善，在1981年的《韩国学报》上刊登了名为《〈显隆园志〉〈行状〉与〈恨中录〉的比较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被收录进她的著作

《朝鲜后期党争史研究》（1988年出版）中。通过一系列文章，李银顺首先对《恨中录》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因为正祖编纂的思悼世子墓志及行状里都没出现《恨中录》提到的世子身患的狂症。她还进一步得出结论，即思悼世子事实上很可能不是死于狂症，而是死于老少论的对立。但她不忘在结论后面附加了以下条件。她在第一篇论文中提到：“这里要明确的是，即便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但我并没有见到直接的支撑材料。”她在最后那篇文章中写道：“南人、少论等派把与父王英祖政见不同的思悼世子推到前台，试图颠覆保守性较强的老论政权，最后以失败告终，以此事件来解读‘壬午祸变’不是没有道理。……但我相信，要想完善这一心证，对少论派李宗城及南人蔡济恭等人的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她凭良心承认了“党争牺牲说”说到底只是一种学术假设。

可见思悼世子的“党争牺牲说”并不是由李德一首创，而是从朝鲜后期党论书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假说。但李德一却表现得像这一说法的创始人那样，“激烈回应”道：“我提出了主流历史未曾记录的其他框架，你不对这个框架进行正面批判，而是将若干部分视为问题，混淆了整个讨论主题。”当我指出这个框架以前便存在时，他回答道：“我查阅过几乎所有关于思悼世子的论文，但未曾听说过李教授的论文。”他拥有历史学博士的头衔，在撰写相关领域的著作时，竟然声称自己未曾看过如此著名的论文与书籍，不禁令人目瞪口呆。如果真的未曾读过，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是理直气壮地叫喊。《思悼世子的告白》没有对相关论著标注任何引用与参考。

李银顺虽然不断将自己的假说具体化，但也把根据寄托于后续研究，李德一以何为据而将这一假说确立为定论呢？现在我们来逐一看看李德一提出的证据。先说结论，李德一列举的证据“全部”来自夸张、谬误与曲解，甚至到了让人想要反问一句整本书里到底有没有一处算得上是证据的程度。在我看来，《思悼世子的告白》是一本从第一个扣子就扣错，总体上都是谬论的书，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它视为历史著作。

对《恨中录》批判的批判

正如《思悼世子的告白》的逻辑，某种程度上人们也会接受《恨中录》是谎言、惠庆宫是恶女的说法。如果这是事实，学界就应该澄清，哪怕没有明确的证据。毕竟在过往的事情中，有多少真相能被彻底查明？只罗列、沉溺资料的过分实证主义值得警惕，仅凭间接证据来构成合理逻辑的做法也可以采纳。但如果既没有任何根据，又没有合理逻辑，就绝对不能接受。那只是造假与谎言。

把太庙读作太祖陵

我先指出《思悼世子的告白》里史料解读的低水平错误。按《恨中录》的记载，思悼世子因年满二十二也未能陵幸随驾而深以为憾。李德一对此称，从《英祖实录》来看，思悼世子曾多次跟随英祖参拜陵园，所以《恨中录》是虚假记录。

惠庆宫在《恨中录》中提到，世子直到二十二岁也未能陵幸随驾。……但这只不过是惠庆宫为了展示父子间矛盾而故意捏造出来的谎言。世子在此之前已多次随英祖参拜陵园，早在惠庆宫首次如此主张的四年前，即英祖二十八年（1752年）二月，英祖前往太庙（太祖之墓，即健元陵）与永禧殿，以及次年即英祖二十九年（1753年）七月前往太庙时，思悼世子就随驾左右。另外，英祖在同年十二月赴太室及次年元旦陵幸太庙时，世子也一样跟随其后。（《思悼世子的告白》，第181页）

李德一称，思悼世子事实上已多次随驾陵幸“太庙”，惠庆宫所言为虚。他竟然把“太庙”解读为“太祖之墓”，这一误读实在令人无语。太庙并非坟墓，“太庙”的“庙”指的是祠堂而不是“墓”。太庙即宗庙，是位于首尔钟路边、昌德宫之下的王室祠堂。李德一连“太庙”与“太室”（即“宗庙”）这么基础的历史常识都不懂，就对《恨中录》提出批判。他把太庙理解为位于京畿道九里市的太祖之墓，认为思悼世子随驾到了那里。

思悼世子居住的东宫位于昌德宫，与宗庙在同一院墙之内。虽然现在宫殿遭到损坏，有一条大道分割昌德宫与宗庙，但两处原先是在同一院墙内的建筑。因此，前往太庙与随驾陵幸这种大型外出活动不

是一回事。李德一将太庙误读为太祖之墓，把思悼世子前往位于自己住处前方的宗庙之事视作去了数十公里外的健元陵。

温阳之行的规模

再来看一下李德一为证明《恨中录》不可信而提出的另一个例子——1760年七月的思悼世子的温阳之行。和其他先行研究一样，李德一将思悼世子的温阳之行视为他未患狂症的证据，而《恨中录》也称这次出巡非常神奇，思悼世子竟毫无差池地回来了。有了温阳之行一事，思悼世子患有狂症与否的问题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只是李德一的如下叙述的确存在问题。

《恨中录》称这次出巡：“幸行威仪，虑其萧条不成说。故小朝欲多率前陪，快闻巡令手之声，壮其吹打而行，大朝不得已而送之，岂欲如是铺陈？”而李德一认为这种说辞与事实大相径庭，因为《英祖实录》记录了这是乘辇而出，“仅护卫兵力就多达五百二十名的庄严行列”，绝不是“萧条不成说”。他认为惠庆宫为了展示英祖没有给予思悼世子应有的待遇，故意曲解了出巡规模。

在说明行列的规模与水平之前，我们需要先考虑一件事，才是做学问：必须通过比较其他行列来看看“五百二十人的行列”到底是什么程度。如果是县监、郡守级别的出巡，这种程度可以说是特别大的规模，但对于世子这样代理一国国政的最高掌权人而言，我们需要单独考虑这种程度究竟是怎样的水平。金芝英的最新研究表明，在都城内与都城外的出巡，规模不尽相同，都城外的出巡通常会出动四千名以上的护卫军。当然，这是国王的出巡情况，世子的情况会存在差异，而且随着时期与目的地的不同，规模也有所不同。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自然很难把握一般情况下的出巡随行人员数目。但我要强调的是，没有这样的比较，就不能草率地判定行列规模，更不能以随意判断而得出的结论来批评其他史料。

仔细阅读《英祖实录》的话，此次行列的确就像《恨中录》的叙述一样，队伍寒酸而简陋。就在温阳之行的当月，《英祖实录》中另一则记录提到：“师傅宾客，无一人从之者，识者忧叹。”（《英祖

实录》,1760年七月十八日)明明是世子的出巡,世子的师傅大臣及侍讲院的官官竟然无一人跟随,可见世子的出巡规模并不符合世子的地位,这点令识者忧叹不已。从《朝鲜王朝实录》一向不太积极记录国王的负面情况来看,这种程度的记述似可证明惠庆宫所言不虚,当时情况可谓严重,而李德一甚至不曾考虑到如此重要的相关记录。

封闭式解读

除了上述例子外,《思悼世子的告白》还列举了许多其他案例来否定《恨中录》的真实性,但其中似乎没有一件合理。

李德一首先怀疑惠庆宫对英祖与周围人关系的描述,以此作为否定《恨中录》的第一步。惠庆宫称英祖厌恶和协翁主,李德一认为这是谎言,因为从《英祖实录》来看,英祖在和协翁主临终前曾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亲赴其宅探视,可见惠庆宫所言为虚。(《思悼世子的告白》,第18页)另外,《恨中录》称英祖对惠庆宫爱护有加,而根据《英祖实录》的记载,英祖对长媳孝章世子嫔赞不绝口,却几乎未曾称赞过惠庆宫,李德一把这点用作否定的依据。(《思悼世子的告白》,第22页)

李德一所用逻辑的特征是封闭式结构,仿佛完全不去考虑其他思维方式的可能性。厌恶女儿,所以连她最后一面都不见,但就不能想一想这样的父亲会被外界怎样评价?当然,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这一时期,英祖正因洪準海的上疏等事而勃然大怒,说要把王位传给思悼世子(后文将详述)。英祖赴翁主家宅的原因不能以仅出自对女儿的爱来考虑,还存在各种可能。另外,英祖对长媳孝章世子嫔赞不绝口是因为她早已不在人世。人们公开称赞逝者的情况很多,对生者却难以做到,事理如此。虽然不一定是恰当的比较,但在《英祖实录》中几乎也见不到英祖称赞十分珍爱的和缓翁主。

此外,以下例子也能说明《思悼世子的告白》对《恨中录》的解读错得离谱。李德一写道:“惠庆宫在《恨中录》中称和平翁主缓解了英祖与世子之间的矛盾,但考虑到和平翁主的死亡时期,这一主张也令人摇头。(中略)但到那时为止,仍难以找到英祖与世子之间存

在严重矛盾的证据。”（《思悼世子的告白》，第23页）而实际上，《恨中录》也不曾提到和平翁主在世时，英祖与思悼世子之间存在“严重矛盾”。

和平翁主在思悼世子十四岁时就去世了。那时思悼世子尚未代理听政，病症也未严重。《恨中录》只是说和平翁主在世时很好调节了英祖与思悼世子的关系，大家勉强相处得挺好，但和平翁主去世后，再也没有人能扮演这个角色，令人感到遗憾。李德一甚至编造了《恨中录》里没有的话，继而反过来将此当作批判的材料。

倒转过来阅读原文

“寡人，思悼世子之子也”

李德一的其他书中也出现过只截取资料的一部分，180度推翻原文意思的情况。吴恒宁在批判李德一的另外一篇文章时，曾指责他通过“断章取义”来曲解史料。《思悼世子的告白》中也出现了两处这样的事例，这一部分对书的整体逻辑来说非常重要，因此问题显得格外严重。他颠倒了史料的意思，并以此为立论提供依据。

因《思悼世子的告白》而出名的句子莫过于“寡人，思悼世子之子也”，这是正祖即位当日对外宣布的话语。思悼世子死后的1764年初，英祖下令将孙子，即正祖过继给孝章世子。孝章世子是思悼世子同父异母的兄长，早已去世，也就是说英祖把虽然生父已不在人世，但俨然有生父的正祖过继给了早夭的孝章世子。从英祖的立场来看，他这样做是为了让继承王统的世孙免为罪人之子。但站在正祖的立场来看，父亲冷不丁地被夺走，加上这等于宣告了父亲乃罪人，他自然心痛。《恨中录》也提到正祖因此事而十分难过。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何在即位当日如此宣告。

问题在于，正祖即位当日的发言中蕴含的政治逻辑并不简单，从整篇文章来看，其主旨也与我们的先入之见截然不同。正祖当日说：“寡人，思悼世子之子也。先大王为宗统之重，命予嗣孝章世子。呜呼！前日上章于先大王者，大可见不贰本之予意也。”还说：“既下

此教，怪鬼不逞之徒，藉此而有追崇之论，则先大王遗教在焉，当以当律论，以告先王之灵。”当然，正祖也想尊崇生父思悼世子，但如果一即位就立即推翻英祖的重大决定，政局将发生巨变。正祖仿佛也很担心这一点，在自己尚未完全掌握政局的情况下，这可能会招致危险。所以说正祖的发言既稍微透露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同时也警告了意图扰乱政局的人。但李德一却这样解释这一部分：

正祖召见大臣于殡殿门外，发表了自壬午年（思悼世子死亡之年）以来深藏内心，一日不曾忘记的话语。

“呜呼！寡人，思悼世子之子也。”

大臣们惊骇于他即位后的惊世一声，曾将思悼世子逼向死亡的老论派尤其恐慌，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十四年前在木柜中悲惨死去的思悼世子复活的样子。（《思悼世子的告白》，第345页）

上述引用部分似乎参阅了《正祖实录》1776年三月初十日的记录，第一句“召见大臣于殡殿门外”与《正祖实录》完全一致。但从第二句开始，其内容不仅无法从《正祖实录》中找到根据，反而与上文介绍的《正祖实录》的内容完全相反。

实际上，那些未能正确领会正祖话语的人立即遭了殃。正祖的纶音发布不到一个月，李德师、李一和、柳翰申上疏为思悼世子申冤，结果被处死。当时大规模狱事爆发，许多人因此丢了性命。即便如此，同年八月，英祖的国葬刚结束，安东儒生李应元再次上呈了相似内容的上疏。这次正祖不仅处死了李应元与他父亲李道显，还索性把他们的出生地安东从府降级为县。正祖明确展示了纶音并非空话。

如此一来，现实中并没有发生《思悼世子的告白》里所说的事情：听到正祖的纶音后，“大臣们感到惊骇，老论派陷入恐慌”。当然，如果是惧怕正祖即位后的势力，那他们无论听到什么都会紧张。所以正祖才故意说些让他们安心的话，不过他们仍然无法放松。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存在这样的史料，历史著作也不会把“惊骇”“恐慌”等表述写在文面上。这是明显的谬误，是对史料的曲解。

把惠庆宫娘家与贞纯王后娘家视为一派

在《恨中录》中，惠庆宫最厌恶的人是贞纯王后的娘家人，这不仅包括贞纯王后的父亲金汉耆与兄长金龟柱，还包括因是自己婆婆而不能明目张胆说出来的贞纯王后本人。期盼思悼世子死去，策划阴谋的人是贞纯王后娘家人；思悼世子死后，密谋阻止正祖登上王位的人还是贞纯王后娘家人；正祖执政后没落了一段时间，后来凭借贞纯王后垂帘听政，在掌握权力时攻击惠庆宫娘家，最终杀害惠庆宫弟弟的人依旧是贞纯王后娘家人。据称贞纯王后娘家人在贞纯王后成为英祖继妃前与入宫初期都对惠庆宫娘家低头伏小，但在宫里站稳脚跟后立即与惠庆宫娘家对抗。无论阅读当时哪本历史记述（即使不是《恨中录》），这种程度的事实都是能够轻易获知的内容。这是18世纪朝鲜政治史的常识。但按李德一的说法，在1800年贞纯王后开始垂帘听政之前，贞纯王后娘家似乎与惠庆宫娘家保持着合作的关系。

以下是《恨中录》中有关鳌兴府院君金汉耆与他女儿贞纯王后金氏的记录。

“且己卯大婚后，鳌兴为国舅。其以儒生，不意间尊贵而凡百生疏。先亲以国恩至重，休戚同为之心指导之，若至亲然，俾不生愆。凡事顾见指挥，渠初则为之感激。余亦仰大妃殿（指贞纯王后），敢以不思入阙之先与年纪之多而一心恭敬。大妃殿所以待余者亦至极，无纤芥之隙，期以百年之相依。而形势张大，既知之后，渠则忌先入之人，负指导之意。”

金汉耆与贞纯王后为推翻世子倾尽全力，而洪凤汉家的方针是与这一势力“期以百年之相依”。换言之，洪凤汉与惠庆宫洪氏抛弃了世子，与贞纯王后家串通一气。所谓“形势张大”“负指导之意”指的是纯祖即位后，贞纯王后以大妃的身份垂帘听政，对洪凤汉家发起了攻击。（下划线为引用者所加，《思悼世子的告白》，第220—221页）

实际上贞纯王后娘家与惠庆宫娘家的矛盾早在贞纯王后入宫（1759年）后的1761年就已浮出水面，贞纯王后的兄长金龟柱上疏

弹劾了惠庆宫一家。即便李德一不太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但只要仔细阅读上引《恨中录》内容的后续部分，就不至于出现上述失误。《恨中录》的相关部分还记录了另一件事，1766年，惠庆宫父亲洪凤汉因继母之丧须居丧三年所以辞去官职，贞纯王后娘家便对惠庆宫娘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李德一未能全面掌握史实，只读了资料的前一部分，把两家的“对立”解读成意思完全相反的“勾结”。

如果按李德一的见解，就无法解释贞纯王后垂帘听政时为何会突然攻击惠庆宫娘家。也许正因如此，在上述的引文中，李德一未做任何前后说明，只强调贞纯王后攻击惠庆宫娘家一事。

空想的历史

《思悼世子的告白》中若干处叙述干脆脱离了历史著作的书写范畴，只能被视为小说，我们根本无从考究其叙述的依据究竟是什么。

正祖之梦

李德一认为正祖憎恶老论派，因为他们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但正祖却选择老论派金祖淳作为自己的亲家。为何如此？尽管这个提问本身就是错误的，但按李德一的逻辑，这是不得不提出的问题。他抛出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后，又从不着边际的地方找到了答案。他马上谈到了正祖之梦。

正祖为何会拣择老论派的女儿为世子嫔？无论时派还是僻派，老论都是妨碍正祖实现王权强化这一政治目标的绊脚石。尽管如此，正祖出人意料地选择老论派的女儿为世子嫔。这与他在显隆园中所做的梦有关，而对这场梦的错误解读招致了严重的后果。（《思悼世子的告白》，第385页）

到底是怎样的梦，竟让正祖把“政敌”之女定为儿媳？关于正祖在1800年正月十六夜间所梦，《思悼世子的告白》称：“正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于正月十六日亲赴显隆园祭祀，而后留宿斋室。当晚他做了一个与世子嫔拣择相关的梦。”正祖之梦的出处为何？李德一并没有列出根据。

然而按其亲家金祖淳留下的记录——《迎春玉音记》，正祖早在正月初三日便已向金祖淳许下了拣择他女儿为儿媳的承诺。《迎春玉音记》记载了正祖去世前在其所宿迎春轩中与金祖淳的密谈。该书作为一部由金祖淳撰写，于金氏一族秘密流传的资料，在历史学界早已广为人知。我们无从得知李德一所说的正祖之梦究竟是什么，哪怕这场梦是事实，但按《迎春玉音记》的记载，金祖淳被定为亲家的时间早于此梦。如果无法证明《迎春玉音记》所传之事为虚，那么李德一的逻辑就站不住脚。

英祖传位事件的背景

《思悼世子的告白》第四部最后一章《以何面目去见皇兄？》与第五部第一章《如果有其他王子》均与1752年十二月发生的英祖传位骚动相关。两章讨论的是同一事件，本来不应该分章，而《思悼世子的告白》却将此分开进行叙述。这已让人产生疑问：该书是否错解了事件的实质？实际上，就算阅读《英祖实录》，我们也完全无法得知英祖的传位骚动到底因何而起。但《思悼世子的告白》不揭示出处，就断定这是“英祖以即将到来的六旬为借口，彻底扑灭‘景宗毒杀说’的行动”。我们无法得知他究竟是根据什么资料而发表如此看法。

《恨中录》认为该事件的起源是老论派司谏院正言洪準海弹劾少论派领议政李宗城。但我曾经说过，惠庆宫对这一部分的说明有些令人难以接受。李宗城弹劾事件与传位骚动在时间上相距一个多月，而且我不认为这样的大臣上疏足以让君王决定传位。只要处罚洪準海就够了，而洪準海早在传位骚动前便已受到了处罚。

在我看来，最能说明此事件背景的资料是《待闈录》。《待闈录》称传位骚动的起因是思悼世子生母宣禧宫与当时深受英祖宠爱的后宫——文女的对立。文女仗着英祖的宠爱顶撞宣禧宫，英祖的母后仁元王后以扰乱宫中法度为由惩治文女，英祖听闻消息后便声称要传位于世子。英祖对大王大妃惩戒自己宠爱的后宫女子感到愤怒，他是为了向仁元王后示威才引发传位骚动。

尽管不清楚该记录可信度有多少，但按这一说明，我们能够更顺畅地理解对此含糊记录的《英祖实录》与似乎省略了相关内容的《恨中录》。无论如何，我们很难把握当时英祖传位骚动的来龙去脉，这不禁让人好奇李德一究竟是基于什么依据而断定其为“扑灭‘景宗毒杀说’的行动”。如果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如此叙述，这就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小说。不，也不是小说，而是空想。

小说式撰写方式

李德一总是像小说家描绘出场人物性格一样去描述历史人物的心境与意图，却不说明自己是如何得知其意图的。到此为止，考虑到这是一本大众历史著作，这种方式尚可接受。但问题在于他误解了人物性格。

当晚，英祖突然身着服丧时所穿的衰服，然后步行至崇化门外，伏地痛哭。世子对英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惊慌。但是，面对父王身着衰服伏地痛哭的情况，世子不能装作不知道，他也跟随英祖跪了下来。

英祖经过算计选择的示威场所在崇化门外。崇化门是孝昭殿，即“彰显孝道之殿”的外门。英祖这场丧服示威的意思是，自己之所以身着丧服，是因为世子不尽孝道，会导致朝鲜灭亡。（《思悼世子的告白》，第231页）

上述引文展示了英祖与思悼世子之间的矛盾。这一部分叙述英祖故意身着丧服跪到崇化门外，仿佛是为了谴责思悼世子的不孝。但这一解释与事实不符。《英祖实录》1757年十一月十一日条记录了这天发生的事情：“初更，上以衰服步出崇化门外，露地伏哭，东宫亦以衰服伏于后。崇化门即孝昭殿外门也。”

当时是该年三月去世的英祖母后仁元王后的居丧期，所以英祖身着丧服的行动并非突如其来，反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孝昭殿是仁元王后的魂殿，英祖在那里俯伏于地并不奇怪，而是理所应当。魂殿是供奉灵魂，实际上是暂时供奉神主的殿阁。换言之，魂殿是用

于供奉三年丧结束后将移至宗庙的神主的地方。英祖赴孝昭殿的意图是要向仁元王后进行汇报。《英祖实录》同日的记录中也提到英祖当日已经在孝昭殿举办过祭祀。他在崇化门外痛哭，分明是表达对思悼世子的不满。但不能像李德一那样解释，即不能以“丧服示威”“孝昭殿如何”的方式来进行说明。英祖理应穿丧服，理应去那个地方，孝昭殿也不是因为思悼世子而得名。

对李德一的先行批判

李德一因《思悼世子的告白》一书而声名显赫，之后又顶着历史评论家的头衔展开活动，至今出版了近四十种六十册的书籍。此外，他还活跃在各种有影响力的媒体上，执笔固定专栏。他以研究抗日独立运动获得博士学位，但目前的著述范畴横贯了韩国古代史至近代史。他自诩纵横韩国史全时期与各领域，正在撰写批判历史学界主流学说的具有挑战性的历史著作。他跨领域、跨专业的积极活动已经多次成为批判的焦点。据我的统计，这样的批判以版面公开刊行的就有四次。

首先是忠南大学名誉教授、汉学家赵钟业的批判，他针对的是李德一的《宋时烈与他的国家》（Gimmyoung出版社，2000年）。文章有几处地方以事实为根据进行了指正，核心是批判李德一以狭隘视角来看待宋时烈，可以说是对李德一闭塞视野的批评。但这一批评在学界与舆论界并不怎么为人所知。

其次是首尔大学韩国史系教授吴洙彰的批判。吴洙彰针对的是大众历史著作中有关“丙子胡乱”原因的记述，他批判了李德一的《生动的韩国史3》（humanist出版社，2003年）与李离和的《韩国史故事12》（韩吉社，2000年）。吴洙彰称：“上述这些错误评价与逻辑矛盾都是来自对事实的大量误解。”他指出了李德一的若干处史料误读之例以及随之而来的逻辑问题。

再次是韩信大学韩国史系教授刘奉学与成均馆大学汉文系教授安大会的批判。他们针对的是李德一主张的“正祖毒杀说”。刘奉学此前已经批评过二人化（笔名，原名柳哲钧）在小说《永恒的帝国》

（世界社，1994年）中提出的“正祖毒杀说”。此外李德一在《谁杀死了国王？》（蓝色历史，1999年）中首次提出了“正祖毒杀说”，该书在更换书名与出版社后重新刊行，获得了很高的人气。（《朝鲜国王毒杀事件》，茶山草堂，2005年）但随着2009年大量正祖御札被公之于世，“正祖毒杀说”重新成为问题。二人化的小说反正是虚构的，不是学术性事实争论的对象。但李德一的书不一样，因为他将其定义为历史著作。

“正祖毒杀说”的相关争论在新闻报刊上展开，但李德一突然抛出不着边际的逻辑，指责对方有出身问题。因此，争论未能继续，最终中断。李德一毫无道理地把刘奉学、安大会说成是老论与殖民史观的后裔，试图以此摆脱争论。后来，主要负责介绍正祖御札的安大会在他的著作中逐一批判了李德一的见解。正祖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毒死，现在谁也不能断言。但从纯粹史料解说的观点来看，李德一的见解可谓全无道理。

最后是全州大学历史文化系教授吴恒宁的批判。他围绕栗谷李珥的“十万养兵说”，详细指出了李德一的误读与曲解。但李德一对此不做答复，称吴恒宁提出了繁冗的版本问题。这是脱离了争议焦点从而回避争论。吴恒宁提出了作为历史理解基础的一手史料选择与解读问题，而李德一却将此推脱为“繁冗的版本问题”。普通人或许能这样说，但历史学者万万不可如此。历史学博士怎么能把史料说成是“繁冗的版本问题”呢？在我看来，想从争论中挣脱出来的人正是李德一。

此外，网络上也有不少值得一听的批判李德一的古代史与近代史撰述的声音，还有人上传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思悼世子的告白》的文章。就像这样，尽管李德一的著述受到不少批评，但他仍是世人熟知的历史著述家。问题出在哪里呢？

历史大众化的道路

《思悼世子的告白》是一部大众历史著述的代表作，将以前晦涩难懂的历史著作简单有趣地诠释出来。从图书销售量与舆论好评来

看，该书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在于它迎合了读者的感情。《思悼世子的告白》将《恨中录》视为“胜者的记录”，旨在复原被埋没在历史中的“败者的记录”，为含冤而死的思悼世子申冤。在这里，胜者指的是老论，而败者指的是少论；同时，胜者还指惠庆宫，而败者指思悼世子。在这一逻辑下，思悼世子之后的所有朝鲜国王都是其后代这一显然的事实被理直气壮地无视掉了。也就是说，书中出现了视思悼世子一方为败者的奇怪逻辑。思悼世子即使拥有圣君资质却还是被锁进木柜悲惨死去，读者们同情他并感到愤怒。另外，他们还感动于真相被掌权势力掩盖的通俗小说逻辑，“我竟然至今都不知道这段隐藏的历史”，罪恶感和愤怒一下子涌上心头。这是很难从事事计较与考证的过去历史著述中体会到的感动。

既然制造出这样的感动来试图贴近大众，那么他提出的论据或可不必个个都重要。为了贴近大众而简单解读历史，几处错误可能也是无可避免的。这就像不能指责一位画坛巨匠画错了路上的一块石头、一撮泥土一样。但如果他画出违背常理的画作，却硬说是事实，就不能置之不理了。更不能把石头称作鲜花，把鲜花称作泥土。即便是大众历史著作，我们也不能容忍曲解事实、描述出与真相不同画面的行为。这不是大众历史著作，而是假冒历史著作，它不属于历史著作的范畴。

就算把《思悼世子的告白》的逻辑与事实不符这点放在次要位置，书中提出的论据也没有一个具备充分的说服力。在我眼里，这只不过是一本使用学界的陈旧假说，并为迎合这一假说而夸大、曲解史料的著作。

即便如此，《思悼世子的告白》还是成了阅读界的畅销书与稳销书。该书于1998年首次出版，在2004年更换出版社后重新发行，本文引用的是新出版社于2010年3月22日刊行的第1版第17次印刷的版本。该书在很多地方都是“鼓励图书”或“推荐图书”，为初高中生及普通人广泛阅读。学生读者认为这是不会出现在学校课程中的真实历史，媒体已经多次高度评价了李德一的历史大众化工作，他毕业的

大学还设立了媒体人奖，并把他评选为首届获奖者，因此学生与普通读者很难否认其权威。如此一来，《思悼世子的告白》便被阅读界与教育界视为学界的定论。

《思悼世子的告白》取得了大众化的胜利，但无法成为历史。历史大众化不是迎合大众的历史关注点，这是不行的。在“历史”大众化中，绝对不能丢弃的是历史。只有成为历史，大众化才有意义。大众化历史不能是迎合大众感情的曲解的历史，而必须是提高大众历史意识的历史。所谓韩国史，不应该是公然只助长民族感情、煽动国粹主义的历史，而应该是能让人正视民族现实的历史。提高韩国人的自豪感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自豪感便歪曲历史。我们需要基于真实的历史大众化。

从某种角度看，历史小说或历史电视剧的历史歪曲影响反而没那么大。虽然有不少人把这种编造的历史视为真实的历史，但大部分人都知道它们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当然，制作者也认同它们的虚构性。针对这样的历史小说，历史学家还是会将它们斥为歪曲，抛出无数批评的文章，甚至连李德一都曾是其中的一员。

大众历史著作的作者主张自己写的是事实与历史，而大部分读者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因此难以找到对这种大众历史书正式而缜密的批判。这里指的不是针对一两处见解的批评，而是说见不到针对书本身或其作者本身的缜密批评，偶尔能见到的只是一时性的争论。作为讨论仲裁者的媒体不过是截取双方的部分意见进行传播，并没有积极分辨真伪的意图，就算问题不难辨别也是如此。当然，我期待媒体今后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大众历史著作曲解历史的问题不能只交给媒体来解决，何况报纸、杂志等媒体本身还受到了版面等各种限制。从根本上说，这是学界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各界要求加强韩国史教育的呼声日渐高涨。但如果一边要求加强历史教育，一边对这种曲解历史的行为不加批判，那么普通人最终便会产生历史不信任感或历史虚无感，“学这种荒诞历史干什么”的话语也可能出现。为了我们的学生，为了我们的历史，有必要对大众历史著作进行全面探讨。而这一工作要在学界——具体来说要在学会

层面进行。专家们必须给历史大众化指明方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基于真实历史而非“似是而非”历史的历史教育。

附录二 宫阙介绍

第一讲 环视朝鲜宫阙：思悼世子遗迹踏勘

宫阙的历史

所谓宫，即国王即位前后所居之处，或给有宫号的王室成员冠以的生前或死后居所（即祠堂）的称号。英祖与高宗即位前居住的“彰义宫”与“云岫宫”，惠庆宫洪氏的“惠庆宫”，思悼世子的祠堂“景慕宫”，英祖的生母淑嫔崔氏与思悼世子的生母暎嫔李氏的祠堂“毓祥宫”与“宣禧宫”都被冠以“宫”字。此外，还有在君王短时出行停留的地方建立的“华城行宫”与“温阳行宫”等“宫”。与这些“宫”不同，在位中的国王正式长期居住的宫阙——法宫只有数座。严格来说，符合这一条件的宫阙只有三处。

1. 随着朝鲜开国而于1395年竣工的景福宫，这是北阙。

2. 作为景福宫的离宫（辅助宫殿），分别于1405年与1484年竣工的昌德宫与昌庆宫，这是东阙。

3. 1622年光海君时期竣工的庆熙宫，这是西阙。

昌德宫与昌庆宫在《宫阙志》等书中被设定为单独之项，世人将其视为其他宫殿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实际上这两座宫与宗庙一起，原本就在同一堵墙内，墙内可以相对自由地往来。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国王从昌德宫迁至庆熙宫时，会被明确称为“移御”，但从昌德宫迁至昌庆宫，变更“时御所”时并不会这样称呼。从昌庆宫的中心殿阁——明政殿的布局中可以看出，国王在这里并不能对南面的臣子进行统治，这不是可以朝向“南面”的宫阙。按原则来说，礼法上国王在北，臣子在南，但明政殿朝东，这说明昌庆宫本不是为国王使用而建立的宫阙。昌庆宫最初是为大妃建立的居所。因此，昌德宫与昌庆宫通常被视为一座宫阙，又因位于汉阳东侧，而被称为“东阙”。

不把德寿宫纳入法宫可能会让人诧异。德寿宫原本是壬辰倭乱时逃难归来的宣祖临时停留的地方，当时汉阳的宫阙全被烧毁，国王无处可居。德寿宫当时被称为庆运宫，之后又因仁穆大妃被幽禁于此而被称为西宫。高宗在俄馆播迁后的1897年认为此地靠近俄罗斯公使馆，于是在此建造新房居住，并于1907年将其命名为德寿宫。高宗将德寿宫作为法宫且停留了一段时间，但从停留时间不长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德寿宫的离宫色彩非常浓厚。

按照位置，景福宫被称为北阙，昌德宫与昌庆宫被称为东阙，庆熙宫被称为西阙。景福宫在朝鲜王朝初期被短暂使用，而从世宗时期开始，国王们几乎都住在东阙。据说历代国王都回避景福宫，理由是这里曾发生过王子之乱等王室凶杀事件。壬辰倭乱爆发的1592年，景福宫被烧毁，直到1868年的高宗时期才重建。但是重建后，高宗也没有继续留在景福宫，此后的纯宗也主要生活在昌德宫。

东阙是整个朝鲜王朝时期国王们使用时间最长的宫阙。可能是因为规模庞大，供奉历代国王神位的宗庙也位于同一堵墙内，便于国王留居。国王们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东阙，也会暂时停留于西阙，而英祖是在西阙停留较久的国王。英祖在庆熙宫停留时，《恨中录》中称其为“上大阙”，而称思悼世子居住的东阙为“下大阙”。

朝鲜的宫阙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遭遇了磨难。庆熙宫被拆除的位置上建立起了京城中学（后改为首尔高等学校），昌庆宫则随着动物园、植物园等入驻而变为公园。虽然庆熙宫现已复原，但几乎让人找不到原型，甚至其正殿崇政殿都被拆毁后卖给曹溪宗，现已成为东国大学内的法堂——正觉院。至于昌庆宫，虽然现在改修并复原了剩下的部分建筑，但剩下的原来的宫中建筑并不多。除19世纪中后期新建的景福宫与德寿宫外，只有昌德宫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朝鲜宫阙原型。

像这样，宫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是与在那里生活的主人共命运的历史空间。国王们从东阙迁往西阙，再从西阙迁往东阙，即使在同一宫阙里也经常更换住处。世子居住过后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世子嫔居住过大妃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另外，作为木制建筑的朝鲜宫

阙遭遇过多次火灾，烧毁的位置也长期被置之不理，需要时再重新建造。

宫阙的布局

宫殿空间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即治朝、燕朝、外朝。治朝是统治空间，位于宫阙的中心，拥有最庞大的建筑，包括举行国家重大活动的正殿及附近国王处理日常业务的便殿等。昌德宫的仁政殿是正殿，旁边的宣政殿、熙政堂等起到了偏殿的作用。宫阙的各级机关，即阙内各司位于治朝的前方与左右，也被称为外朝。另外，就像两班家中男性居住的厢房后面是女眷们的内屋一样，偏殿后面是国王的起居空间，也是王妃的住处——燕朝，而大妃的住处比王妃的住处更靠后。东阙之中，后宫大多居于东侧的昌庆宫区域，世子的东宫位于南侧的昌德宫与昌庆宫的交汇处。除了这样的居住与办公空间外，燕朝的后面还有宫阙的庭院。此处常被称为后苑、禁苑，既是王室的休息空间，也是保管蕴含宫廷重要传统的绘画、书籍等的收藏库。

昌德宫与昌庆宫现在虽然分属不同的管理主体，但原本在同一堵围墙内。东阙位于北侧北岳山向南延伸的地方，宙合楼与暎花堂所在的春塘台北侧的后苑是昌德宫与昌庆宫共同使用的东阙后苑，后苑下方有小巧的东山，以山丘为界，西侧的高处是昌德宫，东侧的低处是昌庆宫。东山再向南延伸，高低逐渐接近，其交汇处就是现在的乐善斋区域。

朝鲜宫阙的特征

宫阙是朝鲜的中心，它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与学术中心。与其他国家相比，朝鲜的中央集权程度较强，因此宫阙的中心性也非常强。只有了解宫阙，才能了解朝鲜。与其他国家相比，朝鲜宫阙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宫殿小巧而朴实。这可以说是把崇尚节俭的儒教理念反映到建筑上的结果。正祖晚年居住在昌庆宫迎春轩，雨季来临时经常漏雨。大臣们劝他进行全面修理，但正祖担心工程会扩大，只允许维修

局部地方，即国王带头力行节俭。在这种情况下，宫阙不可能修造得宏大又华丽。到了19世纪，王室在昌德宫乐善斋与后苑建造了演庆堂等连丹青都未涂刷的建筑物，这是因为国王及世子试图在自己家中实现淡泊的儒生取向与理想。

第二，国王在宫内务农。昌德宫后苑有一座像凉棚一样以草为顶的亭子，名为清漪亭，亭前是一小片农田，这表明国王在宫内务农。18世纪日本的朝鲜语译官雨森芳洲撰写的朝鲜文化介绍书——《交邻提醒》中，针对朝鲜与日本的文化差异有如下一段描述：

我人曾问曰：“国王之庭所栽何物？”朴釜知答曰：“种麦。”我人拍手笑曰：“噫！下国也。”国王之庭栽草花之属乃常事，一国之君不忘稼穡，亦古来人君之美德，故渠人以我人必同感也。而如是答之，反招我人之讥。将来诸事，须深思及此。

朝鲜的宫阙基本上是体现儒教理念的空间，而宫中的农田也是体现重农思想与爱民思想的空间。昌庆宫春塘台下有一方名为春塘池的大型池塘。原来此地曾有宽广的农田。英祖曾前往农田南侧的观丰阁，让思悼世子随侍左右，向他讲述农事之难；秋天还将从这里收获的稻谷分给大臣们。英祖对思悼世子来说是位苛刻的父亲，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为理解百姓的艰辛生活而努力的贤君。

第三是矮墙。任何国家的宫阙都设有严格的防御设施，而且严格管制普通人的出入，因此宫阙也被称为禁宫。但朝鲜宫阙的围墙低矮，与开挖宽阔的防御用水道——壕子而把宫阙建得像岛屿一样的日本宫阙，以及用高耸厚实围墙围起来的中国宫殿相比，只有民间普通富贵之家的家墙那么高，只要两个壮丁齐心协力，就能翻越。围墙低矮一方面可以说是展现了王室对外敌和内乱的担忧较少，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与百姓的隔阂程度相对较低。朝鲜的宫阙是让国王与百姓可以沟通的宽广的开放空间。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最终步骤在宫中举行。宫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可以容纳许许多多的人进宫参加科举。在宫中举办的科举考试中，最有名的是被称为“春塘台试”的在昌庆宫春

塘台进行的考试。在《春香传》中，李道令遇到的科举试题里出现了“春塘春色古今同”的诗句，可见春塘台非常著名。正祖在去世的那一年，即1800年三月二十二日，于昌庆宫春塘台下的观德亭与观丰阁之间举行了廷试，应试者达到103579人，提交答案者有32884人。当时汉阳人口只有二三十万，竟有十多人涌向如此狭窄的考场，不难想象考场的混乱情况。这也反映出，宫阙对百姓来说是一个宽广的开放空间。

朝鲜的淫谈稗说集《纪伊斋常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庆尚道丰基的一位乡村儒生为参加科举来到春塘台，写完答案却找不到交卷的地方，最终把卷子扔到考场的梨树上而后离去。另一位书生捡到了这份考卷交了上去，高中状元。这个故事反映了科举考场的混乱状况，但同时也展现了朝鲜宫阙是对乡村儒生都打开宫门的开放空间。

踏勘一 景慕宫

昌庆宫正门弘化门朝向的马路对面是首尔大学医院，该地原来是王室的庭院含春苑。思悼世子去世后，在该地的一侧建起了世子祠堂景慕宫。景慕宫存续了近一个半世纪，1899年思悼世子被追尊为庄祖，其神主被迁往宗庙后，景慕宫失去了原来的用途。1907年，大韩医院在景慕宫旧址旁建立，后来成为现在的首尔大学医院，景慕宫位于首尔大学医院本馆的后面。

现存的景慕宫遗址只有被称为“含春门”的三间门与通往景慕宫正堂的石阶。从当时的平面图来看，“含春门”就是“内神门”。景慕宫是朝鲜最大的私人祠堂，大概相当于供奉历代国王神主的宗庙的一半大小。这既展现了正祖对父亲的心意，同时也展现了作为国王的生父，无人像思悼世子一样长期无法被追尊的历史。

原来思悼世子的祠堂位于汉阳北部的顺化坊（景福宫西侧），也被称为思悼庙。1764年春，英祖下令将正祖过继给孝章世子，正祖便脱去了为父亲守丧的丧服，思悼世子的神位也被转移。这年夏天，正式丧礼结束后，思悼世子的祠堂被迁到现在的首尔大学医院的位置，名为垂恩庙。正祖即位后改建了垂恩庙，并改称为景慕宫。

正祖首次改建景慕宫之时，从昌庆宫弘化门出宫再经过景慕宫日瞻门进行参拜。1779年，为了方便参拜景慕宫，又在昌庆宫北侧另建了用于参拜的月觐门。他经过昌庆宫月觐门，进入景慕宫迨觐门，再登上山丘，经过日瞻门进行参拜。正祖为在无法亲自参拜时也能见到父亲，于景慕宫望庙楼挂上了自己的肖像。

踏勘二 昌庆宫

月觐门

月觐门之意是每月都要参拜的门。正祖经过该门出宫，登上东侧首尔大学医院的山丘，经过日瞻门进入景慕宫。日瞻门之意是每日都瞻望，据推测，该门位于现在首尔大学医院主楼西北侧的语言教育院的附近。可以说，该门有每日瞻望，缓解对父亲的思念的寓意。

月觐门西侧也有山丘，这就是在地形上划分昌德宫与昌庆宫的界线。此处分别有正祖居住的诚正阁（及重熙堂、观物轩）与惠庆宫居住的慈庆殿。正祖晚年住在昌庆宫迎春轩，诚正阁、慈庆殿、迎春轩、景慕宫几乎位于同一条直线上。正祖与惠庆宫在自己的住处随时都能看到父亲与丈夫的祠堂入口。像这样，思悼世子的家人在世子死后仍然与他聚居在一起。

文政殿

把思悼世子关入木柜的场所文政殿，在处置思悼世子时是贞圣王后的魂殿。南侧是世子的住所——东宫，西侧是崇文堂，英祖在文政殿前庭把世子关入木柜。在处罚世子时，惠庆宫从德成阁派人到文政殿墙下探听世子的动静，这是几乎与文政殿连在一起的近在咫尺之地。墙外传来的声音如下。“父王、父王，吾之误谬甚矣。自今以后，惟命是从，读书且听所教，幸勿如是。”（《恨中录》，第133页）后来正祖出现，请求留父亲一命，但被赶到了文政殿东侧的王子斋室。之后英祖亲自严密封住的这一木柜被运到了世孙讲书院与承文院所在的崇文堂。与崇文堂相邻的勤读阁正是正祖的住处，可以说父亲就在儿子生活的地方离世。正祖的无限憾恨可想而知。

其他建筑

昌庆宫到处是思悼世子的气息。思悼世子生于集福轩，他的孙子纯祖也生于此。他自己的住处东宫更不用说，他在生命最后几年曾长期停留在祖母仁元王后魂殿所在的通明殿附近，他似乎非常思念生前给自己准备美食的祖母。现在也如此，通明殿周围山丘下有装饰秀丽的雅静之处，因此比其他地方更美好。他的妻子惠庆宫在住处景春殿生下了正祖，正祖出生时，思悼世子在胎梦中梦见了龙，并把梦中所见画出来贴在屋内。纯祖亦见到过那幅画，看来挂了很久。迎春轩作为正祖晚年的住处而出名，当时他的生活由纯祖的生母嘉顺宫朴氏负责照料。据说正祖经常召见让他满意的大臣来此处吃“家常饭”，但从未给贪于权势的金钟秀等人赐食。该记录出自《恨中录》。

踏勘三 昌德宫后苑

后苑是王室的休息空间，后苑深处的溪谷旁建有亭子，可以让因国政而疲倦的国王休息。思悼世子在英祖移御庆熙宫后，在后苑骑马射箭。朝鲜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宫殿内也有虎豹出没。思悼世子在此应该也打过猎。原先春塘台一带是宽敞的开放空间，所以经常举行武科科举。

沿玉流川而上，在美丽的枫叶林中，可以遇到许多拥有奇特屋顶的亭子，其中双顶亭子——尊德亭上挂着正祖的“万川明月主人翁自序”悬板。他说自己是明月，大臣与百姓是世上的众多溪流，溪流只有被月亮映照才会显露出自身的模样。该文章展现了能够完美操纵百姓与臣子的神王形象，与映照玉流川下莲花池的月光完美融合。正祖在统治期间建造了多个这样的悬板，并将它们挂在宫中各处，但现在只能在这里见到。

昌德宫后苑的山丘被称为东山。此处有许多栗子树，秋天散步时可以捡到掉在路上的栗子。纯宗时期，会在九月末或十月初举行所谓的“拾栗会”，王妃会奖赏捡到栗子的孩子们。但在1771年二月，因为栗子，英祖甚至下达了一种戒严令——宫城扈卫令。按惯例，这里收获的栗子会作为正月十五时所用的坚果分发给王室成员，但其中一部

分被送给思悼世子的庶子恩彦君与恩信君。听闻洪凤汉给他们送栗子的消息后，英祖怀疑比起正祖，洪凤汉更庇护的是思悼世子的庶子们，因此下达了戒严令。小小的栗子隐藏着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

第二讲 国王寝殿的风景：《大造殿修理时记事》

国王何时迎接初夜

国王与王妃于何时何地又如何迎接初夜呢？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很难知晓夫妻隐秘的卧室之事，更不用说严格强调内外之分的朝鲜时代了。这是九重宫阙中的国王寝殿，其中之事既不需要让外人知道，也不能让外人知道。因此世人无从知晓。

朝鲜的国王与王子很早就成婚。英祖在十一岁时成婚，思悼世子在十岁，正祖也在十一岁成婚。十岁的话，在现代是上小学三年级。在朝鲜时代，只有满十五岁才算成人，因此就算举办婚礼也不会让孩子们同寝一屋。那么他们是何时度过初夜呢？

1744年正月，十岁的惠庆宫与同岁的思悼世子成婚。惠庆宫在义洞别宫接受了新娘教育，然后入宫，在昌庆宫通明殿与新郎同喝一杯酒，举行了同牢宴。同牢宴是宣布两人合二为一的仪式，若在民间，就在当天度过初夜，但思悼世子夫妇年幼，所以当天并没有立刻举行“合礼”。

思悼世子夫妇直到惠庆宫十五岁成人后的1749年正月才举行合礼。同年正月二十二日举行了惠庆宫的冠礼，思悼世子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一日，即在他生日的次日举行了冠礼。该礼是成年仪式，思悼世子在婚前的1743年三月十七日就已经举行了冠礼。像这样，王子在婚前举行冠礼是常例，但在惠庆宫冠礼当天的深夜，英祖突然向思悼世子下达了代理听政令，并于当月二十七日向全国宣告由思悼世子代理听政。此日也是思悼世子与惠庆宫预定举办合礼的日子。思悼世子不得不在一日之内完成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惠庆宫将当日的情况记录如下：

英庙以晚得之子，为十五岁至于合礼，从容得见其滋味，此乃盛事也。未知圣意如何，忽下代理之令，即吾冠礼之日也。此后亿万事，皆由代理而起，岂不痛哉？（《恨中录》，第39—40页）

代理听政被认为是导致思悼世子死亡的原因之一。英祖在思悼世子夫妇度过初夜后立刻向全国公布由世子代理听政。思悼不是别人，是亲儿子，英祖竟然对儿子的合礼这一重大事情都不管不顾，惠庆宫不由地发出了长叹。

此外，十一岁时举行婚礼的正祖，在十五岁时的1766年十二月举办了合礼。（《英祖实录》，1766年十二月十七日）世孙嫔孝懿王后比正祖小一岁，生于1753年十二月十三日，当时十四岁。孝懿王后的冠礼在1766年十二月初十日，也就是在不满十五岁之前举行了冠礼。正祖已经年满十五，世孙嫔则即将过生日迎来十五岁，成为成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合礼似乎提前了半个月。考虑到这种情况，《恨中录》称正祖在同牢宴的当晚，与世孙嫔在光明殿中“过夜”，这样的“过夜”与其说是同睡一觉，不如说是同睡一屋。

正祖之子纯祖与思悼世子、正祖不同，不是以世子身份，而是以国王的身份迎娶王妃。1799年正祖为迎娶世子嫔下达了拣择令，并预定金祖淳之女为儿媳。但是1800年六月完成了世子嫔的再拣择程序后，正祖突然去世了。由于正祖的去世，纯祖的婚姻自然而然地被推迟。因为按照儒教礼仪，父母丧中不能举行婚礼。于是纯祖直到正祖三年丧结束后的1802年十月才举行婚礼。拣择的最终程序——三拣择是在此前一个月1802年九月初六日进行的。

大王大妃贞纯王后将纯祖与纯元王后的同牢宴场所定为昌德宫大造殿。思悼世子在昌庆宫通明殿、正祖在庆熙宫光明殿举行了同牢宴，但纯祖的情况有所不同。纯祖的婚礼是名正言顺的国王的婚礼，所以在王妃的住处大造殿里举办了同牢宴。

纯祖因父亲的三年丧而婚娶较晚，在十三岁迎来了十四岁的王妃。纯祖的生日是1790年六月十八日，纯元王后的生日是1789年五月十五日。纯祖虽然成婚晚，但是合礼较早。虽然无法确认精确的合

礼之日，但从纯元王后的冠礼于1803年十月初三日举行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办过合礼。纯元王后比纯祖大一岁，过了十五岁还没举行冠礼。她的冠礼与两人的合礼可能是在大王大妃结束垂帘听政而纯祖即将年满十五亲政的情况下匆忙举行的。刚刚结束“过家家”游戏的初中一年级与二年级的稚嫩的国王与王妃在全国民众的关心中度过了初夜。

纯祖的新婚寝殿

国王如何在装饰好的寝殿中度过甜蜜的新婚之夜呢？这本身就是隐秘空间，也根本找不到描绘寝殿的绘画。此外，现在的寝殿也不是以前的建筑，空荡荡的房中，不仅没有新婚房的气息，连寝室的温馨气氛都无法让人感受到。在资料几乎全无的情况下，幸亏存有一篇描写国王正式寝殿——昌德宫大造殿室内室外的文章。这是庆尚道奉化出身的乡村儒生李颐淳撰写的《大造殿修理时记事》（见《后溪集》）。

这篇文章记录了李颐淳参与大造殿修理工作中所经历的事情与大造殿的风景。当时是1802年，纯祖即将成婚。该年八月，大王大妃贞纯王后下令全面修缮大造殿。大造殿是国王夫妇举行同牢宴的地方，也是王妃终生居住的地方，同时还是国王的正式寝殿，因此修缮空置两年以上的大造殿是当务之急。

李颐淳是退溪李滉的九世孙，在通过生员试的二十七岁时，即1780年进入成均馆学习，1799年出任位于京畿道高阳的仁宗之墓——孝陵的参奉，开始登上仕途。他于1802年七月末出任负责建造宫中建筑与修缮等工作的缮工监奉事，以此为契机被选中参与大造殿修理工作。

乡村儒生登上仕途进入宫中就已经很荣耀了，而李颐淳进入了大臣们都不能轻易进入的宫阙最深处。那种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李颐淳的人生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他一生都在夸耀这段经历，而且把自己见到的景象像绘画一样详细地描写出来。李颐淳作为假传体寓言《花王传》的作者，在韩国国文学界广为人知，甚至

有人说他是汉文长篇小说《一乐亭记》的作者，可见其文学才能非常出众。李颐淳的这种文字展现力使得他可以细致描绘在别处难得一见的空间。

《大造殿修理时记事》大致由三个段落组成。第一段记录了参与修缮工作的经过，第二段记录了大造殿室内室外的风景，最后一段记录了修理工作后的感怀。

修理的经过与感怀

负责修缮工作的官厅是户曹，而负责修缮宫内各殿阁的是紫门监，掌管官厅经费支出的户曹别例房与紫门监共事。当时户曹判书是赵镇宽，他的父亲是朝鲜最早引进红薯的通信使赵曦。赵镇宽也是惠庆宫的从表兄弟，同时也是纯祖的姻戚——他是纯祖的儿媳神贞王后的祖父。实际上总管修缮工作的是户曹参判朴宗辅，他是纯祖的生母嘉顺宫的兄长，即由王妃的嫔舅指挥工作。此外别例房的郎厅是户曹正郎尹光心，他是曾历任工曹判书、汉城府判尹等职的尹东晬之子。

李颐淳于1802年八月十五日经过金虎门进入昌德宫，在延英门见到了尹光心。在此处等了判书赵镇宽一会儿，然后同行赴大造殿。他们经过端阳门，又走了数十步，抵达神佑门。神佑门是在内殿的差备门内。差备门是区分宫中殿阁内部与外部的门，无法带入内部的事情就在此处理。李颐淳终于进入了大造殿内部。进入大造殿的李颐淳察看需要修缮的地方、搬入修缮所需的物品等，立即着手工作。

十六日因月食而暂停工作，十七日正式开始工作。此日也收到嘉顺宫赐下的食物。《大造殿修理时记事》中记载了当日的工作。

于是贡人楔进火，长木楔进木，铁物楔进斫器及铁物，鸭岛楔进帚，修理楔进纸，小麦楔进糊，尚衣院进帘，济用监进帐，长兴库进席，义盈库进油蜡，平市署掌涂褙。木手、石手、泥匠、印匠、冶匠、加漆匠、涂褙匠、屏风匠、金工、画员各执其艺、各趋其事。其中使令者曰官使唤，举行者曰紫门军士，赴役者曰募军。各自衙门一时排进，而户曹总摄。使计士一员、书吏一名，分掌董役，汛扫其尘

垢，洗涤其污染，修筑其倾仄。石砌之不正者正之，木槛之伤者补之，丹雘之黝昧者改采，屏幃之漫漶者改饰，庭除之荒芜者锄治，窗户之剥落者加漆。新涂墙壁，复张铺陈。

二十日，贞纯王后赐下了食物，其他人用油纸包好食物送到家里，但李颐淳因为家太远而无法送回，感到非常遗憾。他把自己份内的两盘食物中的一盘送给了在司饔院值班的父亲友人——主簿金珩吉，另一盘送给了自己寄宿的主家。

修缮国王龙床前的灯台时，尹光心负责下面部分的画杆，李颐淳负责上面部分的玉台。画杆擦了一两次后焕然一新，但玉台尘垢深染，经过多次打磨洗涤后，才显现出本色。尹光心见此开玩笑说自己敏捷而李颐淳迟钝。李颐淳回答说：“钝敏虽相悬，玉石琢磨之功，何如竹木攻治之事耶？”于是尹光心笑着道歉。到了二十四日，所有修缮工作结束。

李颐淳感动于得以进入大造殿，乃至亲眼见到此处所挂先王撰写的“正心修身”“苍蝇月光”八字御笔。回到值房后，在记忆和感动被遗忘之前，他立即着手写下了文章。

李颐淳修缮的大造殿不是现存的大造殿，现存的大造殿是1920年新建的。1917年大造殿因火灾被烧毁，于是拆景福宫交泰殿移到此处。不过李颐淳见到的大造殿也不是1917年消失的大造殿，因为1833年十月发生的昌德宫火灾不仅烧毁了大造殿，还烧毁了熙政堂、澄光楼。

现在几乎找不到有关李颐淳见到的大造殿的其他记录。被推测为1830年左右绘制的《东阙图》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大造殿的外形，而记录了因火灾被毁的昌德宫重建过程的书册——《昌德宫营建都监仪轨》（1834年）中也留有一些记录与图像。此外，通过《宫阙志》等记录，多少可以了解到大造殿的历史，而通过1907年左右制作的《东阙图形》等书可以推测出大造殿的房间布局。但无论在哪，都无法找到有关大造殿寝殿室内情况的记录，由是可见李颐淳的文章具有很高的价值。

李颐淳描绘的大造殿

现在来利用《大造殿修理时记事》正式察看大造殿内外的情况，以下将摘抄原文的数个段落再加以解说。

殿在仁政殿东、熙政堂北最深处。中六间为正堂。左六间为东上房，右六间为西上房。东上房六房，西上房八房，前后皆有退，总之为三十六间。前后左右四方，皆设窗户及装子而无土壁矣。堂板之隙涂以纸，铺以旧地衣，乃以彩花新地衣加之。

大造殿是国王的正式寝殿，也是王妃的日常住所。有些国王还召大臣到大造殿处理政务。大造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中间有正堂，正堂左右有东上房与西上房。正堂是具有客厅功能的空间，东上房与西上房是寝殿。东上房与西上房分别被称为东温突与西温突。金用淑先生在《朝鲜朝官中风俗研究》中提到，东温突是国王的寝殿，西温突是王妃的寝殿，《大造殿修理时记事》也提到东上房被称为国王的正寝，即正式寝殿。但从《承政院日记》来看，肃宗与景宗主要住在西温突。

堂之北壁当中，设金笏屏两片，著以广头钉，其前设瑶池宴屏十帖。置龙床，床上铺龙文席，问之则安东席匠之所贡云。龙文席上，立交椅，椅前置踏床。左右列笔砚几案香火罐，床下东偏，立短檠而画竿玉台，其上挂诸窗户钥匙。堂之西偏，立月刀手旂于画机上。西南偏，立箠衡，其制如钟鐻样，涂纸两边，画以山水以障之，疑古所称树塞门也。东南隅，设红色方席，置铜鴈金蟾金鱼，而鱼口插金莲花。南偏两柱，挂大镜一双。北退两柱，挂中镜一双。南退两柱，又挂中镜一双。堂南二柱，南退二柱，各挂长剑一双，而以黄鹿皮为绶。堂南三间出入处，皆挂朱帘。南北退堂，始铺藁席，上加彩花席，席外边端，著尺木。

参考《戊申年进饌图》屏风中的“通明殿进饌”部分，就很容易理解大造殿政堂的器物布局了。这幅画描绘的是1848年通明殿举行的宴会的场景，通明殿被用作大妃的寝殿，规模也与大造殿类似。正堂的后墙放着两片金纸屏风，日本出产的金纸屏风最为有名，不仅出口

到中国，而且常会被作为礼物送给朝鲜通信使。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收藏的《源氏物语》屏风是18世纪日本制造的，推测是通信使从日本所获之物。《源氏物语》是11世纪的日本小说，该屏风每帖绘制六个小说场面，共十二个场面。绘有这种画面的屏风或没有任何画面的金纸屏风似乎被用来装饰正堂的最后面。后文出现的装饰大造殿所用的鹤金屏应该也是从日本进口的。

金纸屏风前摆放着十帖《瑶池宴图》屏风。《瑶池宴图》屏风描绘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西王母举行瑶池宴的空幻盛景。现存的《瑶池宴图》屏风中，罕有十帖巨作。大造殿中的十帖《瑶池宴图》屏风看来是特做的，因为宫中的《瑶池宴图》屏风逢成婚纪念（正祖）、世子册封（纯祖）、世子诞生（翼宗）等大事才被制作。《瑶池宴图》可以说是展现宫中的庆事、国王的长寿乃至太平盛世理想的画作。

箠衡似指在木架上镶嵌画板的插屏，尺木似指珠子。《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的尺木是如意珠的名字，与博山炉相似。据说没有如意珠，龙就不能升天，也有说法称这是龙背上的宝珠。

正寝三间，东壁立牡丹屏，北壁付九雏凤图，中两栋付苍蝇月光隶字，西付正心修身八分字，最中间一间房西壁立梅花屏，北壁立竹叶屏。东一户付梅竹画，铺黄花席，加彩花灯。每其上，设莲花方席一双，此是正中寝。左右及后诸夹室，或设屏风，或置衣装。南退堂悬龟甲镜一双，置火炉大如釜者而以盖覆之。

这是国王正式寝殿的室内景象。虽然无法准确掌握房间的布局情况，但东上房共有六间，其中有三间正寝，最中间的一间有正中寝。紧挨着中间的房间，左右两侧与后侧都有夹室，仿佛是在屋中再安置房间的样子。

三间正寝的东侧墙壁上摆放着画有“花中之王”牡丹的屏风。《京都杂志》称，宫中活动中摆放的济用监的大型“牡丹图屏风”也被士族们借走用于婚宴。此图有象征荣华富贵之意，其华丽的形象也很适合婚房。此外，北墙的《九雏凤图》描绘了九只小凤凰。凤凰是

象征朝鲜国王的动物，可以说九只凤凰幼崽表达了希望得到更多王子的心愿。《晋书·穆帝纪》等书中有凤凰引领九只幼崽的“凤引九雏”之说，这与东晋拓宽版图的穆帝相关，也被理解为宣告太平盛世的吉兆。

房内的两块木板分别写着“苍蝇”“月光”。“苍蝇月光”出自《诗经》中的《鸡鸣篇》。在该诗中，妻子称鸡已打鸣，而懒惰的丈夫说不是鸡鸣而是苍蝇之声；妻子称太阳已经升起，丈夫说不是阳光而是月光。诗歌的主要内容是训诫厌恶早起的懒惰丈夫，即劝告国王勤劳，同时也含有要王妃好好辅佐国王之意。

后文说这字迹是“先王”的，当时是纯祖时期，先王通常指正祖。从同一时期写下的《恨中录》来看，正祖被称为“先王”，英祖被称为“先大王”，两者有严格区分。但《承政院日记》1770年十月初八日条记录的英祖备忘记有云：“诗传苍蝇月光章，殿中书揭。”英祖非常喜爱“苍蝇月光”，不仅亲自写下字迹，又将其悬挂，甚至把它画出来，并在画上题字。（《列圣御制·月光苍蝇图赞颂》）也许李颐淳见到的是英祖的御笔。

在寝殿贴上了警惕懒惰的“苍蝇月光”与《大学》中的一篇篇名“正心修身”，这是要求国王端正心态，修身养性，哪怕在卧榻上都不能失去作为统治者的正确姿态。

国王的寝殿既华丽又沉静。如果立体地塑造这种形象，似乎会不太协调，但在寝殿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既不显眼又不沉闷的精致空间里，在彩灯闪烁的梦幻空间里，十岁出头的国王与王妃迎来了初夜。

西上房二间，南设影窗，余皆一间以户通之。北偏两房，皆置大藏矣。

凡寝室盘子装子，皆涂以白菱花纸，而以青箔纸为缘。窗户涂以草注纸，漆以蜡油。房室底则付油张板，铺彩花席。独东上房各间，则彩花席底铺黄花席为重席。外窗户矢门之内，兼设小装子为重户。

窃伏意东上房为临御正寝故也。屏风凡为十余部，而金屏一画七鹤，其余画仙人者，飞龙者，画珍禽奇兽名花异草者，不可胜记。

堂之北偏扁额曰积善无为，画大如肱。南曰思无邪，御笔。南退前扁额曰大造殿，今皆改金。惟思无邪三字，色不渝故不改。

西上房是王妃的寝殿。不知是王妃的寝殿没有着意装扮，还是因为不便言里屋之事，李颐淳没有详细描述。西上房的特别之处在于“影窗”，这是安装在推拉门内的可以防风与保温的双重门。《林园经济志》中称其为“映窗”，李裕元的《林下笔记》（1871年）称，这是原来在宫中使用的窗户，最近民间也开始使用。影窗能让在大造殿里度过长久时光的王妃感到更加温暖。第二段中描述了大造殿的窗户、天花板与地板布置。盘子指的是天花板上的纹样。

大造殿的南北悬挂着金字匾额，上面写着“大造殿”“思无邪”“积善无为”。“大造殿”即寝殿之名，“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意为“没有邪思”。另外，“积善无为”中的“积善”与“无为”都是常用之词，但两词连用的话，有退溪李滉之例。退溪在写给李宏中的一封信中表示：“天地无为而任运，人道积善以回天。”总而言之，就是多做善事，以求得天意的意思。

东西房南檐西檐，各悬藁帘二部。东檐揭遮阳，灶口皆遮以铁窗。南檐东门曰延春，西曰延秋。堂之南筑石阶，环以板墙。东西南三方。皆设门机，或以帐蔽之，独揭扁额于南曰景福门。筑御路，下七层阶，以抵宣平门。石阶上，造置石鸡。又立铁杖三枝，以铜索三条，贯于铁杖头，分属于西南行廊，总会于殿之南柱，所谓悬铃索也。东北隅有集祥殿而无屋脊，与本殿同。西北隅，有澄光楼而与本殿相通。北庭树以怪石花草，有幽闲之致。西偏行廊，即内人侍婢之所居处，并使修理。

以上描写的是大造殿建筑周围的景象。殿门前的露台即月台，以石头砌成的月台上方有板墙环绕，这在《东阙图》中也有呈现。原本孤立的内殿仿佛因板墙完全变成了一座要塞或监狱。

月台上放有石鸡。《宫阙志》中收录的大造殿《重建上梁文》（1834年）称：“房而鸣珮，陛而奏鸡。”人们相信鸡具有辟邪，即驱除邪恶的力量。因为鸡一打鸣，黑暗就会退去，光明的世界就会到来。《世宗实录·五礼》在解释“鸡彝”的同时，还引用《礼书》称：“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之形。春祀夏禴，裸用鸡彝鸟彝。夫鸡，东方之物，仁也；鸟，南方之物，礼也。”这是祈望石鸡像给万物注入生机的春风一样，把温暖、良善的气息带至大造殿。

悬铃索在民间也被当作呼叫下人的工具，所以大造殿使用悬铃索并不奇怪。1876年作为修信使前往日本的金绮秀第一次见到电信机后，曾将其形容为“舌铃索”而加以说明。（《日东记游》）可以说悬铃索是前近代的通信器具。但大造殿悬铃索的特别之处在于设置了三排，即可以向多处下达命令。设置在这里的悬铃索应是纯祖夫妇所用之物。纯祖的文集《纯斋稿》有题为《悬铃》的二十二句七言诗，其中有云：“殿庭深远难言传，玉阶铜索金铃悬。殿中一摇声闻外，言语传命莫此先。”

主要参考文献

《英祖实录》《正祖实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数据库。

《承政院日记》，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数据库。

黄胤锡：《颐斋乱稿》，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数据库。

朴宗谦：《玄皋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数据库。

朴夏源、朴齐大：《待阐录》，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数据库。

惠庆宫洪氏著，郑炳说译：《恨中录》，文学社区，2010年。

《庄献世子东宫日记》，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本。

《翼翼斋漫录》，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本。

金尚鲁：《霞溪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金龟柱：《可庵遗稿》，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印影本，2007年。

《金公可庵遗事》，收入《公车指南》，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本。

英祖：《废世子颁教》，收入权正忱：《某年记事》等。

赵翰逵：《壬午本末》，收入《紫桥小藏》，见《朝鲜党争关系资料集》。

金致仁等：《明义录》，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含《尊贤阁日记》）。

郑载伦：《公私闻见录》。

郑炳说译注：《惠嫔宫日记：现存唯一的宫阙女性处所日志》，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2020年。

郑炳说：《从核心史料看思悼世子的人生与死亡》，收入《思悼世子》，水原华城博物馆，2012年。

郑炳说：《宫阙之犬，思悼世子之犬》，收入《韩国学，画下图画》，太学社，2013年。

郑炳说：《开胃的甜辣之味：英祖的食性与苦椒酱之爱》，收入《18世纪的味道》，文学社区，2014年。

郑炳说：《历史电影化的一个事例：〈思悼(2015)〉》，《人文论丛》74，首尔大学人文研究院，2017年。

郑炳说：《从移葬过程所见的〈显隆园志〉的性质》，《藏书阁》43，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20年。

郑炳说：《围绕思悼世子之死的争议》，《东亚文化》58，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2021年。

翻译说明

1. 书中引用的《朝鲜王朝实录》等编年史料，史料虽为阴历日期，但原著中郑炳说教授按当今韩国学界的通行标注习惯使用阿拉伯数字标记日期，译文中阴历月日调整为以汉字标注，年份依然使用阿拉伯数字。

2. 史料引文若有汉文原文，则直接引汉文；若以谚文、日语候文写成而无汉文原文，则由译者自译。书中多次引用的《恨中录》为译者参考朝鲜时代的汉文行文习惯而译成。

3. 书中出现的韩国学者姓名的汉字，均为该学者的实际汉字名，但偶有无法查到的汉字名，则以“×××（音译）”标记。